

# 中国纪事

1932—1939

[德] 奥托·布劳恩著

## 出版说明

为了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除了编辑出版党史著作和资料外，还计划在今后有选择地翻译或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我党历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类书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歪曲史实和攻击我党、诽谤毛泽东等同志的内容。尽管如此，这类书中的史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故按原文翻译、翻印，内容没有删节。

《中国纪事》是这类书中的一种。作者奥托·布劳恩是德国人，1932年由苏联来我国，他在中国期间的名字叫李德和华夫。他积极支持和推行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他1939年回苏联，后回东德。六十年代中，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攻击我党的反动文章；1973年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主要记述了1932—1939年我党、我军的一些重要事件，并对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

本书由李逵六、郑伊倩、王亚汶、马其静、赵晓红、区延佳等同志译，李逵六同志校；并由李践为、王仲清同志作了校阅。

一九八〇年三月

##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在中国期间曾名李德和华夫。

作者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坏的影响，1939年离去。1941—1948年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从苏联返回东德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4年病死。

作者为了迎合苏联领导集团的反华需要，从他的反动立场和观点出发，记述了1932—193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均有所评述。

作者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书中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作者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以奴才自命而已。

本书根据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本译出，对原书内容译者未作任何删改。

# 目 录

## (内 容 提 要\*)

前 言 .....1—2

**第一章 出发地 上海 1932—1933** .....3—39

从莫斯科到上海 一个殖民地城市 对秘密工作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条路线、两种派别的形成 在中央苏区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中央苏区的巩固 蒋介石的第四次反共“围剿” 冯玉祥的抗日行动 中央军出征福建及其影响

**第二章 在中央苏区 1933—1934** .....40—109

一次冒险的旅行 在瑞金的最初感觉和印象 中央苏区及军队的准确情况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 瑞金党和军队领导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围剿”第一阶段的和局 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党和军队领导人掠影 天赐良机：蔡廷锴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哗变 广昌之战 关于短促突击战术的争论 突围的第一方案 毛泽东转向派别斗争 内线的战斗与第六、第七军团的牵制行动 最后的突

---

\* 德文本为“内容提要”。——编者



围计划 主力的战役行动，还是苏区的撤退？ 长  
征的最后准备 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被破获，与外界失  
去任何联系

### 第三章 长征路上 1934—1935.....110—200

中国红军的兵力 与项英夜谈 突破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加紧进行派别斗争 部队第一次改编 向贵  
州的胜利进军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背景及  
详细情况 遵义会议《决议》及其在党内权力之争中的  
作用 北部战事的失败 部队第二次改编 损失  
惨重的通过贵州和云南的强行军 横渡金沙江 会  
理政治局会议 强渡大渡河 长征目标：是新疆还  
是甘肃？ 与第四军团的会合 改称第一和第四方  
面军 任命张国焘为中国红军总政委 两个战略方  
案 毛泽东和张国焘争夺领导权 毛儿盖的妥协  
军队和党的分裂 政治局在巴西对张国焘的批判  
一方面军的第三次改编 长征的新目标：陕西 长  
征的最后阶段 到达陕北后的政治阴谋 长征的简  
短总结

### 第四章 陕甘宁过渡时期 1935—1937.....201—277

在陕北采取的最初步骤 共产国际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  
政治方针和毛泽东的篡改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 对政治路线的假纠正 扩大  
宁夏、甘肃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方针 同地方军阀洽谈  
反对南京中央政府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两面  
手法 一个新的全面内战的危险 第二和第四方面军  
的进军和战斗 与第一方面军的会师 四方面军主  
力的“西征”和失败，谁的责任？ 毛泽东破坏挽救“西  
征军”的努力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的军官逮捕  
人民审判和内战，还是谅解和抗日？ 历史的转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预 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  
新角斗 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斗争 1937年5月  
的“党代表会议” 陕甘宁“特区”民政和军事的变化

**第五章 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 1937—1939**.....278—357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目的和进攻行动 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对立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指示 毛泽东趁国民党失败进行投机 八路军的成就 王明和毛泽东对立 南京沦陷后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毛的战略问题 张国焘的逃跑和出党 瓦解国民党 日本占领军后方的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的退却战术和武汉的失守 八路军的观望态度 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是一个妥协吗？ 毛泽东的两面政策 平江事件 国共两党领导之间的公开冲突 战争爆发两周年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忠诚声明和战争宣言 从共同抗日到互相对抗 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我在延安的生活和毛的个人行为 陕甘宁的外国人 毛泽东同美国代表的第一次接触 “延安工作作风”的特点和它在六十年代对毛政策的影响

**尾 声** .....358—363

我回到苏联 莫斯科余波 后注

**附 录：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364—368

## 前 言

《纪事》这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奥托·布劳恩同志生于1900年，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列中进行战斗。1919年4月，他坚守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之上，二十年代又始终置身于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中，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干部，执行过党交给的许多责任重大的任务。在遭到魏玛共和国法律的迫害和监禁之后，1928年他才得以逃出监狱，并根据党的决定到了苏联。

1932年，奥托·布劳恩，这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前往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七年多充满战斗的生涯。他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先后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南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华北解放区工作过。中国人民解放军<sup>①</sup>南征北战，进行了横贯中国的万里长征，奥托·布劳恩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

今天，奥托·布劳恩同志作为许多苏联书籍的翻译者、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院的科学工作者，而

---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注

为大家所熟悉。为了表彰他在革命工人运动战斗中的伟大贡献，他荣获了卡尔·马克思勋章、祖国战争勋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其他许多最高奖赏。

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决定性阶段的直接见证人，本书作者回忆了他在中国活动的岁月，为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艰苦奋斗，展现了一幅发人深省的画卷。同时，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马列主义力量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经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观点，开始了他们对于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因此，奥托·布劳恩同志的《纪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对马列主义兄弟党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迪茨出版社

# 第一章

## 出发地 上海

### 1932—1933

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两周以后，我身着西装，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已经坐在横越西伯利亚的快车里了。列车把我带到边防城镇满洲里，从那里我继续乘车前进，在哈尔滨作了短暂停留。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几次旅行，象第一次旅行一样，都没有发生意外。

因为从南满铁路两边的高粱地里，时有中国爱国者开枪袭击，所以火车上有日本兵守卫。我乘火车先到大连，从那里又乘船到了上海。虽然沿途受到白俄分子和日本密探的严密监视，但总算安然无恙。

在上海，我起初住在礼查饭店<sup>①</sup>，这是一家外国人经常出

---

<sup>①</sup> 今浦江饭店。——译者注

入的旅馆，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建筑风格。过了几个星期，我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这样，我才有了社会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受怀疑地进行活动，我需要这种背景，因为与其他外国人不同，我既没有开设商店，又没有足以证实身份的职业。

上海这时呈现着一幅为帝国主义分子所统治的港口城市的典型景象。黄浦江流入长江的江面上，停靠着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军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外国人的城市管理机关用自己的警察执掌市政。市场上充满了进口货，主要是美国的进口货。外国人通过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通过军火买卖和鸦片走私赚得了百万钱财，在跑马厅、赛狗场，或者在无数的夜总会、跳舞厅、海员酒吧间寻欢作乐。

近旁，在港口和街道上，麇集着骨瘦如柴的苦力和乞丐。离市中心不到半小时汽车路程，就是中国市郊的废墟闸北。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上海时，把这个地区变成了一片瓦砾。当时外国人从他们旅馆和公寓的屋顶上，用望远镜眺望这场历时数周的浩劫，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仿佛自己是坐在剧场里。

此时上海是平静了。然而，假象迷人，蒋介石的警探们，依仗着国际警察的支持，白天把大的纺织厂查了又查，夜晚把中国居民区搜了又搜，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谁被搜捕出来，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叛变或者死亡。数以千计的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在这几年里被杀头，被枪毙，被绞死，不仅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武汉、广州和其他城市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参与这些有组织的

谋害行动的除了警察之外，还有同国民党合作多时的流氓集团和蒋介石不久前建立起来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是他们迫使共产党人完全转入了地下斗争。

因此，要对社会的冲突获得真正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冲突象火一样在地表之下微微地燃烧着，只是偶尔在罢工中或者在其他抗议行动中才迸发出来。

然而城市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情绪却是很容易感觉到的。这完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表现为一种公开的仇外心理，这决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在公众中显露出来的情绪，无疑地是一种真正的民族危机。然而这种情绪，却被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当作一种新的革命高涨，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上错误的估计，确定了不符合 1932 年至 1933 年中国现实力量关系的目标。关于这点，我以后再谈。

---

白色恐怖也使我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特别是在我们受到警告以后。1930 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

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调节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如上所述，秘密工作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是中国人，有“洁白无瑕”的护照，又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里居住，相对来说不太危险，但我们也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谨慎，在公开场合只同外国人交往，偶尔到俱乐部去，也尽量不要引人注目。

同中国领导同志接触却是异常困难的，同他们直接联系的只有尤尔特同志和我。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座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有两次我们又转了回来，因为没有见到安全信号，我们不得不到设立在办事处之外的紧急情况联络点去，来安排下次接头地点。后来才知道，这两次没有放信号是由于疏忽所致。除此而外，我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联络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没有发生过意外或者被捕事件。

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这两人都在苏联学习过，俄语说得很好，洛甫还在美国学习过，也会说英语，因此没有翻译我们也可以交谈。有时候，当然不太经常，参加这些谈话的还有其它中国同志，很可能有康生，不过我记不清了。以后大概还



有斯拉文(李竹声)和米茨克维奇(盛忠亮),他们是在1933年从苏联回来的,1934年被捕后成了叛徒。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上海,一方面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一方面同中央苏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主力部队(即所谓中央红军)的所在地,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以及临时的通讯员联络。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没有自己的电台,也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收发报机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同其他苏区和游击区,当时已经没有定期的联系,如果说有,也只是间或通过特派员和通讯员保持着这种联系,但他们在途中常常耽搁数周,非常影响整个工作的开展。同其他大城市党组织的联络,同国民党统治区工业中心的联络,还有同中央委员会设立在北京、武汉和广州办事处的联络,也大体如此。

阿瑟·尤尔特同志介绍我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当时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材料,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多次为她安排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会面。她关于苏区这几年战争真相和情绪的报导,几乎是逐字逐句纪录下来的,她总是把这些报导让我先看一看。虽然这些报导具有主观色彩,而且往往过于夸大,但对我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很有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史沫特莱同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有着个人接触。宋庆龄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因此同其他国民党的反对派,例如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同广东、广西两省省政府的代表,同流亡在香港的中国政界人士都有联系。

---

当我在上海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于中国政治状况和党内关系都没有足够的、清晰的了解，我所掌握的也只是些残缺不全的、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军事情报。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通过同阿瑟·尤尔特、博古、洛甫等同志的一系列谈话，我对于政治情况有了一个大略的、当然是相当不完全的了解，依据这种了解，当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发展的第三阶段，——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地概括，并没有顾及历史的分期。

第一阶段，大约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其重要标志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直到1925年他逝世时止。这一联盟政策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尽管在思想上尚未巩固的党内，存在着“左”倾宗派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里还是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组织，并且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广州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时重大的弱点，表现在反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剥削者的反封建农民运动的领导中。由于受到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推动，国民革命军在1926—1927年的所谓北伐中，夺取了中国南部和中部的政权。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1926年夺取了国民党领导权，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且在1927年同英美帝国主义分

子和国内军阀、封建主签订了契约，这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遭到了失败。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及在这次大会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虽然有某些反封建的倾向，但还不具备明显的一定的阶级性质。继续同国民党左翼实行联盟政策的企图，或者换句话说，分化国民党的企图失败了。以后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地仅仅依靠工人和农民来进行。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接着开始第二发展阶段，社会革命的口号代替了国民革命的口号。虽然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农民问题，但是许多人，包括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把它理解为一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只是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即那些大的财政和商业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一直作为革命动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是反动的；而工人和农民则统统按照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错误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被认为是革命的唯一动力。这就完全抛弃了同中产阶级的联盟政策，以后到了1930年就发展为“左”倾宗派主义、盲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党的领导中得到贯彻，就是历史上的“立三路线”。

两种情况促成了这条路线的产生。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横行，党的工人干部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业已失散；另一方面，由于原先国民军中的一部分革命部队，与农民游击队联合起来，举行起义，在中国中部建立了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这样，阶级斗争的重点就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从工人转向

农民，从政治行动转向军事行动。党的领导由于对自己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竟采取了先在一省或数省、后在全国夺取政权的路线，其方法就是通过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进攻，从农村根据地出发去包围和攻占大、中城市和敌人的中心地区。这样一条招致惨重流血牺牲的、冒险主义的极左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到1930年底才把它制止住，但是没有彻底纠正过来。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谴责了李立三的盲动进攻路线，改组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并把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在国际上经过考验的干部吸收了进去。至此，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三阶段，暂时是发展的最后阶段。据我知道，新参加常务委员会的首先有：王明（陈绍禹）、周恩来和原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被阶级敌人谋杀后，王明被选为总书记，但王明于1931年就到了莫斯科，直至1937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周恩来在政治局委员项英来了以后，于1931年底，前往赣闽苏区，担任新建立的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博古继王明之后担任总书记，同洛甫一起在上海领导着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但是，在新的领导人中间对于政治形势和革命进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又谈论起革命的重新高涨，并认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一观点受到了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人们把反对自1931年以来日益嚣张的日本侵略而引起的蓬勃兴起的人民运动，以及革命武装力量、根据地、苏区和游击区的

无可辩驳的增长，看作这一新高涨的契机。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整个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的削弱。因此同官方对形势的估计相矛盾，又常常有革命处在平静时期或低潮阶段之说。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赣闽苏区。毛泽东在项英和周恩来来到以前，把整个政治和军事权力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一旦蒋介石消除了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的一时冲突，毛泽东就把这种观点宣扬开来。毛泽东认为，苏区是白色大海中的红色岛屿，只要白区的统治者相互开战，这些岛屿就能立足，因此，必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攻击，但应避免他们联合了的力量。作为游击战中的一种军事方法，在苏区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战略。但是，据我后来所知，它作为政治准则却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人们在“高潮”和“低潮”之间争论不休、动摇不定的问题，而是对于革命根本问题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党的领导不同意说当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赞成民主革命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旧纲领，当然，就苏维埃的新的预兆而言（他们把苏维埃看作是一种工农革命民主的专政），就这个革命的前景而言，它将继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未来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谁也没有绞尽脑汁地去想过，这在三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据我们想，不过是为了争取城乡广大群众参加民族与社会解放斗争的一种手段。双重斗争产生了双重任务。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应该不顾一切白色恐怖，积极开展

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我想着重指出，早在1932—1933年人们就已经把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视为主要敌人，而直接的敌人，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则是国民党和各省的军阀。

当时的形势使每天都在防御直接敌人的苏区、特别是在毛影响下的赣闽苏区，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首脑、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视为第一号敌人。毛认为，为了打垮日本，必须首先打垮蒋介石。因此，同李立三时期一样，内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影响了苏维埃所实施的政策，例如，对富农和中农采取错误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在土地法上规定全部征用一切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不仅对阶级敌人，而且也对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甚至对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实行白色恐怖等等。因而，一段时期在赣闽苏区，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了。

至于提出反帝反封建两条战线不同的主攻目标，一时也很牵强附会，因为严酷的事实，尤其是1930年以来蒋介石有计划地向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酷事实，迫使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越来越片面地注意苏区和内战这一个目标。尽管有时发表了一些关于抗日的声明，情况也未能改变。赣闽苏区，从这时起称为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四中全会的决定，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并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这时党的首要任务，是把革命武装力量改编成正规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加强国民党地区的游击战。

据我们开始听到的一些暗示性的、不尽相同的意见来看，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党的领导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不坚定不移的。

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是法定的、不可缺少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文盲极为普遍，白色恐怖横行无忌——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层的知识分子，鉴于这种情况，就更应该加强培养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而毛泽东则相反，他在1927年以后一再声称，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领导作用，革命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革命的堡垒是农村。

与此相联系，他又在步李立三的后尘，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象1917年从德国转到俄国一样，现在又继续转到东方，转到中国。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从中得出结论，说什么苏联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进行一场战争，帮助革命的苏维埃中国；而胜利的革命的中国，其任务就是继续推动世界革命。如上所述，所有这些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完整方案，只是毛平时喜欢常用的一些简短的表述。我们也是通过交谈才逐步了解的。因此谁也没有给予认真的注意，以后的事态表明，这是极不应该的。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我们这些人一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我们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的代表，越来越明显的是后来形成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

和日本。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中体现，保卫它，使它不受冒险计划的破坏，不受敌人的打击，这是我们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

---

我当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相当混杂的政治形势。以此为背景，我把我在上海担任军事顾问的工作集中在：尽可能地如实了解日本军队和中国武装力量——抗日游击队和具有抗日情绪的国民党将领的部队——以及红军和用来对付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这两方面的部署和行动，第二个任务当然处于突出的地位。这样，对于形势的分析和以建议形式拟成决定的工作，就只好局限于唯一同我们保持定期联系的中央苏区了。我把拍摄在微形胶卷上的、附有草图等等的形势报告，好几次通过信使送到了莫斯科。

但要正确地估计中国红军的武装力量，却是困难重重，读者听起来一定会感到很矛盾吧。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相当了解的，有些是通过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里，几乎敌人的全部无线电通讯都被有组织地窃听和译了出来。相反，关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消息、部队的番号、部队的转移和战事，有一部分却不甚明了，甚至是互相矛盾和过分夸大的。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我对于革命武装力量及其根据地的情况还是获得了相当全面的了解。1939年底返回莫斯科以后，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下面这些与实际情况相当符合的材料，大部分是从报告中摘引出来的。



根据这个报告，1927—1932年在华中和华南一些农村的中国红军，主要是由三部分力量组成的：起义的农民、地方的绿林盗匪以及国民革命军和靠近国民党的其他军队的哗变部队。

第一批农民游击队，在1926—1927年期间国民革命军经过的地区，特别是在湖南、江西两省，业已产生。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在湖南由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秋收起义中，它发展成了一股可观的势力。据说，毛统帅下的第一师有四、五千人之多。然而，经过多次损失惨重、毫无成效的攻城之战，以及向深山逃跑退却，农民革命军第一师只剩下了几百人，其残部隐藏在江西境内的天然屏障井冈山之中，并从那里周旋于附近地区。毛的部队还从两股绿林盗匪中增加了在军事上相当可观、然而在政治上十分可疑的力量，这些盗匪许久以来就以井冈山作为自己的隐避之地，如今同毛部联合了起来。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提中国的秘密组织和绿林盗匪、又称为“土匪”的情况。1927—1936年十年内战期间，阶级敌人也把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划为“土匪”之列。这些盗匪很久以来，大部分都是由贫苦农民汇合而成，他们逃脱了封建的债务奴役，不时对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发动小规模战争，在有才能首領的军事领导下，他们逐渐发展为比较大的队伍，并往往为地方的军阀所器重，甚至合并成正规部队。以后，他们之中有些人蜕化变质，也同样放火勒索、抢劫杀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社会面目，而堕落成反人民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其余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那一部分人，则参加了

农民游击队，我在上面举例提到的井冈山上的那两股匪帮就是如此，或者象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贺龙指挥下的部队，开始时也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不过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很清楚。以后成了四军团根据地的湘鄂边区，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这些土匪在红军中并没有起过值得称道的作用，在政治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得到改造。

中国红军的基础和主力无可争辩地是由国民革命军中起义的部队构成的，在以后几年里，冯玉祥的国民军和中国南方诸省军阀的哗变部队也参加了进来。1927年南昌八月起义以后，这些部队的大部分（约一万人），在朱德、叶挺、方志敏以及其他共产党将领和军官的领导下向南方进发，到达湘赣地区，直至广东。因为几乎全部是所谓“铁军”的部队，即原国民党第四军的部队，所以这支部队开始时仍然沿用这个名称。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们动员了农民，创立了暂时的根据地。1928年初，朱德带领这支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汇合，当时毛泽东的部队还不到一千人，被编为第四军第一团。这两支力量以朱毛部队而著称，是以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骨干。

1928年7月，以彭德怀为师长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倒向红军以后，又有一些哗变的江西省部队增加进来，于是成立了第三军团。后来，大约在1929年年底，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旅在宁都举行了起义，这个旅成了董振堂指挥的第五军团的中心。

1930—1932年，中国南部的中国红军的主力，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起来的，中国中部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形成过程也大

体如此。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些零星的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到达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成立了红军第四军团。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贺龙创建了自己的根据地，组成了以后的第二军团。

红军的战斗行动最初纯系游击性质，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城镇得而复失，战斗时胜时败，实际上没有中央领导，它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江西、福建地区才建立起来。1929年，毛泽东利用中央委员会赋予他的过分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前敌委员会，甚至动用恐怖手段，使得省和地方党委隶属在前敌委员会之下，实现其指挥一切革命武装力量的企图，一些地方权力机关也不得不俯首贴耳。直到1930—1931年，才建立了相互之间有联系的、或多或少比较巩固的苏区和正规部队。

如果说在这以前拥有一些实力的地方军阀部队和省府官员还是主要的敌人，那末，这时的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这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巩固，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英国、还有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已经拥有一支用比较现代化方式武装和训练起来的军队，于是，蒋介石便在1930—1931年向最重要的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虽然敌军曾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但这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这几次围剿之所以失败，因为敌军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策略不符合有组织的游击战的新条件。敌人排成漫长的行列，在大部是丛山的地区迅速向前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更不用说是堡垒了，这样就使自己遭到突然的打击；又由于军事首领之间争权夺利，缺乏相互支

持，以致单个纵队、整团整师的敌人被围困在苏区腹地之中，被引诱到埋伏圈之内遭到歼灭。

这样一种战略，虽然在军事上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牺牲也很惨重。我们部队在战斗中，特别是在退却的时候，损失非常巨大，而老百姓的损失更为惊人，因为敌人一旦占领苏区，对老百姓越发惨无人道。在李立三时期，中央的冒险进攻策略，即毫无意义地进攻敌人的中心地区，其影响也十分恶劣。正是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四军团攻打了武汉，攻打了长沙的中央军，攻打了赣州及其他大城市。

老百姓和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也很薄弱，红军的发展当然受到了影响。我听说，在有些部队中，特别是在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和第四军团中，还长期保留着某些封建习气——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机械地执行纪律，辱骂甚至殴打下级等诸如此类的行为。这些现象显然表明了旧军事传统的恶劣影响，对此我当然无法监督，有一部分可能还是过去流寇行为的恶劣影响。直到几年以后，这些弱点才得到克服。

此外，还有我提到的在惩治反革命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时的过火行动，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不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还有战俘，甚至还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焚烧地主庄园，甚至焚烧整个村庄。1931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对于巩固苏区、加强红军起了根本的作用。就社会的成分来说，红军几乎全部由最贫苦的农民和职业士兵组成，而职业士兵往往是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其中还有很小一部分是流氓无产阶级分子。产业工人寥寥无几，主要来自广州，以及一度被占领的城市吉安、赣州和长沙。这种不

利的社会成份，后来也没有什么改变，相反，越发严重了。

根据我1932年的统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红军官兵总数不到百分之二十，虽然在一段时期，整个整个村庄和部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尽管有这些阻碍和困难，到1932年红军的各个部队还是建立了拥有自己政权机构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建立了强大的正规部队，一些孤立的地区，当然只能作为游击队的根据地坚持着斗争。

1931年，在一月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接着在瑞金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以后，武装部队和党的领导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改善。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项英和周恩来被派到了中央苏区，张国焘被派到了第四军团的根据地。但是，在这两个比较大的苏区，由这些政治局委员掌握政治领导，以及后来的军事领导以后，很快产生了磨擦，特别是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磨擦。

到了1932年，同红军其他根据地和部队之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了。

1931—1932年，武装力量进行了改组，改组工作的最初一些阶段在1929—1930年业已开始，在以往几年中建立的不同部队的名称和番号都统一了起来，迄今为止的十几个军，也都尽可能改成团和师，集团军和方面军都改成军团，还建立了后方机关，供应、给养、卫生和教育等机关也相继组织起来。

但是我不能说明，改组工作在中央苏区以外贯彻的程度如何，特别是在一些孤立的地区和根据地还一直沿用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称号，这些部队通常只有几千人，有时甚至更

少，直到今天在毛主义的历史著作中，这些名称还仍然象幽灵一样时隐时现，令人捉摸不定。

根据我从中央委员会获得的情报，1932年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初期，苏区及其居民和武装力量的状况如下：

中央苏区，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在那里。它位于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土地联成一片，比较稳定，有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五百万人。中央苏区的正规武装力量中央红军，是由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以及五个师（以后是六个师）组成，约二万五千人，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除此而外，在这里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师、团，合计约三、四万人（同样有一万五至二万支枪），其战斗力差别甚大，比起正规的军团当然要差得很多。还有农民的自卫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等等。然而，这些组织如果说有什么武器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他们的战斗行动只限于防御民团（由地主豢养的土匪）偶而的袭击，此外就是在军需、给养方面帮助正规部队。

在中央苏区的北部和西部，还有三个独立部队的根据地，但中央苏区同他们没有固定的联系。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有一片交战甚为激烈的游击区，它拥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将近一百万人口。在方志敏的指挥下，红十军在这里活动，有五、六千人，三、四千支枪。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南端，即已经由国民党政府划线测定，但尚未建成的武汉至广州的一段铁路地区，有两个独立师，即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在这里作战，这两个师以后在肖克的指挥下合并成第六军团，其根据地同样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一百万至一百五十

万人，武装总数一万人，七、八千支枪。方志敏和肖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袖，他们保证了这两个地区的严格的政治领导。

然而，独立十六师所在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游击区，情况则不同了。这个游击区也曾一度拥有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五十万人口，三、四千战士，但在这里既没有建立坚实的政治领导，也没有在人民中贯彻正确的政策，也没有创建有效的苏维埃机关。实际上是听其自然，以后这个师就逐渐瓦解，它的根据地也丧失殆尽。

拥有四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第二大苏区，位于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在长江以北，京汉铁路以东。这个地区的正规武装部队组成了第四军团（也常常称为第四军、第四方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一万支枪。此外，在这里还有一些拥有五、六千战士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在后来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合并到第十五军团（实际是合并到第二十五军团，这一点直到1935年秋我在陕西时才知道，但是为了叙述上的真实，在此以前，我仍称第十五军团，请参看本书192页）。张国焘受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委托，在这里实现了政治上的领导，并且日益加强了军事上的领导，这里是否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最后，在长江中游，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地带，还有第二军团所在的苏区，该区拥有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二百万人口，一万多名战士。

粗略地计算一下，一共有六个较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总面

积十五万平方公里，具有战斗能力的、或多或少是正规的武装力量六万五千至七万二千人，四万五千至五万支枪。这样，在1932年春，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苏区所占的面积，即使不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一些较小的孤立的、尚未巩固的游击区计算在内，也达到了最高点，至于武装力量和正规部队，在这时尚未达到最高程度。

与中国内地十八个省份的总面积相比，苏区占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四，人口占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土地和人口之间之所以有这个差别，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苏区主要是在人烟稀少的各省交界的山区，此外多年的内战和敌人的围剿，也使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我在上海为着指导战争而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时所掌握的最初的数字，当然这些数字只能作为一般参考，因为除了统计本身受到限制外，无论是“红”区还是“白”区的迅速发展也不断改变着这种情况，特别是1932年，这一年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军事的变动。

---

蒋介石终于巩固了他的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了一些省份的将领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使这些人的部队至少在形式上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但是在下面，在国民党中国的许多地方，却酝酿着争夺和阴谋，而且越来越公开爆发出来。这时，不仅是毛泽东，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日益立足于这一点，“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几乎成了一张符咒，企望用它克服自己的一切困难，解决当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在内战中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更由于日



益高涨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民斗争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新旧冲突也因此而暴露出来，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谈。

内部的困难，首先在苏区表现了出来。随着中央政治局的建立，以及唯毛命是从的前敌委员会的解散，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严重分歧开始了，其实这已经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派形成的最初迹象。但我必须承认，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932年8月在宁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由于过去的、特别是对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在军事上的片面主张，即所谓枪杆子政策，以及由于他一味退却、毫不抵抗的战略而造成的苏区的丢失，还有向山区溃逃等等都在会上受到批判，被谴责为“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抵抗”。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象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直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我们在上海中央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阿瑟·尤尔特同志以及以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

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能够通力合作。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上海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报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主要是这样考虑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很大，而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对他应该迁就一些，以防止分裂的危险，因为果真分裂，那对于中央红军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将起到不幸的作用。不过，我们也是在隔岸观火，对中央苏区的真正情况很难一目了然。这种情况，尽管不是主要的动因，也促使党的领导在1933年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

中央苏区的巩固，并没有受到内部分歧的影响。1932年，准确地说，1931年至1933年，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遍及各个方面：经济政策的制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加强，特别是正规武装力量的发展。上海和瑞金之间的无线电报交往也频繁起来，其中军事性质的，在我到达上海以后，都是经过我手的，因此我对最重要的措施相当了解。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了总参谋部，主管部队的补充和供应，训练和后勤，并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为了这个目的，中央苏区分成四个军区——南军区设在会昌，东军区或称福建军区设在汀州，西北军区设在宁都，东北军区最先设在南丰，后来设在黎川。各军区分别在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总参谋部有电话和无线电联系。这样关于边区情况的报告就能够迅速地传递，地方部队的战斗行动也能够相应地调整。总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刘伯承

将军，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掌管整个领导。

在各个部队里，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设置了政委一职，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设立了政治部，由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领导，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同时负责组织前敌指挥部的工作。为了培养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开设了两所步兵学校和一所技术专门学校，主要是培养炮兵和工兵；直到1934年秋，有三、四千干部进了这些学校的短期学习班；还计划建立一所培养高级司令员和政委的军事科学院，不过一直到1933年底才建成。

这些旨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正规军和全面巩固根据地的措施，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顺利地实现，是因为蒋介石在1932年底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没有向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无所事事了。完全相反，他们吸取了过去几年军事上失利的教训，精心准备着下一次“围剿”，即第四次“围剿”。

为了给这次围剿筹集资金，他们废止作为国家金融基础的银元流通，聚敛中央银行的银元，代之以很快就贬值的纸币，他们还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获得了高额贷款。美国在短期内接连两次贷款给蒋介石，合计九千万美金，其中有一半用于提供不少于八百五十架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贷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法国四千万金法郎，德国四千万马克。现代战争技术——炮兵、装甲车、迫击炮、快速射击武器以及充裕的弹药，还有道路和堡垒建筑的技术设施以及通讯设备——充分装备了国民党军队。甚至日本人也在放慢侵略速度，以

便蒋介石有可能不至过于丧失政治体面，而把整个中国军队用于苏区。好几百外国军事顾问坐镇在南京，坐镇在许多军队的司令部里，有一部分是以著名的将领塞克特（1933年由法尔肯豪森替代）、韦策尔和克里伯尔为首的德国军官，还有美国人，如著名的飞行员林德伯格上校。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并以现代技术和新式战略训练了这些军队。他们还草拟了“围剿”计划，计划上的那些作战原则在开始几次已为人所认识，不过在以后的第五次“围剿”中更加完善和最终贯彻了。最主要的原则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采取政治和纪律的措施；以几个师的兵力结成强大的纵队，集中进攻；在行进道路和地区上连续构筑堡垒。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1932年夏季开始，延续到1933年初。中央政府动用了十二个精锐师来对付红军第四军团，其中有一个骑兵师，合计十万至十五万人。为了对付第二军团，蒋介石配备了中央政府的四个师和湖南地方的几个师，总共五万人。其余的湖南军队，估计有六万至八万人，用来与第六军团和独立第十六师作战，蒋介石的两个精锐师和浙江部队二、三万人则与红十军对峙。

附带说明一下，各省军队的数字往往不如中央政府军队的数字那样精确。此外根据德国军队组织序列表，大部分的师是由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特种部队组成，有些师则由二至三个旅（六至九个团）组成。还有，应有兵力和实有兵力相差也很悬殊，因此这些统计数字是非常不稳定的。

敌人的兵力大部分集中对付中央苏区。在北线，盱江的东面和西面至少有十二个精锐师，在西面赣江沿岸有三个精

锐师，在东面是第十九军，有五个师兵力加上福建地方军队，在南面是广东军，有六至八个师的兵力。敌人的军队，约三十个师，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逐渐包围了中央苏区。这时，广东军和福建军，在福建军开始进攻之后，态度却相当消极，很明显，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火中取栗。就是那些精锐师，虽然也在北面和西面向前推进，但行动非常缓慢，主要也是致力于构筑街垒和碉堡。

在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把主要的进攻目标首先对准红军的二、四军团，他依靠大工业城市武汉和航运线长江，保证了给养的顺利供应和军队的自由运动。

关于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的作战经过，我一直也没能得到详细的情况，因为和这两个军团的联系，在1932年夏末就中断了。根据报纸和电台的报道可以推断，四军团从根据地撤出，被敌人从南面和东南面挤到西面，同时越过了京汉铁路，敌人用重兵迅速地占领和固守了这个地区，这样后退也不可能了。于是四军团的主力在湘鄂边界一线继续向西，终于在川北和陕西之间已有小部游击队活动的交界地区，找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留下的一些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开展了游击战争，后来加入了十五军团。这样苏区日益缩小，只剩下原来面积的三分之一，就是这块剩下的土地，又由于国民党军队有组织地进行破坏和灭绝行动，一年以后也几乎全部丢失了。

至于苏区遭受损失的原因，从来也没有人进行过分析。当我在上海问及此事时，博古列举了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不论在部队中还是在老百姓中，政治工作薄弱，因此“封建习气”

没有被克服，根据地的老百姓和经济资源也没有被动员起来。第二，四军团以运动战攻击敌人的外线，同时又把兵力分散于各个次要方面，这样既没有保住苏区，又没有进行决战。博古说他的判断不是依据绝对可靠的情报，当然是作了某些保留。他和洛甫坚决驳斥了说四军团是按照上海党领导的命令行事的这种意见。

以后在瑞金，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第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战略是很重要的。周恩来对博古列举的原因表示同意，但对其他情况则保持沉默。毛泽东同样对此事迟迟不作判断，反而高谈四军团西征的“伟大胜利”。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四军团的政委张国焘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依从了他自己所主张的那种游击战术。在1935年夏和张国焘分裂之后，毛又把四军团的行动说成是“在敌人面前逃跑”。

贺龙领导的二军团，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也没能坚持得住。二军团离开了它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前进，进入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那里同样已有一些小部游击队在活动。1932年二军团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苏区，并胜利地坚持了一年之久。关于贺龙的军事指挥，没有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以后反而言过其实，对贺龙大加赞赏，因为他把贺龙看作是自己一个可靠的追随者。

六军团和红十军虽然也受到猛烈的逼迫，并且不得不丧失许多领土，但还是胜利地坚守了它们的根据地。

而在独立十六师那里情况就不同了，它甚至在湘军微弱的压力下就不战而退，分散成连级的最多是营级的单独小分

队。这些小分队尽管也进行一些小型战争，但与其说是战争，毋宁说更象绿林盗匪的袭击，在这些袭击下当然是老百姓受害最深。为了暂时结束内战中的这段插曲，我想再提一件事。十六师师长孔荷宠1934年来到瑞金，关于他的部队情况，交了一份过分渲染的报告。周恩来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似乎表示怀疑，就把他送进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同他谈过话，他对把他送来学习一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说，他自己知道应该怎样打仗，用几挺机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军和现代战术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要求让他回到他的师里去。毛泽东出来为他说话，满足了他的愿望。不久以后，他就背叛了革命，投降了敌人。

如上所述，我们关于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所得到的情报，尽管很不完全，互相矛盾，而且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我们又不得不从报纸和电台上获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二、四军团虽然放弃了它们原来的根据地，但是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胜利地反击国民党省军队的战斗中，至少是四军团得到了大量扩充。六军团和红十军虽然受到一些损失，还是守住了原来的根据地，只有十六师失掉了本来就成问题的地盘和作战能力。

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局部胜利。他以为，二、四军团的主力都被消灭了。这不仅在报纸上，而且在秘密情报中也是这样说的。因此他只用少量的兵力进行追击，并且把追击的任务主要交给那些省军队，使这些军队遭受了惨重失败。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锐师却抽调到江西。蒋介石之所以将原来的“围剿”计划加以变动，显然是慑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在

这段时期，由于动员了群众、改编了部队和积极进行了战斗，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大大地加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周恩来、项英和王稼祥的功绩，他们当时在军政领导中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干部中的核心。

1932年的夏季，中央红军对赣州发起进攻，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拿下这座城市，但它扩大和巩固了赣江以东的苏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这时在一旁嘟嘟囔囔，把这次只取得了部分胜利的作战行动，武断地斥之为军事冒险。

到了1932年秋季，情况已经很清楚，蒋介石妄图在北线给中央苏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此，第四次“围剿”进入了第二阶段。关于国民党军队这次出动，我们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情报。上海的党领导，根据我的意见，并且经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同意，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对国民党的攻势先行反击。与此同时，将中央红军调到北线，暂时先调到东北军区，因为那里敌人的工事还没有构筑完毕。中央红军的任务是扩大江西东北部的苏区，向红十军靠拢。这样就能夺得有利的出击阵地，以便从侧翼和背后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次战役不久就取得了初步胜利。位于东北军区的敌人重镇黎川被我军占领，与红十军的联系，也通过中央红军的先锋部队建立了起来。

在此期间我们又得知，蒋介石的强大部队，在他的最好将领陈诚指挥下，在盱江和赣江之间的地区，向乐安——宁都方向开始发起攻势。因此，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向乐安方向进军。中央红军在南丰未被敌人觉察，越过



盱江，出其不意对行进中的国民党第十八路军的第十一、十四和五十二师发起了进攻。第十一、十四师被歼，第五十二师连同其师长几乎全部被俘。

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结束了。蒋介石停止了进军，命令所有部队，在阵地和交通线上构筑工事，他的德国顾问们在制订新的“围剿”计划。中央苏区得到一段喘息时间，一直持续到 1933 年秋。

---

国民党中央政府军采取比较消极态度，不仅仅限于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种种政治上的背景。日本军国主义者撕毁了 1932 年与蒋介石签订的停战协定，继续侵略中国。1933 年初，日本军从满洲经过上海向华东、经过热河向察哈尔进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他正忙于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认为这次“围剿”会最终战胜共产党人。如果华北各省过于独立的地方将领和行政长官不得不单独抵抗日本人的压力，并因此而遭到削弱，蒋介石可能不会不高兴的。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群众抗日运动的烈火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熊熊燃烧起来。一些国民党将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同情人民的抗日运动，比如张学良，在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之后，他和满洲军一起被蒋介石撤到西北的陕西；蔡廷锴在中国的上海市郊闸北进行了英勇保卫战之后，蒋介石把他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南方的福建，与共产党人作战，实际是把他贬谪了；还有冯玉祥，他的势力范围内蒙古直接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共产国际代

表团和上海的党领导看出其中的有利转机，想以此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日。即使不能形成这种局面，但蒋介石为了驯服这些难以驾驭的将领，也不得不暂时延搁他的进攻企图，减少集中对付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

193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来的指示更坚定了我们形势的判断。指示中的具体建议是，鉴于迅速增长的民族危机，应依靠广泛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在下列三项条件下与任何中国军队和集团建立联盟，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三项条件是停止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一切进攻，保障民主权利和自由，武装人民。

关于这些指示的政治意义，我们在上海看法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这是建立一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步。接着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发表了宣言，宣布临时革命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准备共同抗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宣言是由洛甫起草的，有一天在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尔特同志同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也议论过这个草案。

宣言起到了它的作用。在国民党的范围内，甚至在南京，表示拥护联合一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祥和蔡廷锴发表了相应的声明。据电台报道，广东和广西两省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图，但他们在幕后却抱着观望态度，因为他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维持他们一省统治的传统自主，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如果取得胜利，必然会殃及他们的统治。

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新口号还有两个障碍。在中国同志中，在党的领导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怀疑情绪，怀疑指示的三项条件是否可能实现。他们倾向把抗日宣言不作为行动口号，而作为宣传口号，借以削弱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减轻红军的负担。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认为利用国民党中的矛盾是顺利地继续进行内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要同那些具有抗日思想的国民党将领建立直接联系，以及与他们进行谈判，客观上也存在着困难。

1933年春，冯玉祥宣布，决心向日本占领者开战，并将他的部队改称为“抗日同盟军”。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党领导在详细讨论了局势之后，作出决定，指示中央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与冯玉祥进行联系，并要求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支持他。此外，指示还要求和蔡廷锴进行接触，可以考虑由宋庆龄从中斡旋。至于张学良，中国同志并没有想到与他接触，因为他在政治上向来不很认真，而且有“花花公子”之名。

我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并受委托亲自前往北京，在北京通过一个同时从上海派去充当翻译的中国联系人与中央委员会北京办事处的一个代表会面，再和他一起去张家口拜访冯玉祥，以便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签署具体协定。遗憾的是，联系人没有到事先约定的接头地点，我回到上海后才听说，他在此之前就被捕了。接连几天，我在不同的时间到一家酒吧间等他，引起了一些可疑分子的猜疑和注意。后来甚至有一个家伙用俄语同我攀谈，这足以使我警惕了。为了消除我的踪迹，我访问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我临行前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曾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他，以应付各种情

况。我想说服斯诺，以他合法记者的身分和我一同去找冯玉祥，但是他不愿参与此事。他和他的夫人带着我在北京的四郊游览，我们互不信任地试探着对方，进行一些若即若离的政治性谈话。我徒然地返回了上海。

冯玉祥的行动不久就破产了。与蔡廷锴建立联系一事，出于我当时还不能说明的原因，也没有成功。上海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不一和勾心斗角，可能起了某种作用。但我认为，更可能是蔡廷锴不愿意铤而走险，因为他当时在自己第十九路军指挥机关中也受到蒋介石追随者的排挤。

无论如何，变内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尽管尚不确实，却始终未被利用。在国民党地区，党的工作虽然还在继续，工作重点虽然还是建立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党领导的主要注意力却越来越放在中央苏区及其部队上了。

---

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条件，变得日益困难了。在1932—1933年新旧更替之际，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如果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迁至瑞金，是否更为合适。因为政治局和常委会本来就不过是个空架子，其大部分成员都在莫斯科或者在中国苏区和红军中。博古和洛甫开始只是把这项措施看成是组织上的权宜之计，后来考虑到，作为革命主要堡垒的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通过此举可能大大加强。而且宁都会议以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派之间的可以感觉到的紧张气氛，也有可能因此得到缓和。

我们请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3年初，执行委员会表示同意，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考虑的：一则可以避免在上海

受到逮捕的严重威胁；再则也可以改进江西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工作。1933年春，博古、洛甫、陈云（据我所知，他当时负责工会工作）和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其他几个同志，动身去中央苏区。中央委员会在上海留下了一个上海局，先由康生领导，在他不久前往莫斯科以后，由斯拉文和米茨克维奇领导。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备迁至苏区，总军事顾问又指日可待，可以预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我利用这段时间，彻底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中国的参考书，并开始学习中文。

在此期间，大约在1933年春天，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以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他游历了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迟了几个月，几次约会都给耽误了。幸好我们从莫斯科起就很熟悉，有一天他在大街上与我攀谈，我介绍他同阿瑟·尤尔特建立了联系。虽然弗雷德作为总顾问是我的上级，但出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

可惜，在弗雷德和我之间，为了一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很大影响。

这就是关于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关系问题。我在前面说过,1932年初,十九路军英勇抗击了日本入侵,保卫了上海闸北中国工人区。当时共产党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十九路军,并利用这个机会把许多共产党员派了进去。后来蒋介石和日本人进行谈判,停止了战斗,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以便使他在福建的军队从第四次“围剿”中腾出手来。他的“蓝衣社”和宪兵队虽然对十九路军进行了清洗,但是抗日的情绪,包括对民族叛徒蒋介石的愤怒情绪,在军队中和指挥机关中仍旧有增无减。第十九路军,1932年秋季进行了唯一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以后,实际上几乎处在枕戈待命的状态。这次进攻出于某些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还要简短地谈到),使十九路军获得了一块可观的地盘,之后,它就不再继续进攻中央苏区,对修筑旨在形成福建封锁圈的工事也不特别热心了。1933年春,当冯玉祥的行动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实现的时候,蔡廷锴那时确实只尚言语,未见行动。但我和尤尔特同志却认为,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1933年1月的指示精神,他仍然是一个可能的同盟者。所以我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再对他进行军事进攻,而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北线,也就是集中到蒋介石军队这边来。

弗雷德在他到达不久则建议,利用北线的喘息之机,在福建发起攻势。他主要列举了两条互相之间没有紧密关联的理由。第一,他暗示苏联可能向中国的中央苏区提供武器援助。他是凭自己的臆想,还是从莫斯科带来了如他暗示的有关指示,我就不得而知了。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内局势,尤尔特同志和我都觉得这样一种援助纯系空想。苏联

不久前同国民党中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即使这种援助不致招来严重政治纠纷的风险，运输中技术上的困难也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弗雷德辩白说，这些困难可以通过空运或袭击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而得以解决。第二，他认为，蔡廷锴在冯玉祥行动时表明自己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弗雷德对我提出的异议作了驳斥，并补充说，即使不能使蔡就范，但通过对十九路军的胜利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和蒋介石的决战中，确保我军在福建的后方和侧翼，然后我们就能转而对国民党中央军在北面的进攻，开展积极的骚扰活动。

弗雷德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有力支持，中央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从瑞金发来电报，表示同意。先前大体上和我意见一致的尤尔特同志，也改变了主意。同样，原先迟疑不决的博古，也在政治局里被多数压倒，或者说改变意见，他后来对我说，毛同意这个作战方案，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简言之，决定进攻。1933年夏，中央红军被调到西南军区。五军团在南面对付广东军，以确保这次战役的进行，一、三军团在福建西部宽阔的战线上迅速向前推进，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虽然有几千名减员，但大都是疟疾和脚疾所致，这在亚热带的夏季并非意外，伤亡是微乎其微的。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攻克了一连串小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粮食和布匹等。一年半以前曾在对日作战中炫耀于世的十九路军，这时被证明是不能打仗或者是不愿打仗的。在被

广东军、中央军完全丢下不管的情况下，十九路军避免野外作战，把自己主要限制在防守坚固的城镇，同时还向长期固守的以南平为主要据点的屯溪和沙溪一线，缓缓向后撤退。九月底十月初，红军的进攻终于在南平停了下来。

在这次战役中，除了福建省军队以外，十九路军的好几个师也遭到了重创，接着，在十至十一月间蔡廷锴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开始谈判，达成一项类似停火或休战的协定。谈判期间，我正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此对谈判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我也不能判断，福建的战事是否由于我们的攻势而平息下来的。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可以说是达到了既定目的。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趁我北线正规主力部队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盱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黎川。1932年底，我军在江西东北部所夺取的大部分地区又丧失了，那里原来存在的防御工事间的空隙被弥合了，与红十军的联系也就此永久地中断了。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告急的北线。这样，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而丧失了。

福建战役所带来的政治情况和影响，还要严重得多。战役之前在上海，战役半年之后在瑞金所进行的激烈讨论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些倾向，这些讨厌的倾向使人不禁又想起李立三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新中心的论调。根据这个论调，苏联应该不顾外交上可能引起的后果，给予这个世界革命新



中心的国内斗争以军事上的援助。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月指示、中央的政策，原则上应着眼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现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终于占据了首位。在民族革命解放战争中争取同盟者的方针也被置之脑后，代之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矛盾夺取军事胜利的方针。过去早已存在的那种面向农村苏区和红军的片面倾向，此时更有所加强。

当然，在1933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象今天在回顾往事时这样清楚地以批判的眼光通览由于变更政治重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变更当时就已经有了表现，而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先锋作用，这个在客观上本来就是立足不稳的命题，在主观上也就更成问题了。

## 第二章

# 在中央苏区

### 1933—1934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又一次讨论了形势。尤尔特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他还向我暗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过去的冲突，他认为这些冲突尚未解决。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也都一一表示了他们的愿望。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和盱江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能以薄弱的力量牵制住敌人，在福建战役结束之后就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目的是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中心地区。虽然我上面所概述的军事形势的突变还没有发生，因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突变的情况，但是我对这些计划表示了怀疑。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他

同我商定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尤尔特同志稍稍劝阻了一下，他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半夜，我带着几百块美元，以应付意外情况，和一只小手提箱，乘车来到码头，在那里上了一只英国海轮，上这只船的好处是不会有人提什么好奇的问题。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弄来了一张国内护照，护照上填写的地方，当然不包括那些“防匪地区”。海轮把我带到汕头，在这个华南港口的唯一的一家欧洲旅馆中，我根据约定见到了中国的联络员，他是保卫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姓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在基督教教会学校读过书，在冯玉祥军队中担任过牧师，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当时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例如1936年在西安他给埃德加·斯诺同邓发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早晨，王拿着我的小箱子（到了瑞金我又把这只箱子取了回来，里面的东西完好无缺），这样，如果我们在路上被截住，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无辜的旅游者。接着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

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使我很失望的是他不懂外文。后来我多次见到他，1935年长征途中，在一次蛮子的突然袭

击中，他牺牲了。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的声音。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我们仍然在国民党地区。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动身了。我们在稻田中间狭窄的田埂上鱼贯而行，绕过极其昏暗的村庄的屋角和篱笆，走进了山区。突然在我们前面传来了枪声，我们的侦察员同国民党的巡逻兵遭遇了，我们不得不折转回来。第二个夜晚，我们比较幸运，到天亮时已走了好大一截路程。白天我们睡在亚热带树林里，成群的蚊虫蜂拥而来。过了两夜到达了无人地区，一营地方部队在等着我们。我们继续翻山越岭，在白天行动。一眼望去，到处是淤塞的稻田，野草丛生的薯地，荒芜的蔗田，烧成废墟的房屋。四周几乎杳无人烟，这是长年内战的后果。

又是上山，一直爬到山顶，我们越过了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界线。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使人愉快得多的情景。我们下了山，走上一片宽阔的肥沃的平原，这里有收割过的田地、干净的房子和勤劳的人们。

在整个旅途，我象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第二年我对他的了解多了起来。他是一个性格诙谐、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人；他喜欢举行赛马和手枪射击活动，用宽面的大刀装备他领导下的保卫部队和警卫人员，刀把上绑着红布。就我所能判断的情况来看，他严格地并且“不偏不倚”地履行他的职责，而不公开介入内部的纠纷。1946年4月，他同博古和叶挺一起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邓发讲了几句不成句的俄语，向我表示欢迎，陪我走进一间孤独的农舍。那里接待我的是两个俄语说得非常好的同志，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我的翻译。两个人都在苏联学习过，其中一个伍修权。在我所参加的政治局和常委会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都是他为我翻译，我认为他翻译得完全正确。1935年他被任命担任外事工作，得到毛的信任，逐渐升为中央委员，中央国际联络部领导和外交部副部长。我同他最后一次谈话，是1939年秋天，是在兰州当我乘飞机回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那里领导党和政府外事处的工作，担任苏联

基地司令员的联络员。1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从远处看到他，听到他粗暴地攻击兄弟党，因此代表们不得不命令他遵守大会秩序。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搞得声名狼藉。1967年4月13日，我见到了一张北京“红卫兵”大字报的英文底稿，大字报指控他“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亲近南斯拉夫和苏联修正主义，攻击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字报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1935年1月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上，正是李德这个大叛徒，最激烈地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方针。李德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把李德的这些报告和讲话忠实地翻译过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伍修权这个混蛋。”

另外一个翻译是一个很壮实的中国北方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有扎实的军事知识，主要从事训练工作，在军事学院为我当翻译。在延安抗大——这是一所抗日干部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军事学院就叫抗大，我们也一起工作，一直到我离开。

我周围还有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带着毛瑟枪和大刀担任警卫。

---

当天晚上，博古和洛甫来看我，他们告诉我，我的住处在一个禁区内，所有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都设在这个禁区内。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离我的住处步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国民党飞机早就发现了这个地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我们看到，到处都是防空洞和防空壕，当五百公斤、一千公斤

的重型定时炸弹扔下来时，这些防空洞和防空壕也只能起到相对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以后就不得不迁到离瑞金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住在禁区内的居民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知疲倦地劳动着。他们忙着收藏这一年的第二季收成，把稻子、甘薯和腌菜集中起来，甚至还交纳猪和鸡，为红军战士编树皮鞋和草鞋，用外地的棉布缝制服。

博古和洛甫向我简略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再谈，这里我只想讲一个与当时军事发展有关的问题。他们两人对福建战役的胜利都表示满意，那时已是十月中旬，这次战役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他们暗示，有可能同蔡廷锴取得谅解，后来十月底果真实现了。他们对赣东北的局势显得很担忧，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们根据这个消息，尖锐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作为。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惶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救的损失。他们说，1933年初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的闽西区党委书记罗明以及这个区的其他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在一次国民党部队（其中包括不久前刚调到那里去的第十九路军）的进攻中，也是逃跑似地慌忙撤退，当时所失去的各县一直到现在才得以收复。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把博

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更使我惊奇的是，不久以后，在十二月，周恩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在这篇文章中周指出，在红军中，特别是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这条路线根深蒂固，同这条路线的斗争，如同以前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一样，是我们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毛泽东却相反，他亲自出来袒护肖劲光，因为肖劲光是他的比较亲近的同乡，在1930年毛的政治阴谋中又多少有点瓜葛。后来，毛甚至不惜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以博古为首的党的领导，随心所欲地时而说它是“左”倾机会主义，时而说它是右倾机会主义。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时期内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当然这样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

博古和洛甫还告诉我，在瑞金只有他们两人是中央书记，他们的分工是，博古承担党和军队的工作，洛甫负责政府和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但是看来他们不久都得到了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后果。博古越来越成为一心想获得原有权力地位的毛泽东的攻击目标，而洛甫在政府中与毛紧密合作，在毛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的立场。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这两个中央书记暂时还是同心协力的。

最后，博古要我暂时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认为，我是个“外国鬼子”，为了我的安全，又鉴于国民党不断叫嚷有“俄国间谍”活动，这是必要的。对此我虽然不很了然，但还是



顺从了。再说，几天以后我的脚发炎了，肿得不象样子，而且全溃烂了。医生对我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热带病，是由沼泽中的污水和蚊虫引起的。因此我有一个半月或多或少的被拴在房间里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1932年被弹片打成重伤，住在野战医院，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整年都很少见到他。

会议主席是毛泽东或项英，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反攻讲了几个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由此得出结论，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他的观点是，必须以速决战，切断敌人的内外联系，以此打击敌人。然后讨论了群众动员和供应问题。接着项英作了一个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报告说，整个中央红军已出发开往北线。有人问我，对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设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盱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一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五个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一次讨论的过程，因为以后对形势的判断和作出的决议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的。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

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毛却巧妙地利用这种误解以便撤去博古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

根据我在以后几星期和几个月中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央苏区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总的来说是有充分准备的。然而，中央苏区的外部形势是困难的，同二军团、四军团以及红十军的联系被切断，同六军团和十六师的联系也中断了多时，因此同这些部队的协同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除了事实上已经可以说是解散了的十六师而外，这些部队虽然都保住或恢复了它们的有生力量，四军团甚至还增加了有生力量，但是它们的苏维埃根据地就不得被认为是全部或部分丢失了。此外还有以下一些不利的政治因素：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薄弱，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没有开展，以及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不够等等。

因此，中央苏区只得完全依靠自己了。苏区本来巩固的地区同样也在缩小，这同我们在上海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前不久在福建收复的地区尚且不能说是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最近在赣东北被割去的地区当然就更不能这样说了。真正不受敌人威胁的巩固地区，估计得高些，大约有四万

平方公里，我曾多次到前线各地进行过实地考察，这个数字是可以确信的。这块巩固地区以瑞金为中心向四周各延伸大概一百公里左右，向南大大少于一百公里，向北则多于一百公里；还有一块差不多大小的地区，虽然仍在苏维埃机构的管辖之下，但常常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军事上的无人区。这里不断有红军的地方武装和敌人的地方部队，主要是民团和省军交错活动，一部分地区已经被敌人的堡垒体系割开了。

尽管如此，这个被敌人封锁和禁锢的地区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农产品可以足够养活本区居民以及部分红军；红军通过对国民党地区的袭击，不仅能满足武器和弹药的需要，而且还能满足粮食、服装等方面的需要，如最近在1933年夏秋两季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闽南和粤北还进行着相当活跃的贸易，输出钨、烟草和其他产品，输入迫切需要的奇缺商品，特别是盐、棉布和煤油。

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建立以来，老百姓中的政治工作已经有所改进；1933年春，政治局直接领导以后，更有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的结果不仅表现在公粮增多，红军服装及其他装备生产的提高，而且也表现在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人大批增加。在此基础上，到1933年底建立了很多新的正规部队，例如：第三师（后来改称为九军团）、第六师（编入三军团）、独立十四师和独立十五师，这两个师主要是由共青团员组成，所以也称为青年共产国际师（后来合并成一个师，隶属于一军团）、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后来合并成七军团的一个师），以及独立二十二师和独立二十三师。根据总参谋部的资料，中央委员会当然不得不批评指出：在动员红军战士以及组成

新部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如地方苏维埃不是始终坚持自愿的原则，说服工作常常为行政措施所代替，因此逃兵的百分率很高，各地区的情况不一，逃兵的百分比大概占动员兵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建立新师的时候，对指挥部的成员——指挥员和政委的挑选不够认真，对部队训练也很不重视。所以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最后，由于建立了这么多新的部队，对原有部队减员的补充也暂时受到了影响。

然而正规部队还是增长到了四万多人，这些部队由于1933年的胜利都比以前有了较好的武器装备，特别是装备了机关枪，但重型武器仍然明显地感到缺乏。虽然有缴获来的迫击炮（确切地说，按当时的语言习惯应该称之为山炮，这种炮可以拆开用毛驴运输）和野战炮可供使用，但是缺少弹药。如果弹药用完，这些武器也就报废了。相反，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却可以利用旧弹壳在自己的工厂里制造。有一个兵工厂，从1933年以来，就制造手榴弹和修理轻型步兵枪械，1934年就转为辅助生产迫击炮弹了。参谋部和部队都配备了足够的通讯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和长途电话。无线电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总之，我们这些较高一级的参谋部，特别由于刘伯承的努力，还是比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某些师和多数团里的参谋部的工作，往往只局限于附属性的辅助和抄写工作。后勤工作——卫生、供应、军队的补充等，如果考虑到当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如医生和药材，那末还是

完全符合需要的。由于生活条件和运输条件很差，随军人员中有很大批担架队员、炊事员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辅助人员，成了战斗部队的累赘。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根据这个方案，一个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迫击炮部队（有迫击炮二至六门）、一个侦察连、一个通讯连和一个内勤连（警卫连）组成；一个团分成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并各有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内勤排；一个营分成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排和一个内勤排；每个连分成三个步兵排，每个排分成三个班，每个班有十名战士。一个师的应有兵力，类型不同，多少不一，在一、三军团是七千五百人，配有三千五百至四千支枪，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挺轻重机枪和四至六门迫击炮；在五、七和九军团中是七千人，配有三千至三千五百支枪、六十至九十挺机枪和二门迫击炮；在独立师中是六千五百人，配有三千支枪，四十至五十挺机枪。但实有兵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尤其是在独立师当中，通常都大大低于应有兵力，在某些师中，有时只有三千至四千人，甚至更少。我从广东前线向北前进时，在瑞金附近看到隐蔽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兵营里的五军团，那里的人数当时还不到五千人。

一般说来，新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所不利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条件下，一些排、班基层单位的力量比较薄弱。由于缺乏机枪和弹药，部队火力不足，又由于训练仓促，

部队中没有作战经验的战士的比例过高。

这些不利的因素，通过 1933—1934 年在部队里以及在战俘中开展的良好政治工作，部分地得到了弥补，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果：提高了部队内部的自觉纪律，建立了与老百姓的模范关系，促成了士气的空前高涨。我在中央苏区这一年中，只听到一件破坏纪律的事，有两个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的侦察员，在敌人后方强奸了一个妇女，他们完成军事任务回来以后，就被军事法庭提审、处决了。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偶然事件。

此外，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这不仅在上面提到的肖劲光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我在 1933 年 12 月第一次上北线所经历的一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总参谋部任命一个指挥员去担任一个独立师的领导，但是这个指挥员立即到了前敌指挥部，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师，坚决要求分到三军团去。这件事甚至还引起我同周恩来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周告诫我说，应该考虑到这些干部的心情。

为了提高部队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水平，1933 年夏天我在上海就曾建议建立一所军事学院。当我到达瑞金时，它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只是初具规模。军事学院有将近一百名学生，都是有作战经验的低、中级指挥员，1934 年一年中，人数增加到几百名。领导同志除了偶而来校作政治报告，很少关心这个军事学院，只有刘伯承和周恩来表示了比较大的兴趣。我的翻译很精于军事，我同他主要担任讲授战术课课程，主持讨论和作战演习。这些课程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直至

我到那里时，所有的军事专业课完全由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讲授，其中有五十二师师长，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这名将领曾企图煽动他的旧属，1934年初又自杀未遂。之后，我应周恩来的恳求，同这个人谈了一次话。他说，训练共产党人去反对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他于心不忍。不久以后他失踪了，可能被枪毙了。

国民党军官讲授战术课，是以德国前线服役规程为基础，其中有《多种武器的使用与作战》。但我们没有重型武器，因而也不能进行经典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讲授这些课程是毫无意义的。我于是用了很大气力，编写了轻武器部队在运动战中的战术规程，使其既适合红军游击战争的传统，又符合同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国民党军官对此都没有兴趣。我们逐渐让那些最好的学生去当老师，把他们换了下来。只有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例外，这位少校后来在长征途中，例如在黔东强渡乌江的桥头战役中，立了多次战功，以后入了党。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家休假，没有再回来。

最后我想谈一点关于红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这方面我见到一个关于政治管理工作的报表，使我很受启发，当然这个报表所涉及的只是中央红军，而且所反映的也只是1934年夏天的状况。据报表介绍，中央红军百分之六十六是农民，百分之三十是工人，百分之四是其他成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报表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很明显是从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阶级划分出发的，这种错误的阶级划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把农村工人、苦力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都算成是工人阶级。事实上，

如果把工人阶级只是理解为产业工人，那末工人的百分比要低得多，而农民和其他成分的百分比要高得多。这从动员工作的统计中看得很清楚，统计表明，新兵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是从苏区居民中征集的，百分之七是从战俘中招募的；百分之四是从起义过来的人当中补充的，百分之十二是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所谓过去的国民党部队的成员，显然是指1927年以后由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的原有的骨干——或者是红军的残留部分。关于部队战士的年龄，情况要好一些：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四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四。红军中百分之二十八是共产党员，百分之十以上是共青团员，因此党员的人数从1932年到1934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如果算上共青团员，甚至增加了一倍。共产党员中百分之二十七是指挥员，百分之十是政治工作人员，百分之四十是红军战士，百分之二十三是参谋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

这个概述无论如何表明了，红军主要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的这种性质在以后几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同时也表明了，红军无可争议地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保证了它的高度的纪律和士气。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极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也保持了这些特点。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与以前的一切计划完全不同，它是政治、警察和军事措施的综合。为了提高部队的可靠程度，巩固部队的纪律，蒋介石在所有部队中都设立了政训处，其成员主要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同时加强了战地宪兵



队。为了破坏占领区居民的反抗，他们采取了“联保”制度，并且在地方控制和管理方面，给予民团这一类反动的“自卫组织”以无限的权力。他们为了争取居民，还开展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平定国家、“医治”经济、重建因内战而遭到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但实际上，这一运动结合上述其他措施，不过是意味着向旧的半封建状态的倒退。用来引诱农民的“改革”，其目的不过是要在消除过去债务奴役的沉重负担的幌子下，重新恢复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毁掉的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地契和证券的法律效力。

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对老苏区居民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

新“围剿”计划的核心是德国顾问们根据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炮制的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它的基本思想是，集中几个主攻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每一个主攻方向造成战役优势，而在进攻时则完全采用战术防御手段，也就是说在步步推进中布下一个越来越稠密的碉堡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持久的、消耗巨大的行动，但是德国专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使而且必然使中央苏区在一、二年之内完全瓦解，并使残留下来的“岛屿”逐渐缩小。他们还断定，中央红军由于不得不进行堡垒战而越来越失去运动的自由，并逐渐被消耗，最后被包围，被消灭。

这方面的前提，从军事上看确实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提供的比1932年更为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贷款，至少可以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按照现代化的原则重新装备和改

组。德国以及其他外国顾问，主管训练国民党部队掌握新式重型武器，并在主要战线上负责兵力的调动。由于建造了公路和混凝土工事，后方和补给线的安全也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配备了不下四十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而对付其他根据地和红军其他部队的任务，则大部留给各省的部队了。蒋介石只是在每一条战线上为各省部队配备了二至三个他自己的师，借以加强各省部队。此外，对付中央苏区的还有十九路军的五个师、粤军的六至七个师，湘军的三至四个师，总共有五十至六十个师，将近五十万人，或者说其兵力高出于我军十倍以上。

至于说到火力，那当然更是无法比较了。敌人的五百架飞机川流不息，轮番轰炸着前线和苏区后方，而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防空设施，最主要的防空办法，如同在陆战中一样，不过是到处都在熟练运用的伪装办法。估计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迫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一，我们的主要武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步枪和手榴弹。

关于蒋介石的进军计划，我们得到了相当准确的情报。他计划了七个主攻方向，三个在北线，近期目标是占领永丰、广昌和建宁；西线首先攻打兴国；南线攻打会昌，东线攻打长汀和宁化。在这七个主攻方向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三至四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苏区进军。此外，东北线还有陈诚部队的十至十二个精锐师，准备随时参加任何一条战线的进攻。余下的十至十五个师驻扎在碉堡里，从那里掩护进攻的部队，而

自己并不出击。

可以看出，这个进攻计划的目的在于，在上述的七个主攻方向上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进苏区的心脏，先把中间地区分割开来，然后逐个加以“清剿”。这完全符合蒋介石和他的顾问们的基本战略思想。

幸好敌人同时的集中进攻未能实现。湘军和粤军开始采取观望态度，而十九路军则完全离开了进攻的行列。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这些冲突和争夺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敌人阵营的政治矛盾”，把主要兵力集中于北部一线，打垮敌人军事上的咄咄逼人的优势。因此，比较大的战役主要都局限在北线。

从一开始敌人就坚持以守为攻的策略，前进时，总有飞机和大炮进行火力掩护，即使没有遇到抵抗，前进四、五里（二公里）以后，就掘壕自卫。敌人在所有的通道和一切村镇上都构筑了“堡垒”，堡垒之间可以互相了望，机枪火力可以彼此接应。这些堡垒用我们的轻武器根本无法攻占，敌人从这些堡垒中出来，至多离开一小段距离，一旦遇到我们的反攻，就马上折转回去。附带说明一下，红军战士有时轻蔑地称之为“乌龟壳战术”的敌人的堡垒战术，并不是什么新的进攻方法。这种战术在前几年就已经运用了，在这几年中对中央苏区形成了一道或多或少无法通过的封锁线。堡垒体系构筑最坚固、推进最深的是北部，它的前端从赣江延伸到永丰以北、乐安和南丰以南、直至黎川，其主要部分是从福州到南丰两岸都构筑了坚固堡垒的盱江一段。西部主要的堡垒线沿赣江到赣州，从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一直到福建边界。东

部，即闽西，堡垒一直没有构筑完毕；1933年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以后，这些堡垒大部分都被放弃或捣毁了。在东北部暂时还敞开着一个缺口，敌人准备在拿下黎川以后，继续构筑堡垒，越过尚在我们手中的广昌和建宁直到南丰，来封住这个缺口。

---

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以坚决的措施回答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他们用“一切为了前线！”和“不丧失寸土！”等口号来动员群众，特别是他们成功地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产品和输入的商品进行公平的分配，同时还进一步采取了尽可能完全自给自足的方针。接着掀起了一场新的动员参军的运动，这场运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并于年中达到了高潮。按照官方数字，自愿参军的有将近十万人。据我估计，其中最多只有六万人补充了正规部队，其余的有的当了逃兵，有的不合格，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退了回来，或者被分配在地方自卫部队。但是，参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就足以弥补第五次反“围剿”一年艰苦斗争中的损失，并可以有一定的储备。

中央红军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从1933年10月到12月底，在北线、主要是在东北一线作战。他们本来应当利用敌人的堡垒地带在那里尚未建成的这种情况，包围和进攻陈诚军队的外侧，而不是如弗雷德所建议的那样，一直挺进到浙皖敌人后方的中心地区，因为如果这样，就有被敌人切断退路、无法撤回的危险。

十月底，我第一、第三军团与陈诚的三至五个师展开了大

规模的遭遇战。敌人虽然遭到重创,但未被歼灭,因为它们依仗着在此期间构筑了堡垒的黎川城,立即掘壕自卫,转为防御,使其优势火力充分发挥了作用。在这个地区后来又有两次遭遇战,战斗开始时我军取得了胜利,但结果不分胜负。

十一月份,第一、第三军团把作战重心从敌人有计划地构筑堡垒的东北部移到盱江两岸,以便在那里先发制人,进攻从南丰向广昌挺进的国民党主攻部队。那里发生了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我们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每当我们进攻时,敌人就退到碉堡里面,以火力掩护自己。不久,来增援主攻部队的陈诚主力,也是尽量回避任何决战。这几次战斗一般被称为浒湾战役(以盱江而得名,盱江又称浒江),它持续了一月之久,实际上成了我们这方面的分散的短促突击。

十二月,当陈诚在东北部又试图从黎川向建宁推进时,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情形。我第三、第五军团向陈发起进攻,但也只能把它打了回去。

因此在这三个月中,中央红军只得满足于取得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至于在大规模的包围战和开阔地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主要目的则没有达到。红军的攻势只好停止下来,但是敌人也没有达到其目的,它未能攻下广昌和建宁,然而却把堡垒体系从黎川一直延伸到闽西北的邵武。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战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进行了审议。林彪指责说,在浒湾战役中,第一军团奉命利用初战成果继续进攻,追赶敌人直至碉堡区,但退路却没有保障。彭德怀反对分散主力部队。他争辩说,如果在十二

月战役中把第一军团放在黎川东南，也许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抓住了这些批评意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激烈反对这种战术，即：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箝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他认为，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对于这种他称之为进攻性防御的原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赞成的。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在赣东北敌人的外线寻找决战时机，这点从战略上来讲是毫无结果的。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如果敌人不这样做（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也没想过要这样做），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考虑同我对形势的判断是符合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在这以前，大约在十一月底，博古和我走访了设在建宁的前敌指挥部。此行之目的，除了想同朱德和周恩来讨论军事战略与战术的问题而外，主要是因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前敌指挥部的合作中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就我们看来最主要的是要严格划分各自的职权范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

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在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只有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我们此次旅行(我一直不能步行，只能骑马)用了三天时间。半路上我们曾在几个兵站和一个野战医院过夜。这些兵站虽然比较简陋，但相当整齐；野战医院尽管设备很少，却完全符合卫生要求。从瑞金到建宁有一条战地军用电话线，我们逗留过的兵站和少数比较大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都有电话相通。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张贴着竞赛图表，以激励人们去争取更大的成绩。总之，到处是一派充满着政治积极性的和平景象。只有一次，我们在射程以外从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旁边走过，听说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

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建宁。朱德和周恩来在前敌指挥部会见了我们。他们领着我们穿过了指挥部。指挥部有十几间房子，包括警卫人员有几百人，其中有整整一连被亲热地称为“小鬼”的情报科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日夜值班，窃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在以后几天中，除了一些次要问题，例如改进后勤组织工作等等，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以及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问题。我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合并这两个机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它们本来都是用同样的联络工具——军用电话和电台与部队取得联系，而且由于中心区离前线不远，亲自同部队指挥员联系，也不致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另一方面，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红军总政委，在瑞金可以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有关职权范围的一切含糊不清的问题就一下子都解决了。至于中央红军进行大规模战役的领导问题，可以根据需要由第一军团或第三军团总指挥林彪或彭德怀负责，如有必要也可以由军事委员会的某级领导负责。这个决定由军事委员会批准以后，从1934年初开始实行。

六年以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莫斯科宣称，我企图用这种手法免去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员职务。还说，毛泽东看穿了 this 阴谋，激烈地反对了这种做法。凭空捏造、诬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甚至周恩来，虽然他在那时早已转到毛的立场上去了，对此也加以否认并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的印象是，一切军事问题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具体地说，浒湾战役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博古暗示说，朱德多年来已退居幕后，1929年毛独揽了军事领导大权，但是在1932年又不得不让权于周。我发现，在这里党内冲突正激烈进行，而我也就不再多问什么了。很久以后我又



听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想以后再谈。

我们对军事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认为，在陈诚将其主力集结到盱江以后，应当尽快停止浒湾战役，而在部分已被敌人夺去的东北一线发动新的攻击。为了履行义务，我叙述了实际上已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定了的弗雷德的原先计划，即在赣江和盱江之间构筑防御工事，在东北部向敌人的后方推进。当然我也没有隐瞒我对这个计划所持的怀疑态度。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此外，我们也都认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这些决议也都报告了军事委员会，并且得到了批准。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

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 1934 年 1 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

鉴于事态有了新的发展及我军主力又有可能重新部署于赣西北地区，前敌指挥部因此命令第一军团留在广昌地区，同时第三和第五军团（四个师）在黎川东南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分散兵力无疑不利于战事的结局，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

博古和我绕道回到了瑞金。在广昌地区我们察看了地形，我对掩体的构造作了一些指示，这些掩体应当伪装起来，使人不易发现而又能在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射击下进行防护，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至今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自发建造的带枪眼的半圆形工事，往往成为敌人火力的最好目标。

---

1934年1月，在瑞金附近召开了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接着月底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自从在第四次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得到更新、常务委员会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以后，已经过了整整三年。至于在统一过去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不同见解、保证同毛泽东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追随者有效的合作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现在大概可以看得清楚了。

其实，这方面的条件是存在的。在忠实坚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的马列主义干部的领导下，甚至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闽赣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稳定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同 1932 年宁都的激烈冲突相比，在中央领导和多数受毛

影响的地方和军队干部之间，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以证明，博古作为党的总书记，当时尽了一切努力来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然而这种努力没有得到毛相应的回答。毛那时虽然或多或少又重新参与了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但在其他方面，在个人交往中，态度总是非常冷淡。中央全会预备期间，他借口身体状况不佳，声称不能参加会议，因而破坏了会议表面上的和谐。他对这次会议事实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从表面上看，人们也许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不存在什么重要的意见分歧。无论在中央全会中，还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也同意了中央全会指示中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两次会议的发言和决议中，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地接近毛观点的提法。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中央全会，我得到的消息也可能不够准确，下面我所依据的是1935年在莫斯科摘录出版并附有王明写的引言的正式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间接看到，至少中央全会给代表大会的指示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定的。

两个大会一致认为，中国革命是带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意思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上拯救出来。”指示中说，苏维埃政府真诚

地希望，同一切反日和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民族革命而共同斗争。但是接着却又指出，中国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都已崩溃，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理论出发，于是就断定，只有以革命战争去消灭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先在一省或数省、最后在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为此，应该采取使各个苏区的军事行动严格一致的方针，以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占领中心城市。

由于中央苏区同中国其他地方的革命根据地和部队几乎都没有联系，所以在当时要协调中央苏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撇开这点不谈，这个目标也是从两个不切合当时实际的前提出发而提出的。第一，把国内一切非共产党和非苏维埃势力都毫无区别地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一帮，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国民党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即内战，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红军是抗日战争中唯一的武装力量，是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最主要的杠杆。尤其是193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指示，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对派集团和军队结成同盟是有可能的，上述看法就更使人觉得惊奇。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33年春，冯玉祥的崛起，同蔡廷锴谈判的恢复及继续，由于蔡廷锴的努力使谈判在1934年1月，即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取得了成功。第二，认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是，在对形势作了冷静的判断，采取了以战役和战术进攻的方法达到战略防御目的的

军事路线时，却又说革命虽然在发展，但正如毛泽东有时所讲的那样，仍然还处于“低潮”。毛片面地强调军事斗争的路线越来越得到贯彻，甚至达到了如此程度，竟要白区的政治工作首先服从游击队的领导，这说明他们对国民党地区地下党的群众政治工作是十分轻视的。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以后，王明在莫斯科所写的“引言”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在那里也说到中华苏维埃是一种特殊的新的国家形式，鉴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彻底崩溃，以及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同反革命的长期流血斗争中，必须实行这种国家形式。在这方面王明还不厌其烦地说，已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不久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在“引言”中说，如果中国革命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取得胜利，就有可能引起世界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并阻止战争。但是，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先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罪恶战争，那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就必须利用这场战争，来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并把远东的所有其他的民族从帝国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虽然王明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国际主义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保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但是在这个“引言”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李立三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新中心的老调。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他肯定是被片面夸大的消息

迷惑了。例如他在“引言”中说，中国已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被苏维埃政权所控制。写到这里时，他颇为恰当地加了限制词，说这些地区都是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实际上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苏区面积总共还不到中国内地十八个省的百分之三，也就是在四百万平方公里中只占十二万、最多占十五万平方公里；而居民人口只占百分之二点五，与1932年相比，略有减少。由于当时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所以其影响还是很严重的。有所增加的是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第四军团的武装力量。

此外，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政治上分裂和军事上薄弱，以及关于红军人数的夸大之词，都是属于这类不实报道之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创建一支拥有百万人数的军队，中央全会的指示也要求组织“新的方面军、新的师和新的军团”，但这种要求同实际的可能性是很不相符的。

在讲话和决议中，有些地方也显示了马列主义领导干部的影响，例如其中谈到了关于坚决同游击主义的传统做斗争、关于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关于坚持包括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正确的阶级路线和重新分配没收来的土地、关于加强和巩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各级机构中的领导作用等问题。但无论是中央全会的指示还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没有谈到国际工人运动。关于苏联，除了在毛泽东报告的开头有几句空洞的词句外，在文件中也都没有提及。

会议文件，特别是中央全会的指示，内容常常前后不一，有些地方甚至互相矛盾。这说明人们所追求的只是达到一致

通过的目的，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另外还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同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力量的均势，但是也可以看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毛的观点开始作出了让步。两次会议几乎尚未结束，又发生了虽然在语言上是缓和的，但事实上是十分尖锐的冲突。据我所知，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纠正经济政策，进行战争的方法，以及同苏联的关系。

中央苏区的经济，不言而喻，当然只能是战时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但是，过去在贯彻经济政策过程中，是存在严重错误的。毛泽东推行一条非常强硬的“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不仅要消灭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而且还要消灭富农，有时甚至要消灭中农；其他的中间阶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遭到了严重损害。他把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或者没收征用，然后再按“人头”重新分配。在重新分配土地时，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往往被忽略不顾，人们就以“最后胜利”来宽慰他们。在成立合作社过程中，矛盾也很尖锐，行政上采取强制措施，急于求成，毫无选择的自由。

这些老错误是“左”倾宗派主义思潮的表现，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出于误解而采取过急行动的表现，现在这些错误或多或少得到了清算。毛泽东，还有一直倾向于支持“左倾”路线的洛甫，这时来了一个急转弯。同以往一样，毛这一次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现在又主张政治上也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采取缓和政策，主张给私人投资和商业以更大的活动余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活动余地”这几个

字，因为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对此也是赞成的。也许毛想到的是在中国实行一种类似1921年在苏联代替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新经济政策，以为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经济形势可以因此有所好转，苏维埃政府的社会基础也可以得到扩大。与此相联系，他还以“一切为农民”这句口号，来补充“一切为了前线”这句正确的口号，他相当明确地主张采取由他推行了多年的面向农民的路线，更精确地说是面向农村居民的路线，进而冲淡了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原则。这样，尽管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阶级路线问题。

至于进行战争的方法，内部的争论是：在正规战术和非正规战术、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之间，重点应放在哪一方面。其实，从1931到1932年改编革命军以来，就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毛依据1927年以后的所谓“胜利实践”，主张完全采取游击战的老方法，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土地；同时还低估了第五次“围剿”中敌人的“堡垒战术”。他的这些观点不仅遭到中央领导人的反对，甚至他的一些追随者也不同意。我记得，项英为此来找过我，要求我起草《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观点的干涉，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博古、项英、周恩来、刘伯承和我在小范围内谈论过这个问题，谈论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承认两种战争形式和两种部队的组织形式，而运动战，不管是作为正规大部队的行动，还是作为非正规部队的游击行动，都是普遍有效的原则。最后毛也同意了这个提法，于是这个提法就写进了大会的报告和决议，而对于在独立



行动的游击队领导人和地方部队指挥员身上一直可以觉察到的专断行为，则通过要求他们严密组织、服从上级、积极配合和遵守“铁”的纪律来加以约束。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只是顺便谈到了。在此以前提的口号，一直是“帮助苏联！”。这句口号与世界性的口号“不许干涉苏联！”比较一致。而毛现在却说，据我所知不是公开地说，这句口号过时了，应该用“帮助中国！”这句口号来代替。他重申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对立，而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他说，从这个冲突出发按事态的发展来看，目前主要任务是中国苏区同国民党中国之间的内部斗争，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一斗争。当时“帮助中国！”这句口号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还没有被普遍承认，所以实际上开始时也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一些本身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思想的党的领导同志，例如从上面提到的王明在国际代表大会文件“引言”的段落中可以看出，并不重视这句口号，象过去的情况一样，这一次也没有要求作相应的说明。

在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补进了新的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会议任命博古为总书记。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全会的提议，这个职务由洛甫担任；此外，洛甫还继续担任中央书记。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还是项英和张国焘（张没有出席会议）。博古和洛甫在形式上也是革命军事委

员会委员。

这样，马列主义干部在中央和政府里占据了大部分重要职位。尽管如此，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政治路线得到了贯彻，那就错了。实际上，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没有彻底澄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为以后的冲突留下了祸根。

据我所知道的例子来看，我以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党领导中的马列主义干部对毛的观点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回避明确的决断，寻求妥协的提法，甚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屈服于毛的影响。例如，忽视国民党阵营内的民族革命力量，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尤其是片面推行内战、红军武装斗争和农村苏区的总政策。这些政策也确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的支持。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的环境，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举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环境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在地方党和军队领导中得以发展的土壤。根据代表审查委员会所公布的名单，参加代表大会的只有八名是产业工人，其他算在工人名额中的有二百四十四名手工业者、五十三名苦力和一百二十二名农业工人。如果算上三百零三名贫农、二十五名中农和六十六名其他阶层的人（小商人、知识分子等），那末可以看出，代表的社会成分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最贫困的阶层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等级”。

附带说明，这些数字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作为客人参加会议，同代表们不坐在一起。礼堂最多能容纳七百至八百人，

但是在纪录中却写着参加大会的有七百名代表和一千五百名客人，其中有一百多名来自国民党中国和国外，而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至于来自其他苏区和游击区以及国民党中国的代表，博古对我说，由于封锁的缘故派来的也是寥寥无几。

毛泽东几乎应当对会议感到满意了。会议增强了他作为中央苏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在此基础上，他准备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遭到的双重失败进行报复。在保持表面上的政治统一和同志式合作的烟幕下，他又重新挑起了旨在争夺党政军领导大权的争斗。

---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观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为了尽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当时通过谈话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也写了进来。

和我本人经常有些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卫措施”比较放松和我的脚病痊愈以后，我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局限于定期访问中央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还有总共到前线去了五次。当然，还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

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象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生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

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同阶层的阶级性质，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交替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被他归结为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在他看来又体现为红军的力量，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内战的形式进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博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了多次，我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与之斗争。他们不想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同毛泽东破裂，这当然也是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的。他们知道，毛在中

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城里人”，则以白眼相待。因为他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在他的眼里，苏区以外共产党人英勇的地下斗争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他狂妄地以为，只有他才能担负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胜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他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1931年以前，他在闽赣地区实际上曾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在这之前，党内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冲突是以当时的中央全权代表、前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一方，以湖南省委及闽赣地委为另一方。有关这次冲突的详细情况，我在这里虽然比在上海知道得略微多一些，但至今仍然不甚了解。总之从我得到的一些暗示可以看出：毛主要是依靠对他唯命是从的军队领导人，在1929—1930年用强制手段取消了省委和地委，在镇压反革命——“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分子”以及真正的或所谓的托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幌子下，据说从肉体上消灭了很多反对毛路线的党的干部，其中也有红军战士，特别是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以及在1927年广州公社失败以后和1930年暂时占领长沙以后参加红军的工人。我听了虽然很吃惊，但对这些不可靠的谣传并不十分介意。直到现在，这些谣传才在文件资料中得到证实，使人不寒而栗。当时大家也许认为，而且也希望，令人不快的内部斗争已经过去。周恩来称

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为“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英则直率地称之为“党派斗争”。

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报警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在五中全会上他要求发言，但没有成功。从此以后开始了一场隐蔽的争夺，党和军队领导权的新的不平衡的斗争。之所以说是不平衡的，那是因为我们大家把毛看作是群众威信很高的革命领袖，对他很尊敬，我们诚恳地尽力去寻找同他的共同语言；而他却施展政治阴谋，暗中用尽心计，不仅想恢复他已经失去的影响，而且想更进一步夺得全党的领导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组织了一个反对派小组，小组成员都是1930年他反对湘、赣、闽省委时支持过他的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属于这个党内宗派的有古柏、曾山和毛的秘书陈正人，1930—1931年他把他们推上了江西省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但这时他们都不再有什么显著的作用了。我不知道，他们以后是否又东山再起。此外，还有他的弟弟毛泽潭和毛泽民，他们两人只做过基层的经济和财政工作，而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政治领导。参预其阴谋的还有受他保护的罗明和肖劲光；军队干部中除了林彪，还有当时是师长的陈毅和军政治部《红星报》编辑的邓小平。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

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是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是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



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王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令。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的忠实亲信。

据我所知，除了陈云，项英是政治局里唯一的工人。他们两人都是二十年代国民党中国有名的工会领导人和罢工的组织者，项英领导了1923年2月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周恩来掌握了领导权以后，项英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主要负责动员和供应工作，以及地方自卫队和游击队工作。他工作时沉着、实在，从不小题大做。在中央红军出发的前一夜，他有一些失去常态，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

军队最高领导者都是职业军人，并在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就已经是将军或上校了，只有林彪例外。

朱德当时就是一个国内战争中传奇式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少有奢望的谦虚朴素的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1922年

在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他率领第四军革命部队到达江西，于1928年同毛的农民游击队会师。我零零散散地从博古和项英以及朱德那里知道，朱德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毛是正确的，以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博古和项英看来对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也很少，而朱德则很不愿意谈这方面的问题。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之间发生冲突时，朱德和毛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朱德批评毛当时的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中心“陀螺似地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毛责怪朱“理论上无知”、“机会主义倾向”，因为朱执行了省委的指示，出征湘南，而这次出征以部分失败结束了。1929年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德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把朱的政委陈毅和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拉到自己一边，彭德怀和刘伯承不久也被毛争取过去了。朱德屈服了，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但从此以后就不再起什么独立的、决定性的作用了。依我看，多年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是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去看待从零散的谈话中体会出来的这段历史。它至少说明了，为什么象朱德这样一位很有经验的、对革命忠贞不二的元帅，对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影响竟然这么小。现在，这段历史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已经由发现的文件证明是确实无疑的了。

毛在江西回避一切私人交往，好几次我想同他交谈，都被他拒绝了。与他相反，朱德却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

可行的解决办法。

刘伯承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英勇事迹流传很广，又由于在战争中失掉了一只眼睛，所以有“独眼龙”之称。他也参加了1911—1913年和1925—1927年的两次革命。后来他在苏联学习过，但是几乎从不说俄语。他一直独立地掌管参谋部的工作，自从周恩来操纵了总参谋部以后，他觉得自己也有些多余了。他喜爱作战工作，他的愿望是重新率领部队。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成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浩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唯独他的军团由三个师组成，人数上是最强大的军团，正规战训练方面也是最好的军团，因此他通常总是被派去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他曾多次陷入险境，但又一次次地化险为夷，突破难关。我同他及其在苏联学习过的政委扬尚昆偶尔作过交谈，从谈话中我感到，他们两人都具有国际主义的思想，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注定了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悲惨命运。

林彪在军团总指挥中是最年轻的。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北伐战争中曾任连长，1927年后一跃而成为营长和团长。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指挥第一军团。这个军团的两个师以行动迅速而闻名，因此特别擅长于包围战和迂回战。林彪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家。他不赞赏其

他作战方式，在军事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战略战术的领导问题，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然而在政治上他却是白纸一张，在这张白纸上，他盲目崇拜的毛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他从毛的宠儿发展为毛用来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工具。

林彪同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回避与别人交谈。他的政委或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却很善于交际。罗和林的经历相同，也是走过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红军这一条道路。多年来罗一直受到毛和林的信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林也把他打成刘少奇的同谋，任凭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

关于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该军团直到1934年秋只由一个师组成)我没有多少可说的。他是一个很壮实的军人，总是认真执行一切命令。有人背后说他有“封建传统观念”和“军阀习气”，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部队享有只善于掩护战的名声，而且也总是相应地担任掩护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1935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州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1936年董振堂率领他的部队在贵州前线作战时阵亡。

我在中央苏区同王稼祥、陈云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接触比较少。他们是后起之秀，因此关于他们以后会有一些叙述。刘少奇当时也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开始时据说被派往华北担任政治工作，关于他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显然，当时他在党的领导中不象后来那样起支配作用，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也没有多少联系。

在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所谓福建事变正在进行。1933年11月，蔡廷锴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福建省省会福州建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是：停止对苏区的内战（十九路军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与红军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独裁。一月中旬，有两个人（一个姓潘、一个姓张）到瑞金来谈判，准备签订一些具体协定。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他们的权力很有限，但还是就蔡廷锴对中央苏区的经济援助以及红军同十九路军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磋商。关于军事合作问题，蔡廷锴首先并不是要得到直接的支持，他只是想签订一个包括确定分界线等内容的互不侵犯协定。对此起了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方面，他根据1933年我们进攻的经验，害怕红军会占领他的领地，“吃掉”他和他的军队；另一方面，他觉得必须考虑军队领导中、特别是广东省政府中政治上温和分子的情绪，因为他依靠的正是他们善意的中立态度。二月初或二月中，当他的处境迅速恶化时，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如果在红军的帮助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华南和华北的其他反对派力量也纷纷响应，那这种形势必然会威胁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决定中断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对付十九路军。他把十至十五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也就是把部署在北线的全部进攻部队调到闽北，要求他们迅速推进，占领福州。他把陈诚的部队十至十二个师放在建宁以北，以备在我军插入福建时掩护其前进部队的右翼，或者向我已没有主力部队

的东北部纵深推进。同时，有十至十二个师的堡垒驻守部队，仍然留在原地。

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第一、三、七军团以及独立三十四师，总共七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发动一次进攻，开始时还考虑实施弗雷德在十二月建议的、原则上已被采纳的计划。按照那个计划，在湘赣南部边界独立作战的第六军团也应该在赣江以西向北挺进。留在后方牵制敌人的：建宁地区是第五军团，广昌以北盱江沿岸是第九军团，西北部是独立二十三师，南部是独立二十二师，总共是六个师，但这六个师中只有三个师，即第五、九军团各有一个主力师及独立二十二师真正有战斗力，其他几个师（第十四、十五和二十三师）是重新改编的部队，其战斗力也很有限。

这样，中央苏区全部正规部队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并且都是最精锐的部队处于发起攻击的准备状态中，但是进攻没有发动起来。人们不去积极地行动，反而在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争论不休，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争论政治上应该如何判断形势，军事上应该作出什么决定等问题。

至于在政治上应该怎样估计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博古一个人——也许得到周恩来半心半意的支持——的观点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 1933 年年初以来就在酝酿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组成远远超出苏区范围的、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抗日阵容。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尽管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上海局却相反，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说，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倾

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上海局认为，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与此相似，好象也同意弗雷德的计划。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当事变正在发展时，他不断地批评福建政府，说它“不一致”、“不履行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义务”（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应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说它“不主动不坚决”等等。他警告说，要“谨慎”、要“三思而行”。他认为，十九路军必须首先在闽北打击蒋介石的部队，然后我们才可以积极干预，给予支持。

看来博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作了让步。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以便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果然不出所料，关于这个问题上海和瑞金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次冲突比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影响还更恶劣，因为实际上他们是迁就了毛的踌躇不决的战略。

根据弗雷德的计划，第一军团开拔至永丰，第三、五军团在广昌待命。在此期间弗雷德用无线电发来一个经上海局批准的详细计划。计划规定，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地攻占长沙。这个计划太冒险，太不符合实际力量的对比情况，因此遭到了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坚决拒绝。我也反对这个计划。从博古阐述的政治理由出发，我从一开始就同意进攻闽

北,但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弗雷德指示的束缚,所以我在军事委员会中一直持保留观望态度。现在我以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异议为掩护,发电给上海,表明了反对意见。接着无线电报来往不绝,其中也有弗雷德用我们之间约定的密码拍给我的私人电报。他明确表示,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命令我,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他的计划。因此我内心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在这以前,我一直在贯彻弗雷德的指示精神,尽管我并不同意这些指示。例如,由于我的催促在瑞金建造了一个备用机场,虽然我认为这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反而会引起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又必然会变为失望和不满。事实上这个飞机场我们一直没有利用,后来却为国民党的飞机效劳了。同样我在军事委员会还违心地宣读了弗雷德关于在盱江和赣江之间建立堡垒以及在东北地区向敌人后方发动进攻的建议。当然,我同时根据自己对形势比较正确的认识,并按照军事领导部门的意见,已经把这些建议归略到可以贯彻的程度。但是他现在这个计划实在无法实行。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建议,命令第一军团派部队到永丰进行侦察;同时,我请博古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态。这两个建议都通过了。不出所料,军事侦察的结果表明,敌人在赣江以东向纵深层层修筑堡垒,这不是我们的兵力和其他手段所能突破的。同时肖克派人来报告,说第六军团在赣江以西也遇上了坚固的堡垒而不得不返回原地。

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闽北,正向福州方向推进。被打败的十九路军前途渺茫,虽然坚持反抗,但终究不敢



决一死战。十九路军的领导中，又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应迅速采取行动，挽救还可以挽救的局势。因此我决定，不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博古告诉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拖了很久才批准下来，主要内容是：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上可以独自作出决定），自己承担起责任，立即把我们先头部队的七个师调到福建，在那里大约在南平地区向蒋介石部队的右翼发起进攻，以减轻十九路军的负担。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这次一致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蔡廷锴深知自己处境之艰难，无路可寻，所以也同意红军向福建中心地区挺进。

这时，情况有了变化。我第一、三军团急行军向南平挺进，第七军团和独立三十四师在邵武以东地区抵抗陈诚的部队，以掩护第一、三军团的左翼。就在这时，蔡廷锴的一名师长带领他的全师人马投降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占领了建阳、建瓯和南平，以致我们无法渡过闽江，不得不把整个先头部队转向东南方。二月中旬，福州失守。十九路军领导内部发生分裂，军队大部分投降，只在闽南还有个别部队进行反抗。我们的先头部队在闽中打击了新编第五十二师，占领了一块相当大的地区，包括沙县、三明、永安和尤溪等城市。但是这已经影响不了战争的结局了。我们只能力求保护十九路军的人和物的安全，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但远远不是所希望的程度。

决定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命运的福州陷落以后，蒋介石从福建撤出了大部分军队并把他们调往北线的原来阵地，他的意图显然是要在我们主力返回之前，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突然进攻建宁，第五军团胜利地保卫了这座城

市。尽管如此，军事委员会还是命令第一和第三军团回到北线，因为敌人的其他主攻部队已在行动，这样北线又成了主要战场。为了阻止或者至少是延缓蒋介石部队完全占领福建和建立新的堡垒战线，第七军团和第三十四师奉命留在新区，积极进行作战，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得到了第九军团的增援。

虽然福建事变的过程和结局暴露了蔡廷锴“人民革命政府”内部的弱点，但还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提供了某种机会，来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当然就必须立即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由于我们对事变的政治判断上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军事战略上意见不一，所以一直未见行动。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上海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也随声附和，并用他的怀疑等待和不合实际的政策，来支持这种错误估计，致使政治局反对了博古开始提出的正确观点，又一次采取了“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的方针，拒绝迅速给蔡廷锴直接的援助。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进攻。他的这个冒险主义的战略方案，以及坚持这一方案的顽固态度，阻碍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时作出把主力放到闽北，同十九路军一起作一决战的唯一正确的决定。而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为时已经太晚，机会也已经错过。我自己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在弗雷德从上海和毛在瑞金的双重压力下，我也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样犹豫不决，没有迅速作出决断。

福建事变以后，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斗

争条件急剧恶化。蒋介石不仅镇压了蔡廷锴的起义，而且吓倒和削弱了全国的反对派。他现在可以出动全部兵力对付中央苏区。1934年他在福建建立了一条新的战线，这条战线虽然就堡垒的密度来讲有许多薄弱地段，但却使中央苏区的经济情况更加困难了，并迫使中央红军在完全被封锁的条件下作战于内线，蒋介石的后方这时却很安全了。斗争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漫长，最后红军不得不突出重围。

一年以后，毛泽东利用福建事变以及在事变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并以此为把柄篡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他仍然说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还无耻地歪曲事实说，党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突破敌人的封锁，但“博古和其他人却让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而不是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福建事变的真实过程，对于延续了数周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以及对于他自己、中央委员会上海局、遗憾的是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中起的恶劣作用，他却很明智，闭口不谈。

---

福建事变正在发展的时候，我在一月底、二月初又到北线去了一次，这一次是与朱德同行的。不久以前，弗雷德关于在西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详细的日程计划，已到达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坚决拒绝这个计划，把我主力调到闽北；并决定第一军团从北线撤出之前进行一次我在前面提到的军事侦察。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同第一、第五和第九军团的总

指挥们谈谈我们的战略战术。林彪在谈话时言词激烈，对不久以前根据弗雷德计划把第一军团调往永丰和以后命令他们进行军事侦察这两件事甚为不满；但是，他拥护在福建主动支持十九路军的决议，也同意用小股部队搞掉永丰地区的敌人堡垒。

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给较大范围的听众，即第一军团的高中级指挥员们作了报告。我在报告中阐述了我对第五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术的看法，在此没有发生什么矛盾。

这一时期，广昌和建宁以北的敌人同整个北线一样都比较安静。董振堂深信，如果陈诚向前推进，他一定能成功地挡住陈的军队，守住建宁。我们在广昌同第九军团总指挥谈话时，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但是两个人都强调说，如果蒋介石的主力重新发动进攻，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军团必须协同作战，否则建宁和广昌就有失守的危险。

他们的忧虑是正确的。蒋介石几乎还没有同蔡廷锴清算完毕，他的主力部队就在主要战线上重新开始了进攻，用的还是步步推进、步步建碉的战术方法。从二月底到四月初，陈诚军队同我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在东北一线发生了一系列战斗，双方都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是都没有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四月初开始，敌人把进攻的重点移到盱江两岸，旨在占领广昌。

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眼前的形势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作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大家都比较一致，包括毛泽东在内。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意见就有分歧了。简单地说，当时的情形是：

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被完全封锁。封锁线沿着整个东北线、北线和西北线从南平一直延伸到吉安，在西部沿着赣江向上直到赣州。

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推进，所以要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近半年的经验表明，突围肯定会使我军陷入敌人的堡垒地带而不能自拔。南面的堡垒地带比较容易通过，闽西南暂时还是最薄弱环节。

敌人决心一如既往，在北部发动进攻并继续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到建宁、广昌和永丰一带，它的近期目标是广昌。湘军这时开始慢慢向兴国推进，粤军也开始向会昌推进，但是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因此，我们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是我们不能以阵地战，而必须以战术上的运动战和进攻战来完成保卫苏区和保存有生力量这个双重任务。这本来不是什么新的认识，只是如何实行这一点，需要我们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作出新的决定。在此有三种可能：

第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主力，用第一和第三军团，或者也可以用第五和第九军团突破重围，以便在敌人后方摆脱敌人堡垒的牵制，向敌人发动进攻并将其消灭。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我还补充说，这样的突围只能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即只能在西南部或东南部，才有希望成功；我突围地点不能选择在敌人的中心地带，因为这样敌人会越战越强，我们会越战越弱，而且敌人肯定已经作好了准备。在这样的战役中，我们虽然可能会暂时丧失

部分土地，但是可以保存有生力量，获得作战的行动自由。

当时大家都反对这个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毛泽东。他宣称，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绝不是不存在了；他竭力主张，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这第二种方案也同样被拒绝了，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面对敌人的策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

作为第三种可能性我建议，继续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一旦进攻的敌人离开堡垒，我们就让它有比以往更多的活动自由，它“跳出”堡垒越远，就越有可能落入“陷阱”。

第三种方案原则上被通过了，并决定把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放在北线，对付从南丰向广昌推进的敌人主攻部队；第七军团、第三十四师和新编二十四师在闽南作战，不得已时也可同粤军交锋。由于在这个地区还有某些行动自由，所以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三月底四月初，在彭德怀指挥下，主力部队在南丰以南向敌人的主攻部队发起侧翼攻击。第三军团打开了一个缺口，大踏步向北挺进。然而，陈诚的“消防队”出动了，他依靠南丰的堡垒工事及其优越的军事技术转入反攻。第三军团面临着被割裂的危险，在遭到极大的损失以后才冲破重围。我们的进攻也就毫无成果地逐渐停了下来。

在这以后，敌人最后决定四月份攻取广昌。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它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此，在一次毛泽东也参加的

革命军事委员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在广昌地区打一仗。由于敌人在陈诚部队获得部分胜利后稍微加快了通常缓慢的进攻速度，军事委员会在另一次会议上又决定（毛也参加会议并同意了决定），这一仗在广昌的前沿阵地进行。在此期间应让敌人有迅速推进的可能，也就是说采取变化的“诱敌深入”的策略，引诱敌人进入苏区，然后给敌人的侧翼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次战役延续了两周左右，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因为敌人根本不给我们以可乘之机。

四月底，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领导小组出发到广昌，小组成员有朱德、博古、政治部的副主任和我。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使我军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能够更好地协同作战。这时，博古已经听到一些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这当然是无法证实的，但有间接的迹象可以证明。如彭德怀在广昌战役前夜同军团指挥员谈话时，曾气愤地指出，在四月初的一次战斗中，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就在附近，却让他单枪匹马与敌作战。

通过无线电侦察我们得知，敌人企图在四月三十日，即次日清晨，以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其出发地是广昌以北十五公里远的堡垒区。我们视察了广昌周围的防空设施，结果表明，尽管过去对此下过指示，但这些设施建造得十分马虎，既不能抵御飞机轰炸，也不能抵御大炮射击。因此我们作出决定，不再坚守广昌，星夜撤出县城，让敌人一直攻到广昌城前，然后由第一和第三军团在盱江的开阔地带打击敌人，同时第九军团掩护渡江并守卫盱江东岸。

朱德发出了相应的命令。四月三十日，第三军团在半路

上打击了正在向前推进的敌军，可能为时有点太早，当然是否如此也无法确定。第一军团本应在迂回运动中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缩回到堡垒区的后路，但是部队展开得过晚，还没有同敌人发生接触，敌人就躲进了堡垒。第三军团这次又是单独作战，在敌人获得源源不断的增援并动用了飞机重炮的优势火力下，又一次受到了严重损失，而第一军团却在一旁若无其事。领导小组作了简短讨论之后，朱德在傍晚时分命令停止战斗，撤出阵地。部队秩序井然地撤了下来。敌人没有准备向我们追击，他们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才占领了广昌。接着双方暂时休战。第三军团撤回到休整地点，从十四师那里得到了人员和武器的补充，因为根据政治部副主任的报告，十四师政治上不够巩固，又缺乏战斗力。后来十四师的大部分人员编入十五师，十五师后来又转为第一军团的第三师。

五月一日，我在第三军团的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的报告。在一次同指挥员的座谈中，象先前在第一军团那样，说明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同时我表示反对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那种过分强调建造防空设施和不留任何余地的过于短促突击的错误做法。我把这些意见写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见附录）

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重新作了检验。我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和三月底那时一样，我又一次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



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最后我建议，我们甚至可以丢掉一部分土地，让向前推进的敌人有“更大的空隙”，使我军能较为灵活地给敌人以突然打击。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根据主力撤离的程度，必须在敌人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也可以采取这个方针。

毛泽东这次还是反对突围的建议。他认为，这样的决定至少还太早，因为在中央苏区内客观上存在着消灭敌人的条件。但是，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军事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则上都同意突围，我建议的其他战略战术方案，他们也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成了少数派，从这时起他以半公开半隐蔽的方式反对党的领导。他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车”，加上了种种罪名：什么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战术、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作出作战决定等等。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在部队指挥员的眼里贬低我们三人，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他把我选作主要攻击对象，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最没有能力维护自己。他煽动同胞们的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并散布开始是针对我的、后来却概括为政治论点的言论，说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其特殊性，而这些是一个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的。

毛把这时已经转到他一边的洛甫派到政治局。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围绕着广昌战役的这场争论，完全是为了宗派的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先讲一个事实：毛泽东后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广昌战役决议，以及由于形势不利又作出撤退的决议，不再称之为灾难性的了，反而说成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强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毛让他的卫道士林彪从前线写来一封信。林在信中也坚决主张，以后在苏区内只能进行纯粹的运动战，而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胜利在握时才能作战。经过博古同意，我按照上面所叙述的意思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说，人们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我承认，这些话讲得不很合适。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

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鸦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

---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五——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有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

形成决议。据我所知，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同意的，他很可能是出于宗派斗争的考虑。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至少博古是这样对我说的。

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是有某些弱点和缺陷的，并且在计划的实行中产生了不利的影晌。中央委员会几乎把全部政治工作都集中在苏区，而且还是在“一切为了前线”和“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下进行的。至于国民党军队和白区居民中的政治启蒙工作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其可能性本来就很有限，而我们现在几乎一点也没去利用。

在部队的改编过程中，象以往一样，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主要是人们没有把原有的军团和师扩充到最大限度，而是建立了许多新的单位和部队。虽然也有几个薄弱的部队解散了，但是由于1934年一年中损失严重，大部分队伍中没有经验的新兵的比重很大，尤其是新成立的第八军团和扩充了的第五、九军团。

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决定并在五——七月计划中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贯彻得十分缓慢。由于敌人一直坚持它的策略，虽然我们使它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但一直也没有和我军进行决战。在原则上决定了突围以后，我们也不再于苏区内寻求决战了。这样总的说来，我军首先就停留在短促突击上，这当然限制了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发挥，而且由于战线多次变化、部队经常转移，搞得战士们疲惫不堪。

但是，在春夏两季，我们还是取得了几次较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甚至被周恩来用来发展成一种理论，即在持久战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取得战略上的胜利。他在给部队报纸《红星报》写的好几篇文章中，都讲述了这种论点。他试图以此从理论上论证军事指挥中两条并行的方针——一条是突围到敌人外线作战，另一条是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内线作战。事实上，整个战略形势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局部胜利而有所改变，敌人虽然遭到了某些失败，但仍然不甘罢休，还继续实现它在主要战线上构筑堡垒的计划。

敌人于五月底六月初占领了建宁，并从建宁和广昌分两路向石城进军。在石城以北，第一、三军团在一些小部队的协同下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的两三个师遭到重创，但还是逃回了原地，因此我军缴获的战利品很少。

六月，国民党中央部队和湘军占领了永丰和兴国，准备从那里出发集中向宁都进军。同时粤军也开始积极活动了。省主席陈济棠显然很担心，因为如果蒋介石成功地通过苏区一直推进到广东边界，那他的地盘也要受到威胁。我们在南线只有一些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因此军事委员会委托我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到会昌作短期视察。我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那里按老方法自发建造的半圆形工事根本不适用于防御的目的，最多只能成为敌人炮火的目标。在那里作战的部队由于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富有希望的正规战争；以我们的主力来加强这些部队，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不可能。此外，敌人即使在很小的战斗中也表现得极其谨慎，几乎近似于胆怯。出于这些原

因，我们指示军区指挥员，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人的队伍，不断破坏敌人的进军，但不要使自己卷入真正的战斗。我们回去以后，我也是这样向军事委员会汇报的。军事委员会同意我们的指示。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直到1934年秋才占领了会昌。

此后不久，由朱德、博古和我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从瑞金出发，经宁都到西北前线。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根据总参谋部的命令，已经在那里集结，准备打击在永丰以南向前推进的敌人主攻部队。这一次又只是第三军团同敌人发生了遭遇，第三军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敌人随即又缩回到它出发的堡垒里去了。这以后，除了福建以外，在所有战线上都出现了很长一段休战时期。整个夏天敌人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限于扩建堡垒系统，伺机步步推进。

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前线视察的时候，我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谈话中林维护他和毛的战术观点。我建议他为《革命与战争》写一篇文章，阐明他的思想，他真的写了。实际上，军事委员会五月份所作的决议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现在再进行公开的讨论，就多少有点无的放矢了。博古和我却宁愿把这场讨论看作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计谋，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真正的意图，因为可以肯定地说，间谍已把这份杂志弄到敌人手里去了。彭德怀也参加了谈话，我们同他没有什么意见分歧。

七月底八月初，第六、七军团在敌人外围交通线上的作战行动大大稳定了北部战线的局势，因为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因此受到了牵制和束缚，使我们能够把中央红军主力在短期内

或较长时期内撤回休整，进行补充和训练。

1934年初夏，有一队政治和技术干部带着无线电设备和密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第六军团所在地。这样，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可以收到关于那里苏区形势的比较详细的报告。事实证明，那里的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不利。地盘大大地缩小了，第六军团的物质基础也很薄弱。另一方面，据说贺龙领导的第二军团（当时我们同它没有直接的联系），成功地巩固了他在湘鄂川交界的新根据地。我们认为，这块三角地区在战略上很重要，因为它位于长江附近，又处在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的交界点，可以为广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提供很好的立足点。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肖克，放弃第六军团的老根据地，在抗日的政治口号下与贺龙会合。同时命令独立十六师师长，从瑞金出发返回十六师的根据地，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把敌人引向南昌的方向。但是，正如我已提到的，独立十六师师长跑到敌人那里去了。

第六军团在湘东成功地突破了两层堡垒区，通过湘南直到贵州，没有受到重大损失。第六军团经过的路线大体是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稍靠北一些。它通过无线电汇报了许多有关敌人堡垒体系的宝贵情况，接着从贵州又突然向北，于1934年秋到达第二军团的根据地。我们同第二军团又建立了无线电联络，当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两个军团合二为一，贺龙担任军事总指挥，肖克担任政治领导。开始他们在湘北与敌作战，时而也取得一些胜利。1935年夏秋之交，他们跟随着中央红军的足迹向西转移。

1934年7月底8月初，由第十九师组成的约有七千人的

第七军团，从闽西南出发。他们称自己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准备在福建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以此来威胁赣闽浙皖交界地区蒋介石的战略后方。蒋介石在清算了蔡廷锴以后，稳住了福建的局势，并让早已准备的两个主攻部队向宁化和汀州方向移动。军事委员会因此命令第一、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在汀州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支援第七军团突围。上述各部队击溃了敌人一至两个师的兵力，并缴获了大量战争物资。这次战役以后，在这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战状态。第七军团顺利地进入福建内地，然后挥师向北，可是，1935年初在浙江边界地区为敌人的优势兵力所截，遭到了严重打击，我们同第七军团的联系也突然中断了。第七军团的余部虽然同红十军会合了，但此时红十军自己的处境也极其艰难，我们从敌人的广播中获悉，1935年初红十军几乎全军覆没，1927年起义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方志敏也被捕遇害。

---

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五月——七月的季度计划也基本上完成了。第六、七军团紧紧咬住敌人不放，最初的形势十分有利；同时在六、七两军团的配合下我们取得了石城和汀州之战的胜利，迫使敌人的主攻部队在整个主要战线上停止了前进。可以说，尽管在北部还有许多小规模战斗，但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接近尾声了。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敌人在北部和西部战线已达到了它的近期目标，在南部和东部（在福建）它也令人忧虑地接近了



预期的目标。敌人比以往更加紧构筑堡垒，同时不只限于保护它从后方到堡垒前沿的联络线，而且还建造了几道横贯的堡垒线，以此把堡垒之间的苏区地盘割开。此外还有消息说，敌人在它的后方纵深处围绕中央苏区加固了堡垒地带，并且补充构筑了新的堡垒。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也许因第六、七军团的突围而得到了警告，估计我军主力可能突围，所以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也不再有什么异议，更不用说相反的建议了。此外，他几乎完全引退了。我原先以为他在禁区的政府机关内“养病”；过了很久才听说，他至少从九月份起在第一军团待命地于都逗留了一个时期。好多年以后，他让人散布无耻的谣言，说博古和我借口让他去侦察最有利的突围地点，把他流放到那里去了。

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象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在对这个计划进行加工时，我和周恩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原来的想法是，以中央红军三个军团突破封锁线，此外在中央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虽然由于敌人的堡垒地带已经向纵深深层推进，主力能否回来还很成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至少可以保证苏区成为强大的游击根据地。在实行第一个季度计划时，就已经有倾向表明，要把第九军团和暂时还只是计划中的第八军团也牵入突围的行动。现在周恩来竭力主

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等，并把很大一部分准备留在苏区内和边界地区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也纳入正规部队。通过博古从中调解，我们之间达成了妥协，领导整个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占了上风。只是应撤退人员的总数稍有降低，据我估计，降低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结果作战部队被非作战人员过分拖累，大大妨碍了部队的行动。被编为军团的新建部队的战斗力，当然也有待提高，但这些部队对非正规战争来说是很需要的，而它们的兵力在苏区却是越来越少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里还是应该留下足够的、可以顺利开展游击战争的干部和战士。

据我回忆，这次意见分歧并没有波及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而只是在博古、周恩来和我之间产生的，后来又在完全同志式的气氛中解决了，对外我们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

当时的主要政治口号是动员苏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中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附属这个政治口号的“战略”口号是向抗日战争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发动大规模进攻，继续积极捍卫现存的苏区。实际上，这当然也是政治目标。可是，这一切完全被毛主义的历史编写者歪曲了。他们宣称，毛泽东在当时拟定了一个动员全部革命军队开赴抗日前线的天才计划。且不说毛在制订和实现突围计划时所采取的消极旁观态度，这一点读者可从上述的党内事件中看得很清楚，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

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侦察结果表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虽然这里也有四道南北方向的堡垒封锁区，它们之间相距按直线计算约有五十至六十公里，纵深至少有二百至三百公里，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向上有堡垒相联结。然而这里的堡垒同其他线段上、特别是同北部和西北部的堡垒是不能相比的；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远远走在蒋介石增援部队的前面，而粤军和桂军却很难加入这场损失浩大的战斗，因为这必然会大大削弱它们同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这是同我军的意图相吻合的。我军的意图是要避免冒着巨大风险在堡垒地区进行决战，而待我军获得广阔的作战场所以后，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

五月计划中确定的措施——贮备粮食、冬衣、弹药，补充和改编部队等等，在组织上越来越加紧贯彻下去。新的重要工作是已经着手进行的在中央红军和苏区之间关于人员和物资的分配。根据周恩来的撤退计划，中央红军扩大为五个军团，由十二个师和两个纵队的非战斗人员组成（详细数字见后）；苏区留下来的独立部队的人数下降到一万至一万二千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数不定的农民自卫组织，他们的武器很差，战斗经验也不足。政治机关和干部也作了相应的分配，其中多半只是中央的机关和干部进行出发的准备，而几乎所

有的地方机关和地方干部都留在苏区。苏区在政治上由项英领导，在军事上由陈毅领导，而且变得更加独立了。

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附带说明一下，毛泽东甚至在突围的时间问题上也把是非完全颠倒了。春季，他激烈地反对突围的想法；夏季，他说突围至少过早了；但后来又说突围太晚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九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九月底十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只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九月初，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突然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如果不考虑粤军以蜗牛般的速度极其缓慢地向会昌行进，以及许多民团的经常袭击，那么南线从1932年以来

一直是比较平静的。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陈济棠显然是担心，至今一直使他没有同蒋介石发生直接对峙的苏区一旦失守，蒋介石就会同他争夺赣南领地，并危及他在广东的统治。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让主力继续在苏区内作战。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突围，因为敌人对苏区的封锁已经大大地缩紧了。其次，在我们南线的粤军第一军司令余汉谋，是有名的蒋介石同党，他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攻打我们。粤军驻扎的地区是唯一有利的突围地点，如果不利用，以后要突围就很成问题了。以上种种考虑起了决定作用。谈判还在继续，从我们这方面来讲，主要是为了掩饰我们的战略计划。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时期。众所周知，这次大会重新确定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和战术。王明在会上也作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结束中国内战，建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新的统一战线。这条路线同共产国际旨在动员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总策略，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同外界的隔绝，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更加放手加

紧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宗派斗争，不惜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过去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建议任意加以解释和歪曲，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干部。

毛的阴谋所以容易得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枪杀或者叛变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投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供出了一切他们熟悉或者知道的情况，导致了白区很多领导干部被捕，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丢失。

蒋介石很可能就是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幸好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因为具体的细节、特别是突围路线和日期，当时尚未最后决定，所以也没有告知上海局。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第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八、九月份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最晚是九月底，我军主力最后开到待命地点。这些部队事先已由留下来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从前线换了下来，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任务是坚持战斗，牵制住进攻的敌人。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并在十月一日基本结束。十月十六日，长征队伍开始行动，在敌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夜行军向出发地靠拢。

# 第三章

## 长征路上

### 1934—1935

根据我 1939 年的笔记中记载的 1934 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机关枪的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 中央红军在出发时的实有兵力是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 其中五万七千至六万一千名战士, 有四万一千至四万二千支步枪和一千多挺轻重机关枪。战斗部队编为五个军团, 第一军团由第一、第二和第十五师组成, 有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 其中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名战士, 有九千至一万支步枪和三百至三百五十挺机枪。第三军团由第四、第五和第六师组成, 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名战士, 有九千支步枪和大约三百挺机枪。除此之外, 作为突击部队而承担突围主要任务的这两个军团, 还拥有三十至四十门轻迫击炮和大约三千枚我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弹, 并且各有两门以上直接瞄准射击的野战炮和几百发炮弹。第五军团由第十三和第三十四师组成, 有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 其中一万名战士, 有七千支步枪和一百五十至二百挺机枪。新编第八军团由原来的独立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组成, 有一万人, 其中八千名战士, 有六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挺机枪。最后是第九军团, 由第三和第二十二师组



成，有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九千至一万名战士，有七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五十挺机枪。每个战士发了一至二枚手榴弹，每支枪配有七十至一百发子弹。每挺机枪配有三百至四百发子弹，每挺重机枪配有五百至六百发子弹。

所有部队，包括师指挥部，都拥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野战电话和其它通信器材。两支收容纵队也是这样，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充足，以便在必要时能够短期独立活动，进行自卫。第一行动纵队，或称中央纵队，包括中央委员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成员。总参谋部下面设有几个直属部队，其中有一个通信营、一个主要负责修筑道路和桥梁的工兵营和一个防空连。由军事学院和三个军事学校合编成的干部团负责保卫工作，干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务营，该营拥有六门轻迫击炮、六挺重机枪、相应数量的轻机枪和步枪。这支纵队总共有四、五千人，其中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枪以及上面列举的武器。属于第二纵队即后勤纵队的是军队的后勤部门，包括一个野战医院、各种机关及党政干部，就数量来说其主要部分是所谓预备师人员。这个师由新招募的挑夫组成，他们负责运送数百包宣传品、银元箱、兵工厂机器、其他工场设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行军途中，他们的负担部分减少后，往往就要作为战斗人员编入部队，以补充不可避免的减员。这个预备师的人员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因为他们带在身边的梭标、长矛和大刀也没有多大用处。这个纵队由保卫部队的一个混合团担任掩护，总共有八、九千人，其中大约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步枪和毛瑟枪，以及几挺机枪。这个混合团的人数很不稳定，因为它是根据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对警卫人员和警卫部队的需要而设置的。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

这些精确的数字说明，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象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下同——译者）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象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根据毛轻率提出的并在历史记载中至今流行的说法，突破封锁是军事上失利的必然结果，并且是在敌人的压力下进行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这不是一支被打垮的、而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领导者们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计划作出这个决定，完全是出自本意、出于明智的考虑，即苏区内的不利的战略总形势。问题非常简单：是应该保卫这个四面被围、资源枯竭和部队行动越来越受限制的地区呢，还是应该保存有生力量和夺取广阔的区域，以进行运动战，使我们有希望去打击敌人，创建一个新苏区而又不完全放弃老苏区？如果我们把下面一点作为军事战略上的主要任务，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中央红军作为革命武装的重要部分，根据至今的经验和经济上、政治上、道义上以及技术上的可能，去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并为继续进行武装的阶级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人们至多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遭到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阶级斗争在以后的年代里，越来越汇合到民族革命解放战争中去，而同时苏维埃运动也越来越被统一战线所代替，因此坚持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在客观上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把上面列举的数字和早年的数字比较一下，就会清楚看到，中央红军的战斗部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武器装备上都有所增长，战术训练和政治教育也有所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军自建立以来在这些方面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十二个师的战斗力也不相等，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七个主力师（第一、二、三、四、五、六和十三师）战斗力很强，而另外五个师（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三十四师）则缺乏正规战争的经验。1934年刚刚参军的战士，就是在主力师里也占了相当高的百分比。这的确是严重的缺陷和弱点。尽管如此，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红军中还是拥有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它完全能胜任自己所面临的新任务。

为了完整起见，在这里我讲一下就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红军其他独立作战部队的实力，一般说来它是与1934年年底总参谋部估计的数字相符合的。

红十军和第七军团在损失严重的战斗之后，总共还有六千至八千名战士和五千至六千支枪，他们只能依靠一块狭窄的根据地与敌周旋，根据地的面积在五千至七千平方公里之间，居民将近有五十万人。主力从中央苏区撤出之后，这些部队由项英和陈毅领导，但是1935年主力红军和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合编以后，有一万五千至二万名战士和一万至一万二千支枪，其根据地的面积经常变动，曾达到两万平方公里，只有大约一百万居民。

在四军团以前的根据地，徐海东领导的地方部队合并成第十五军团，有五千至六千名战士和四千至五千支枪。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屠杀，老苏区已经难以坚持，十五军团便在1934年底向西北挺进，它可能是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这我就说不准确了。

关于四军团的流言传播甚广，我们同它一点联系也没有。以后，四军团同地方军阀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斗争，直到1934年夏在川北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据称有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一百五十万人口，一时甚至达到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四百万人口。但是，后来四川军阀纠合在一起，蒋介石又调动了四、五个师的兵力并且采用了象对付中央红军那样的堡垒战术，四军团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向西撤退。传说，在主要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川康交界地区，它创建了一大片新根据地，并成立了苏维埃联合政府。关于第四军团的实力，说法非常矛盾，一般说战士人数在十万和三十万之间，这无疑是被大大夸张了。根据总参谋部的清醒估计，大约有六万名战士，三、

四万枝枪。可是，据说四军团没有重武器，只有相当少的机枪。关于四军团的实力，估计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可能是因为四军团在离开川北的临时根据地时，还撤走了一部分居民。

这些颇为不足和不可靠的数字，大部分来自敌人方面，但仍然可以说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国红军其余独立作战的部队大部分也在1934年左右放弃了他们以前的根据地，那些由于当地的情况没能这样做的部队，以后也或多或少地被瓦解了，红十军的情况就是如此。

---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象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由于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面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的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

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的、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卫组织的那一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到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一旦主力突围成功，陈毅领导下的独立部队就会比现在更加分散地、从山区适宜的根据地出发进行游击战，而赣闽粤和湘赣交界地区中险峻的蜿蜒连绵的山脉，将为此提供最好的条件。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项英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蒋介石的军队虽然于1934年底开进了已成一片废墟的红都瑞金，但他必须把大部分精锐师团迅速派往湖南和西面更远的省份，分头进行追剿。江西革命武装的主力常年未受损害，它甚至从分散的和被截断后又回到老苏区的主力部队那里补充了一些有生力量。这样，项英和1937年接替了陈毅的叶挺能够在国民党的容忍下建立新四军，其实力在短时期内达到了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然而，当新四军1941年奉命北上，开赴日军后方作战时，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埋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项英战死，叶挺被俘。有谣传说，新四军接到了从延安来的同国民党商定的协议相违背的命令，因而引起了事变。最新的调查证实，新四军确实从国民党有关部门得到了开拔到长江以北在日本人的背后作战的命令，但是出发时间给耽搁了，因为毛泽东发出了相反的命令，毛的意图显然是要保存和扩大长江以南国民党后方的“革命根据地”。当新四

军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终于出发时，国民党军队已经集中了兵力，然后对行进中的新四军进行了袭击，当时特别对准了新四军的军部。这样，项英就成了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毛泽东角斗的牺牲者。1938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诽谤项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项英忠实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定地代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我在事变之前，早已作过这样的评价。因此，项英之死并不是不合毛泽东心意的。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我想在这里插几句话，我在江西逗留期间，这位过去曾经勇敢地反对过毛泽东政治上的轻率行动，努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有一条正确的、与共产国际相一致的路线的杰出革命领导者，就已经不再起什么明显的作用。据我所知，他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府人民教育和文化委员，但几乎不太引人注目了。这只是由于他的重病，或是还有什么政治阴谋，我就无法说明了。1935年在试图撤出苏区的途中，瞿被国民党的暗探抓住并被处死了。毛和“红卫兵”甚至到最近还在继续玷污他的英灵，并把他的名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抹掉。

象以前一样，项英这次也对毛的恐怖政策，以及毛在1930年左右对忠于党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作了明显的暗示。同时，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

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

中央红军兵分三路，通过赣州和会昌之间未被敌人占领的缺口，向江西的西南端进发，在信丰一带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了赣江的一条源流——桃江。这段战线是由广东第一军第一师把守的，我们对他们的阵地以及我们的进军路线和进攻方向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侦察，几个夜晚之内我们的部队就到达了他们的前沿阵地。第一、三军团使用了储存的重武器，出其不意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击溃了粤军第一师，而自己在战斗中几乎未受损失。这次战斗获得了圆满的胜利，就连毛泽东对此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感到不甚痛快。

随后，三路大军不停顿地向湘赣交界地区——我们必须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继续进军。根据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主力部队向预计在我们前面和左面积极行动的粤军和桂军发动进攻，而用较弱的兵力掩护右翼向北挺进，估计在那里国民党中央军很可能还没有出动追击。因此，中路军由作为突击部队的第三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组成，并以第五军团



作为后卫；右路军负责北翼的掩护，由第八军团组成；最后是左路军，它作为第二突击部队，同时作为掩护南翼的部队，必须占领广东边界上设防的山隘口，抵御住粤军和以后桂军可能发动的进攻，由第一军团组成，第九军团作它的后卫。

第三军团从正面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一军团在地形不明的大山里，没有地图可循，被迫在羊肠小道上和狭长的深谷中行进，因而未能占领他们前面设有坚固堡垒的隘口，侧面又受到粤军赶来增援的部队的威胁，而自己却不能展开兵力对付他们。至此，第一军团必须掉转头来暂时拐入中路军的行军路线，以便绕过自然障碍，避开敌人的侧面袭击。这样，就失掉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激烈攻击博古、周恩来，当然首先是我。我们承认，在确定第一军团行军方向时，我们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正象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一贯性的”，过失在于情报侦察的不准确。虽然，毛泽东出于种种理由不让朱德参与此事，但朱德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此毛准备重新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中挑起宗派斗争的企图，从一开始就破灭了。但是，从这时起，他把这个斗争公开地继续下去了。他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当时，

他所凭借的是许多长征参加者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在新编部队和后勤纵队中屈服于突围的困难、惊慌失措和只想到退却回家的人的情绪。毛不去反对这种情绪，反而对此大加煽动。由于敌人在此期间加紧进行追击，我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又损失了许多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军速度，而这也给毛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借口，因为逃兵和掉队的人数在日益增加。

我们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终于成功地在蒋介石大队人马到达之前，在刚刚测定的一段汉粤铁路旁边冲过了由较弱的湖南兵力把守的第三道封锁线。向第四道即大家知道的湘江沿岸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的进军，尽管湘桂交界地区道路难行，以及后面紧追不舍的粤军不断给我后卫部队施加压力，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同时我们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三、四个师的兵力由周将军指挥在我一侧平行方向进行追击，并力图夺取位于广西北部的县城全县（全州），同时打算渡过湘江，在这里堵住我主力，乘我军渡江之际消灭我们。

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县城时，发现周已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周的一个旅占领了县城，将主力埋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全县四周的城墙又高又厚，就象中国内地大部分古城一样。用我们的武器攻城看来不大可能，至少要消耗很多时间和付出很大伤亡。在全县的近郊进行决战也几乎不能成功，因为在这个地区兵力很难展开，而且此地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瑶族和苗族。

因此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

建议，他要求同周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

然而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虽然第一、五军团能够击退敌人进攻，第三军团也能够突破封锁线，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特别是第五军团遭受了很大伤亡，它的第三十四师被截断，无法与主力重新会合。这个师未能突破重围回到江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转向湖南，在那里进行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以后加入了第二军团。还有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警卫团，特别是后勤纵队预备师的情况也是这样。随军携带的大部分物资，已在突围战斗的近两个月中消耗殆尽，或者成了多余的累赘。此外，为了提高中路军的灵活性，在越过湘赣边界之后领导上决定，把一部分笨重的机器和工场设备就地丢下，摆脱了沉重负担的挑夫大部分也都留下了，有的留居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有的成群地或单个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损失最大的是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自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据总参谋部的粗略估计，他们在占领贵州东部县城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的损失甚至达到实

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向遵义的继续进军看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他们到达遵义时的人数，同在黎平时一样，减员不多。主力部队，即第一、三、五和九军团久经战斗考验的许多师的减员保持在很小的限度之内。

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是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长征队伍这段时期在极其艰难的地区行程达五百公里，历经数十次小仗和三次大仗，终于夺取了广阔的战略区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堡垒区的计划失败了。我军主力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笨重的后勤纵队和临时组成的部队把自己的累赘大部分甩掉以后，主力部队在质量上甚至还有所提高了。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确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和长征以后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① 还是那个肖劲光，在全县战斗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在1933年秋天第五次“围剿”开始时，把中央苏区东北军区的大片土地及战略重镇黎川不战而弃了。今天我不能够确切地说，他在全县战斗中指挥的是什么部队，在中国编年史中这段插曲当然已无人知晓了。可能当时是第三十四师，也许是第八军团两个师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当敌人的部队出其不意地接近他的指挥部时，他带着警卫人员逃跑了，丢下他手下的部队，听天由命。后来这些部队有的被截断，有的被打散。他在总参谋部报告时，却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自然谈到了这件胆怯失职的事件，我当时说，应该把肖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象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肖被调到后

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1937年我在延安见到他时，他当上了陕北留守处主任；1955年毛又让他当上了海军大将。在遵义毛利用我的话诽谤我、加罪于我，说我使用了“恐吓和惩罚的手段”。

---

中央红军按照计划继续向西前进，然而在战术上有了一个很小的、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央红军避开广西的区域而采取了一条大致向北的、朝着湘黔交界方向的路线。这样中央红军就从丛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地进入了好客的汉人地区。此外，粤军和桂军也停止了追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盘不再受到危害了。我军暴露了的南翼，以前常常受到威胁，如今消除了，而我们沿途遭遇到的地方保安队和民团对我们也无可奈何。相反，周将军却继续在我军行军路线的北边平行方向进行追击，但他暂时并不进攻我们。显然，只要没有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援部队的援助，他在堡垒区以外就会感到力量不足。年底我们越过贵州边界，击退了那里地方驻军的无力抵抗，占领了黎平。

在一次行军间隙中，总参谋部对部队暂时的实有兵力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决定解散第八军团、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和后勤纵队的预备师，以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和战士来充实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各个师。中央红军这时由八个有战斗力的师组成，第一、三军团各有三个师，第五、九军团各有一个师。关于实有兵力的人数，据我的回忆，没有提到，但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这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红军最后在中央苏

区、也就是说在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组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前的水平。一直到遵义，兵力人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贵州有少量减员，但通过征集俘虏中和农民中的自愿兵而弥补上了。周恩来在遵义也说是四万五千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在总参谋部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

非战斗人员部队的减员很厉害，后勤纵队比中央纵队更为严重。这两支队伍的人数下降到三、四千人，甚至也许更少。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警卫团以及掩护团被改编成营。总之，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变得更有利了，现在不是三比一，而是六比一。此外，我们把携带不便的辎重，包括那些用完了弹药的重武器统统扔掉了，中央红军由此赢得了更大的灵活性。简言之，运动战的一切条件现在都已具备，问题只在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 this 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

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四军团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的并不确切，因为它长期没有联系了；此外同二军团的无线电联系也在行军时中断了。

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象过早地走开了。从1934年秋季以后，我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这段时间发作得特别厉害。春季到达滇北山区时，我的病况才逐渐好转。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占领黎平之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彭德怀和林彪也参加了，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行军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因为根据我们的情报，已有六、七个蒋介石的部分机械化精锐师向贵阳方向出动了），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虽然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撇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战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

从黎平到遵义，我们又走了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这次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完成的。这个地区没有防御工事，我

们可以加快自己的行军速度，而且又有足够的伪装用来对付频繁的空袭；敌人的空袭不断加剧，以补充或代替地面的追击。虽然这个地区很贫脊，资源也很少（贵州是中国南部最落后的省份），但是部队的给养没有发生困难。我们除去占领了一些较大的村镇外，还占领了好几座城市，其中有富饶的商业中心镇远。我们没收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大批存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分发给穷苦的老百姓。当地居民友好地接待我们，有时还派代表对我们表示欢迎。我军只与贵州省军队有过直接的战斗接触，他们的装备不如我们，而且训练也很差，至于他们低落的士气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认真地试一试，来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就被我们赶跑了。

乌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是我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新贵州军在河边构筑了防御阵地，所有船只都被拖到河对岸去了。第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迅速扎起竹筏，强渡过去，拿下了桥头堡。在他们的掩护下，主力部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修起两座竹桥，急忙渡过江去。这里的敌人也是在开始时抵抗了一阵，然后就仓惶地撤退了。

第二天我们得知，蒋介石的两、三个师，估计是周的军队，急速行军从湖南边界向乌江推进，显然是打算在我们渡江时进行袭击。本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袭击并消灭这两个师，因为敌人必须从对岸渡过乌江，而我们可以在江岸这边伺机行动。我认为，我有义务提出适当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却根本不愿听取。在这种时刻打了胜仗，好象是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他急着要赶到遵义，因为他认为：经过长期和彻



底的准备，打击党的最高领导并重新掌握军队的时机成熟了。照他看来，这根本不需要军事委员会作什么决定，他的一句话就足够了。

从乌江到遵义这段短短的路程，我们走了两三天。贵州军队不敢与我们作战，他们或是逃跑，或是溃散了。省主席王家烈不愿动用剩下的四、五个师，让它们继续向西撤退。中央红军一举解放了这个拥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人烟稀少的地区，除了省主席的夏季住地遵义外，还占领了遵义以北的商业中心桐梓。中央红军就此还控制了长江港口重庆和省会贵阳之间的重要交通线。

我们向这些城市的进军如此之神速，以至很多居民（遵义将近有一万人口，桐梓还要多些）几乎都留了下来，甚至那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和大商人也没来得及逃走。粮食布匹等大批货物都落入我们手中，但我们最急需的枪支和弹药等战利品却很少。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口号，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根据地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没有决定。方面军的总政治部、军团和师的政治部，首先是干部预备队中的党政干部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组织宣传鼓动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储存物资和劳动工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穷人，建立自卫队和征募自愿兵，甚至还规划了土改的最初步骤。

部队得到近两个星期的喘息休整时间；因为蒋介石停止了消耗巨大而又徒劳无益的追击，他需要时间重新部署他的兵力，并把它们的行动与黔滇川等省地方军队的行动协调

起来。

当时的形势，决不象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sup>①</sup>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

---

毛泽东不去这样做，反而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他之所以能够毫不迟疑地这样去做，是因为他知道大多数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是支持他的，其中除了洛甫、王稼祥和陈云外，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半心半意支持他的周恩来。但是他仍不满意，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即使把1934年1月五中全会补选的委员考虑在内，那末，三十五至四十个与会者当中肯定有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有四分之三不是中央委员，更不用说是政治局委员了。这是这次会议的第一个特点。人们不禁想到今日中国在所谓“九大”以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人所共知，会上毛集团分子和红卫兵对出席会议的少数中央委员，也是施行了以多压少的和恐怖的手段。

第二个特点是：象以前五中全会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一切革命基本问题，例如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世界

---

<sup>①</sup> 见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1959年，英文版第265页。

的主要矛盾，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等，关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会上，既不谈国际形势，也不谈对苏联的关系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斗争，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在会上也只字未提。会议的唯一题目是关于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会议内容的这种限制，以及会议的组织成份，从一开始就保证了毛泽东去贯彻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纲领。为了万无一失，他非常明智小心地不去攻击中央的政治总路线。他说，这条总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局部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以后他又反过来把这条路线咒骂成彻头彻尾的“第三次左倾”。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

在谈到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和决议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对会议以前的历史和有关会议的其它情况作一些综合性的说明。我在此依据的是文件记录，对其内容的真伪，我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

毛泽东在遵义有何目的呢？非常明显，他是要对1928年“六大”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在1932年8月宁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1934年1月瑞金中央全会上的失败进行报复。在宁都，他在中央苏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中的独裁统治被打破了，主要是因为他不顾领土丢失，不顾百姓利益，顽固坚持向山区退却的战略。现在，他通过利用组织上和战术上的个别错误进行煽动，特别是通过臆造论断和诽谤陷害等手段，有可能实现他多年来派性斗争的目标了，这就是贬低党的领导，消除总书

记博古的影响，完全恢复自己的名誉，并把军队重新“抓在手中”，从而使党服从他的意志。

为什么他敢于在遵义这么干呢？第一，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计划煽动起来的。第二，许多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张太雷、彭湃、邓中夏、恽代英、罗亦农、向忠发和蔡和森，有的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有的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其他领导人，如瞿秋白、王明、项英、方志敏和张国焘（瞿和方不是政治局委员）也都没有在遵义。另外，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当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第三，党在思想上还不够巩固，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也或多或少有点偶然。百分之八十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不是在“六大”上选出来，而是后来补选的，政治局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就他们的社会出身来说，据1934年统计，中央委员里只有百分之十一是工人，百分之二十六是农民，同样百分之二十六是职员和知识分子，百分之三十七出身于地主和商人阶层。因此毫不奇怪，当时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三十六的委员，后来在各个不同时期投降变节了。

特别是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

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另外，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对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没有一个清楚的设想。原先的计划，即和二军团一起在华南建立一个新苏区，由于毛泽东断言此计划不能实现并从中作祟，只好放弃了，而在贵州建立一个根据地的想法，如果不是带有自发性的话，也是一时冲动的产物。毛泽东考虑和四军团会师的设想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因为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实现。至于向西北、向陕甘宁地区进军，在那里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事，在当时就是做梦也没有人想过。党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一个苏区，1935年夏通过张国焘才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这段神话竟被大肆宣扬，说毛泽东在遵义天才地设计了红军所有部队共同开赴抗日前线的方案。这是纯粹的臆造，这一点甚至从会议的“决议”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人们就会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遵义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上风。博古除了同意会议的组成及其片面的议题而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估计到，毛及其追随者将会对他和周恩来，当然还对我，进行尖锐的攻击，但是他希望客观地评价当时的局势，共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面前重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然而，他受骗了，毛一心一意所谋求的只是讨论错误和换班两件事。

会上，博古首先作了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接着周恩来在另一个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他们讲的都是围绕已经提出的题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他们的论点是，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领导一般说来是正确的。至于红军放弃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他们则列举了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予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军事技术和配备军事顾问等手段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使得蒋介石能够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即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国十分薄弱。所谓主观因素，他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人民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足，游击战开展得不够，以及在贯彻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

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这就给毛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击矛头集中在我们两人身上，让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我们，而他对周恩来却大大地加以庇护。他把周恩来的真正错误，例如周关于在长期战争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夺得战略上胜利的理论，都算在博古和我的帐上，还对突围时非战斗人员给中央红军带来的极大负担，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在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他说博古的报告“在基本路线上是错误的”，博古“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

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对当时所谓在中国存在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因而他得出了认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一“机会主义的结论”。

在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的条件下，红军的灵活机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并且不得不对慢慢集中推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作战，而敌人所依仗的是多年来构筑的并在第五次“围剿”中逐渐完善起来的堡垒和岗楼封锁系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责博古、周恩来和我，说我们“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门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试图“阻止敌人的进攻”而不是“把敌人消灭在全胜的最后决战中”。所有这些指责都是牵强附会的，我在前面对江西斗争的描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是消极防御或阵地战的信奉者。在遵义会议以前，更确切地说，在广昌之战以后出现的有争执的问题，除了突围方案以外，始终只涉及少数几个战术上和策略上的决定。

毛很善于蛊惑人心。他虽然依据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侈谈“革命局势的新高潮”，但同时又象在瑞金一样，总是说“革命低潮”，并且从中引出他在遵义还坚持的战略防御理论，认为如果存在有利条件，就能够而且必须会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人们不会忘记，没有任何人象毛泽东那样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反对突破包围圈，而现在他却反过来说突围太迟了、太仓促了。

同样蛊惑人心的是，毛歪曲事实并武断地说，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在五次反“围剿”期间“常常轻

易地强攻堡垒”，从中央苏区撤退时又采取了“不战而逃的路线”，“把战争当儿戏”。

这些论调是很容易驳斥的，但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重复了。我想，我对中央苏区和长征第一阶段情况的清楚描述已经足以证明，毛的责难，除了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外，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毛却把这些缺点错误无限制地夸大，并且说成是普遍性的。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1933年10月—1934年10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而所有这些却被毛说成是“把战争当儿戏”！

在遵义会议期间和遵义会议以后，毛试图把事情说得好象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军事战略方案的分歧，他自己代表的是正确方案，博古、周恩来、我和其他人代表的是错误的方案。在红军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确实可以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但正是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依赖于井冈山这个天然屏障，时而热衷于一种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时而以伏击和偷袭的形式进行“流寇战”，以后又与李立三的冒险进攻理论相一致，去进攻敌人的大城市和坚固的中心地区。而在三十年代初，他又采取了向山区逃跑退却的方针。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之后基本上有了一个统一的战略方案，这个方案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伯承和中国红军其他许多杰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共同努



力制定出来的，而且适应了时局的不断变化。毛泽东也参与了此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观点向来缺乏逻辑性，和那个他归功于自己的“唯一正确”的方案，很少有共同之处。

凡是毛在他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共同制定的战略计划，其内容毫无疑问都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正确原则，对这些原则，人们并没有什么意见分歧。遵义会议之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有争论的问题，我已经多次说过，只是涉及战术上和策略上的问题。但这就使毛有机可乘，把“曲解和损害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的罪名，强加给那些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并给他们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实际上这是经过编者加工的毛泽东的讲话）这样写道，“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条错误路线的根源在于对客观困难估计过高，特别是对红军和苏区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态度是：在军事问题上反对“单纯防御路线”，同时在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

十年以后，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毛泽东撰写的，1945年4月20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中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这里写道：“左倾”的发言人（即博古领导的中央）“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还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1953年，中文版第1002页。

为了给他的所谓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一论调寻找根据，毛竟不惜把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政治口号歪曲成战略目的。他声称，“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苏区”的口号被博古、周恩来和其他人篡改成军事命令，并由此给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对 1934 年年初福建事变的论述，达到了他篡改历史事实的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对此已经作了详尽的叙述，在这里我想简短地概括一下。毫无疑问，党中央疏忽了对蔡廷锴十九路军的及时有效的支持。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这个错误与弗雷德的冒险进攻方案一起，在军事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并给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增加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大家想必还记得，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遗憾的是还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在瑞金的毛泽东，正是他们警告说要防备蔡廷锴，反对中央红军直接和马上与十九路军合作。在遵义毛泽东干脆倒打一耙，诽谤和指责博古和政治局常委会，说他们“不了解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的存在对我们十分有利。”同时，他在遵义仍然把十九路军说成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还说这个派别为了维持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给自己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对群众更具有欺骗性。他甚至在遵义还毫无改变地坚持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提出一种原则，我们必须“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这是对于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这一正确原则的极危险的修正。后来，毛从这个原则引伸出同地方军阀实行联合的政治口号，以破坏正在兴起的民族统一战线。因为，不去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去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一直是

他的主要愿望。

毛还把搞宗派的罪过，推到从一开始就赞成同十九路军紧密合作的博古和其他人身上。很显然，毛是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投机，因为绝大部分与会者不知道福建事变期间的错误政策和战略的具体背景，也没有人向他们讲清这一点。

最后，毛泽东为了诋毁我并孤立博古，对领导方法进行了最激烈的攻击，把这种方法说成是“极端的恶劣”。他给我的罪名是：我“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但是，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他对此却始终讳莫如深。毛企图以此说明，政治局对“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政治局常委会，即博古“积极的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是的，参与决策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可是说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军委委员）“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我是“徒然的”，那就根本不是事实了。毛蛊惑人心地把他的派别“中央三人小组”和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混为一谈，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谈到了。集体领导首先是由毛本人以及部分地由洛甫和王稼祥破坏的，他们为了进行宗派的煽惑活动而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几年以后，当事实的真正联系已经被人遗忘，有人为了使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论断得

到较为可信的解释，又到处传播，说我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强加给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毛在讲话的结尾，突然以一种十分乐观的语调说，“我们红军的主力仍然存在着”，这与以前他自己所谓红军的损失“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的论调自相矛盾。他还提出了“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的任务，并强调说，这个任务“只有在自己艰苦奋斗中”，而且“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如果人们撇开新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继续西移这一点不谈，那末这个如此仓促地制定出的目标与突围之前制定的战略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笼统更没有约束力罢了。至于是否和怎样实现同二军团或四军团的协作，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对此事会上根本就没有谈到。毛不能或者不想作出任何一种选择。

由于从一开始一切基本政治问题都被撇在一边，所以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党和革命的前途问题，也未能解决。对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只字未提；对于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也只字未提。虽然，这个口号从1931年以来就是红军的主要政治口号，而且同全中国人民息息相关，并为他们所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占第一位的从来就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军事斗争和内战。这一点从他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地流露出来，在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决议》中也是明白可见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策略上追求两个目的。他想为自己赢得与会者的多数，同时使他的“对手”至少保持中立。一方面，他把党中央内部的两派对立起来，称为“我们”和“他们”。我们，即原告，指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他们，即被

告，指博古、周恩来、我和其他人。甚至他的讲话从形式上来看也象律师的弹劾演说，而以他的讲话为基础的《决议》也颇象一纸公诉状。例如在《决议》中写道：“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或者“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毛清楚地知道他对党的领导者的指控大部分、恰恰是最严厉的部分，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此他不得不狡猾地玩弄手段。我在前面已经援引过，他虽然声称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博古，周恩来和我主持制定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是错误而有害的，但同时又肯定说：“党中央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在他控诉了博古十恶不赦的罪状并将撤离苏区的责任强加给博古之后，他缓和了他的指控，说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总之，他的讲话除了以诽谤诬陷和肆意歪曲，还以含混不清和矛盾百出而著称。由此人们可以看出，在遵义毛所关心的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场派别斗争将为他通过军队夺取党的领导大权铺平道路。

但是，这个派别斗争的特点，并没有逃过与会者的眼睛。所以，毛再三强调，要防止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登场视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决议》上也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们私下也在悄悄议论，因为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之间的角色分配太引人注目了，竭力操着粗暴声调的林彪当然就更不用说了。相反，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发表意见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

谨慎的。与会者大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象在接受命令。

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承认了《决议》。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两天的会议。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并仔细阅读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同时，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一请求被批准了。

最后作出了著名的《决议》，但是据我所知，它并没有以书面的确定形式提交出来。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形式上的表决也没有进行。毛泽东的报告很可能是以掌声和欢呼声通过的，如果这种或多或少带被动意味的接受也能称之为通过的话。当然，与会者的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报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看一看会议参加者的组成以及“中央三人小组”事先的准备工作，就可以预见到了。

接着，在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上讨论了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组织问题。据说，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也加深了我的印象。尤其是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

书，1968年于伦敦发行的最新英文版中也写得明明白白。可是，根据许多文件我相信我是搞错了。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毛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象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意味着毛向篡夺党和军队的大权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是重要的一步，特别是在军内他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洛甫的支持下，他排挤了身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总指挥的周恩来，并取代了他的位置，这样除了政府以外，把军队也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他同样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权力的集中，虽然没有立即、但却在以后的十年中过渡到毛泽东的新独裁，使他得以推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路线。与此相反，党的领导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力量的影响，却大大下降了。由于政治局中民主决定的风气，只是逐渐被削弱的，因此他们还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只要革命仍旧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我们内部取得谅解就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这对紧张的军事局势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博古至少是出于这些考虑，才继续同毛泽东合作。毛则成功地把他完全拉到自己一边，并且在不久以后，当旧的“中央三人小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和分裂的时候，还一度让博古担任了自己最亲近的政治顾问。

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为了使新近取得的权位在国际上也能够得到巩固，会议结束后，毛就立即派陈云去莫斯科。陈云在中央红军继续长征时就留了下来，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他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按毛泽东的旨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据我以后知道，他首先是要说服苏联政府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也说明毛为什么先在西康后在陕西那样急迫地要越过新疆或内蒙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明显地暴露出他对中国红军自己的力量并不相信，只是嘴上说的截然相反罢了。

毛显然也同样向中国红军的其他部队派出了联络人员。关于此事的更详细的情况我一直没有听说，只是看到，有一支相当于连排兵力的部队向贵州东北部出发了。由此可以断定，这支部队是去寻找同贺龙、肖克的联系，也可能是向他们转达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命令。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贺龙和肖克于1935年毫无必要地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先转向湖南南部，然后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向西行进。顺便提一下，毛当时硬说同二军团取得联系和协同作战是不可能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至于四军团，张国焘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1935年1月底就已经知道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了。

---

在我继续描述以后发生的事件之前，想先就《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如文件的正式标题所称）作一些说明。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在遵义既没有作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提出以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决议，而且我这个看法越来越肯定。会议之后，我多次提出请求，希望看一看会议文件，但总是被空洞的安慰搪塞过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就根本谈不上了。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1967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1970年得到一份英译本。

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三十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陈云到莫斯科要途经白区，当然不可能携带什么书面的东西。最迟到1936年夏同莫斯科建立了正常的通讯联络，并且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也就是一年之后，才又有了人员交往。尽管如此，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1939年末，《决议》出人意外地被“塞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其用意是想在莫斯科给我脸上抹黑，同时在共产国际的眼里贬低博古、周恩来，以及其他毛泽东旧时的“反对者”。

据我所知，在中国这个《决议》是1948年在毛泽东著作选集中首次发表的，由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出版社发行。1957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它收入《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译成了俄文。1969年在伦敦

《中国季刊》杂志第40期上刊登的英译文源出何处，我不知道，它同俄译文出入不大。在这两个文本中非常明显的是，不再出现博古和周恩来的名字，而是用××和×××代替了。这表明，博古、特别是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又得宠了。因此，他们又“官复原职”，不再被指名道姓了。在发表的《决议》中，除了引言外，他们两人的名字只用××明显地标了出来，以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猜来猜去，都猜不出这到底指的是谁呢。在文件中，开始我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及当时授与我而我不知道的笔名华夫；后来李德就从文件中消失了，仅仅留下了华夫。

所有这些，人们可以从中得出明白的结论：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毛把这个稿子也用来作为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讲课的基础，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应用了这个原稿。

具有政治意味的是，遵义会议及其《决议》，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人们甚至对此避而不谈，但后来又被大肆宣扬。除了已经提到的事实，引人注目的还有，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只字未提遵义。他仅仅说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我现在逐字逐句地援引《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的这一段：“第一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和蔡廷锴联合。第二个错误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取了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

除此之外，连一个字都没提！

这种做法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在此有时间上先后连接的三个原因，而这些原因都是同毛泽东追求党内、军内和国家内的个人独裁，以及推行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暴力政策相联系的。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在长征路上的内部争执中，以及后来，他一直致力于把中央红军里的政治局委员拉到自己一边，这一点他基本上得逞了，甚至我有时也被牵扯进这场玩弄权术的把戏中去。这时，《决议》只能起妨碍作用，所以一直被妥善地保管在毛有名的文件箱里。

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重新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之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业已开始、王明回到中国之后，国际主义的思潮这时在党的领导中再度增强了影响。为了对付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毛在莫斯科抛出了《决议》这张王牌，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他的战略和策略，自1927年以来，在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

日本战败后，特别是通过四十年代头五年，在整风口号下进行的实际上是党内的清洗运动，毛的地位得到大大地巩固，这样他就可以将《决议》在中国公布于众了。另外，遵义会议在时间上同中国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涨同时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历史的记载也以此为据，说会议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即采取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我已经说过，甚至从以后经过编者修改过的《决议》中，也看不出有类似的内容。实际上新的方针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以后由王明领导的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贯彻实行；而毛泽东

却一直坚持继续内战的旧方针，只是不断变化策略上的手段罢了。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可能也相当重要，毛泽东因此更加放手去加强他的民族主义方针，并逐渐排除、甚至剔除这些国际主义的党的干部。

当《决议》在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起到了它的作用之后，就消声匿迹了，无论如何它不再被收进毛泽东的《选集》以及我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记载里了。只是在“文化革命”中《决议》又偶尔出现了一下，在将来争夺领导权的新的斗争中，可能还会是这种情况。

---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战略方案，并以时间上前后相连接的口号形式，传达给了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这个方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二是渡过长江和四军团会师。其实，只有第一部分符合毛在会议上提出的任务。此外，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部分是互相矛盾的。重庆往上直至岷江入口这一段长江尚可通航，但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特别是敌人可以使用内河船队作为便利的联络线。若是渡江成功，那末重新返回长江南岸或者仅仅与长江以南地区保持正常的联系，就完全不可能了。这一点毛自然是知道的，看来他想为自己保留这两种可能性。首先，他试图取近道强渡长江，使中央红军朝着大致向北的方向进军。

在一个警卫排的陪同下，我自己也动身了，以便跟上第一军团司令部的行动。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我安然地通过这个

地区，我的路线距离去重庆的通商大道不远，大致是向西北方向。第一天傍晚，我遇到了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这个军团不久前拿下了一个由贵州军设防把守的山坡。在一个作为宿营地的古庙里，董坐在台阶高处，对取得的胜利颇为满意。从他那里我知道他的军团负有掩护一军团背部和左翼的任务。一军团这时已经在我们的北面，离这里有半天路程，因此我只好加快步伐继续赶路。在一个小村庄里，我们过了夜，村民们很友好，但也很谨慎，在他们中间我没有发现什么政治工作的痕迹。然而他们证实，不久前红军路过了他们的村子。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遇上了一军团的哨兵，而且很快就到达了司令部。

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关于军事形势，他缄口不谈，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他把此事推给了罗瑞卿，罗也是粗略地给我讲了讲作战的经过。以后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通往重庆的大路西面的广阔战线上向前推进，准备在这个港口城市的上游伺机渡过长江。五军团防御云南之敌，九军团分散在主力的右翼、大娄山东边的群山之中，以便侦察来自乌江下游敌军行动情况，并且在必要时加以骚扰。

毛和林显然估计敌人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住长江。实际上，湘军的大部分已被二军团牵制，川军的主要力量已被四军团牵制；另外，在不少川军将领与已把总司令部迁至重庆的蒋介石之间，据说也存在磨擦。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散的，有几个师加强重庆一带长江的防守，并以此控制那些难以驾驭的川军将领，其他师驻

守在乌江沿岸的各个设防据点中，而主要兵力则一部分去保卫贵阳，另一部分从东面向遵义推进。

为了利用时间上的优势，一军团试图以急行军赶至长江，每天行军四十至五十公里。严格地讲，红军战士们不是在走，而是穿着轻便的布鞋和草鞋慢步小跑。这样，他们走了大段的路程，而又不显得过分疲劳。这种“持续小跑”的专门行军本领，使一军团不愧有“神速部队”之称。在这种情况下，平坦易走的地形更便利了他们的行军，只是向北走村镇越来越密集，需要耗费时间去侦察和警戒，因而减慢了行军速度。

长江，就是从远处我们也没能看上一眼。在越过贵州同四川省界之后——这里的省界就象在华南和华中到处见到的那样，由一条山脉构成，这为防御者提供了极好的天然阵地——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力量较强的敌军，一场战斗就此展开，战斗中敌人没能被我们赶出阵地，我们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停止了战斗。

这时候，毛泽东到林彪的司令部来商讨局势，我也被叫去了。通过无线电侦察和战斗侦察，当时可以确定，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把中央红军围困在云贵川交界的三角地区。长江以南有川军九至十二个团的兵力在挖掘工事，其后分布着兵力不详的国民党中央军。西面滇军已集结起来，周将军的部队，大约有六至八个师分成几路从东面向遵义推进。

南面在贵阳以及贵阳北面，驻有贵州军剩余的四、五个师和早已调往那里的蒋介石的几个师。

毛泽东这时还不想放弃他横渡长江以及与四军团会师的计划。他和林彪作出决定，转向西面，突破他们认为敌包围圈

中最薄弱的环节——滇军，并且继续在长江上游泸州和宜宾这两个港口城市之间寻找有利的渡江地点。

按照这个决定，一军团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渡过赤水河，并且从四川西南端挺进至云南省界。在这当中，一军团在北面一直受到川军的搔扰，被挤到南面；因为林彪回避大仗，部队不得不进行消耗力量和时间运动。其他军团也是如此，尤其是行军路线多次和一军团交叉的三军团。最后，当正面和南翼也出现了滇军，局势就更加困难了。部队前进一段又退了回来，不断变换方向，并且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地区兜圈子，以至经过某些村镇达两三次之多。

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林彪这里，这一次显得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从中我得知，别的军团有一部分已经向东南回转了；一军团无可奈何，也只好按照毛事先的决定同样掉头回转，先向东北，后向东南，大致上是向着遵义的方向。经过一个月疲惫不堪和毫无益处的徘徊之后，毛的两个方案一个也没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既没能在原定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没能强渡长江。使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同川军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毫无结果的战斗之后，以及随即向西转移之后，没有对滇军的战斗力至少试探一下，也没有寻机突破滇军的阵地。我认为这是打破蒋介石的围困计划，寻找有利渡江地点的最简单的途径，尤其是敌人的阵地上并没有构筑坚固的堡垒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野战工事。然而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大概也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我对敌人的情况、对自己部队的运动情况，是不甚了了的。

在回转的途中，第三、五和九军团在桐梓以西打击了从贵阳向北推进的贵州军零散的剩余部队，紧接着在遵义地区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周部的一支纵队。一军团恰好及时赶到，冲进了敌人的侧翼。据总部发出的战报称，这支纵队的二、三个师受到重创并部分被击溃，我军抓到了几千名俘虏，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首先是急需的弹药。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中央红军又扑向周驻扎在遵义东北仁怀地区的另一纵队。但敌人立即退入防守阵地，打退了我们的进攻。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还有一名师长阵亡了。然而在遵义取得的局部胜利毕竟是可观的成果，它巩固了由于在长江以南三省交界地区作战失败而有所动摇的毛泽东的地位。

在遵义我又加入了中央纵队。这座城市此时呈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商店和仓库也都空了；大地主和商人的乡寓以及省主席的夏宫，被钉上了木条或者多半被毁、被抢；在房屋的墙上还到处挂着我方政治工作人员所张贴的标语口号的碎片；这些都是一月初那样热烈进行的苏维埃化所留下的最后痕迹。

周将军虽然局部受挫，但很快又把他的部队纠集起来，另外从北面又开来了增援部队。面对这些情况，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讨论中出现了毛泽东北部作战行动的尽管很委婉、但却是很明确的批评。在此期间，继博古之后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的洛甫，把这次作战行动称为未加考虑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的行动，并且认为，我们本来早就可以在同样有利的情况下战胜周的军队，并以这种方式在



更好的条件下于贵州建立新的苏区。这样，他就对我以前提出的在横渡乌江时打掉周的先头部队的建议，事后给予了肯定，虽然他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王稼祥主要是责怪作战决定实际上由毛泽东一手包办，这里已经显露出原先宗派的“三人小组”分裂的兆头。结果以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达成了妥协，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毛仍然是总政委，也就是实际上的最高指挥者；周恩来领导总参谋部的全部工作和决定战术方面的事宜；王稼祥还和以前一样，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

鉴于北部作战期间的部队减员，为了提高主力师的战斗力，最后对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撤消了第十五师，第三军团撤消了第六师，两个军团各由两个师组成。第五和第九军团保留了原来的编制，只是象第一和第三军团那样从俘虏和农民的自愿者中增加了少量的兵员。一直保存的少量辎重，只要不是必要的，也都丢掉了。

当时，从战略上确定的方针是横渡长江，与四军团会师。但如何在作战中实现这一意图，谁也说不上来。根据事态的发展，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首先回兵黔南，然后挥师滇北，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寻找渡江地点。但据我所知，对此没有作出形式上的决定。

俘虏们在经过肤浅的政治教育，并保证永远不再反对红军之后，都一一被释放了，只有少数人自愿参加了我们的队伍。1935年3月初，所有红军部队向乌江进发，这一次从相反的方向毫不困难地在上游渡过了乌江。

1935年3月至4月，中央红军不停顿地行进了整整两个月，穿过黔南和滇东，并一直受到省军阀部队的顽强逼迫以及对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的骚扰，尤其是受到蒋介石三路强大力量的围击。周的军队在背后几乎是脚跟脚地尾随着我们；在我们的前面，又有另外两支军队凭借着贵阳和昆明这两个省会——蒋介石将总司令部先后移至这两地——企图切断我军去金沙江的道路。桂军也在广西省的界河沿岸重新拉开进攻的架势，以防止我军被挤向南面。

毛泽东及其军事领导小组一味回避任何大仗，只想寻找渡河地点，错过了多次有利战机。在中国内地为了防御掠夺成性的兵匪的袭击，几百年来许多城镇到处都筑有高墙，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堡垒系统妨碍我军的行动。道路两侧山势陡峭，有些地方甚至是悬崖绝壁，在这里敌人很难把数量上远居优势的军队集中起来。

虽然在总参谋部我又能时常看到侦察报告和每天发布的命令，但我对中央红军在这两个月中的行军路线只能作大概的说明，因为行军路线经常变换，使人不能一目了然。

从乌江起我军先向南行军，从东面贴着贵阳而过。由于那里驻有强大的敌军，据说有蒋介石的五、六个师和滇军的几个旅，因此必须防备敌人的进攻。我军一些小部队离开了行军队伍，向城市方向急进。据报告他们到达了距城二十五公里远的飞机场，摧毁了几架飞机和地面设施。除了和敌警卫部队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在此期间没有进行什么战斗。敌人或者只顾守城，或者出动过晚，总之我们的部队平安地撤了回来。

绕过贵阳后，我军掉头向西，准备挺进云南，成功地出其不意地拿下贵阳西南没有驻军的关岭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地方当局的代表自己打开的城门，他们还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入城呢。这种情况在长征的这一阶段之所以屡次发生，是因为敌我战线经常变换所致。在这里我们暂时切断了贵阳和昆明之间的交通线，并且截获了一辆吉普车和蒋介石的联络官；这辆车正在驶往贵阳途中，车上载有昂贵的药品和宝贵的带有比例尺的地图资料。这时，敌军从北面和东面压过来，我军主力挥师西南，又以不久前占领关岭一样的方式占领了罗平城。从那里红军主力先转向西北，扑往曲靖，但未能拿下该城。接着，第五或第九军团佯攻昆明，据传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很大的惊慌，蒋介石急急忙忙跑到印度支那去了。我军主力以急行军的速度一直向西，一枪未放拿下了元谋城；元谋虽然位于金沙江南岸只有五十公里，但令人不解地却没有设防。

人们读了这段简单的作战概况，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这两个月的行军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中央红军唯一的一次胜利进军。今天，毛主义的历史记载也试图这样来描述事实。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以说与事实完全相反。行军越来越变为一场退却，有时竟成了道地的逃窜。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特

毛泽东  
手书

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它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出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同时遭遇敌人。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我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就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即使在平川上稻米和蔬菜也很少，目光所及之处，罌粟地比比皆是；为了交纳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唯有种植鸦片，才能保证自己勉强地生活下去。我们在支付时，也几乎只用没收的生鸦片来代替银元，因为鸦片可以长久使用，又容易分开，完全可以充当货币，所以到处都乐于接受。在那些暂时招来的脚夫和被编入部队的自愿者中，不少人已经嗜烟成习，因此不得不允许他们多少抽一点，虽然这在红军中是严格禁止的。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敌机飞到头顶，我们就在路旁卧倒，不象以前那样去寻找掩体。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

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与此相反，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其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周恩来和王稼祥同毛一样也遭到了批评，而他们却任凭事态发展，宁可采取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采取类似态度的还有朱德，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去攻击毛。博古向我表示，他担心一场新的派别斗争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的分裂。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中央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这次延续了数星期之久的领导危机，不象在遵义时那样是人为地造成的，而是真正的领导危机；可是关于这次危机的过程和经过，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历史记载中都找不出一点痕迹。因此，我觉得以我经历的几次个人谈话来说明这件事，也许更为恰当。所有这些谈话是在云南，大概是在曲靖和元谋

之间进行的。

以前和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如他所说）灾难性的军事形势时，他说，这种形势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冒险的战略和战术造成的。北部作战的失败，虽然由紧接着的遵义战役的胜利部分地得到了弥补，但是目前向西部的逃跑必然会导致部队的灭亡。同时，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说明在公元三世纪三国时代和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金沙江流域曾有全军覆灭的前车之鉴。为了使部队免遭类似的命运，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军事领导来取代现在的“三人小组”，在这里他提到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的名字。当然，他在表达这些意见时，并不象这里写的那样直捷了当，而是相当隐晦和谨慎，但他讲话的意思是明了的。我察觉到他内心的确非常不安，然而我对形势的判断不象他那么悲观。我回答他说，现在全看能不能强渡金沙江了，即使不能成功，也还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困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可以返回贵州，但决不能漫无目的地继续向西行进。我说，我不能赞同他在目前这种时刻变换领导的要求。看来洛甫对这次谈话相当失望。

以后我与博古商议，他也表达了如上所述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即与其被敌人挤到缅甸，甚至西藏，不如在中国南部开展运动战。

几天以后，毛泽东请我去谈话。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他认为，军事形势虽然困难，但他坚信，中央红军无论如何会成功地渡过金沙江，与第四军团会合。即使部队最后为了寻找渡口，可能不得不向上游行进很远，他也无所畏惧；他甚至

说出了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他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当着我的面说的——带领红军经西康和青海到新疆，以便在那里和苏联建立联系，得到各方面援助。那时，我并没有觉得他当真有这种打算，但还是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我提出的方案，即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战线转过来，突破追击部队的半圆形包围圈。但被毛拒绝了。交换意见完全是实质性的。可是，当毛一谈到洛甫，就换了一种严厉的语调。他说，洛甫已陷入恐慌之中，并密谋反对他。最后他提议，让我参加他的行军组，以便我们能随时对要做出的决定事先进行商量。这当然是一个诱饵，没多久，在毛的地位又稍有稳固以后，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仅仅这些插曲就表明，事实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领导危机。

不久举行了一次军委会议，军团总指挥中至少有林彪和彭德怀参加了。我记得很清楚，开会的那间农舍遭到了轰炸。一颗炸弹落得很近，墙壁震得摇晃起来，灰土落了我们一身。但大家都很镇定，随后进入旁边的防空壕，在那里继续开会。

周恩来作了形势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金沙江边，他的追击部队由于滇军乃至湘军的增援而加强了，虽然行动缓慢，但兵分几路不停顿地向江边推进。敌人还在行军路上修建了堡垒，把上下游数百公里的船只全部拖到对岸，有些地方甚至把船烧掉。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的内容并不是关于我们所面临的行动，而是关于最近几个月损失严重的行军。

根据总参谋部统计，这时战斗部队的实际兵力为二万二

千人。这就是说，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已丧失它原有兵力四万五千人的一半多。实际的损失还要多些，大约是三分之二，或者用绝对数字来表示，基本部队损失了三万人，因为它的实际兵力通过招募志愿兵已增加了大约六分之一。这完全是行军中的损失，也包括许多不是计划内的而是迫不得已的战斗中的损失。与此比较，毛在遵义决定打的唯一的一仗，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小，然而这一仗并没有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他们总计还约有三千人，在经历了突围的严重损失后，现在比战斗部队的损失要小得多。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和洛甫的追随者，在军委里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设法强渡金沙江。关于领导变动问题没有提到。看来毛还是成功地（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了政治局和军委的大多数成员，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员的任何变动都不利于军事行动；洛甫这时也不得不让步了，然而危机并没有因此被克服，它的解决最终取决于横渡金沙江是否能够成功。

---

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第九军团沿江向上游行军，并开始扎木筏和架桥梁的准备工作。我军主力跟在后面。蒋介石通过空中侦察得到情报，也向那里投入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值此之际，第一或第三军团的一个先遣营，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向相反的方向即位于元谋东北的绞车渡行进。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金沙江南岸这一带地势平坦，容易被我攻占；但北岸耸



立着悬崖绝壁，上面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堡垒工事，由一支四川驻军据守着。

岸边停靠着几只船。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并强迫几个地方名流陪同。敌人以为来了增援部队，就应刘的要求派了一条能装大约一排人的大船到南岸。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了战斗。这是1935年5月1日以后几天发生的事。

主力部队立即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金沙江约有二百米宽，水流相当湍急；我军夜以继日源源不断地渡过了江，尽管如此还用了几乎一周时间。当我军后卫部队的最后一个排过了江，蒋介石追击部队的前锋才出现在南岸。

在此期间，刘伯承率领我军的先遣部队已经继续向北，往会理方向前进。沿途一带丘陵起伏，森林茂密，居住着少数民族彝民，亦称倮倮。他们经常进行反对当地中国官员及其军队的小规模游击战。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不久，毛泽东和朱德在协定上庄严地盖了印。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当时川军驻扎在唯一一条通向北面的道路的沿途几个村镇里，而这些村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刘试图通过一次突然袭击占领会理，然而没有成功。这座县城四周有高大坚固的城墙，由一个旅或一个师守卫，敌军凭借四周开阔地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射击。几天以后，我军

主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进攻也告失败了。然而因为敌人满足于防御，我们的部队得到了几天休整时间。

毛泽东称赞抢渡金沙江是战略上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在他的倡议下，五月中旬在会理附近匆匆忙忙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这次没有参加，林彪和彭德怀也不在场，我在最后一刻被邀请去了，然而没有带我的翻译。虽然有博古出来应急，但他只能极其简单地转述讨论的内容和翻译我的讲话。

洛甫首先讲话，简短地报告了形势。在报告中他收回了他以前的大部分批评，尤其是不再要求变换军事领导了。毛泽东则转入反攻，他谴责洛甫、林彪和其他反对他的人怀疑革命和从事分裂活动，并说，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对此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证实了他的战略是正确的，现在是完成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与第四军团会合的时候了。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一旁帮腔，虽然他们的语调比较温和，也没有扣什么政治帽子。朱德、博古和其他几个我已记不起来的在场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支持毛泽东，但他们有意避开他对“反对派”的政治定性，只是强调指出，无论如何必须采取返回中国腹地的路线。当问到我的意见时，我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然而补充一点保留意见：“我们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在目前的形势下没有其他的出路。”看来毛对这个发言是气愤的，因此对我长期怀恨在心。

最后，没有经过形式上的表决一致同意，为了与第四军团会合，应该继续向四川的西北部前进，估计四军团就在那个地区，然后与四军团一起创建一大片新根据地。大家都有义务

维护目前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在作出这些无疑是加强毛泽东地位的决定时，政治局委员们，其中包括博古，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呢？

那些在瑞金被掩饰了的、在遵义被排除在议程之外的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政治分歧，这时已为现实本身所消除，完全退居于军事问题之后。是内战，还是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无需进行辩论了。中央红军同第四军团、第二军团一样，正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军队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是一场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领导的任何分裂都意味着对红军的削弱，因此无论如何必须避免。以后不久，毛泽东和张国焘由于彼此不和而造成的悲剧，更加证明了这种态度的正确性。

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出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的痛苦经历所证明。二、四军团深入西康中部，在无法形容的困难条件下，以重大的代价从那里沿着青海边界历尽艰辛向甘肃行进。同时，大家都明白，要贯彻会理决议，就会使军队领导在战略上难以作出决策，例如首先遇到的就是强渡大渡河这一步。大渡河是注入长江的岷江的大支流，它虽然不在行政上，但却在地理上和种族上，构成了西藏和四川的边界。

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与博古及其他几位交谈过，他

们也同意这个意见，并说，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必须把一切分歧放在一边。他们深知，毛将利用他地位的加强，在将来更严厉地制止别人对他的领导的任何批评，但是他们自觉地承受着这一切。

---

我们经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山地，向北继续行军，虽然条件也很艰苦，但比起前几个月的行军条件有利多了。在国民党飞机空袭时，这种地形很便于隐蔽，我们也可以在白天行军了。倮倮的善意中立及川军比较消极的态度，使我军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向前推进。当时的物质情况也还可以，到达大渡河前不久，由于夺取了敌人在一个仓库里储藏的大量稻米和其他粮食，部队的给养一时甚至得到改善了。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战斗部队的士气大振，领导中的意见分歧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被排除了。

不久局势就表明，我们对蒋介石的军事意图的判断是正确的。蒋重新调配他的兵力，企图隔断我们到四川中部的去路，滇军和川军封锁着大渡河东岸。为了赶在敌人前头，部队必须加快行军速度。我们每天行走三十至四十公里，其中一段是距唯一一条大路不远的山间小路，以便在石棉一带渡河，据说那里有一条渡船。当第一师到达时，渡船和所有其它船只都被拖到下游或被毁坏了，然而夜间我们发现了一条藏在岸边灌木丛中的船。次日清晨，一排人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渡过江去。我坐在西岸高高的陡坡上观看，这条船在湍急的激流中搏斗了近一个小时；居高临下，我们对左岸的敌人和比较平坦低洼的地势，可以一览无余，敌人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

那里向纵深层层设防。我们这个排安全到达敌岸，用手榴弹击溃了前哨敌人，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桥头阵地。刘伯承再次担任渡河的指挥，其他各队也相继过去了，但是那一天有一营人，至多两营人几乎没能渡过，第二天飞机就开始轰炸渡口了。

因此，领导者们决定主力部队向康定进军，攻打泸定桥。那里有一座十八世纪建造的吊桥，这是横跨大渡河的唯一桥梁，相传连接西藏首府拉萨与四川省会成都的古代栈道也从桥上通过。当第二师到达泸定桥对面高耸的河岸时，川军的一个旅已经进入防御阵地，撤去了桥上一半以上的木板，还企图烧掉木板，砍断铁链，当然没有得逞。自告奋勇的突击队员集合起来，冲上火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吊在铁链上，用左右手交替向前移动；一部分人扶着左右两边的铁索，一步步前进着。密集的火力准确地射向敌人的阵地，突击队员们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到最前面。他们中间有六个人坠落到咆哮的波涛之中，其他人到达了铺有木板的桥面，用手榴弹打散了被我们火力压住的、丧失了士气的守敌。后续部队也立即以同样方法冲过桥面。敌人总共有一个师的兵力，在此期间他们感到左（南）翼从石棉渡河的第一师的威胁，立即仓皇逃跑了。蒋介石的飞机取代了步兵，对吊桥不间断地进行轰炸，但幸好没有击中。桥面上的木板又重新铺好，除去已经在对岸的第一师以外，全部队伍在几天之内过了泸定桥。

由于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战斗，我军实现了深入四川中部、返回中国腹地的直接军事目的。然而这一胜利马上又成了问题，继续向东推进的尝试失败了。蒋介石在第

二天或第三天就以自己的兵力和川军的部队成功地阻止了我们的前进，中央红军因此不得不掉转方向，向北行进。

与第四军团会合前的这段行军过程，我已无法详细叙述。从六月初到月中，几乎有两个星期之久，我们经过四川和西康的交界地区，继续行军，距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越来越近。这个地区在地理上同在种族上一样已属于西藏，几乎没有公路和道路相通，顺着崎岖的小道爬上山，大山把海拔三千米的西藏高原同中国的腹地分开。我们还得趟过急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深浅莫测的沼泽，越过四千至五千米高的山隘。虽然已是夏天，但气温几乎没有超过摄氏十度，夜间几乎降到冰点。由彝族和藏族组成的稀少的少数民族居民，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又称蛮子（野蛮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白军，处于一种对他们的喇嘛头人族长式的封建依附关系中，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威胁，因此都赶着他们的牲畜逃进深山老林。居民们在山林中埋伏以待，不时地袭击我军小股行军部队和掉队的战士。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行军路旁，其中有击毙的、冻死的和纯粹累死的。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最糟糕的是赤痢蔓延，伤寒病也开始出现了。

我想顺便提一下，在这次行军途中我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其中是否隐藏着恶意的目的，还是偶然的事件捉弄了我。当我们趟过一条河水虽浅但流速很急的河流时，驮东西的骡子跌倒了，装着我全部东西的铁皮箱也落入水中。后来所有东西都被打捞上来了，就是少了我的日记本。我到江西以后，经常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本子里记

录的事实、时间、名字、提纲、数字等等现在都无法挽回地丧失了。虽然以后我凭着清晰的记忆又做了笔记，但这些笔记当然无法代替那本日记了。

将近六月中，以前曾徒劳地进行过一、两次下山的尝试终于成功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小城天全被我军占领。在那里我们才第一次得到了四军团的确实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四军团的主力应该在去懋功(小金)的行军路上。中央红军没有耽误时间，也向那里出发。部队又爬上大山，继续穿越山地，现在是向西北的方向行进。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中央纵队到达了懋功，部队住进四郊十分分散的、居民离弃的村庄和院宅。根据总参谋部粗略的统计，这时部队，包括非战斗人员，还有一万五千人，最多二万人。

在懋功城里或在郊区，政治局，也可能是军委，再次集会。或许这是一次不拘形式的谈话，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王稼祥肯定参加了，我也在场。在这以前，从天全到懋功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在云南对我说过的想法，即经过中亚细亚从苏联得到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援助。他同我没有谈到这点，因为他知道我对此是抱有否定态度的。但我从博古那里听说，毛试图争取他、洛甫和王稼祥同意这个提议；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提议与不久以后张国焘所表述的类似的思路完全吻合。

在这次会上，毛公开谈到，在川康交界地区建立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红军主力以此为根据地，经过青海或甘肃向新疆推进。他说，从那里可以与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并能使苏联对中国红军的全面援助成为现实。毛的这个计划不仅暴露了他

对中国革命自身力量的怀疑，而且又提出了他原先的观念，即中国是世界矛盾的中心，苏联应该在解决这些矛盾中起到纯粹的援助作用。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而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毫无疑问他估计到，向新疆的推进如果成功，一定会导致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上的、也许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这正是他的本意。假如老虎在山谷里互相厮杀，毛企图坐山观虎斗，象谚语所说的古代中国的封建诸侯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一本万利”，其实这个本也不见得很小。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估计连同毛本人在内，心里都很明白：越过冰山隘口，经过中亚细亚的沼泽、沙漠和盐碱草地，必然会给部队带来极大的损失。看来毛已准备付出这笔代价，但多数会议参加者否决了他的提议。我的印象是，对此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考虑到要避免苏联卷入中国内政和惹起一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后果严重的冲突，不如说是担心不可避免的损失必然会导致红军力量的严重削弱，甚至可能导致红军的覆灭。就这方面而言，否决毛的提议并不意味着国际主义立场对民族主义立场的胜利，而只是明智的军事思想的胜利。

接着原则上又作出决定，队伍继续向北，更确切些说是向东北行进，这样又来到了汉民地区。甘肃是最近的战略目标，从那里出发既可以转向宁夏，也可以转向陕西。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服从了这个决定，不久以后他完全放弃了他的建议，甚至表示反对了。促使他180度急剧转变的原因，是与四军团会合后的数天和数周中发生了许多情况。



我们在懋功停留了几天。不久，四军团的一支部队也随后到达了，其中有张国焘和徐向前的一个代表。他说，张、徐及他们的司令部位于北边的小镇两河口，距此还有一、两天路程。中央纵队迅速出发，向两河口前进。

途中，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了几件重要新闻，这是四军团的代表向党和军队领导人转达的。据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正继续加紧入侵华北，由内蒙古向西推进。在中国，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越来越广泛的阶层卷入了抗日群众运动，不仅有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群众运动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中，包括军队最高指挥官中也有很大开展。这个消息证实和补充了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情报。

出人意料的还有其他一些消息。根据这些消息，四军团（其数量与以前不同，大约有五万人）在四川西部和西康东部占据着一片地区，有三万至四万平方公里，当然这里人烟稀少，居民百分之九十五是少数民族，有藏、苗、彝、西番等民族。考虑到这些情况，据说张国焘准备成立一个联邦政府，四军团的干部正在建立地方权力机构，以便为创建民族国家打下基础。还说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同苏联建立联系，并且根据政治和军事的形势，继续进行有成功希望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或者积极参加迟早必然发生的抗日战争。

最后四军团的代表还告知，1932年留在老根据地的部队，当那里的局面不能维持时，历经艰险到了陕南，现在作为独立十五军团在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地区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游击战。

博古对这些消息显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然而，以后的发展证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这点我已经指出过了。博古很重视关于第十五军团的消息，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我们两人认为，这将大大促进和便利向甘陕的突围——从根本上说，这是政治局多数委员已经决定的方案。

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象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虽然我眼下没有关于这个部队在会师时实际兵力的数字，而且人们对四军团报告的兵力数字表示怀疑，但是可以肯定，其兵力至少有中央红军的两倍之多。他的部队牢牢掌握着岷江上游西部地区，从南面的懋功到北面的毛儿盖，直至西康境内；他的干部行使着地方上的权力。然而这里不应忽略的是，这个地区的东部本来人烟就很稀少，现在居民几乎都逃进山林里去了，因此与其说这是个被解放的地区，不如说是一个被占领的地区。但是无论如何四军团掌握着这个地区所拥有的少量资源的大部分，这对于上万名红军战士的给养是异常重要的。

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张的野心和权欲都不亚于毛，象毛一样他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与毛不同的是，张多年来一直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深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赏识和尊重。毛本人曾多次、特别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颂扬的口吻强调指出，张作为中央在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和第四军团的总政治委员，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张国焘在四军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同中央红军中的情况相类似，作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决策都由他制订；相形之下，司令员徐向前在他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

不难预料，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围绕着争夺党内和会师后军队中的领导权问题必将出现一场斗争。但是就毛这方面而言，因为四军团上下团结紧密，而且时间也很紧迫，要象“中央三人小组”在江西所进行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争论必然在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上和未来军事战略方面尖锐起来。人们希望，这些争论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具体工作上的分歧；六月下旬在很小范围内举行的一些会议也暗示了这点，不过关于会议内容我一无所知。

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了正式会议，我也被邀请去了，据我所知别的“局外人”都不在场。会议开得出奇的平静，显然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在预备会议中作出了。张国焘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同他的参谋部代表在懋功向党中央领导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他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川康根据地上。其他的会议参加者，包括毛泽东在内，同意了他的意见，原则上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只想把川康交界地区作为暂时的根据地，在部队休整以后，从那里继续向甘陕前进。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人们没有过多地从政

治上考虑,关于抗日斗争只是附带地说了说,而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没谈到;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军事上的考虑。国民党的主力这时正处于被动状态,在重新调配兵力。敌人只在岷江东岸部署了较强的军队;在南部和北部,敌人还得耗费时日进行准备,以便保证补充给养,然后贸然向前推进;而在西部、在西藏方向,红军根本没有感到国民党方面的威胁。

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部队的住宿和给养,队伍往往不得不拉得很远,多次更换驻地。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根据两河口通过的妥协办法,主力部队不得不缓缓向北移动。原来的意见分歧,就此只是在表面上消除了,但并没有作出最后的战略决策。

相反,却决定了改编会师后的军队及其领导。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团改称第四方面军。我想附带说一下,改编工作也可能是在晚些时候,在梭磨或毛儿盖进行的,中国方面的历史记载无疑地把这个日期往前推移了许多。如果不考虑到,由于时间的提前有可能掩盖住这两支部队会师时的力量对比,那末,部队名称改变的时间在我看来并不是很重要的。以后,我将使用那些现时普遍流行的名称。

更为重要的是,张国焘被任命为会师后红军的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刘伯承任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正式宣布解散,就默默地消失了。如果考虑到,中国红军通常是由总政委作出所有重要的军事决定,那末,这次领导人的变更对毛泽东来说就意味着一次严重的失败,他从第一把交椅上被排挤下来了。周恩来也渐渐隐退了,不久以后他患了重病,不得不在继续行军的途中有数星期之久躺在担架上。

为什么政治局多数委员以及毛泽东本人会同意作这样的让步呢？因为，两河口会议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的，张国焘是唯一代表四方面军的政治局委员，他不可能象后来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个人对其他委员施加了什么压力，或者强迫了他们。他的任命完全在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四方面军实力雄厚，它的干部又在川康交界地区行使着地方权力，因此事实上张是局势的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几乎只在军队里或通过军队起作用。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的结果都不甚满意。毛竭力通过他在政治局和第一方面军的支持者，动摇张在会师队伍中的地位，张这方面也在竭力夺取党的领导权。冲突在酝酿着，最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终于公开爆发并导致了党和军队的分裂。

在详细地谈及此事之前，我想简短地说一下红军会师后在川康交界地区部队与部队之间，以及部队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在两河口，虽然谈到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联合，但实际上并未实现，只对一些高级指挥员的职务重新进行了调整。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这时各有兵力二千至三千人，出于给养的原因，它们附属于第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分给三军团大约一千五百人作为补充，并向三军团以及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给予了物质上、主要是粮食上的援助。

在会师后的最初几周内，四方面军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因为如上所述，它牢牢掌握着这片交界地区，并且拥有这

个地区的大部分资源，而它显然也愿意减轻一方面军困难的处境。一般说来，我亲眼见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比起我们精疲力尽的战士来，显得精神更好些，穿着更整洁些，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纪律。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流传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说他们有军阀习气，甚至有盗匪作风。

当然我不能判断，依靠严厉的措施来保障的纪律能维持多久。我认为，可能而且很可能是由于第二年的给养极度匮乏，四方面军的纪律不说瓦解的话，也是大大地涣散了。

我们在这个交界地区停留了大约两个月，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间起初良好的关系渐渐恶化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上的“小道消息”，毛的支持者和张的支持者都在下面四处传播，主要原因无疑是日益加剧的住宿和供给上的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听说在七月份甚至发生了个别的武装冲突。有人告诉我，在毛儿盖一带，四方面军的部队包围了一方面军的一个团。但我从未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就是后来发生分裂时，也没有亲眼见过。

至于我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然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末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

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我们不仅必须满足眼前的需要，而且还要为继续行军贮存粮食，因为我们知道，行军途中我军将再次通过沼泽和翻越雪山。在毛儿盖一带，我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以便为继续行军作好准备。我们收获了半熟的粮食——大麦、小米和其它农作物，把青稞粒从谷穗上搓下来，晒干或者烘干，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吃起来也还是要掺合一些磨成粉的树皮、野草和“含有维他命的土”。有数月之久，我们没有尝到盐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越过甘肃边界。

居住在从这里直至甘肃一带的苗族、彝族和西番族的山民，他们部分是农民，部分是牧民，一有机会就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这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当时流传着所谓“一只绵羊值一条人命”的俗话，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才流传开来的，因为在川康交界地区并没有绵羊，只有大蹄子的马和牛，此外还有牦牛、山羊和小牲畜。我们只有在居民点和平川上才是安全的，逃跑的居民不敢到这些地方来。

队伍继续往西，到了四方面军所在的西藏边界，情况才好一些。如果人们可以相信未经证实的报告，那里甚至有党的省委会和地方的政府机关，少数民族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在交界地区东部，我们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尽管障碍重重和给养缺乏，在毛儿盖一个多月的休整，对部队却是十分适宜的。国民党军队离得很远，他们打出的炮弹也很少落到这里。在一方面军的战士中，特别是在指挥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南方人，盛夏时节停留在高原上，这对习惯于亚热带气候的南方人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因此减员一般

保持在很小的限度内，特别是在此期间既没有急行军，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战斗。

---

从六月底起，会师后的红军队伍按照两河口决议向北推进，同时，为了寻找粮食，实际上“搜”遍了整个地区。中央纵队经过小镇梭磨前往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有几百户院落的大居民点。七月初，在梭磨又举行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表面看来是因为对下一步的行军方向和选择建立新苏区的作战区域有意见分歧。在此期间，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认识到，在衣食缺乏，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抱敌视态度和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重新形成包围的情况下，主力在川康交界地区长期停留，或者甚至在西藏高原度过严冬，一定会给红军带来可怕的后果。

会上，张国焘作了报告。他提议，不要完全放弃川康交界地区现有的根据地，主力部队可以向青海、大约向青海湖地区行进，并从那里出发，经过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以便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果这一行动不能实现，那还可以向甘肃北部行进，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人们看到，这个建议同他在两河口提出的、毛泽东在他之前主张过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但现在毛赞同由洛甫、博古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的不同建议，即首先经过四川西北向甘肃南部突破，这符合政治局多数成员以前在会理和懋功作出的决定。会议也没有作出最后的决议。主力继续向北，主要是向毛儿盖地区进发。中央纵队也转移到毛儿盖，并在那里停留到八月初。



关于会师后红军的主要推进方向的争论，在七月份整整进行了一个月。后来听说除了第十五军团以外，在陕西，还有以深得民心的游击队领袖刘志丹为首的地方部队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那里有了一个小而稳固的苏区，以及在许多中央委员所熟悉的共产党员高岗领导下的一个共产党省委和一个革命政府。当人们知道这一情况时，争论又有了新的内容。

这种情况，更加强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信念。他们认为，红军应该尽快越过甘肃向陕西前进，去扩大那里的根据地，为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赢得新的有利的出发点。引号内的话，在这里并不是引文，我只想借此强调，继续内战和继续进行苏维埃革命的老调子，还丝毫没有有什么变动。在江西，就已提出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口号于此第一次在军事战略上有所反映，虽然只是极其笼统而又互不联系的。

毛泽东现在成了甘陕路线最积极的赞同者。我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不是由于他认识到，这条路线是符合政治目的的，军事上也是必要的，但是他肯定还受到其他动机的支配。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局委员是站在他一边的，并希望以此来孤立坚持不同意见的张国焘。绝非偶然的是，象“革命的低潮”、“失败”、“退却”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代之以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在中国西北创建大片新苏区、重建“中央革命政府”等等词句。

与此相反，张国焘则把放弃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长征视为一次失败。他声称，首先在一省或数省，然后在全中国取

得苏维埃革命胜利这个以前在中央全会提出的、在遵义又重复了的论点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苏维埃革命现在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不是苏维埃革命，而是抗日战争；但是又要进行抗日战争，又要反对国民党，红军的力量则过于薄弱了，所以应该在一个比较闭塞的根据地里，例如在川西或甘肃坚持斗争，等待时机，直到红军从苏联方面得到援助，并且强大到足以依靠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改变他们目前的态度。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屡次听到毛泽东和张国焘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远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否认，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当然绝不是他的军事结论，比毛泽东和支持毛的政治局委员的立场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后者的立场是一种左倾宗派主义态度的表现。我后来看到有关文件，回忆这段历史，不得不确认这一点。

在争论过程中，张国焘还直接攻击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他认为五中全会，尤其在遵义召开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无效的，理由是这些决议不是由选举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遵义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员和非政治局委员作出的。只有两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即他自己和周恩来，是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章程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补选进政治局和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是违反章程的。除此之外，中央委员会本身在遵义已经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因此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并矫正政治总路线，必须把第四方面军合适的干部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和政治局。

我没有参加这些争论。在到达毛儿盖后不久，我被派到联合军事学校，这个学校离中央停留的地方有十几公里远。就这段路程本身而言并不长，但由于经常可能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必须有很多卫兵护送才能通过。我记得，在整个七月份中，大概去了两次，最多三次。因此我的消息来源于第二手材料，主要是从博古那里得知的，以后又通过谈话得以补充。然而从我手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消息基本上与事情发生的真实过程是一致的。

为什么把我派到联合军事学校去？这是谁的指令？对此我至今都不得其解，住宿问题和训练活动，恐怕都不是主要原因。我虽然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讲座和图上演习，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参加“收割”，甚至有两次参加了一个征粮队。我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嫌我挡道，想把我排除出去，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他的战略观点；而毛泽东肯定也觉得有我亦可、无我亦可，特别是当张国焘开始攻击遵义会议的时候。或许人们认为，在学校放一个政治局多数委员所赞成的军事方案的忠实支持者更为有益。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这个学校虽然连同军官学校合在一起只有一营人，但主要都是由一方面军的干部组成的。

让我当这个学校的领导，显然是张国焘的提议，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个听命于张的四方面军的师长，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随身带有自己的机枪排，他直率的告诉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经常亲自带着这个排参加战斗。在他身上至

少有六处伤疤，这是他勇猛善战的明证。在同我的交往中，他表现得非常友好。他对训练并不关心，对现代军队的指挥和参谋工作，显然懂得也不多。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必须亲自参加战斗，做出榜样。他的卫队行动准确无误，然而总是不大与人接近，只服从他的命令。我提起这些，因为我对四方面军的最初印象就是由此得来的，同时也表示我对一方面军干部有一定的看法。

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旨在最后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我今天实在想不起来，我是否参加了这个会议。说没有参加，是因为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任何细节，虽然这次会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8月5日通过的决议，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其详细内容只涉及到军事部分；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没有披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部分与遵义决议相类似，驳斥了关于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是抗日先锋的神话。所以据我所知，决议也就从未发表过。

有三种情况说明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至少是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参加了。首先，我在三十年代的许多不同场合下，对这次会议作了相当深入和确切的论述，当然，相应的消息我也可能是事后得到的。第二，有人在不久前告诉我，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谴责我在毛儿盖采取的赞成毛主义的态度，这可能与我在两河口或梭磨反对张的军事计划有关。第三，这次会议之后，我没有随军事学校，而是直接随中央委员会的队伍继续行军，几天以后军事学校也加入了中央纵队。

这次会议和决议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为了反映当时事

件的全貌，应该回过头翻阅有关的文件，更应该在这里一再援引这些文件。

在决议的开头虽然确认，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已经转入建立一个在它统治下的“华北国”的阶段，然而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将革命的前途同民族危机的尖锐化和抗日运动的高涨联系起来。相反地，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苏维埃革命，并且给会师后的红军提出了战略任务，集中主力向西北挺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注意：指国民党军队），在川甘陕创建一个大苏区，这个根据地将成为全中国开展革命的后方。在谈到南方二、六军团的战绩（对此实际上无人知晓）和西北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军（这里指的是前面说过的十五军团及陕西刘志丹高岗的地方部队）的战绩，以及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决议写道，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在对中国政治形势，特别是对革命前途的判断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下胜过了张国焘。

在对战略措施作了一个相当概括的分析和列举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遭到的困难之后，决议逐字逐句地写道：“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即使人们把张国焘一同参加起草的毛儿盖决议作为一种妥协来评价，那也很明显，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在向中国西北方向挺进以及幻想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并不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就是到后来，毛和他的追随者关于这方面，也没有

对张进行过指责。附带说一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信奉基督教的进步将领冯玉祥，就曾依仗西北各省和内蒙古，进行反对满洲的反动将领张作霖和华北、华中的吴佩孚的斗争。在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也曾有人提出过同毛儿盖决议相类似的意见，那时当然不是在苏维埃革命的口号下，而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口号下提出的。

“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在会议中，与此相应也在决议中，占了很大篇幅。决议说，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使苏维埃革命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增加了数倍，并且展现了苏维埃革命胜利的新前景。因此，必须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建立西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高利益。与此相应，又重新提出了关于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等一条激烈的路线。

关于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兄弟的团结”，此时情况也不妙了。这表现在：虽然长征被誉为一方面军的壮举，但同时也对一方面军的巨大损失，红军战士精疲力尽，许多干部情绪恶劣，政治工作不深入和纪律涣散，进行了批评。决议建议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学习，接受四方面军的积极经验。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决议一方面强调四方面军动员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剥削者的功绩，赞同在未来的“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已经着手建立的苏维埃联邦政府，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为时过早。

会议最后既反对那些“对革命高潮表现怀疑”和“认为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反对那些因轻敌而可能走到军事冒险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代表。决议对这个问题讲得很笼统，没有点出姓名，但是实际上却明显地包含着对张国焘意见的批评。张国焘经过努力，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参与负责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

总而言之，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倾向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缓和了，后者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双方都作了让步，但基本上还是贯彻了五中全会上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总路线。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甚至比五中全会更后退了。张国焘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微弱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真是命运的讽刺！1935年8月1日，几乎就是通过毛儿盖决议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告同胞书号召全体同胞面对日本侵略团结起来，牢记民心所向的伟大真理，丢开任何内部纠纷，共同反对外部敌人。告同胞书还具体提出“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唯一的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并且实行对日抗战。

这个同毛儿盖决议明显矛盾的宣言，是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的。这次代表大会恰好在此时

举行，并且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宣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后来经过欧洲送到中国。我们当时与外界完全隔绝，对此一无所知。在继续行军途中，估计甚至是在陕西，才有一些零星的、可能被误传的关于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和这个宣言的消息，辗转到达我们这里。

于是，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出现了两条独立的、互相矛盾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一如既往旨在内战的路线，是由毛泽东制定并为红军中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所赞成；而在王明领导下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下的逗留在苏联的一小部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则拥护另一条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直到1936年至1937年，这个矛盾才部分地得到了解决。

如果说在毛儿盖对向北行进的政治目的勉强达成了协议，那末现在关于战略方向的争论又重新爆发了。张国焘这时又提出他的旧方案，即经过青海向新疆行进，如果不可能，就向甘肃北部行进。毛泽东和政治局多数委员坚持首先向甘肃东南部挺进，虽然这样必须经过战斗强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通道，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是有许多有利的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也达成了妥协，总参谋部七月对部队所作的整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次妥协作了准备。会合后的红军被编为两个行军纵队，分两路向甘肃前进，预计在甘肃再次相遇。左路军，或者叫西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以及五、九军团组成，朱德和张国焘率领，总参谋部也设在这里，因为他们同时指挥着会合后的全部军队。他们的行军路线是这



样设想的：自松潘向西直至阿坝，中间穿过“大草地”，这片沼泽地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然后从阿坝再向北移动，大致是向兰州的方向。右路军，或者叫东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少数几支部队、包括残缺不全政治局的前中央纵队，以及军事学校、干部预备队、尚存的后勤部队和后方机关组成，受徐向前和陈昌浩（都是张国焘的人）的指挥。右路军的行军路线大多是沿着“大草地”的边缘，经过松潘向巴西行进，然后越过岷山山脉到达甘肃。

从军事观点出发，我觉得会合后红军的整编和两路军的行进方向是极不适当的。试想，至少有原来兵力的三分之二要通过渺无人烟的泥泞的大草原，在那里预料不会有强大的敌人，但也根本不可能找到给养，更不用说地理上的困难了。而至多有三分之一的部队从东向北移动，它们受到随军非战斗人员的拖累，实际上成了左路军的侧面掩护。敌人可能从岷江出发，在岷山的通道上攻击右路军，并准备在它到达甘肃以前把它消灭掉。此外，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被左右分开也增加了困难。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等军队领导人在左路军，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残缺不全的政治局，他们仍然是多数，则留在右路军。两军之间只有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如果有较大的作战行动需要配合，这在重新会合于甘肃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长时间，我都在试图弄清双方促成这次令人奇怪的妥协的动机。我的猜测是，张国焘原想改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使之对他有利，但没有成功，因此他想至少要牢牢掌握住军队的指挥大权。除此之外，显然他并没有放弃原来的想法，

即如果不经过青海，那就经过甘肃到新疆同苏联建立联系。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仍然无可辩驳地是党的领袖，他的地位还是稳固的。如果张国焘真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那末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将大大削弱四方面军的实力，而毛作为党的领袖、作为在中国战斗着的这一部分红军的领袖，就将不费举手之劳获得胜利的果实。当然，这纯粹是我的推测，我也不想径直说出来，只是对博古做过这方面的暗示，他也表示对此事很担心。他说得对，我自己是一直赞成回到中国内地去的，并主张经过四川西北部和甘肃东南部向陕西挺进，是的，我直到现在也还持这种态度。但是，我内心依然存在着种种疑虑，我觉得，鉴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对抗，这次军事冒险行动，尤其是政治和军事的领导人分开两地的状况，本身就隐藏着新的冲突因素。不久，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担忧。

---

政治局会议以后几天，两路军相继出发。首先是右路军直接转向北方，向松潘的方向移动；然后是左路军向西北方向运动。我个人只能报道右路军的行军路线：部队先是再一次经过山区，不久就越过相当平坦的大约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从这里开始了行军路上最困难的阶段。在虚浮的草皮下面是粘滞的黑色泥潭，它无情地吞噬着踏破薄薄的干硬表皮或偏离狭窄小道的每一个人。我亲眼见到一头毛驴就是这样悲惨死去的。我们把当地的牛马赶到前面，它们本能地寻找着最安全的道路。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上睡觉，只

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在八月中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唯一的食物是储藏的谷粒，遇到好的时候，能有一块坚硬如石的肉干。沼泽中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但还是有人喝了，因为没有木柴把水烧开消毒。赤痢和伤寒本来在西康已经渐渐减少，此时又蔓延开来。这次极其痛苦的行军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幸运的是，敌人既不能从地面也不能从空中进攻我们。

我们终于从高原走下来，到达了令人愉快的地区。田地和园圃、房屋和类似城堡的大喇嘛庙，又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也逃跑了，我们前面是一座四周有坚固城墙的小城松潘。从岷江推进的敌人已经占领了该城，我们只好从西边绕过。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巴西，并在这里停留了下来，这是我们在甘肃边界以南的第一个行军目标。在有几座喇嘛寺的小镇上，我们补充了新的粮食。部队忙着收获快要成熟的庄稼和蔬菜，屠宰能够弄到的牲畜。这时已经是八月底，我们极目远望，前面是岷山的雪顶，这是一个在秋天难以逾越，而在冬天几乎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作好继续行军的一切准备。

在此期间，左路军也到达了最近的目标、即青海边界以南的小城阿坝。但是过了不久，我们通过好几次无线电联系才知道，左路军无望地陷入了泥泞的大草原，不能自拔。由于洪水猛涨，又缺少架桥材料，部队根本无法渡过那里纵横交错的湍急河流。战士们没有栖身的地方，没有充饥的食物，只得在

比我所叙述的更为恶劣的条件下露营在空旷的原野上。

张国焘终于决定带着他的队伍调转头来，同时也给右路军下达了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只发给右路军的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还是以形势报告和决议的形式也发给政治局以及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军事委员会，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会讨论了所出现的形势。会议认为，鉴于衣食缺乏，当地居民抱敌视态度，国民党军队又在岷江以西从茂功到松潘一带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并从三面合围过来等种种情况，返回沼泽草地，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在西康高原上过冬，对于红军极为不利，甚至可能导致一场灾难。

事件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混乱的，有人告诉我，毛泽东试图使张国焘相信，如果右路军不误时机地继续向北行军，左路军则往回走，尽快跟上右路军，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张国焘坚持他的决定，并给徐向前下达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决定的抵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行军。

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如果事态果真如此，那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出发后我才得到消息，也就信以为真了。队伍在夜雾中出发，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而我呢，半夜被派到军事学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我这样去做了。司令员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来，其间好象没有发生冲突，早晨我同学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纵队。

一方面军所有其他部队显然也是照此方式出发的。过了几天，传说属于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企图跟踪和截住一方面军，在一个地方甚至动了武力。但后来他们又集合了队伍，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开始退却。后来我听说，他们在毛儿盖一带加入了左路军。会师不久的红军就这样分裂了。至于分裂是怎样发生的，以后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人们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或者寻找客观理由，把过错归咎于张国焘。

有人说，张国焘不是对整个右路军，而只是对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下达了退却的命令。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末毛泽东就根本没有必要让一方面军秘密地和匆忙地向甘肃出发。另一方面，张国焘作为会合后红军的总政委，几乎不可能对分裂有什么兴趣。根据中国红军的惯例，在左路军陷入绝境后，张完全有权对整个右路军下达退却的命令。据我对朱德本人性格的了解，我也认为，朱德在当时一起签署了命令。多年来，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他都是这样做的。有人后来散布谣言，说张国焘用逮捕甚至枪毙的手段，来威胁强迫朱德和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服从他的意志，可是当事人自己从未证实过此事。在六十年代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甚至武断地指责朱德，说他没有对张国焘进行斗争。

还有人说，国民党军队的推进导致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离”（注意：不是分裂！）。其中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敌人从北而来插入左路军和右路军之间；另一种说法是，敌人依仗它占领了的松潘城，从东而来插入右路

军，这样四方面军的部队就不能随后跟上，不得不折回。这种说法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它与人们所知道的事实明显地相矛盾。

1936年，在得到毛的允许而发表的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他自己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党的官方的看法。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伦敦1968年）的202页上我们读到：“在这里（在四川西部——奥托·布劳恩）这两支军队又分开了，南方军队中的一部分继续北上，其余的和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至于如何执行正确的路线，党内意见颇有不同。……这段犹豫不决的时间终于受了两个因素的影响而结束了。第一个是蒋介石的军队从四川的东部和北部向前推进，企图在红军两支部队（哪两支？——奥托·布劳恩）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第二个是四川的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河水突然上涨，无法渡过，于是把两支军队分开了。此外，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不过在这里毋需讨论了。”

红军分裂的历史，从毛泽东口中听起来是如此简单和无足轻重。实际上，他是唯一从中得到了利益的人。他摆脱了来自张国焘方面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赢得了时间去继续巩固和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地位。现在，他作为数量虽少但对他唯命是从的一方面军的独一无二的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政治局实际上可以通行无阻地施加决定性影响。政治局尽管缩小了，但毕竟包含着政治局中最强有力的成员，因此，它有权以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说话了。

---

在巴西北边某地，残缺不全的政治局再次开会。我已经

记不起详细的地点和时间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官方的历史记载说，地点是巴西，时间是八月底。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议只能在一、四方面军分裂之后，一方面军继续行军的路上，大约九月初举行。这从决议中也可以推断出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些决议记得很清楚，决议都是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

张国焘的举动被谴责为反党行为，他和徐向前指挥下的四方面军被说成是带有浓厚的封建、军阀主义色彩的军队。同时，还说他们对川北临时根据地居民采取了所谓暴行——无理的强制措施、拷打和枪杀。然而，与四方面军无线电联系仍旧保持着，以便对它的军事行动施加影响，并“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教育它的干部，尤其是张国焘本人。在这方面，人们指望朱德、刘伯承以及在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的积极支持。

但是，不论“施加影响”，还是“说服教育”，都无济于事，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两方面电报来往不断，互相指控对方背叛革命、在敌人面前逃跑、篡夺党的领导权，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事情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张国焘公开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合法性，更确切地说，对一方面军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且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他自己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他从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中挑选的。可是，没有具体的事实证明，他排斥甚至残酷压迫他那里的一方面军干部。我当时听到许多带有倾向性的消息，多年来对此一直确信无疑，1939年年底，我

在莫斯科的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偶尔还有这样一些风传，说张国焘在军队刚一分裂时，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上述组织，这同样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知情人心里都明白，这一步骤最早是在1935年底采取的。

说完这段题外话，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巴西政治局会议。

一方面军又一次进行改编。根据参谋部(其人员已大大精简，主要由以前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统计，一方面军的实有兵力总计只有九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有七千至一万名战士。以后的统计说有三万人之多，显然是被篡改了。人们把甘肃和陕西现有的部队也统统计算在内，而对这些部队的独立存在和活动长时期闭口不谈。一军团仍然由第一、二师组成，每个师有两个团，每个团有四个连，总共有四千至五千人。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同样由四个直属团组成，每个团有四个连，总共有三千至四千人。会合后的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包括学校和其他警卫部队，以及所有非军事组织，几乎照原样未变，计有二千至三千人。彭德怀任一方面军的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尽管出现了疲惫、饥饿和疾病等现象，会议对全体指战员的士气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强调了在分裂的时候没有人表现动摇。

关于行军的战略目标首先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家从一开始只对向甘肃方向行动意见一致，可是再往何处去呢？毛泽东在暂时把张国焘从竞争中排除以后，又提出了他原先的想法：向新疆前进。洛甫主张到宁夏去，博古、王稼祥和其他人，也包括我在内，则赞成去陕西，最后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并且决定与那里的部队会合，扩大现有的根据地，然后确定未



来的战略。

大家认为，继续行军应当在原来抗日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因此一方面军得到了“抗日先锋”的称号。这在以后给毛泽东提供了借口，他在1938年宣称“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北京中文版第493页)实际上，已被削弱的一方面军除了向陕北进军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条最短的道路。到了陕北，一方面军既能得到军事增援，又可以有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因此，这也是一致的决定。我认为，一开始出现的不同意见，从毛泽东方面来讲，只不过是他的—种手腕，其目地在于，将来给自己留—手；而洛甫显然是要求得—种暂时的解决办法。

向甘肃的继续进军，确实是闻所未闻的艰难。队伍沿着道路先是顺山而下，渡过在深谷中奔流的白水江，然后爬上岷山，越过几个部分还有白雪覆盖的山口，大约沿着川甘边界又向下行进，从上游渡过白龙江。在这段路上实际上没有敌人，只有当地的游牧部落常常从埋伏处向我们射击。这里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岩石大山，形成了几乎不可克服的自然屏障，特别是狭窄陡峭的能走牲口的小路和几座摇摇晃晃的吊桥有一部分也被破坏了。我们不得不爬过一个又一个悬崖绝壁，尤其是在白龙江南岸，更要吃力地攀登。为了明确起见，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上面是陡峭的石壁，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对岸有一个小镇，通向那里的小路被大块岩石堵住，从小镇打过来的子弹正对准这些被封锁住的路口，幸而敌人使用的都是一些老式步枪。我们无法躲避敌人的射击，等待夜晚的来临又太费时间，只好冲过去！我们过去了，虽然付出了一些死伤

的代价。象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几乎天天经历。

当我军横穿甘肃边界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正规军，但其兵力比较薄弱。从白龙江北边向上是一个很高的山口，它已属于邻近的一个山脉，可以说是通向甘肃的大门。我们用奇袭的方法夺取了甘肃军队占据的这个关口，然后一方面军转向西北，拿下了其他几个由胡宗南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第一军先遣部队守卫的山口。这几次交锋都不是什么大仗，不过是一些前卫战和小冲突，以后行军路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我一方面军走下长长的山坡，将近九月底到达岷县一带。途中我们穿过许多村镇，居民没有逃跑，这是四个月以来第一次，除了在川西有一、两次例外。这样，部队又有了充足的粮食，而无须采取象在西康时那样的强硬措施。沿途我们所接触的大多是中国的回民，他们对我们一般都很友好，有些地方甚至象旧友重逢，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在岷县遇到红二十五军的联络人员，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甘肃和陕西的形势。这时，谜底才算揭开了。原来，红二十五军主要由青年组成，因此有少年先锋队之称，它由徐海东指挥。我听到过两种说法：一说这个军是在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撤退以后，又说是在四方面军从陕南川北临时根据地向西康继续行军以后向陕北方向挺进的，以后又在陕北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合并为第十五军团。这个消息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根据我以前得到的、当然是不准确的报告（请参照第21页和其他页），十五军团业已在前鄂豫皖苏区由四方面军的驻留部队所组成。估计当时存在一个翻译错误，所指的应是红二十五军。我也不知道，同样在前面谈到的红二十

七军以后有了什么发展，因为不同时期的消息是相互矛盾的。我认为，它可能被编入十五军团了。

至于说到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行动，据我看长期以来被人有意识地隐匿了，至今还被当作微不足道的事情撇在一边。这里的原因是不难猜到的。在毛的历史记载中写道，毛领导一方面军抵抗了远居优势的敌军的进攻，信心百倍地向陕西前进。而对于四方面军以及二军团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和以后更长的时间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引向自己并加以牵制的行动则只字不提。当徐海东得知一方面军向甘肃行进时，红二十五军也立即向那里进发，在胡宗南部队的背后作战，这样为一方面军到达甘肃、陕西开辟了道路。毛的历史记载，对此也避而不谈。我知道这些情况后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小的损失夺取甘肃边界的山口，而且在后来的行军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困难。

在岷县再一次举行会议——一种军事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还有彭德怀，可能还有红二十五军的一个代表。会上有人重新提出这样的考虑，是否可以经过甘肃北部向新疆或宁夏行进。然而会议还是坚持以前的决议，继续向陕北的苏维埃根据地前进，而且要加快速度。

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关于陕北形势的新消息起了作用。从这些消息得知，那里的武装力量有显著的增加，据说正规部队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还有五、六个县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此外，在一个几乎两倍于此的地区里，敌人只能控制较大的城镇和重要的交通线。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胡宗南为了保住省会兰州，已经把他的军队主力集中在岷县以北，这

样他同时也封锁了通向宁夏和新疆的道路。除此之外，在甘肃北部和西部的狭长地带（此地南与青海高原相接，北与内蒙古大草原和乱石丛生的沙漠毗邻），驻有兵力很强的军队，主要是回族将军“三马”的马队，他们有决心也有能力，阻止红军经过他们的领域向新疆推进。

陕西也绝不是没有敌人的军队，完全相反！那里有蒋介石1931年从满洲里撤下来的、张学良指挥的强大的东北军，大约有十万兵力，司令部设在西安。在甘陕交界地区和渭河北岸，敌人部署了十七路军的大约两、三个师，由陕西省省主席杨虎城将军指挥。然而，这两支军队，特别是东北军的士气非常低落。从士兵直至最高指挥官，都宁愿与日本人作战，不愿向“赤色分子”开火，因此，他们基本上只限于守卫战略阵地和设防地区。

所有这些消息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军应该向陕西进军，其他的决定根本无从谈起，特别是向新疆进军的方案看来是彻底放弃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此落了地。

在我们开会期间，林彪带领一军团向天水行进，红二十五军在渭河北岸已经构筑了桥头堡，这样保证了队伍顺利通过。九月底，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渡口之前，我们渡过了渭河。

我军大约沿着甘陕边界，时而在左，时而在右，继续向东北方前进。红二十五军此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平凉它击溃了马鸿宾将军的一支骑兵部队，而后，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又向东转，朝合水和庆阳的方向挺进，以图在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部队背后作战。一方面军继续向东北方行进，途中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

我们穿过的甘肃那部分地区，中国的回教徒占大多数。我必须说，红军严格地遵守了他们的宗教习俗。政治部发布了一个命令：禁止进入伊斯兰教教堂和民宅，禁止使用居民的饭锅和餐具，禁止吃猪肉，等等。这些正确的作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给养上没有什么困难，这里有不少地主，我们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受到甘肃军阀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老百姓，给我军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这是我们通过保保区以后又一次同一个少数民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的少数，但却是宗教上的少数——最初的友好关系。当1936年红军把苏区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这里的时候，事实证明，这种关系发生了持续的影响。

我们越向北走，景色变化越大。我们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区，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高原，狭长的山谷纵横交错。房屋越来越为窑洞所代替，田地和菜园越来越少，树木也越来越稀了。我们面前是一个贫穷的地区，有些地方甚至是一片不毛之地。

十月中旬，一方面军经历了最后一场战斗。我已记不起来，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可能离吴起镇不远，总之，这个地方一定紧挨着苏区的边界，因为此后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了第一批“赤卫队员”。对这场战斗本身，我记得很清楚。十七路军或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毛泽东决定发起进攻。战前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向集合起来的红军战士讲了这次战斗的意义。他说，这次战斗将打开新苏区的大门，胜利结束伟大的长征。他的讲话经过政治部变成几乎相同的口号，加以扩大和宣传，很能鼓舞人心，使部队本来

就很好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毛泽东确信他能成功，邀请我陪同他和彭德怀到附近小山上的指挥所去。从那里我们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这场战斗只持续了几小时。悬崖峭壁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而敌人的骑兵队没有下马，在狭窄的山谷里不能展开，在高原上又完全无法掩护，成了我们理想的射靶。当敌人的骑兵被冲散时，毛和彭把指挥所向前移动了很远，可惜我不得不留下，因为我的马已经死了很久，而驮着行李的骡子还在后面数里远的辎重队中。到了晚上，我才和中央纵队一起赶上了军司令部。第二天，我得到了一匹缴获的马，这是一头训练有素，非常驯良的牲口。几星期以后，我从王稼祥那里换来了一匹察哈尔小马，小马的脾性非常暴躁，只有用马嚼铁才能驾驭。这匹马为我效劳多时，一直到1939年秋我飞往莫斯科为止。

在苏区边界上的最后一仗中，我们的损失很小，敌人的损失惨重。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不多，有将近一百匹马，少许武器和一些弹药。根据政治部的公告，一部分受伤俘虏也证实，许多官兵都厌恶继续进行无休止的内战，希望最终开赴抗日的战场。象通常一样，俘虏们经过初步救护和短期政治教育以后，就被释放了。大多数人又回到他们的部队，并去宣传我军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口号。

队伍继续行军通过苏区，到处都有老百姓热烈欢迎我们。在少数较大的村子，地方苏维埃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举着红旗迎接我们。在黄土窑洞的墙上，用石灰写的白色标语闪闪发光。

大约两天以后，我们到达保安。这是一个房屋很少、却有

许多大石窑洞的小镇。有人告诉我，这个小镇是在修筑长城的时候、也就是大约一千七百年以前建立起来的，是始皇帝、即中国第一个皇帝或者他的郡守的临时行辕。这是否确实，我不知道，以前的豪华景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十五军团的第一批正规部队，有一营、最多一团的兵力，他们显然是在民团或省军发动袭击时经常作为后备队来使用的。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刘志丹也在这里，他是红二十六军的前任军长，据我们所知，也是十五军团现任总指挥。我们又听说，他在不久前被解除了职务。

围绕着这个事件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和矛盾百出的谣传。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有根据的说明。埃德加·斯诺把整个事件描写成一个“离奇事件”（参见《红星照耀下的中国》1968年伦敦版第212页），这可能是毛泽东幽雅的说法。按照斯诺的描写，在1935年夏天，大约是当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时，一个神秘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他似乎是以最高检查者的身份来检查党的工作，并揭出了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反革命活动，以后在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的支持下，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一批他们的同事。刘志丹等人尽管可以依靠优势的武装力量，而且也知道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容忍了这件事，没有进行反抗，徐海东担任了十五军团的指挥。毛泽东和政治局后来调查了此事，发现控告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又恢复了刘志丹、高岗和所有其他被拘捕人的权利。

因为“中央代表”长时间在共产党湖北省委工作，并且可能是随二十五军来陕西的，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件事也许是张

国焘的一个政治阴谋，张想把他的人派到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去。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张国焘激烈反对向陕北进军。接着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徐海东想夺取军队权力。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红二十五军在数量上远不及红二十六军。整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只有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成了替罪羊。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惹起所谓“危机”的“中央代表”和徐海东，都还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并且在1945年以后晋升到人民中国的高级职位。1936年春，刘志丹在所谓东征过程中，在保卫主力渡过黄河时牺牲了。高岗在五十年代，在他担任东北（满洲）人民政府主席时，由于毛分子对他发动了一场粗暴的诽谤运动，即使不是被谋杀，也是被迫自杀了。

这次事件的唯一胜利者，又是毛泽东。他以仲裁者的身份，特别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迅速而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危机”。这样，苏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这就使人产生一种猜测，而这种猜测从未公开说出来过，虽然有些人，其中有洛甫（当然不是对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暗示。事情可能是这样，毛泽东在甘肃认识了徐海东本人，并且确信他的忠诚。相反刘志丹和高岗，毛都不认识，他一定担心：只要刘、高他们在军事上超过一方面军，又掌握着行政上的权力，就可能出现类似张国焘在川康地区时的情况。还有什么比使用权术和诡计去唆使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互相争斗，人为地制造一场政治危机，使毛一到陕北就立即占据优势更顺乎自然呢？我已经说过，这些都是猜测，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在保安脱离一方面军的战斗部队以后，便移至瓦窑堡，这是陕北唯一牢固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县城，也是共产党省委或地委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战斗部队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顺洛河而下，向东南方向行进，去与正在围攻甘泉县城的十五军团的主力会合。

1935年10月20日，大约是在江西突破封锁后恰好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开进了瓦窑堡。从这时起人们所说的长征或者远征，就一方面军而言是结束了。原来所设想的作为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长征，从军事上来看成了战略退却，这种退却只是在最后阶段才转为前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还剩七、八千人，其中有五、六千名战士是正规部队。所有这些经过斗争锤炼的干部，当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成为党和军队的骨干力量。在长征的紧要关头，在一方面军同四方面军充满希望的会师之后，发生了军队的分裂，随后又发生了党领导的分裂。而最后毛泽东所宣传的原始的农民和士兵的共产主义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滋养，将来有可能带来不幸的后果。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中国工人阶级每日每时以巨大的牺牲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完全退居于次要地位，甚至被人故意抛到脑后了。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消极因素，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一万多公里，横贯十二个省，翻过十八座大山，其中有五座终年覆盖着冰雪，渡过二十四条大河。这

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当我们骑马进入瓦窑堡时（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我与博古就新根据地在日本、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交叉点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交谈。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然而，我们能说服毛泽东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我们列入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的国际斗争阵线中去吗？或者，他会从中国是世界矛盾中心的陈旧主张出发，坚持其挑动“山里的老虎”互相攻击的格言，去试图使苏联违背她所宣布的和平政策而陷入与国民党中国，甚至与日本的冲突中去吗？

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两人认为这种危险是现实的。按照事态的发展，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防止这种危险，看来希望也是渺茫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正常的联系，即使只是无线电联系，也可以得到正确的情报和指示。博古打算为此目的尽力争取派一个类似于当时陈云那样的联络员去莫斯科。

## 第四章

### 陕甘宁过渡时期

1935—1937

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 and 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只有相当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令人有舒服之感，尽管气候变化很大，而且偶然还有从戈壁滩刮来的风沙，但这种气候对人的健康还比较适宜。不过，这里的居民多数患有结膜炎和皮肤病，甚至有时也流行天花和从蒙古蔓延过来的羊瘟。

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象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

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地说，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生存下去，那是极为荒唐的，那里没有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报道还说，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无异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长征。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胡说，不过困难确实很多，有待我们去克服。

另外，苏区还不巩固，民团和省军经常威胁它，甚至有几次逼近到瓦窑堡城下。他们没有受到惩罚，因为红军的主力由于上述的困难，只能在不固定的苏区边界或苏区外围作战，直到1935年底主要在南部和西南部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交战。

陕北红军的实有兵力，我在1939年的统计数字是一万六千至一万九千人，其中一方面军五千至六千人，十五军团七千至八千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四千至五千人。1936年，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的数字有些不同，按他的说法，一方面军七千人，十五军团包括刘志丹的独立部队一万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三千人，共计二万人。对总数的估计差别不大，但各个部队的数字有些出入，原因是部队在很短的时期内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第一次在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不久，第二次是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确认刘志丹和高岗部队的忠诚以后，将改名为一军团的一方面军与十五军团，还可能包括原来的独立团和独立营，合并为新编红一方面军。关于二十五军的情况我不清楚，它可能被编入了两个军团中的一个，也可能还继续独立作战。彭德怀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自己

任总政委。新编一军团由林彪指挥，十五军团由刘志丹率领。

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有二十万人，与只有二万兵力的一方面军相比是十倍的优势。东北军的十至十二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近十万人封锁了苏区南部。他们的阵地向北一直延伸到包括延安在内的根据地附近，向西到甘肃南部。东部宜川地区，有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两个师把守，另外两个师在绥德镇守黄河渡口。由胡宗南指挥的八十六师（以后还要谈到），则以坚固的榆林城为据点，扼守着北部；除此之外，在甘肃还有胡宗南的四至五个师作为后备部队。另外，还有“三马”的三至四个步兵师和兵力不详的骑兵团，总计大概有五万人，他们的地盘从宁夏经甘肃一直到青海。

然而，这样显赫的兵力不过是迷人的假象。第一，国民党军队驻地相距很远，兵力分散，东西相距八百公里，南北相距约五百公里，中间是苏区。第二，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主要只限于守卫巩固的地盘和重要的交通线，不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甚至在推进地区，他们也放弃了有效的、但是费力费时的所谓堡垒主义战术。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士气低落，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军的一部分尤为突出；另外，地方将领之间、地方将领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争权夺利，结果是消极被动，互不协作。因此，尽管敌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一直没有发生效力。

这样，红军就可以自由行动，自己选择作战目标，进攻敌人单独的部队。在一方面军到达之前，刘志丹和徐海东已经消灭了东北军的两个旅，并给了一一〇师以沉重的打击。十一月，新编第一方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当时毛泽东在瓦窑

堡)使一〇九师受到重创。张学良原来对蒋介石的进攻命令就执行不力,现在干脆停止了进攻。不久,他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我方是周恩来和博古去协商的。为了掩人耳目,没有成文的协定,条款中有一条规定,双方的军事行动应该相互协调。其他的敌对军队,首先是第十七路军大体上也放弃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从此,军事局势开始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即毛泽东以及在陕北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着手进行苏区内部的整顿。苏区分成南北两区和两个独立的县,一个县在东北部(榆林——绥德公路东北面),一个县在延安的南边。另外,还新建了相应的党的区、县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机构,动员部并入地方苏维埃机构,其任务是动员参军,领导地方部队与自卫组织。区、县机关的领导职务一部份是由中央委员会调派的后备干部担任,一部分是由经过审查的地方干部担任。据我所知,没有进行过选举。中央委员会以这种方式牢牢地掌握了党和苏维埃的机构。

同时,在瓦窑堡成立了省党委会,中央委员也是属于省委的。另外,还重新组织了作为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临时革命政府,并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但我今天已无法说清,究竟是作为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是作为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很可能是后者,因为政府只起附属的行政作用。从这个时间起,在官方的文件中,差不多也总是沿用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名称。

附带说一下,关于两个军事领导体制的关系——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我始终没有搞得很清楚。据说,在瑞金两个军事委员会都有过。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到

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存在，这显然是因为中央军委同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许甚至同“三驾马车”（博古、周恩来、李德）在人员上很大一部分是相互重叠的。反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讨论和决议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遵义会议以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如上所述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可能是从此以后中央军委代替了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中的一切决议都由毛泽东作出，周恩来领导具体工作。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以及与张国焘分裂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此时，第四方面军成立了第二中央，那里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委仍在原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所在的一方面军那里。

在陕北，三个领导机构都是以毛泽东为首。中央委员会以洛甫为代表，他负责协调整个领导工作；政府以博古为代表，他主要进行内部改组工作，后来从事“外交”事务；革命军事委员会（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以周恩来为代表，他着手建立新的总参谋部，并与前线部队经常联系，而且也很关心指导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工作。

根据总参谋部的报告，尽管这里居民稀少，在1935—1936年冬季的参军运动中，仍然动员了四、五千人入伍，这些志愿兵一部分补充到前线部队，一部分则充实了地方部队和后勤部队，特别是警卫部队。

我自己参加了参谋部的工作，主要是在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同样是新建立起来的，学员是十五军团和参加过长征的一些同志，有几百人。

苏区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困难，虽然独立部队偶尔袭击一

下与苏区交界的国民党统治区，年底还在延安以外、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贸易，但困难的情况几乎没有多大改变。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直是强制性的征收（一种实物税收），大多是向富农、中农以及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征收，当时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是很宽的。象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一样，一时又出现了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形势当然影响了苏区的政治巩固。后来，“自力更生”的原则代替了这种形式。随着与统一战线政策相关连的对内政治路线的变化，“自力更生”原则越来越得到贯彻，而到1938年初，抗日战争开始后得到充分发展。

经济困难带来的问题是：怎么办？一方面军是重新出征，去建立新苏区呢？还是扩大现存的根据地呢？在什么地方？去什么方向呢？基本上还是在川康边界没能得到解决的那些问题。这时，要从苏联求得物质和技术援助的思想，又重新抬头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或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洛甫建议：经宁夏过内蒙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他认为，这是与苏联取得联系的可行之路。这条路虽然在北部要经过草原和沙漠，但路程比较短，而且在那边只会遇到地方军，主要是马鸿宾的部队。这个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被否决。一些出席会议的人，虽然也主张向宁夏进军，但他们的目的只限于在宁夏、甘肃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据我回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我也表示赞成。会上还附带谈到了新疆，但大致意思是，四方面军如有可能也可以向那里进军。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只表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向富



有的省份山西推进，然后从那里经绥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他认为，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两大任务：保证根据地物质供应和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走狗”的运动战，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点燃全面人民战争的火焰。会议就此结束，没有作出任何决议。

有一天，我从博古那里得知，洛甫和毛泽东曾认真考虑过，让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洛甫想这样做，但不愿采取可能导致国际纠纷的重大政治和军事冒险行动。相反，毛却准备让红军作为“抗日先锋”，大张旗鼓地进行东征。我的看法是，毛有意地想引起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为一方、以国民党中国和日本为另一方的冲突。因此他没有派专人去莫斯科接洽。直至后来，在所谓东征以后，他才派邓发去了，但不是为了从莫斯科得到情报和指示（这些情报和指示他在此期间都已得到），而是为了商谈关于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援助问题。

---

在政治和军事战略问题还处于悬而未决的时候，1935年11月底或12月初，张浩出人意外地来到瓦窑堡。张浩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估计他是在苏区北部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的，后来他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一直穿着一套带有皮里子的苏式飞行员服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他来做毛泽东迟迟未做的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迅速建立联系一事十分重视，有人告诉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为了保险起见，共产国际除了派来张浩，甚至还派遣了一个小组，化

装成商队通过内蒙。据说，中途他们受到强盗的袭击，最后全队横遭杀戮，无一人幸免。

张浩肯定也估计到，他会落到敌人手中，所以他既没有带文件，也没有带无线电联络密码，无线电联系直到1936年夏才得到恢复。但是，他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口头报告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新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央委员会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参看本书181—182页），特别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倡议、在第七次世界大会之后举行会议的结果，这些会议结果，后来以宣言的形式于1935年11月25日同样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

张浩的报告和由此应得出的结论，使党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份忙了整整一个月。人们没有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会议所涉及的是确定基本政治路线问题。因此，有关的报道也极少，甚至12月25日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我也没有看到，只是听到一些决议的片断。据我所知，决议是在1936年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但从未全文发表过。

然而，我参加了12月27日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这个决议。这篇讲话后来编入了他的《选集》（1951年 北京 中文版第一卷139—165页），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但是此文经过“编辑”之后，发表在《选集》中的文章已不能作为一个真实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利用一下文件资料，并根据自己的印象加以补充。

11月25日，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是以1935年夏季以来中国的爱国抗日运动达到一个声势巨大的新高潮为出发点的。宣言要求全国人民、一切党派和军队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救亡会议，要求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组织和军队派代表参加，为动员和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商讨具体措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无疑是主要政治力量的国民党，也明显包括在被要求参加会议之列。

紧接这个宣言书之后，中国红军最高司令部又向一切军队及其官长，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发出号召，号召书说：“我们声明，我们决定，全力支持国防政府，而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我们决定，首先参加抗日联军，而不管它是如何编制的。我们希望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紧密合作，而不管他们在过去是否反对过我们。”

这些文件所代表的路线展现了同国民党真诚合作的可能性，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客观上已经成熟。因为这时日本的侵略已经威胁到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其中包括最高统治阶层，甚至美英帝国主义，而国民党中央政府或多或少是依赖他们的。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瓦窑堡决议，完全否认了上述可能性，这个决议的主要起草人显然就是毛泽东。决议正确地把工人阶级、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民族革命”的主要力量，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动摇的、分裂的，但为了抗日战争，必须加以争取；可是决议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高级官吏和“大军阀”完全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公敌”、是“帝国主义走狗”、是“卖国贼”。这

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拒绝同国民党、尤其是同蒋介石进行任何合作，确认反对内外敌人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实际上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12月25日的决议明文写道：“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必须把民族革命战争同国内战争结合起来。”

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认为：“同时进行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力量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战争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宗派的、冒险的口号，它既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的对比，也无助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目的。总之，瓦窑堡决议中有许多矛盾。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是因为在张浩转达的基本内容中加入了毛泽东所主张的路线。

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试图掩盖决议中的矛盾，他运用原始的、低级的“辩证法”，不断地玩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概念。一方面是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是革命高潮；一方面是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是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方面诅咒军阀，另一方面利用他们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来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如此等等。

毛还用饱狗和饿狗来比喻军阀同蒋介石的关系，语言是很尖刻的。他把蒋介石比作饱狗，把陕西、广东、广西等省敢于抗命的军阀比作饿狗，他认为可以、也有必要与后者订立反对中央政府的协议和同盟。这样，他实际上阻止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本身的实现。

毛热衷于形式主义的简单化，而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国民党本身是不统一的，甚至蒋介石也是日本攻击的目标，因为日本人入侵中国越深，蒋就越加受到不仅是英美庇护者的压力，而且还有人民爱国运动和他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压力，而不得不寻找一条阻止日本完全奴役中国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首先消灭中国红军，然后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最后是蒋介石的军队。

在研究了莫斯科8月1日和12月25日的文件后，蒋介石认为同共产党人的会谈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毛泽东的两线作战的理论又使蒋离开了这个方针，并为他提供了口实，说共产党要把国民党和他本人排除在民族统一战线之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

毛泽东是真的以为他宣布的两线作战方针会获得成功吗？当然不是！更确切地说，他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要是爆发新的世界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世界革命。12月25日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决议还说：“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帝国主义者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共同目标——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

这是关键的一段！不管如何竭力掩盖，也无法否认：这就是毛1923年所采取的和1930年所支持的、后来被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和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批判了的李立三方案。当时这个方案的根据是，通过在中国发起暴动和冒险进攻，使苏联卷入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武装冲突，从而导致世界大战，引起世界革命，并以这种方法来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6年夏，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证实了他的思想基点，毛确实想利用西北苏区的战略形势把苏联拉入抗日战争。当斯诺问他是否相信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会参加这样一场战争来援助中国时，他回答说：“当然！苏联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对远东的事件不会置之不理，处于被动地位。”他强调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苏联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场战争中不会保持中立。”

我承认，我常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张国焘和毛泽东尽管平时很对立，但是1935年这一年，他们两人都一再试图把苏联引入可能导致与国民党或与日本人相冲突的这样一种境地。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决议中写道，苏联在远东的和平政策失败了。他说得对吗？尽管我了解甚少，我也是断然拒绝这种论调的。为了可靠起见，我请张浩说明一下，在莫斯科人们对此事是怎么考虑的。但是他回避同我谈话，附带说一下，张浩当时完全避免同我接触。因此我只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了更全面些，我还想说一下，政治局的决议又一次冲淡了阶级问题。未来的人民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劳动人民的社会权利，而且应给民族资产阶级、即财产占有者以经济上的自由，这种提法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即使毛的解释：“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劳动法并不反对民族资本

家发财”，说得似乎有些过分。然而，决议中有些部分却使我疑惑不解。比如，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说什么为了“在组织上去扩大”党，党的大门必须对千百万人敞开；说什么党既不用惧怕野心家，也不用惧怕政治愚人或阶级异己分子，党会教育他们等等。

这样，危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就其组成来说，绝大部分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穷苦农民的政党，现在则更加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面目，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全民族的、不分阶级的组织。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详细叙述这个问题。

莫斯科八月、十一月宣言，同1935年12月25日决议的区别（我们姑且不说是矛盾），是很明显的。政治局的瓦窑堡决议，虽然在形式上是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制定的，由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为基础的，可是决议对指示作了“补充”和“修改”，使它几乎转向了反面。尽管如此，这个决议同8月8日的毛儿盖决议相比，还是前进了一步，因为瓦窑堡决议基本上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以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要求代替了苏维埃这个口号。而实际上决议对国民党、蒋介石和内战的态度并没有变化，因此一开始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加了困难和危害。

为了给决议以更大的意义，毛补充了在此期间已经多少由他左右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局。当时十五个政治局委员和候

补委员中只有七人在陕北：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邓发和凯丰（青年团书记？）。另外八人，有三人在莫斯科，五人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为了使决议的表决取得多数，两名中央委员，即彭德怀和张浩，仓卒地被补进了政治局。

决议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同张学良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党中央的代表可以经过西安到国民党地区，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在地下党工作的已有从苏联和其他国家派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青年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成功地掀起了一个以8月1日和11月25日宣言为政治基础的群众运动。据传说，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企图把这个运动纳入12月25日决议的轨道，他们当时所依据的是政治局的权威。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正确，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毛紧接着政治决议之后提出了一个很能清楚表明其意图的军事计划。

---

1936年1月初，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或军事委员会会议，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大体是一致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他把下列任务作为主要目标放在计划的首位，即得到苏联技术上和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一方面军应推进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与苏联远东军建立直接联系。毛考虑分三个阶段来实现这个意图：第一，巩固陕北苏区，准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第二，消灭由军阀阎锡山指挥的山西省省军，并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向北进军，经绥远或察哈尔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第三阶段的计划没有拟定细节，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也就是说，只勾画了远景草图。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表示反对，并建议：把红军的作战行动局限在山西西部，否则不仅会损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会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可是我没有得到支持，在座的人同意了毛的计划，尽管人们没有多大热情，而且一部分人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洛甫只是顺便说了说，主要目标也可以或者最好通过进军宁夏来实现。周恩来强调，绝不能放弃陕北根据地。毛只是严厉地反对了我的意见，热心支持他的有凯丰和张浩。关于张浩，我的印象是，他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最后，这个计划在原则上全体通过了。对于我来说，我的态度造成的结果是，直到红一方面军开拔也没有人再来邀请我参加什么会，大概也没有再举行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议。

以后几周里，我通过谈话听说，政治局委员完全不是象开始时所表现的那样意见一致。例如，彭德怀讽刺地说，这是以不足的兵力继续进行长征；王稼祥表示担心，如果在军事上过于激进，政治上就很容易使自己脱离抗日群众运动而陷于孤立。博古在几次个人交谈中与我有同样的考虑，但他认为事情并不象所想的那么糟，最好的办法是，留在毛身边来影响他，以阻止他的冒险行为。从博古那里我还听说，不仅军事委员会，而且除周恩来之外的整个政治局都准备跟随部队出征。这更使我思虑重重，因为看起来似乎是要放弃现有的根据地了。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意见，只是耸了耸肩，但对让他留下来担任陕北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这一点甚为满意。这使人感到，他的意图似乎是，在红一方面军不再返回的情况下，也要

保住苏区。

大概在二月中旬，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准备出发，参加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此期间我经常考虑，毛的战略计划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最后我得出结论，毛的计划是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决议所反映出来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苏联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如果毛的计划得以实施，苏联人民将由于一场大战的爆发而直接受到牵连。象过去在江西一样，我又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次思想斗争甚至比蔡廷锴变时的那一次更为激烈。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处在危险之中。

我这时再一次把我知道的，无论是听说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重新思虑了一遍：毛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苏俄支援的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图把苏联拉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中去；毛多次表示不满，认为自1927年以来苏联从未给中国红军以任何援助，相反却同国民党媾和交好；1934年以来他一再强调，中日之间的对立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主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毛从1935年以来一再重复的具体计划是，通过中国红军向新疆或蒙古的进军，首先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的冲突中，然后再使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此等等。

我回忆了1932年在满洲中东铁路线上亲眼看到的日本人的挑衅行为，同时也回忆了苏联政府维护和平的政策，这一

政策的实施从世界上消除了冲突的因素。但我也知道，日本当时正利用满洲国这个傀儡，继续加紧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挑衅，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大蒙古国，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毛泽东在1936年夏对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声称：“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奥托·布劳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将作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国联邦的一部分。”他很可能就是这样选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红军未来的基地。

我的想法没有错。不久前我看到1936年3月6日国民党《盛京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红军向山西推进的目的是：第一与外蒙古联合，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二对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不断进行威胁，以此引起日本的侵犯。如果红军能实现其中一个意图，那末就足以造成对南京政府的一个巨大的实际的危险，因此对南京政府来说，反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度过好几个失眠的夜晚，我反复考虑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国际主义战士所处的地位，决定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写一封信。信中我写了自己的想法，坚决反对红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这是一封长信，我现在已不能复述它的全部内容，但是我可以从1939年我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中摘引三个要点。第一，我指出“中国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进军，将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会成为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借口”。我解释说，这样一来必然引起苏联的插手，使苏联不得不扮演毛冒险政策的庇护者的角色，而不顾及由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和平政策所造成的后

果。第二，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政治任务出发，中国红军的主要任务目前不在于去获得苏联的技术援助，而是必须在中国内地进行战斗，以便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击亲日的卖国贼军队”。我继续说，毛泽东向山西逼进的计划不会达到上述目的，相反这个计划会重新点燃内战的火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向华北扩大侵略的借口（这实际上已经发生）。第三，我借用彭德怀的话写道，“主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长征，如果途中敌人采取措施牵制住我军，主力也许不能返回，那陕北苏区的存在实在很成问题”。

这封信由俄文译成中文之后，我交给了周恩来，他答应把信印出来发给政治局委员。这事是否做了，我不知道。同时，我还声明，我拒绝参加出征的队伍。过了几天，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还有参谋部和后勤部的一部分人随军离开了城市，我仍留在瓦窑堡。

我没有收到对我的信的答复。只是过了不久，周恩来告诉我说，从山西来了电报，政治局批评了我，说我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还指责我，误解了苏联和平政策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的实力。这也许就是回答吧！周恩来在向我转达这个批评时未加评论。同时，他建议我除了军事学院的工作，再参加参谋部的工作，我们的目的是防备敌人突然进攻或袭击新根据地。

虽然周掌握的军事力量只有军事学院、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以及参谋部和警卫部队，总计两、三千人，但他还是显得很有信心。他信赖张学良的停战协定和杨虎城的消极抵抗，

这是正确的。红一方面军离开后的几个月，陕北苏区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当然人们不应忘记，大部队离得并不太远，随时都能返回。至此毛的第二阶段计划始终未能完成，但是谁又能事先知道呢？

在这段时间，只有民团多次侵入苏区的中心地区，敌人常常骑马袭击村庄，进行屠杀和掠夺，然后又撤了回去。一次，民团几百人深夜偷袭了紧靠瓦窑堡的一个村子，我们担心这一帮民团可能会袭击城市，于是周恩来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这个地形极为有利、座落在孤立高地上、四周有坚固城墙的城市。我和军事学院全部人员立即出发，去驱逐侵犯者。但是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土匪们在最后一刻受到警告，仓皇逃跑，丢下了他们所掠夺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一些马匹。追剿这股土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了瓦窑堡。这些土匪看来是得到了教训，以后不敢再靠近城市了。

我讲述这段插曲，是想说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参谋部按时给我送来前线的消息，可惜相当少。除此之外，周恩来有时给我的译员一些中国报纸，这些报纸是通过“战地邮局”从山西寄来的，有时他也用英语同我谈谈政治和军事形势，这样我就稍微知道了一些情况。

一方面军的出征，以后被称之为东征。二月二十日，东征主力在国民党十七路军占据的城市宜川和绥德之间宽阔的空隙地带渡过了黄河。驻扎在黄河东岸兵力薄弱的山西省军只是稍稍进行了一下抵抗，因此，东征在开始时进展比较顺利。省主席阎锡山尽管拥有大约六万余人，即二、三倍于我军的优势兵力，但他没有和我军进行公开的交战，而只限于保卫城镇

和坚守从黄河边吴堡到汾河边祁县的交通要道，以阻止红军向省会太原进攻。因此，一方面军占据了黄河与汾河之间、北面直到上述交通要道这块三角地区中的几乎所有的县城，估计占面积二万五千平方公里。

在此期间，主要战斗任务落到了十五军团身上。十五军团作为北路纵队必须在后面掩护主力渡过黄河，同时还必须掩护部队的左翼，去抵御集结在太原以南的阎锡山主力。另一方面，政治局、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所在的一军团，也可以在两河之间的整个地区直至黄河和汾河的汇合处，比较自由地进行作战，一直向同蒲铁路所穿过的富饶的汾河河谷推进，并在那里剥夺地主和商人的财产、征集志愿兵和建立新的地方政权机构，以代替国民党政权。根据参谋部的报告，动员新兵总计五、六千人；缴获财物总计五十万块银元以上，这对于我们比较艰苦的环境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食品（粮油盐等）和布匹以及少量的武器和弹药。运输队把战利品陆续运回陕北，周恩来在这里设立了后勤站，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

东征的政治目的据说是“抗击日本强盗，严惩参与华北自治（实际上是脱离——奥托·布劳恩）罪恶活动的卖国贼”。自称“抗日先锋”的一方面军出发以后第二天，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号召，建议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从表面上看，这个号召好象同1935年11月25日的莫斯科宣言相符合，实际上它是与此相违背的12月25日政治局决议的政治路线的继续。尤其不能使人相信的有两点：一点是它包含了一系列蒋介石此时不能接受的条件，如要求

清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释放一切政治犯、与“人民政府”（迄今为止革命政府一直这样称呼自己）建立“正常”的关系；另外还要求商谈立即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立即对日宣战、派遣“讨伐军”前往满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宜；还建议以陕北作为开会地点（！）。更为严重的是另一点，言行不一，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进军山西又重新引起了内战。

果然，蒋介石命令他驻扎在黄河以南河南省和江苏省的军队，火速开往山西，支援阎锡山。他给绥远、察哈尔、河北等省的省军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这样他就不得不让北方各省轻易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同时他还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封锁黄河，阻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并占领我实际上没有防卫的根据地。

三月底，黄河以东的敌人部署基本完毕。国民党中央军在陈诚将军的指挥下，总共调动十二至十五个师的兵力固守汾河一线和沿岸的铁路线，构筑坚固工事并依仗山西军队防守的城市，分几路纵队（每路有二、三个师）开始缓缓向西推进。同时，阎锡山的主力也在北面向西移动。敌人此时又采用了第五次“围剿”时对付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可以想象，我们四月份的军事形势是很不利的。汾河与黄河之间的作战区域逐渐缩小，部队的运动受到束缚，和敌人决战又不可能，因为这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现在决战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为了突破汾河防线（直接通向绥远的道路已被封锁），经过山西东部向河北并继续向察哈尔进军吗？

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可预测。一方面军同根据地的联系如果被切断，就不得不孤军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作战。从敌

人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有这样的选择，或者恢复山西过去的局势，即把我一方面军赶回黄河以西，或者把地盘让给在他们背后蠢蠢欲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失掉察哈尔和河北（此省已经几乎不可能保住），而且还要失掉绥远和山西。

这时，中国报纸根据日本的报道，也在宣传中国红军同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勾结。日本人则公开声明，他们的势力范围——华北和蒙古，受到了“红军”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加强华北的兵力，以保护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防止共产党的侵占。日本人还迫使中国方面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了“关于反对华北共产主义”的协定。事实上把这两省的权力让给了日本占领者。显然，这个协定不仅是反对共产党人的，而且也是明确针对蒋介石的。总之，毛泽东的东征煽起了中国内战的战火，加强了中国反动的亲日分子的势力，并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反对中国、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最终反对苏联而扩大战略基地的借口。不管这是不是毛的意图，在客观上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最后采取了另一种选择，决定撤回到陕北。当时这样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没有执行蒋介石封锁黄河渡口的命令。此后不久我遇到博古，他对我说，对撤退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已认识到自己的战略计划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博古认为：应该说，东征的积极结果是，此后会比以往更为坚决地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步调不一，可能在作出这个决定时起



了作用，或者至少起了促进作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十五军团担负着战斗的重担。但一军团多次不重视总司令部的命令，拒不支援十五军团，因此，十五军团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特别是在撤退和掩护渡黄河的时候。十五军团总指挥刘志丹不幸牺牲。林彪由于他这种态度受到了政治局的谴责，并暂时被免去了总指挥的职务，改任军事学院校长。

---

1936年4月的最后几天，红一方面军回到陕北。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五月初毛泽东在瓦窑堡东边的一个村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通知我，说我也被邀请参加。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骑马前往，下午到达开会地点。晚上博古来找我，要我第二天在会上发言，作自我批评。他暗示，他来我这里毛泽东是知道的；还说，毛很希望大家的意见能够完全一致，以便消除红一方面军中的分歧和预防对主力撤回可能产生的“误解”。我欣然同意了，因为战事基本是按照我的想象进行的，而且涉及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也没有担心的根据了。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充满了“和平”的气氛。毛的举止就象是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他作了一个纲领性的讲话，讲话中他又来了一个急转弯，这种情况我已经经历多次，特别是在与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显然毛的讲话政治局委员事先进行过商谈，因为大家的发言差不多大同小异。我在会上承认了政治局对我的信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东征的结局这封信实际上已变得无的放矢了，我还“赞颂”了毛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他也谦和地表扬了我在抗

击民团时的积极行动。还有其他人，例如洛甫和王稼祥，这些对毛原来的计划不那么热心的人，也都一一表示了悔意和赞同。只有林彪甚为不满，在一旁沉默不语，但他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出于个人的怨恨。

在这里无需赘述毛的讲话内容了，因为它基本上同5月5日会议通过的呼吁书相一致。呼吁书是作为《中国红军最高司令部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的通电》发表的，在《毛泽东选集》（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一卷第264页）中也可以阅读到。只有几点，我想强调一下。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毛的讲话已不再提到他在年初阐述过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同会议本身一样，至今在毛主义的史记中只字未提。相反毛在2月21日的号召书中却反复说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发起的东征，是为了反对日本强盗，严惩中国卖国贼。具体地说，后者指的只能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他们与日本人正进行着肮脏的交易。而山西和绥远的省主席那时还比较顽强地抵抗着日本的进逼，但是众所周知，毛攻击的主要对象恰恰是他们。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毛声称东征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卖国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我在上面简要叙述的东征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

至于决定东征后撤的理由，毛说，在山西军队和中央军封锁了向河北和察哈尔的去路以后，一方面军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决心避免有利于日本人和卖国贼的新的内战，因此起决定作用不仅有军事上的考虑，而且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他

甚至还说，从山西西部取得的许多重大胜利来看，我军在军事上完全有可能突破汾河沿岸的封锁线，继续向河北进军。

令人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尽管对上述情况知道得清清楚楚，却承认这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这时毛在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地位毕竟十分巩固，以致没有人敢公开地反对他。再则，东征作为一次目的有限的出征来看，也是有实际效果的，它在政治上开辟了新区，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军队的兵力和武器也得到了加强。对于国际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会议最终开辟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新阶段，《通电》也表明了这一点。其特点是，不再把国民党、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而是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停止内战被摆在首要位置，“因为最后的解放，只有通过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好象终于得到了贯彻。

但是，敏锐的观察者从政治局会议和5月5日的《通电》中不难看出，新的政治路线带有更多的宣传性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践相矛盾。因此，毛和政治局的联合政策仍旧不是面向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是面向地方上的军阀——华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华南的两广省主席，他们一有机会就与中央政府相对抗，因此在客观上越来越削弱了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根据当时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就不能实现。

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要求在山西、陕西和甘肃，也就是在一方面军的作战地区，规定一个月内付诸实现；而在华南、华西，即在四方面军、二军团和各个游击支队

的作战地区,只是一般地议论一下,没有确定的地点和时间。人们不应当忘记,政治局是以全党的名义,而军事委员会、即最高司令部是以全国红军的所有武装力量的名义讲话的。另外,在谈到关于尽快实现停战问题时,人们又故意不提宁夏。

毛还借此机会来证实他在遵义以后,特别是在毛儿盖提出的、并从此写进中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中的论点,即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并且在各个阶段,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以动员全部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为目的的。

会议结束时,决定了近期的军事战略,更正确地说,是公布了这个战略,因为它早已确定了。这个战略目标是将陕北苏区向西扩大,并作为抗日根据地加以巩固。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第一,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开展政治攻势;第二,向宁夏和甘肃迅速挺进,出其不意地进攻和打击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除了扩大根据地之外,同时也要考虑到,一有机会就与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在甘肃取得联系。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在川、滇、康几省(下面我很快就会谈这问题)经过漫长的战斗和行军正向北移动。还有一个只是风传而没出确定的目的,就是试图与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个问题可能只在毛周围很窄的范围内议论过,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他们还考虑了洛甫原先的想法,即经过宁夏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但鉴于原来还有另一个方案,即经过新疆得到苏联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就把洛甫的想法搁下了。张浩支持经新疆方案,他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准备通过这条路给中国红军提供援助。因此邓发不久被派往莫斯科,去商量具体步骤,并把距甘肃西面边界不远的的一个商队驿站哈密定为交货地点,那里有

一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建立的、以后又放弃了的飞机场。

这个新的战略计划得到了一致同意，会议就此结束。当天晚上举行庆祝大会，我很不聪敏，没有去参加，这引起了毛的不快。第二天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动身返回瓦窑堡，部队领导人也分别回到他们的司令部。几天以后，一方面军就向宁夏方向进军了。

---

在瓦窑堡，我第一个从自己的住所搬了出来，这是一座隧道式的近似窑洞的石房，紧靠着总参谋部的房子，毛泽东搬了进去，另外又给了我一座城外无人居住的农舍。据我回忆，从这段时间起我就不再参加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了。邀请我参加的只是活动分子会议或党的会议，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人邀请我去进行个人交谈，不过次数不多。

此外，我还继续在军事学院工作，并附带负责建立和训练一个骑兵团，这是中国红军的第一个骑兵团。几百匹马是从宁夏来的，一部分是从马步青的骑兵那里缴获来的，一部分没有经过训练的马是从一个蒙古人的养马场弄来的。同时，还来了几百个善于骑马和愿意骑马的人。虽然我不是骑兵，但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指挥唐波夫骑兵团时，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演习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我们在瓦窑堡呆的时间不长。五月底，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乘一方面军远在西部和苏区相对无防御之机，进行了突然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在瓦窑堡城前，所有的中央机关都在这里，但几乎没有军队防守。在毛的

指示下，城市不战而弃，人员仓卒撤退，例如我就是撤退前一个小时才得到出发的命令的。所有的机关都转移到保安，我们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到达那里的。这件事实在太丢丑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为人所提起了。

以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又有一队中国同志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从苏联经过蒙古到达宁夏，又从宁夏抵达保安。这样苏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有了经常的联系，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毫无疑问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的领导中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力量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改变了他的基本态度。由于消息不全而且片面，很长时期我以为毛的态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这时起执行了一条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基本一致的、旨在结束国内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学习有关文件，特别是学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才纠正了我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不能置之不问，至少当时还没有这样做，然而他从来就很善于用他自己的意思去曲解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受他操纵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如今在这条道路上追随着他，由此产生了一种两面的政策，有些方面表现出左倾宗派主义的特征，有些方面又表现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虽然应该承认这个政策也有一些积极的效果，这可以从1936年这一年看出来。

所谓积极的效果大体说来，首先是由于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成功地与张学良达成了“以抗日为目的的互不侵犯和合作”的牢固的秘密协定，不久杨虎城也参加了进来。这个协定大

大稳固了陕北苏区,使我们一方面军有可能在宁夏、甘肃比较自由地进行作战。另外,张学良还用钱和军服等物资支援一方面军,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政治上的让步。他允许(当然是极其秘密的)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延安和西安与国民党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自由来往,还允许共产党在他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西安设立地下办事处,以及在东北军中“帮助进行抗日教育”,也就是在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工作。

蒋介石在同一时间内加强了他的宪兵和“蓝衣社”在东北军中的活动,因而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为了在政治上争夺张学良的军队而展开了一场“暗斗”的不寻常状况。

1936年夏,毛泽东两条战线的冒险政策达到了危险的顶峰。那时所谓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即两广省主席,公开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并且为了争取群众而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们传统的自治权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政来源。他们的态度是针对蒋介石,不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日本在广东和邻省福建直接策划的阴谋,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相反,他们在自己省内同蒋介石一样残暴地镇压抗日民众运动,对付共产党的残暴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一场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新的军阀混战,正迫在眉睫。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声明,红军决心支持西南集团的“北上抗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说,由西南政务委员会开始的这次斗争,不单单是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因为它首先是反对反革命头子和卖国贼蒋介石。在目前的情况下,抗日战争

与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是不可分割的，人民群众运动最终会扩大为一个强有力的真正的民族革命。

这个决议同2月21日的宣言和1936年5月5日的《通电》，很明显是互相矛盾的。政治局片面地支持西南省份的军阀，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这在客观上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批判了这个决议，认为它是错误的，并且在电报中指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内部分裂。”

大规模的战斗还没有发生，西南集团的企图就破产了，这是因为几个高级指挥官带着他们的队伍投奔了中央政府军。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后果难以预料的灾祸。八月份，博古有一次随便向我谈起一件趣闻，他说：在西南集团起事时，曾在小范围内议论过一个战略计划，其目标是剥夺蒋介石的权力，开展抗日战争。计划中两广的军队由南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由北方向南京挺进，红一方面军则在内蒙或华北抗击日军。这个计划听起来象是幻想，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空谈，还是认真的意图。不言而喻，由于这个时期事态的发展，这个计划如果确实有的话，也已过时了。

然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却没有过时。这个很成问题的计划与以前的东征一样，都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

在我回顾了往事以后，我敢断言，他思想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分裂国民党，组成反蒋联盟，推翻南京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1936年的政治和



军事战略，这个战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相矛盾的，不过按照情况的变化，矛盾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一方面军的政治部在当时就觉得有必要对这方面的谣言当作“谎言和诽谤”一再加以反驳，并说这些谣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卖国贼”编造出来的，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但苏区确实一直还流传着这个口号：“先打蒋介石，后打日本人！”1937年以后代替这个口号的说法是：胜利不属于任何一方，也就是说既不属于蒋介石，也不属于日本人。对外毛泽东当然不得不继续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迫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全国抗日群众运动，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性的意见，政治局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们平时追随毛的意向，也不能对这个决定性的意见充耳不闻。

于是政治局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于1936年8月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同时在这个文件中又对蒋介石公开地进行谩骂和指控，说蒋进行反共内战以及对日本的掠夺采取消极容忍的态度，使国家遭到分裂，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到支持。公开信写道：“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

同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催促下，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作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与过去的文件相比，这个决议无疑是一个进步。尽管如此，决议仍然声称必须“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途径。可是曾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谴责的1935年12

月 25 日决议中对蒋介石的错误态度,在这个文件中仍没有得到明显的纠正。决议中尽管强调说,有必要“争取统治阶层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其理由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和力量”,但是对蒋介石却根本只字不提。

十月份,“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终于发出命令,指示红军的所有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如果遭到进攻,也只许进行自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在甘肃孤军作战,战斗极为艰巨的时候,继续战斗下去势必导致他们主力的毁灭!命令还说,释放一切战俘,发还他们武器,只要他们的部队是抗日的,或者他们本人愿意加入红军。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因为红军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缺少一个相应的后方根据地,除了高级军官外,红军从来就把战俘,自然是不带武器的战俘,释放回家或编入自己的队伍。还有关于不去阻止而去支持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战线这一点,也只有宣传意义,因为只要我们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其他军事要员或省主席没有具体的和睦关系,那革命政府的影响范围实际上就只限于与红一方面军已签订了秘密协定的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如何建立全中国范围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展与蒋介石以及服从于他的军队的关系等等,不仅在八月公开信里,而且在九月决议和十月命令中都没有得到解决。然而,所有这些文件却给人一种假象,似乎这些文件与我们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所知道的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被迷惑住

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尽了一切力量，“通过和平的手段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他们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因为上面谈到的和其他的步骤完全都是以他们的名义公布于众；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政治局委员，最多还有高级指挥员知道，其他所有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都无从知悉，甚至我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博古和其他人在同我谈话时做过一些暗示，但我不可能从中了解很多。

在1936年9月的决议中，政治局只是在一个问题上从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这就是1935年12月25日决议中关于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决定。至于这种纠正是否收到效果、效果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来判断，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当时，博古可能是担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或是在政治局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此也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为了把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意要吸收张学良入党。政治局对此事可能发生了分歧，因为当时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去了请示电，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反对，才放弃了这个意图。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反对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合作，相反，它同意和这些军阀建立联系，只要他们承认抗日统一战线，并允许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在他们的所属部队中进行宣传工作。可是，毛的计划远远超出了这个内容，完全是另外一种倾向。他想让红军、东北军和国民

党的十七路军合编成“西北抗日联军”，并想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成立“西北抗日政府”，依靠陕甘宁三省，策划建立反对蒋介石的民族统一战线，消灭蒋氏政府。这一幻想（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人们只能把毛的这些计划称之为幻想）的基本思想绝不是新的，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年代，其中也包括从苏联得到军事上、至少是物质和技术上援助的空想。（请参照本书179—180页、211—213页和其他段落。）为了进一步达到他的目的，毛泽东甚至考虑让张学良出任“西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同时，他还准备给绥远省政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样“西北政府”的领土就可以扩大到内蒙一带。所有这些，我在同别人交谈时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因此我不能说，中央政治局是否讨论了这些计划、是否报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然而可以肯定，这些计划不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观点。

毛泽东在党的公开会议上，确切地说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主要以下面的论据来说明他的独特的统一战线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受到强大的反动亲日派的影响，仍旧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格言，这里的“攘外”并非一定意味着诉诸武力，更多的却意味着进行外交谈判。如果要使蒋介石从反动派中分化出来，“动员”他、即强迫他停止内战；赞同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那必须对他施以双重的压力，第一是通过全国抗日群众运动的压力，第二就是通过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政府的压力。

这一套论据听起来好象是十分明白的。然而，我们每天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呢，不仅华南和华西各省的军阀，而且还

有国民党中央军，对我游击区、红四方面军和二军团不断地进行战争！同样，众所周知，蒋介石最晚是从“东征”以来就准备给我红一方面军以新的打击，他打算在陕西、甘肃、宁夏（简称陕甘宁）新苏区把红一方面军完全包围并消灭之。有些情况，我原来不知道（除小范围以外没有人知道），而最近才从文件中获悉，说蒋介石在1936年夏曾通过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去探听：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与中国红军共同进行抗日。莫斯科正确地让蒋介石与保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系，上面摘引的文件，特别是那封公开信可能就是对此事的答复。至于双方这种政治试探到底认真到什么程度，我直到今天也很难判断。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是想通过这种政治试探为他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内部争端创造有利的出发点。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如此：1936年拖了整整一年的内战，并未因他们所采取的政治步骤而受到任何削弱或任何影响。

---

相反，这一年的军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政治决策起了一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贯彻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相对立的、旨在削弱南京政府的独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除掉唯一的劲敌张国焘，他当时由于四方面军在人数上实力较强，一直威胁着毛泽东在党领导中的统治地位。

按照东征后决定的战略计划，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春推进到宁夏，击溃了马步青或马鸿逵的几个团，到达黄河支流清水河后停了下来。接着，他们在夏天向南面甘肃边界地区转

移，顺利地逼进到泾河上游。然而他们在那里遭到“三马”军队的阻击，胡宗南国民党第一军的几个师也赶来增援。敌人在两河沿岸和两河之间的平凉—固原—盛镇公路沿线挖掘工事，并在这些防御阵地上等候从渭河出发准备转入反攻的国民党第一军主力的到来。

这样，我红一方面军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基本上结束了。它虽然没有达到所希望的那么大的范围，但仍然使苏区扩大了一万五千至二万平方公里。当然，这个地区象陕北一样人口稀少，主要居住着回民。

据我所知，一方面军的主力直到年底都驻扎在这个新区，指挥员彭德怀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位于甘肃东北端的小城庆阳。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泽东有时到那里对新区进行行政上的安排和政治上的指导。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如何，我现在也说不清了。毛本人的全部时间都呆在保安，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他住的窑洞恰巧就在我的住处旁边，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比以往更密切，我们的交往几乎只限于礼尚往来。在那段时间，我没有一个固定翻译，而当时我学会的中国话还相当少，这个情况可能也起了一定的、虽然是次要的作用，更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我给政治局写的那一封信，使毛对我一直心怀不满。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通过参谋部定期得到前线的消息，所谓参谋部就是同后勤部一起留在保安的简陋的情报处。据前线消息说，一方面军（此时已是秋季）有两项主要战斗任务：第一，采取措施与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四方面军和二军团正从西康出发，试图打开一条通过甘南的道路；第

二，同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一起为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显然要发动的新围剿作好准备。但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对两个情况还不清楚：如果真的打起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采取什么态度；另外张国焘对四方面军是怎样打算的。我听说，毛泽东甚至考虑过，我们一方面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向何处突破。

自从分裂以来，关于四方面军的许多谣言到处传播，我很怀疑，这些谣言是人有意散布的。我想仅举下列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随着整个局势的变化，我们与张国焘的关系也有所变化，这些谣言也就时盛时衰。1935—1936年冬天，这些谣言的盛传第一次达到了高峰，说四方面军的纪律完全涣散、领导严重不和、对老百姓实行极端恐怖手段，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一概不能幸免；还说他们进行掠夺和抢劫，甚至有吃人肉的现象。张国焘被打成党和革命的敌人、惯匪，说他逃避任何战斗，只在逃跑中求得安生。1936年夏秋之交，当四方面军和二军团向北进军时，谣言突然消失了，而四方面军主力在所谓西征中失败之后，谣言又重新四起，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好了。以前我听到过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非常恶劣的评论，但是通过在西康的实际观察，我深信：这些谣言即使不完全是、也至少大部分是凭空捏造的。这也可能是在此期间由于四方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所以情况有了变化。当然，我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坚决谴责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行为。

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通过无线电收到的那些消息，消息虽然不多，但多少能经常收到，并能从我们搞到的国民党报纸

中得到补充和证实。据这些消息说，四方面军，包括原中央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于1935年夏向南转移，还收复了在此期间被敌人占领并修筑了工事的川西的一些村镇，如懋功、芦山、天全等地。1935—1936年冬，四方面军试图继续向南突破，大概是想与二军团会合，也可能是想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过冬”，他们甚至推进到大渡河下游的一些地方，然后被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阻止了前进，于1936年春返回西康。他们在那里沿着大渡河和雅砻江逆流而上，占领了大片地区，据说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一直延伸到西藏和青海的边界。在川西，张国焘实现了他原来的计划，成立了苏维埃联邦政府，在占领西康东部甘孜城之后，又成立了第一个西藏人民政府，当地的“活佛”在形式上担任了政府首脑，这位活佛是最高喇嘛，同时体现了世俗上和精神上的权势。

根据我们的情报，当时四方面军，包括五、九军团，分成了六个军团，共有十至十二个师，各师兵力极不相等。张国焘不仅是另立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由他一手成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朱德是总司令，徐向前是副总司令，陈昌浩是总政委，王宏坤是参谋长。实际上，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占据了所有的关键职位，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没有具体的论据可以说明，中央红军的干部象保安和后来延安的人们所说的那样，被撤掉了指挥职务，甚至受到压制和迫害。令人奇怪的是，在军队领导人的名单里只是找不到刘伯承的名字。

关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时的兵力，说法不一。国民党报纸说是七万人，他们可能把贺龙的部队也计算在内了，我们估



计是四、五万人左右。无论如何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夏秋之际还拥有相当可观的兵力。由六军团和二军团合并而成的红二方面军(从现在起我使用这个名称)的情况就不同了,大概在1935年夏他们就离开了根据地。据我所知,我们的参谋部直到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北部时,都没有同它取得联系。1936年夏,二方面军开拔一年以后,我才得知比较详细的情况。据说他们开始长征时是四万人,对这个统计数字我是有保留的,实际上可能不会超过三万人,就是这个数字与1934年的统计相比差不多还增加了一倍(参照本书113—114页的统计数字)。

红二方面军首先向湘南进军,然后向西,在贵阳北面渡过乌江的上游,接着继续被敌人向南逼迫,不得不历经重重艰险,绕过我们曾翻越的黔滇之间到处是断壁悬崖的界山,直到昆明以北,又分路向西。估计这可能是1935—1936年冬天的情况。他们被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几乎追到澜沧江边,最后成功地转战向北,并在石鼓渡过金沙江,石鼓在一方面军渡江地点的上游。红二方面军的主力沿河逆流而上,一直前进到西康北部的喇嘛城白玉。这支很强的部队可能以军队领导人为首,经过高原地带一直挺进到甘孜,此地也是张国焘大本营的所在地。在长征途中,二方面军所经受的困难和匮乏的境况至少与一、四方面军不相上下。根据官方的统计,1936年夏,当他们通过四方面军的参谋部与保安进行无线电联系的时候,还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周恩来认为,一万五千人比较接近事实。

在甘孜,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对形势和未来的战略进行

了讨论，决定夏天就离开西康，一同向甘肃进军，但是要保证两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

我们在保安讨论了这个模棱两可的决议，而且是在一次为数不多的我也被邀请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的。然而我不知道，会议是在什么样的范围、是在甘孜决议以前还是以后召开的。在这之前，电报往来非常频繁，政治局在电报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应的指示，要求克服党与军队中的分裂，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团结，以便为建立一个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抗日战争赢得有利的出发点。张国焘不得不服从这些意见，尤其是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或者至少是作为共产国际的发言人也签署了政治局的电文。再则，正象张国焘自己在1938年所写的那样，“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决定”，促使他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渐次缩小”，因此张国焘也就更为容易地同意了中央的要求。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二方面军的独立性，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贺龙和肖克是他的老战友，对他也很忠诚。由他们两人指挥的二方面军与此时又强大起来的一方面军加在一起，形成了对四方面军的一种抗衡力量，四方面军在人数上以一、二方面军相比仍占优势，或者至少是旗鼓相当。在政治上，贺、肖二人无疑地加强了四方面军中象朱德那样的一些真诚希望张国焘与毛泽东和解的领导干部的影响。

这样，上面提到的决定也就被接受和同意了，并很快得到了贯彻。二方面军和分散在各处的四方面军的军团，集中在松潘地区，从那里开始基本上按照一方面军过去的行军路线

前进。他们平安地到达了甘肃东南边界，但在向北继续进军的途中，与常驻那里的“三马”的五、六个师以及正在向我一方面军进军的胡宗南的军队进行了多次交战，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次损失显然要归结于两军缺乏合作的缘故，特别是我一方面军也没有进行吸引敌军的进攻，只有一军团的一、两团人于十月份经固原向会宁推进，那时二、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会宁。二方面军以这两个团作先导向东进军，不久与一方面军会师。据当时内部估计，红二方面军的兵力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人。贺龙前往彭德怀的驻地庆阳；关于肖克的情况，我没有听到什么，就我所知，他的名字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关向应接替他担任了二方面军的政委。

红四方面军继续向北，朝着宁夏方向进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一带到达了黄河，其主力渡过黄河，踏上了灾难重重的“西征”道路，这次“西征”不幸地导致了四方面军的覆没。

---

西征的决定是怎样产生的，很长时间我都甚为模糊，因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有关会议我没有参加，而从参谋部能得到的文件中也看不出什么情况。只有从交谈中我才听说：张国焘接到指示，让他从红四方面军部队中抽出兵力，组成独立的“西路军”，经过甘肃向新疆进军，以便在哈密接受苏联已经提供的物资和武器援助；并让他本人回到保安，在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适合他的职务。

这完全是可信的。虽然详细情况我不了解，但我知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放弃经过新疆接受苏联援助的老计划，在这一点上，他的企图完全符合张国焘的愿望；张对让他去保安也

不会有任何怀疑，因为他早就同意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为这一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纲领了。于是，他组成了“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协助徐向前工作。张本人与朱德、刘伯承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出发来到保安。

关于西征的第一个说法就是这样，我想再一次说明，这不是从正式渠道而是通过谈话听到的。据我对情况的了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令人奇怪的只是，除了原有的四方面军的主力参加了“西路军”外，还有董振堂手下的第五军团。西征开始时，他们的兵力是二万五千至三万五千人之间，四方面军只有六、七千人留在黄河东岸，从那里和朱德、张国焘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向陕甘宁开拔。在客观上这意味着，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苏区会师以后，毛泽东就夺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全新的说法，这次是由官方传开的，与第一个说法是根本矛盾的。按照这个说法，中央曾明确指示张国焘与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违背了这个指示，独断专行，进行西征；他命令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向甘肃西北部进军，希望从那里与苏联建立联系。至于战略目的，这两个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把西征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张国焘，其实西征的失败从1936年11、12月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对这个新的说法开始是怀疑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就接受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由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张国焘反反复复和愈加严厉的指责，这些指责

都是党内正式批评，也差不多是我几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消息来源，而且1936年年底整个军事形势又很紧张，因为“西路军”的脱离，我正规部队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最终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本人的态度，他于1938年4月擅自离开延安，不久以后投靠了国民党，并在一个公开声明中指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利己为目的，滥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关于这个步骤之前和之后的政治争论，我以后再谈。在这里，我只想详细谈谈军事事态的发展，叙述中我将参照1939年年底我在莫斯科所作的报告，因为它最好地反映了我当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在我一方面军东征以后，一方面用外交手腕试探是否可能通过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达成某种谅解，另一方面又准备对陕甘宁苏区进行新的“围剿”。在这次战争中，他开始先依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共计十二至十五个师，这些军队得到了从南部和东部向前推进的命令。诚然他们执行了这个命令，但他们的进攻纯粹是一场滑稽戏，因为他们每走一步都是事先与我们驻西安的代表协商的，所有的军队行动都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没有发生战事。我们这方面对付“敌人”的，实际上只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

秋季开始，蒋介石动用了自己的军队。在大同一带，他集中了三、四个师，加上太原以北的三、四个山西师，这样在苏区东北部就有七、八个战斗力很强的师了。另一支拥有二、三个师的中央集团军，可能就是以前布署在甘肃的那支队伍，在西北部出人意外地插到了宁夏。在甘肃，也就是在西部，依旧是胡宗南的军队，它们驻扎在清水河边，再加上“三马”的部队，

总计八至十个师。只是在北部包围圈还有个缺口，而那里是一片草原和沙漠。

满洲国和察哈尔的傀儡军在日本的操纵下侵入绥远，为蒋介石进军山西和宁夏提供了表面上的理由，或者更正确地说提供了借口。虽然傀儡军被绥远省军用自己的力量击退了，但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以抗日为幌子完成了对苏区的包围。

在红四方面军还没有完成强渡黄河之前，侵入宁夏的国民党中央军出人意外地占领了靖远。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部队，包括朱德、张国焘和其他领导干部以及参谋部和后勤部的一部分，被截断了。过河的部队，即“西路军”，足有四分之三的兵力，他们已不能或不愿返回，在敌人不断的压力下大致向着西北方向独自继续开拔了。

在朱德和张国焘的率领下，落在后面的部队向东挺进，约有四、五千战士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其余的约有二千人不是直属作战部队，他们在1936年12月初，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其他人率领到达保安。

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装，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中间大部分由警卫人员组成。当时在中国红军中已经流行的检阅仪仗队的欢迎仪式，这次却没有举行。只是把高级领导干部留在保安住下，所有其他人都安置在远郊的房屋和窑洞里了。

二十五年以后，我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1958年柏林版第549页）读到，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就已从一方面军那里得到四万套新军服，我感到很惊讶。她根据的是一位名叫哈特姆博士的所谓信件和日记，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人。史沫特莱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描写，同样也来自这个渠道，我认为是虚构多于真实。根据我在保安所听到的、并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情况来判断，“西路军”在甘肃西北部那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冬征之前，在装备、衣物及其他给养方面完全没有准备，其兵力人数也迅速缩减了。1936年12月，“西路军”首次遭到惨重的失败，五军团总指挥阵亡，该军团自此也就不复存在了，“西路军”这时还剩一万五千至二万人。

“西路军”在青海和戈壁之间狭长的走廊越向前推进，它的损失就越大。西征道路经过的地区，主要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族人。为了得到必需的衣物、食物和住房，他们不得不毫无区别地进行征用和没收，严重地破坏了地方和宗教的风俗习惯。因此，这激起了当地居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他们积极拥护当地的伊斯兰教军阀。寒冷、疾病、饥饿和疲惫以及在1936年11月—1937年3月这五个月中经历的几十次战斗（国民党报纸报道有七十次之多），这一切使得“西路军”的队伍日益稀疏了。

据我们在保安得到情报，“西路军”总指挥部在这种绝望的状况下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办？有三种可能性：撤回到陕甘宁、突围去新疆、或者分散部队打游击。1937年3月，当“西路军”在酒泉城最后被击溃、徐向前身负重伤的时候，决定采取

最后一个办法。约有八百至一千人的一支队伍经过艰苦奋战，打到了新疆哈密，转危为安。大部分领导干部，包括徐向前在内，带着几支小部队或者他们的警卫员成功地抵达苏区。有几千人被俘，其中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到了陕甘宁。“西路军”大约总共剩下不到三、四千人。

张国焘是“西路军”覆灭的唯一罪魁之说，写进了官方的中国历史著作，成了毛泽东有计划地消除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影响的求之不得的理由。1936年底，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军事学院所作的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说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他还说，“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覆灭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此还有几条注释，其中说道：“张国焘这时候（1936年秋季—奥托·布劳恩）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sup>①</sup>1938年4月，张国焘从延安逃跑以后，毛泽东把张的路线概括为“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sup>②</sup>

---

不管西征是毛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还是张国焘擅自进行的，最迟在1936年12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陕甘宁会师的红军，就正规部队而言总共是三万至三万五千人，此外还有独立部队和卫戍部队，估计也有五、六千人，这些部队能不

---

① 《毛泽东选集》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1卷第197页和2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93页。



能以及如何把“西路军”从这时已经很明显的极端困难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呢？我认为，虽然苏区差不多完全被包围了，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南部和东部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真正受到进攻的威胁，唯一有战事的前线在西部，我们整个正规部队的兵力，即红一、二方面军以及四方面军的余部，都集中在那里。敌人方面，作战的主要力量是胡宗南的军队，因为“三马”的部队和甘肃、宁夏的中央军绝大部分被“西路军”牵制住了。此时我军向甘肃挺进正是时机，但是红军总司令部严格地坚持红军方面不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决定，甚至当胡宗南开始从清水河向环江推进时，我军还局限在犹豫不决的防御上，后来在环县才进行了一次突然的短促回击，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接着胡宗南的军队撤回到原来的阵地，我军没有随后向前推进，局势保持稳定，可是并没有减轻“西路军”的负担，而是让它听凭命运的摆布，另外苏区的包围也没有突破。

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虽然讨论了进军宁夏或甘肃的问题，但在讨论中过去已经出现过的、后来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而放弃了计划，又被提了出来，这就是联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各省建立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我不知道幕后的情况如何，更难想象到，有人会用这个计划按毛的意图来“改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不久，这个计划又一次突然消失了，虽然绝不是最后一次。看来张学良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野心放到其它方面去了。而毛泽东也肯定无意与“西路军”合作，“西路军”此时向西北方向越走越远了。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缩紧了对苏区的包围圈，另外他在东北军中加强了“蓝衣社”和宪兵队的活动。毛泽东这时显然把

“西路军”已经放弃，对保卫陕甘宁也抱着怀疑态度，于是想出了一个类似年初东征的新的战略方案。如果没有出现能使军事局势缓和的政治转折，红军全体正规部队就将按此方案在靖远一带沿张学良与胡宗南军队之间的缝隙向南突破，或越过渭河经过陕南向河南进军，或再渡黄河向山西河北方向推进。我不知道，毛是想在南京政府军背后进行运动战，还是想向河北和察哈尔的日本傀儡军进军，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他当时的及以后的战略计划，向来总是把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混在一起的。因为我都知道了这个冒险计划，那这个计划肯定曾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讨论过，不过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十二月中旬的西安事变，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计划也就石沉大海了。

在详细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就毛及其在政治局的追随者对“西路军”的态度，作一些政治上的补充说明。我在这里提供的情况，是很久以后我从一些文件中获悉的。

政治局在开始时没有利用军事上的可能性，给“西路军”以直接的援助，反而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提供相应的援助。至于这个援助具体指的是什么，文件中没有提到，然而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是希望苏联政府在军事上或者至少在政治上进行干预。根据事态的发展这两方面当然都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具体指示，其中建议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三马”施加压力，必要时甚至可以争取张、杨的军队与红军一起向甘肃进军；另外还建议向南京政府要求，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为重，停止内战，特别要迫使“三马”停止对“西路军”的一切作战行

动。这些建议，在蒋介石于莫斯科伸出外交触角进行试探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而，通过政治途径使“西路军”绝处逢生的这些建议和类似意见都被忽视了，或者如上所述被“改变”得转向了反面。这样，不管人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内战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来了。

---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惊人的新闻，我先是从一个警卫员那里知道的，博古路过我这里，也证实了这件事。原来在天亮之前，东北军的将领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并按张学良的命令把他押在一个旅馆里，对他进行最严密的监视。这个消息象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人，他指使人严刑拷打和屠杀了数万工农革命群众，国内战争中有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而他又是内战的主犯和罪魁祸首。

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举行了一个大会，实际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区的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的公开集会，几乎看不到老百姓，因为在保安可以说没有什么老百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这些讲话我远远不能完全听懂，会后我请人给我作了说明，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人们情绪激动地听取了这些讲话，而对其中的矛盾却似乎没人注意，这就是：一方面号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求对蒋介石进行清算，这样势必会引起严重的内部战争和外部纠纷。

在以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在保安的中央委员会活动极其频繁。周恩来和博古去西安，就蒋介石的命运以及必须采取的政策进行谈判。形势发生急速变化，而且越来越复杂了，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我从博古那里知道了一些事实的片断，其中只有一部分为正式的公告证实了。

博古是这样告诉我的：开始蒋介石拒绝任何谈判，并坚决拒绝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代表谈话，甚至1925—1927年革命时期曾与他密切合作的周恩来，也被他拒之门外；蒋在张学良面前为自己辩护，说他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正确的；他还责备张的作法引起了一场危机，使他统一中国的事业成为泡影，使他为阻止日本人的继续入侵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

张学良起先想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另外，他当时完全处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而周是按

照毛的指示有意识地把张推到前面。

最后博古暗示：有消息说，不仅苏联政府，还有美国 and 英国政府都不同意西安的作法。他对此事没有具体说明，因此我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对蒋介石被捕一事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太清楚，就是在这两位国民党将领的哗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插手或者插手到了什么程度。一开始官方坚决否认这点，大家也都以为，共产党对这个事件是感到意外的；博古还向我保证，他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在此期间有些事至少可以使人推断，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几个亲信知道一些情况。蒋介石通过他的特务多少了解一些张学良和杨虎城同红军的关系，他这次来西安是想好好教训一下张、杨，并促使他们对红军发动强有力的进攻的。为了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预先派来了一团宪兵，他的寓所也不在西安城内，而在城外。所有这些情况，我们驻西安的代表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同张学良的司令部经常进行密切的接触。引人注目的还有，就在哗变发生的时刻，陕甘宁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和军队的一些高级领导人都集中在保安，特别是周恩来，这以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前线或苏区的。最后，张学良在同蒋介石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这次“暴动”的责任不应该只由他个人承担，而应同其他许多人共同分担。

可以肯定，毛和政治局对这次哗变从一开始就是坚决支持的。仅仅是保安大会的过程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这次大会的过程也为其他人，如埃德加·斯诺所证实，不过斯诺没有写出证明人的姓名。特别是可能由毛亲自起草的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呼吁书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其中说道：“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被捕的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这个事件是蒋介石政策中的三个错误所导致的结果：1、投降的外交政策，2、对红军的进攻，3、对人民的压迫。”再之，“如果你们要同蒋介石和亲日派划清界限，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并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要求，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撤销蒋介石的职务，把他交给人民法庭，由各党派、军队和团体的代表组成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介石所实行的那种专政政策和官僚机构，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重新开放被封锁的新闻机关，集中全国所有的武器力量并把他们立即派到山西和绥远武装抗日。”

因此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至于最后一点，即关于派武装力量去山西和绥远的要求，纯粹是欺人之谈，因为蒋介石已经派军队到那里去了，不过他表面上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及其傀儡，实际上是为了进行合围，甚至是为了对苏区发动我们所担心的新的进攻。蒋介石被捕后，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急忙调兵遣将，与国民党上层中和中央政府中有影响的反动亲日派代表一起自行集中军事力量，目的自然是为了向陕西进军，攻打两个哗变将领的军队以及与张、杨结成联盟的红军。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方式能解救蒋介石，而且这样做既不利于他们自己，也无益于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呼吁书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不管听起来是多么动人，也只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尤其是这个呼吁书的对象是一些政客，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怎么说也肯定比蒋介石更反

动、更亲日。

为人大肆宣扬的民族统一、一致抗日的口号未能实现，代之而来的是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全面内战，这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无疑是了解这一事实的，上面摘引的呼吁书中关于“业已开始的战争”之说绝不是无的放矢。

与此同时，事变的最初几天在西安达成了具体的军事协定，成立了“抗日联军特别委员会”，以张学良为首，其次是杨虎城和周恩来。特别委员会将在全陕西行使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并尽可能扩大到西北其他各省，到一定时候将成立独立于南京的“西北抗日政府”。这样，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三次实施他最得意的思想，他不仅希望能从苏联得到后援，而且希望能使苏联卷入同国民党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中去。

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并请求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主力同样调向南面，以便共同抵抗南京军队将要发起的攻势。在军队的转移途中，张学良放弃了一些到目前为止由东北军占据的城镇，其中有通往西安的公路两侧的城市延安、甘泉、富县和洛川。红军部队随即开进这些地区，其主力进驻了西安东北和西北的前沿阵地，十五军团甚至推进到西安以南，只有少部分队伍留在甘肃和宁夏，其余部队替换了北面杨虎城的军队，占领了长城脚下的城市靖边，接着一直推进到榆林附近。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所控制的地区，没放一枪一弹就一下子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了一百万人口。这是权力的巨大增长，但是它终究是牺牲了同红军结成

联盟的军阀的利益。

此外，我们所采取的这些军事措施，同致南京政府的呼吁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呼吁书要求，把全国一切武装力量放在北部，还说：“如果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由我们率领的二十万强大的红军将与你们的军队共同坚守民族革命阵地，为了我们祖国的解放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附带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二十万人，如果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也只是非常勉强的数字。在陕甘宁直属保安总司令部的红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都计算在内，也几乎不超过四万人。与我们完全隔断、只能独立行动的“西路军”，还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在老苏区，特别是在前中央苏区和长征经过的地区，现存的大小游击队，据官方可能夸大的统计大约有四万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同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也不受中央的控制。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最高估计是九万至十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遥远的南部和西部。实际上，总司令部所支配的只有陕甘宁的四万人。这个数字差不多正好符合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正式登记的数字。

蒋介石被捕以后，双方开始出动军队，迅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贺龙（肯定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一个公开声明中称之为“爱国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推行的政策，虽然得到了陕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支持，根据一切迹象来看甚至是受其鼓动，但在几天之内即陷入了绝境。从保安和西安天天都有呼吁书和号召书发至全国，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国民党地区抗日运动的代表，尽管受到蒋介石的追捕和监禁，却坚决拒绝同西安的哗变分子同流合污。他们正



确地认为，西安哗变分子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者。他们可以依仗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这些群众受到最近绥远军事上获得胜利的鼓舞，迫切要求一致抗日，甚至那些一贯主张地区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军阀，这时也明确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划清界限。陕西的“民族革命”的集团，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得很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到，国民党地区的共产党员、至少是大部分党员，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是很不理解和十分忧虑的。

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甚至还有谣传说，斯大林亲自进行了干涉，向毛提出了最后通牒。周恩来和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究，政治局决定，放弃把蒋介石提交人民法庭审判的要求，就共同执行在中国建立民主秩序和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这一问题，与蒋进行谈判，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

关于这个决定的更详细情况，我无可奉告。埃德加·斯诺写道(还是没有写明告诉他消息的是谁)，毛泽东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气得直跺脚，而且周恩来对这个提供消息的人透露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问题”。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无关紧要。毫无疑问可以确定，毛泽东是想把他宗派的、冒险的政策强加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收到电报后开始还是维护这种政策，而至少博古和洛甫却很快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当毛看到他的观点不能得到贯彻时，才转变了态度。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毛对这一历史的真相进行了粗暴的篡改，把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主要功劳归于自己。1936年12月28日，毛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声称：“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sup>①</sup>这一提法后来编入了毛主义的历史著作。在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小册子中（1954年柏林版第50页）也写道：“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此蒋介石被释放了，国内和平乃得实现。”

这种对历史的歪曲，虽然早已受到以后发表的许多文章的批驳，但它在一些善意的、然而不明真相的作者笔下还是留下了痕迹。莫斯科《新时代》（1969年第十三期第6—7页）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例，文章写道，蒋介石被捕以后，“这个屠杀了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出乎意料地被毛派去西安的周恩来解救了……周劝说哗变分子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把他释放了。毛试图用下面的理由来说明他当时所起的作用，他说，他救下蒋介石，使蒋免于一死，是想促使他同共产党人一起继续抗击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

如果我们（我指的是陕甘宁所有共产党领导干部，极少数高级领导人除外）对于西安事变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其后果还有一知半解，那末对于它所引起的国际纠纷则长期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不久前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也不知道日本新闻机关煽动说，西安事变是莫斯科唆使而成的，莫斯科想以此发出在整个远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1卷第245页。

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共产主义阴谋叛乱的信号；还说，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成立了新政府，并与苏联订立了攻守同盟。当然，我们既不知道塔斯社的官方辩白，也不知道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以及苏联其他的表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来往的电报就更不用说了。电报一致指出在中国爆发一场毁灭性内战，从而完全受日本奴役的危险性，明确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电报的原文最近才公开发表，刊载于1972年莫斯科出版的文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一书中。

关于西安事变国内国际的一切联系和背景，这里没有必要再详谈了，苏联、还有西方（尽管是歪曲了的）进行多方调查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我只想向读者提示一下1969年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文集中科·维·库库施金所写的《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文章中以很有启发性的材料叙述了直到1943年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

根据政治局在保安新作出的决议，仍由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不久，谈判成功了。蒋介石获得释放，他口头许诺：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领导层中的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采取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这个协定当时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因此谈判的双方也没有签字。协定最初还是秘密的，以便使蒋介石采取必要的

步骤来贯彻他的新政策。正由于同一原因，也就没有规定一定的期限。尽管如此，我们在保安还是很快地得到了一些详细的消息。毛泽东还促使西安广播电台将这个协定用中文播出，并通过中间人（据说其中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用英文公布于众。蒋介石离开西安，取道洛阳，张学良甘愿作为他的人质随同前往。12月26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声明，其中他把公布协定一事委婉地称之为食言行为，他引用孔子的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为此，毛泽东在上面引用过的12月28日的声明中回答说：“蒋介石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他威胁说：“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这场尖锐的公开争论，又重新危害着业已开始的民族统一战线。它表明，毛在解决西安事变之后仍继续执行他旨在削弱和分裂国民党的原先的宗派主义政策，他这样做为日本人加强对南京政府的压力提供了他们所希望的口实。博古尽管在同我的谈话中表示对公布秘密协定和对9月28日声明感到突然，但他认为，必须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战术上的两步棋，借以强制蒋介石公开亮相，尽快实现他所允诺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确信，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所积极支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最终将得到贯彻。

这番话听起来是很令人欣慰的，但仍存在着某些疑点，特别是有谣传说，张学良放走蒋介石一事周恩来并不知道，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一起驱车去机场途中，周企图追上他们，而当周赶到机场时，蒋、张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

1936—1937年岁序更新之际，中央委员会、革命政府和其他所有中央机构，包括军事学院以及一部分警备部队，迁移到了延安，从这时起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首都达十年之久。以前我们从瓦窑堡向保安行进是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并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而这次转移到延安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防备措施，周围还充满了胜利的气氛。国民党的飞机没有再来轰炸，蒋介石起码是立即兑现了他的诺言之一，这就是在他被释放之后，立即停止南京政府的军队向陕西的进军和一切军事行动。

延安位于一块平原上，有三个河谷在这里相接，四周黄土丘陵起伏，与保安真是有天壤之别。城的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抱，城墙在北面蜿蜒向上，越过一道道山梁。延安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房屋，主要是那些最宽敞和最漂亮的，都空无一人，因为这些房屋的住户是大地主、国民党官员、高利贷者和商人，他们早已偕同家属搬走了。因此住房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也分到了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哈特姆博士和我住在一起，在此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他从这时起直到我去莫斯科为止，约有两年半的时间一直是我的邻居。

根据粗略估计，这座城市的居民还足有三千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我们看到这种已经不习惯的热闹的民间生活，感到趣味盎然，但或多或少

总有局外人之感，因为我们身无分文，衣食住行一向由地方苏维埃的主管部门以及军队后勤部门负责，这种情况以后几年也没有改变。

在政治上，博古的乐观主义似乎得到了验证。临时革命政府，或称中央苏维埃政府，虽然继续保持着它的名称，但同时还建立了西北局，一段时期由博古负责。西北局的任务是，在一定的時候接管以往地方一级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职能。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公开阐述了一个国内和平合作的纲领，其内容与西安协定基本一致，对于西安协定，我们直到那时只知道国民党方面的责任，现在中央委员会方面提出了“四项保证”，概括起来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中央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民党军队，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高利贷者等财产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坚决准备抗战”这个普遍性的口号，代替了过去的立即对日宣战的要求。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后几个月在南京举行了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最高级会谈，与此同时国民党一个代表团于1937年4月到延安进行谈判。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中央政治局认真地完成了一个以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为方针的政治转折，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局愿意同国民党以及同蒋介石实行真诚和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一派在党的领导中又重新得到了加强。这种力量有双重后

盾，一方面，依靠中国本国人民群众的情绪，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情绪，这时要求结束内战进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这种情绪不只局限于人民群众，它越来越波及到统治阶层，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就是很好的说明。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坚决态度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面对这个现实，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至于他是想真正改变他以往的政策，还是仅仅出于战术上的考虑，那只能由未来去说明了。

这一政策的改变，无论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都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堂堂的胜利者，其实不然。汪精卫、何应钦和国民党领导中、南京政府中、以及华北几省中的其他反动亲日力量，千方百计地破坏并尽量阻挠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他们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决议用了“关于彻底根除赤祸”的醒目标题，并提出以下最低要求，以回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保证，即解散中国红军和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武装部队；解散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停止任何共产主义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同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答应实行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

在国民党地区，政治上最初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西安协定迟迟未能实现，政治犯大部分还是身陷囹圄，南京政府没有改组，除了容许抗日力量，包括还有人身自由的共产党人进行活动，以及开放对延安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过去就已经半公开地存在着）以外，民主改革只是微乎其微。甚至这点非常

有限的“自由化”，也已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极大猜疑，现在他们比过去更加激烈地公开攻击蒋介石，并在华北增派了大量军队。

只有在军事方面才可以看出真正的变化。从1937年年初开始，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红军的战争行动，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队伍都撤退了，并继续向华北和华东推进。从好的愿望来说，这可以解释为准备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傀儡。至于在华南和华中的老苏区和游击区是否暂时也出现了和平局面，我不太清楚，由于没有得到反面的消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只是在甘肃“三马”针对“西路军”所进行的战斗并没有减弱，直到“西路军”遭到悲惨的结局，但没有任何人作出那怕是最微小的努力来制止这些战斗。

“西路军”的最后覆没，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他立即利用此事，以便把张国焘这个最厉害的对手、和党内领导人中唯一的竞争者除掉。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西路军”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只要没有全军覆没，张国焘就仍然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留在黄河东岸和加入了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那部分干部都拥护张。虽然这些干部中的大部分人的职务，在此期间已由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接替，他们被送到军事学院或党校受训，但是张国焘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除。尽管张国焘在公开场合几乎从不露面，然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合法选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的个人威望仍然赋予他一定的权势。人们在背后说，他已经失去了工作的兴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活动



范围也是很有限的。

现在，毛泽东认为同张国焘最后清算的时候到了。在部队、机关和干部学校中，特别是在军事学院和党校中，纷纷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这样的会议我本人至少参加了一次，可能是在后勤部，也可能是在军事学院。会议的口号是：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党的机关报发表了《关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报告》。具体地指责他：对革命丧失信心，奉行退却逃跑的军事战略，在党内军内进行派别斗争，实行个人独裁，以严厉惩罚的手段代替教育干部（多么熟悉的调子！）以及在群众关系中采取军阀主义的办法。

在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四月初在延安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政府成员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我没有被邀请，因而只能概括地复述一下我后来所听到的情况。人们指责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时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实行了错误的领导，说他在创建苏区、镇压反革命和压制群众运动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其主要罪行为自立伪中央和伪军委，因而分裂了党和军队；最后又把“西路军”覆灭的一切责任推到了他一人身上。

张国焘粗暴地反驳了这一切指控，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是对他所领导的苏区和四方面军的诬蔑，并断然拒绝发表自我批评性质的声明。

在这次会议期间或会后不久，发生了一起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据说，第四方面军的干部一师、团、营的指挥员在军事学院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逃出延安，煽动四方面军的队伍同他们一起摆脱毛泽东的

势力范围，独立进行游击战争，以后适当的时候再建立新的苏区。如果起事成功，那末张国焘将作为起事的领袖。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就暴露了，五十多个“阴谋分子”被秘密逮捕，传说其中有几个人因进行反抗被打死了。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式的调查委员会，由受人尊敬的党校校长董必武担任主席，然而这个调查委员会没有揭发出张国焘或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有什么罪行。据我所知，几个月以后被捕的干部又都释放了，并让他们担任了军事指挥员。

我在复述这些细节时，是有很大保留的，因为以我自己的观察丝毫不能证实此事。我在军事学院讲授战术课，几乎每天都呆在那里，我也曾与四方面军的干部交谈过，其中有一位师长曾在西康任过军事学院临时院长，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国焘的同情，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哗变的迹象。估计这很可能是一桩捏造的或者人为挑起的事件，以便更容易地解决张国焘问题，因为这期间同张国焘还没有出现根本的政治分歧。这个企图之所以没有得逞，据博古说，首先是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预。共产国际执委会强调指出，必须埋葬过去的一切争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无条件地维护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不知道，幕后是否还有什么活动，总之此后不久张国焘听从了朱德、洛甫、周恩来和其他人的劝说，为了党内的和平，发表了一个自我批评性质的声明，刊登在延安党的机关报上。他在声明中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军阀主义倾向”，并“发展到了反对党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举出具体的事实。总的说来，这个声明行文很短、很含糊，显然是一种

违背心愿的让步。虽然引火药还在地表之下微微地燃烧，但无论如何从外表看来人们的情绪是比较平静了。

现在党的领导者们又以全力投入到当前的任务中去。之所以迫切需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政策不仅在人民群众中，而且在军队中开始遭到部分人的不理解 and 暗自不满。农民们担心土地分配和其他各项土改政策会被收回，红军战士则把新政策看作是向国民党投降，是十年内战浴血奋斗的不光彩的结束。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进行普遍的启发教育，并向干部和群众解释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四项保证所作的让步。二月间书面拟定的一些原则以及后来的告全党同志书，是这次启发教育运动的基础。这两个文件称四项保证是一种必要的和许可的妥协，是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在短时期内实现对日抗战的有效步骤。文件说，这种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相反，共产党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保持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以新的民主体制代替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土地、放宽经济政策以及改变红军的名称，使之从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等等都不会对此有任何改变。我们的目的现在是以后仍然是，千百倍地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这些论点听起来很容易理解，而且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连我也相信它们是正确的了。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其中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只字未提。人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默认

了这个决议。于是，“解散”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变成了“改称”，“停止”任何共产主义宣传变成了“加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解释成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而人们所承认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三民主义；没有矢口否认阶级斗争，然而由于把民族主义的口号推到了首位，所以阶级斗争也就被归结为对亲日分子的斗争。

在我的头脑里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不确定的印象，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主要对手的双方都在推行两面政策。他们知道，对日一战迟早总会发生，而要进行抗日战争就只有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但是他们都想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完成抗日之业。我的这个印象在后来几年中得到了证实。

---

1937年5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地区代表会议”，后来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据我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所谓“全国”和“代表”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很确切的，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党中央机关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和陕甘宁红军代表，此外还有来自东北军内共产主义支部的党的工作者以及来自华北、特别是北京的领导干部。华中和华南，尤其是老苏区和各分散游击区的党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其中有政治局委员项英，王明、康生和陈云当时在莫斯科。从本来意义上来说，人们很难将与会者称作代表，因为，可能除了来自国民党地区的代表以外（是否如此，我也无法判断），他们都不是由下面推选的，而是由上面指定的。

我也接到了邀请，并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因此我可以很好

地观察会议的表面进程。会上的讲话，我最多只能听懂一半，因为我虽然又有了一个翻译，可惜他的水平并不高。另外，开会期间我仍然要到军事学院去上课，所以有一半时间我没有参加会议。然而，我对会上发生的一些相当混乱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一个大概的印象，这是因为我在会议期间与一些熟人进行了交谈，除了博古和其他人，还有彭德怀的前政委杨尚昆，我同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与杨会面是最后一次，他在会后不久去华北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他俄语说得很流利，象以往一样他总是乐于给我帮助。

洛甫主持这次会议。主席台上坐着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周恩来，他可能在南京；也没有王稼祥，他由于重病缠身，几乎从不露面；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都没有出席会议。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任务》的主要报告，内容大体上同西安事变以来“摇摆不定”的新的政治路线相符合。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后来毛泽东在《选集》中以新的标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一卷第249—267页）发表的文章，内容与当时他所作的报告内容是一致的，对此我就不必赘述了。

当然，有一些措辞同原始报告有很大的出入，但如果想到，这篇文章已经是第二次修改的稿子，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毛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解释“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时说道，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对于加入“世界和平战线”的问题，他却没有提及。还有，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更加尖锐了，正是从这里引出了争取统一

战线的斗争，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从“民族主义”的口号过渡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当然指的是国民党地区），并认为这是“目前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讲话的第二部分正是这个主题，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革命阶级”的同盟问题，他说这个同盟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后又把其他所有“爱国分子”以及大地主包括在内，并且为这些同盟者加入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因此，这象过去一样严重混淆了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毛在他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强调了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即红军的领导作用。他严厉地警告说，导致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尾巴主义”不能再重复了。他说，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最终目的。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在统一战线范围内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和无限制的自主性，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有些地方前后矛盾，引起了与会者的许多疑问和一些异议，特别是关于阶级路线问题、关于过分强调军队作用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贯彻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一结论部分，后来也编在“毛选”第一卷（中文版第269—279页），当然删去了所有争论部分。这个报告最后还是由会议一致通过了。

第二个主要报告是由洛甫作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十年》。他在报告中维护了自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总路线，李立三的路线没有包括在内，正如洛甫所

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李立三路线很快被克服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以及所付出的牺牲，他讲的差不多同博古那时在遵义所讲的一样。他说，共产党在这十年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动员和组织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提高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觉悟和战斗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战斗的党。当然，他也为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作了辩解，并表示将来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要结合起来。

接着会议对洛甫的报告展开了讨论，意见基本一致，报告由代表大会通过。这两个报告不久以后作为小册子出版，当然经过了修改。

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中几乎没有露面，他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然而我认为，与他的意愿相反，他仍然引起了小小的骚乱。张显然是在政治局或主席团的督促下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批评讲话。他在讲话中简要地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拥护目前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从当前这种政策的角度来判断过去，那是错误的。说完，他离开了会场。于是有几个代表起来激烈地攻击他，在场的四方面军干部却为他辩护，洛甫起来平息了这场唇枪舌战，他指出，党中央已经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大家不要再进一步追究了，因为张国焘不仅有错误，而且还有很大功劳。

最后，会议主席发出号召，号召书说：抗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一切共产党员要立即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部队主力要进行改编，占据有利地点，为运动战作好准备；返回城市的同

志应转入地下，同时重新建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用各种办法支援战争。就此会议宣告结束。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大的进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得到贯彻；中国共产党就民族范围而言加入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就国际范围而言有限度地加入了世界反战反法西斯战线。此时此刻，人们未曾注意到下述事实，即作为会议主要发言人正式表示拥护新政策的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因而使他有可能会象他过去多次作过的那样，在实践中去实行另外一种政治和军事的战略战术。

---

事实证明，洛甫在党代会上的预言是正确的。此后过了两个月，日中大战就爆发了。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陕甘宁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并在南京会谈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37年整整一年，直至1938—1939年的大部时间，人们都在致力于实施这些措施。

苏区改为“特别管理区”，以后简称“边区”，它有自治权，并为蒋介石所承认。边区在名义上如毛泽东所宣布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却仍然是一块同中国其他地方划定分界线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中之国。开始几个月，边区甚至禁止国民党人员进入，至于国民党军官那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一些民政机构，如邮局、办事所和户籍登记处等等诸如此类的单位，也完全在边区政府的监督之下。只是边区自己的货币不再流通了，不过这种情况早已



如此。

我说这是一块界线固定的领域，其实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分界线并没有确定下来，而且还常有变化。蒋介石把东北军的主力继续向东调动，把杨虎城（此人已经逃到国外）的十七路军部分队伍向北调动，随着这些调动，在一些没有驻军的县城就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真空。国民革命军（红军在短期内称作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开进了这些县城，建立了新的地方政权机构，把国民党的行政机关排挤掉了。这个过程开始或多或少是和平地进行的，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冲突，以后大约是在1939年夏，发展成了武装冲突。陕甘宁特区就是以这个方式大大地扩大了地盘，1939年底据说全部或部分地包括了二十三个县，这些县东濒黄河，北接长城，西至宁夏和甘肃之间南北走向的蜿蜒山脉，南以泾河为界。

让我们再回头谈一谈1937年初夏的事吧。临时革命政府或苏维埃中央政府解散了，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我本人不认识他，张国焘在1938年逃跑以前任副主席。为了实施“新的民主制度”，边区政府曾考虑建立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会，也就是一种议会的形式，但是直至我离开以前参议会也没有开过会，也许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只是到了1937—1938年冬天，一些城市和县镇才建立了“参议会”，然而这些“参议会”是否行使了自己的职能，以及它们是怎样行使职能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选举，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接触的只是早已熟识的领导同志以及军事学院和后勤部门的同事，那些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在边区行使职权的地方党和军队的干部，对我来说几乎都是

陌生的，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见过他们，但是分不清“谁是谁”，连边区党委第一书记高岗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毛泽东在党代会上提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以扫除文盲。

确实，在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经济上的逐渐变化。但是毛对于“有计划地建设”几乎是无所作为。一些逃跑的商人、其他有钱的居民，甚至还有些大地主，在他们惊魂稍定之后，也都纷纷回来了。同外界的贸易，也就是同国民党地区的贸易有了增长，但是进行的时间比较短，范围也很狭窄，因为边区缺乏进行交换的商品和货币。“进口货”大部分是纺织品、煤油、食盐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嗜好品，如茶、糖、米酒、烟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另一方面，随着党政军干部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日常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了。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已被日军占领或受到日军威胁的国民党地区逃出来，大批流入陕甘宁边区，没有别的办法可寻，只好依靠“自力更生”，广泛实行逐年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样做也是可能的，因为农民主要在富饶的山谷里种植豆类和蔬菜，而地势较高的缺水的贫瘠黄土平地和山坡地大部分尚未耕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等开始用锄头和铁锹开垦这些荒地，据我亲身体会，这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结出了硕果。我们种植和收获的主要有小米和高粱，同时在房前屋后还种了白菜、葱头，甚至还种了蕃茄，人们还从鄂尔多斯草原和内蒙古边界地区赶来了牲畜，有的得到了那里部落王爷的同意，有的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这样就在有限范围内暂时解决了人

们长期缺肉的困难。

走私的日本货，开始一律没收，至少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把日本货公开烧毁了，但不久人们就不这样干了，而是把这些货物分配给中央机关，即便它们在半合法的市场上出现，人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有看见。

我想说句公道话，在教育事业方面，人们确实作了很大努力。边区居民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部队里也有相当一大批人目不识丁，他们主要是在中国西北部入伍的，甚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战士。当时出版了印刷简陋的初学课本，里面附有简单的图画，虽然只包括几百个概念，但选用的都是农民和战士常用的词汇。这些课本不仅用来作为许多单位或军人的教材，也是新建学校孩子们的教科书。我自己也用这种课本学习汉语读写。此外，在这里还继续进行国民党语言学家已经开始的尝试，以鲁迅和其他现代作家在文学上所倡导的口语（白话）为依据，创立了一种拉丁文字体。但是由于中国语言结构和发音特殊，再则在陕甘宁边区全国各省来的人汇集在一起，各种方言互相影响，语言十分混乱，所以试验没有成功。人们又回过来用原来的文字，在延安日报或油印杂志及手抄墙报上用的是古老的部分简化了的象形字。另外，人们还用带有说明的画片作为补充教材，类似过去在我们那里很流行的街头画片或现在的“连环画”。

边区在文化方面也做了许多事情。部分依照红军的传统、部分依照当地居民的传统，人们成立并增加了许多宣传队、歌舞队、业余戏剧队等等，他们多半还保持着古典的演出形式，也有一部分戏剧、歌曲和诗歌充实了新的内容。深深地

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次新年联欢会，人们舞着龙灯列队游行，各个村子竞相表演。同时，在延安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现实主义作风，例如把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编成戏剧上演，巡回放映队在露天放映上海的和在中国其他电影公司的电影，以后又放映苏联影片，特别受人欢迎。

当然，这些在文化教育领域从1937年开始的、而且（我再重复一遍）总的来说很有成绩的努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努力本身并非纯粹是目的，它们成为一种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群众的手段。如果我说，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群众路线”的雏形，我想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吧。这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久以后颇为盛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强调，进而代替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样，我认为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是符合1937年和以后几年陕甘宁边区特定生活条件下的客观需要的，它对今天毛泽东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也起了决定作用。上述的“群众路线”和“自给自足”两项政策，就象其他许多实际措施一样，同党代会上宣布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毫无关系，依我看来，它们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毛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经验基础上确立政治战略和策略很重要的出发点。

毛泽东在党代会上提出的首条要求是，立即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它在各方面都成为全国国民党军队的榜样。在同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协商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按照他们的人员编制编成三个师，部队的组织形式与国民党军队的相似，每个师与过去不同，现在由两个旅组

成，每个旅按照战士的人数由两个至四个团组成。另外，后来在军司令部下设一个炮兵团，配有迫击炮和轻野战炮；在师和旅里设有执行特殊任务的独立团，大部分是骑兵，主要作为侦察部队、通讯部队和警卫部队使用，如果指挥部受到突然袭击，在紧急情况下也是指挥部的预备队。团以下各部基本上保持原来的三三制。在设置政治委员方面，我方不得不作出形式上的让步，蒋介石坚持取消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变化，政治委员成了政治部门和特别部门的领导人。由于任务扩大和分工细致——例如有我军中的、老百姓中的、敌军中的政治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友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反敌特、叛徒和破坏分子的斗争——这些政治部门的现有人员甚至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夏初，这三个师的实有兵力在八千和一万入之间，国民革命军的全部兵力，包括后勤部和司令部及其所属的警备部队在内，大概不超过三万到三万五千人。一直到年底，当部队已经调入山西的时候，根据延安官方统计人数总共增加到四万人，主要是从国民党士兵在头几次前线作战失败后补充进来的。

边区的守备部队是完全独立于军队的，它的指挥就是那个在1933年秋把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黎川城不战而弃，1934年底长征途中擅自离开了领导岗位的肖劲光（参见本书45—46页和122页），1937年守备部队的实有兵力总计有四千至五千人，共分五个团。1938—1939年同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时，从前线撤下三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人数增加到六千至八千人。直到我离开延安时，这个数字或多或少还保

持着未变。

边区守备部队经常得到被称为自卫军的地方民兵武装的支援。自卫军不是中央组织起来的，而只是在一些城市和县城劳动人民自愿建立起来的队伍，类似过去的自卫组织，他们时常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增援守备部队。据说自卫军在偏僻的边界地区多次参加过战斗，可是我自己从未看到它们有什么行动。

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逐渐转到对干部的训练上来，党校虽然扩大了，但是训练的重点不在党校，而在军事学院。这其中有一定的分工，参加党校学习的只是新老党员，他们大部分经过三至六个月的短期学习，然后分派到国民党地区后方，在那里根据情况从事合法工作或地下工作；反之，军事学院是为国民革命军培养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包括低级、中级和高级领导干部，以后又越来越多地为游击区和日军后方的地方行政区培养这方面人员。学生的学习期限为半年，他们分成所谓的大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系。由于他们在延安的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住房的紧张，人们只好把学院的一部分移到城外一座古老的寺院里。这是一所抗日大学，简称抗大，过了几年已经很有名望了。

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来，他成了抗大的保护人，象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外，还教政治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最重要的讲稿，以后当然经过修改编入了他的《选集》，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和其它等等。抗大名义上是由林彪领导，实际领导是罗瑞卿。

毛泽东所考虑的抗日战争的政治方针，在干部训练上已经有所表现了。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归根结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加强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控制全民族的解放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无论在国民党的后方还是在日军的后方都必须建立党和军队的根据地。这完全是旧口号的精神：“胜利不属于任何一方”，即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国民党。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一方针的影响还没有认识到，因而表示一致拥护，可能只有张国焘例外，对此我也说不具体。直到战争公开爆发后，人们才对这个方针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开始于1937年8月底的洛川“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

## 第五章

### 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

1937—1939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离北平不远的地方发动了芦沟桥（也称马可·波罗桥）事变。在一次演习中，他们以一种可笑的借口，首先拿下了大桥，接着，在炮兵加紧作了准备以后，袭击了大桥后面的宛平县城。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的自卫，但还是被打败了。

第二天，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党组织举行了许多集会，会议宣布，中央委员会已立即向蒋介石发出了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当天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以同样的精神号召全国同胞立即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中去，陕甘宁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流传了这个宣言。过了几天，我得知，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以全体官兵的名义，在一份署名的电报中，要求蒋介石立刻把他们派到前线去反击日本入侵者。

这一步骤收到了怎样的实际效果，由于我缺少较准确的情报，就无法判断了。我只是听说，芦沟桥挑衅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军队同中国军队在北平到天津之间的铁路沿线及永



定河沿岸对峙着，在第一次大的冲突之后，只是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地部的战斗。看来，日本人企图争取时间，以便调集增援部队，在表面上他们则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战斗区域就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进行谈判。看来宋哲元并不反对和平调解，尽管这种调解对两省意味着的“非军事化”，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从察哈尔和河北撤出中国军队，从而使日本侵略者能在华北腾出手来。当时在延安传说：蒋介石现在还在犹疑，是不是要把中央政府军投入到战斗中去，他没有决心同国民党领导层中的以及中央政府中的亲日反共派断绝关系，他力图依靠亲日反共派的努力求得妥协。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英国方面、特别是美国方面从中进行政治斡旋。

后来，收听到电台广播的中国朋友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在夏末秋初到达延安的）告诉我，蒋介石在7月7日，即在芦沟桥挑衅事件之后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发布之前，就已经表示，赞成拯救民族危亡的战争，宋哲元将军也同意把驻扎在从南方通北平和天津的两条铁路沿线的中央政府军调往前线。

然而整个七、八两个月，我在陕甘宁却很少觉察到有迅速出兵抗日的迹象。的确，没有蒋介石和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的同意，要独自进行一场新的“东征”，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军事措施只限于——我想说，这是理智的——完成改组军队、把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抗大派往部队，让更多的部队开赴陕西东北的黄河沿岸。

七月底，毛泽东发表了纲领性讲话，讲话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我以及大多数人对形势的十分模糊的看法。讲话的准确日期是1937年7月23日，虽然我是从各种不同的来源知道的，但说法却是一致的。这一天，抗大、党校和各中央院校，络绎不绝地列队来到延安城门前的抗大操场，每一个想参加大会的人都可以加入到队伍中去。然后，群众集会开始了，毛泽东讲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299—307页）。讲话一开始，他宣读了7月8日的通电。接着，他没有引用蒋介石7月7日的声明，而是引用了几段蒋介石7月17日在他的避暑胜地庐山发表的答记者问。这两个讲话都强调了一点，蒋介石不允许对日本的挑战有任何一点让步。据我的印象，这些引文在《选集》中正确地反映了出来。随后，毛尖锐地谴责了宋哲元，说他在日本人面前投降并同意就冲突一事向日军道歉，就是说承担了冲突的责任，同意把二十九军从芦沟桥及永定河以东的战区撤退；同意镇压中国北方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

但这种谴责，正如不久所证明的那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几天之后，日军在广阔的平津一线发起了进攻，北平城门前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有上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被俘和溃散，日本人占领了这两座大城市。如果人们从军事角度来判断，那末无疑的是，宋将军在日本人面前并没有投降，而是率领二十九军进行了战斗。这里有两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关于平津战役的消息在延安迟迟才给予公布；另一个是，毛在《选集》里没有再提到宋将军的名

字，只是笼统地指出有叛变、动摇、让步的可能性。

而毛泽东是以所谓宋哲元的投降和蒋介石的犹疑政策为依据，提出了他的关于一种政治方针和两套实际办法的论点。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无疑是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由政治局决定的，当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口号是：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对内改革国家机构，对外执行符合于抗日战争要求的政策——同苏联结成联盟，争取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同情。所有这些口号，无非是一再重复说明：只有积极地、主动地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

毛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涉及应采取的军事战略，然而他强调指出了游击战所具有的伟大战略意义；同时他也承认，这种行动必须同正规部队的作战相配合。我之所以提起此点，是因为毛在这里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公开宣布，他认为他在抗大讲课时所阐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在抗日战争中也同样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他没有在此后不久完全抛弃自己所说的同前线部队合作的条件，并进行一场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特殊的两条战线战争，同时立即把重点越来越转移到第二条战线，那本来是没有可反对的。其实，毛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这个方针，这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得出来，毛在讲话中谴责蒋介石没有从自己当时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引出实际的结论，一直容忍自己政府中的投降派和卖国贼，准备进行一场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有限防御战争。毛还指出，这样一种态度只会导致失败，使中国完全受奴役。

不容否认，上述种种谴责部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个

实际上的战争宣言，尽管披着警告和规劝的外衣，然而不正是表示要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破坏国民党的威信，以便进一步求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霸权。这篇讲话不会有有益于统一战线的加强，反而会使可能联盟的双方加深了潜在的怀疑，尤其是讲话的基本思想作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宣言在全国已经传播开了。

---

日本军队在1937年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和张家口以后，八月，他们沿着通往南京和武汉的铁路线迅速向南推进，这时进攻的重点首先在右侧，其直接目的是占领太原。同时，在北面日军的一个军团正向铁路枢纽城市大同进犯，以便从那里继续向绥远省省会包头<sup>①</sup>、即当时东西铁路线的终点逼进。这种战略目的是很容易识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占领华北的河北、山西、山东各省，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攻占了察哈尔、绥远，甚至占领了人口稠密、发展迅速的内蒙古东部，那末他们就为实现庞大的征服计划拥有了面积广大、战略上极为有利的后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征服计划，是在创建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下或多或少公开宣扬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难从我们在延安得到的消息中分析出来，或是从中引出结论。眼前的问题是，日本人今后企图实现的是哪一种“大东亚”，是北方的“大东亚”，还是南方的“大东亚”。根据反共产国际条约推断，日本人可能是要实现北方的

---

<sup>①</sup> 原文如此。——编者

“大东亚”，就是要征服苏联的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使东西伯利亚脱离苏联。特别是所谓的关东军，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此时正驻扎在满洲，而没有侵犯中国，它一年年更加强大，据我的经验来看，从三十年代初，它已经为一场进攻战作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准备。实现南方的“大东亚”，也就是说，除了偏僻的难以到达的西部省份外，征服整个中国，其目的在于以后向印度支那以及太平洋地区进军，1937年时这种可能性看来也不小，因此同样必须加以注意。从八月起，日本人为了占领上海，不断准备了强大的海、陆、空武装力量，并且用自己的战舰实际封锁了直至南方的中国所有港口。当然，日本人也抱有另一种企图（无疑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从海岸线沿长江而上，向中国的核心、向南京和武汉推进，并阻止美国、法国、英国由水路给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等一切可能的援助，或者至少把这种援助限制到最低的限度。

我从日本人直接的和可以预料到的军事行动来谈及他们的两种战略目标，似乎很不可思议，因为上述目标还十分遥远，才具有一个模糊的轮廓。然而事实上，正如博古多次对我说的那样，当时在南京和延安人们都在谈论此事，他在南京和延安都曾参与过此类谈话。蒋介石可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他的领导下，尽快地稳定国内战线，进而千方百计地去动员来自各方面的外援，不仅来自苏联的，而且也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外援。毛泽东却相反，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只有经过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应该读作在毛的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日本。他的目标是政

治上分裂国民党，军事上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展望未来，他并不排除苏日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估计到，假如日本人在战略上选择了南方，那末国民党也就势必会更加削弱了。

八月下半月，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把以前的陕甘宁红军作为第八路军编入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已按照 1926—1927 年北伐战争的传统，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被派往山西省长阎锡山指挥的山西第二战区，朱德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令，因为朱德绝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所以实际上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着全军。林彪指挥第一一五师，这个师主要由包括十五军团在内的前红一方面军组成，贺龙指挥一二〇师（前红二方面军），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红四方面军的残部和一些独立部队）。九月初，朱、彭发表了一项向蒋介石保证他们真诚的声明之后，八路军开赴山西，陕甘宁只剩下了留守部队，由肖劲光领导。

过了不久，大约十月中旬，南京国民军事委员会批准长江以南、主要是前中央苏区的共产党的部队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指挥。新四军被派往华东第三战区，据我所知，这支部队直到 1938 年初，当日本军队开始从上海和南京出发，向长江以南推进时，才同日本军队交锋。虽然项英不同于毛泽东，他真诚地遵守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但新四军同在反动军官指挥下的国民党地方军之间从一开始就有磨擦，到 1937 年底新四军的一个部队竟被缴了械。1941 年冬终于发生了突然事变，在这场事变中项英牺牲，叶挺被俘。（参看本书第 116 页）

八月下半月，苏联政府同南京中央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

条约，并决定向它提供物资与技术援助。这对于世界这个地区的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条约在道义上增强了一切中国爱国者的反抗精神，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确保了我国北部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后方，条约还包括随时准备直接出兵支援中国军队的条款。在乌鲁木齐、哈密和兰州相继建立了基地，飞机把物资运到陕西和四川，再从那里继续运往前线。后来，穿过新疆的旧商道修复，运输也使用载重汽车了。据说，苏联派来了上百个飞行员和上千个汽车司机，有人甚至说可能派来了苏联战斗飞行员和军事顾问。苏联还以自己的远东军牵制住日本的关东军，为中国的军队提供了不可低估的、间接的军事援助。根据我们的情报，关东军当时已有二十到三十个师，足足有五十万人。

在延安，在公开场合下是欢迎苏中条约的，但在内部对条约却持有某种保留态度，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条约符合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他的意图是希望苏日发生冲突，把苏联卷到中日战争中来，这势必对华北八路军的处境极为有利。这时，苏日的冲突已有迹象，并且很快日益增多。众所周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1938年以关东军一部进攻朝鲜边界线上的张鼓峰高地时，在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的哈桑湖挑起了同远东军的冲突。但是经过十天奋战之后，日本军被打得头破血流，望风披靡。1939年日本军又一次企图在诺蒙坎试探蒙古和苏联部队的实力，蒙、苏部队经过数月之久的苦战，在一次大战中使日军伤亡上万人之多。但是，关东军的几次失败，并没有最终使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向南部

海面。毛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虽然他也预计到了这种发展。当然 1945 年苏联—蒙古部队进攻满洲国以及关东军的投降，极大地弥补了毛的这种失望。

另一方面，毛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顺便提一下，这样一来，我能读到《真理报》了，虽然报纸来得很不齐全，而且也不按时。毛泽东根本不愿意以此来加强中央政府的战斗力，他宁愿看到政府的战斗力日益削弱下去。他故意视而不见，国民党军队尽管战事不利，而且屡遭惨重失败，但至少开始一年半的时间里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对它的援助岂不就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援助？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顾问越多，失败越大”。另外还暗示说，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德国法西斯的顾问坐镇南京。我已经不大记得，是从谁那里听到这些话的，但显然完全是毛的口气。

至于说到西方帝国主义，日本人对中国的快速进攻，也越来越严重地危及到他们原有的势力范围和市场。法国一开始就在背后观望，美国和英国虽则答应支持蒋介石，但后来多少有些裹足不前。这三个国家提供的物资和技术援助都相当少，尽管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香港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英国虽然修筑了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公路，但从 1939 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公路被关闭了，为的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和睦相处。起初，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取得一致的



意见，后来由于没有成功，又由于八路军的地盘越来越大，于是就改变了政策，转而促使国民党同日本在反共的旗号下彼此和解。

我概括地、扼要地叙述了这些事，而且把一些后来发生的事情部分地提前叙述了，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此有一个总的认识，知道当时我和在延安的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援助的。尽管我通过阅读《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及西方的印刷品，对这件事我比别人稍稍清楚些，但这方面的消息实在少得可怜。总的来说，我无法排除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暧昧态度无动于衷，但对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却十分轻视。即使偶尔也发表官方声明，表示赞同苏联及其政策，但上述态度并没有得到改变。只是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援多少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毛泽东一开始就着意贬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行动，或者保持沉默。这一点，我可以借助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来说明。1937年9月或10月，延安军事杂志的编辑来找我，建议我根据后方司令部发给小范围人看的形势报告，每月写一份军事事件概况，我同意了。几天之后，我把第一篇稿子交给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我客观地叙述了当时的形势。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他又来了，向我表示道歉，有点为难地说，文章不能发表了，计划中的这组文章也被禁止。我问：被谁禁止了？他犹疑了一下才回答说：毛主席。

我认为，禁止文章的发表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已经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长文章，当然没有署名，文章未费周折就发表

了，甚至还受到了称赞。1937—1939年冬，我又受司令部的委托，写了几篇论反对现代武器——坦克、飞机、大炮等在不同斗争中的策略的文章，这些文章通通发表了，并署了译者的名字。只有一次，由于疏忽把李德称为作者了，我得到了读者的几句称赞，但编辑却受到了指责。

其实，根本无需叙述这一段小事，就能弄清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国民革命军的看法了。八月底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八路军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使人颇受启示。我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所以只能根据有关的报告、私人谈话、党的会议和年底（大约是十一月）举行的延安活动分子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作些叙述。

扩大会议召开以前，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文件加上了形势分析的导言和结束语，以后在洛川会议上形成了决议。虽然文章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批准的，但却异乎寻常地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309—315页），标题是《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把抗日斗争放在首位，要求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充分信任协作的基础上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据我判断，这个纲领在党内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同时，在有关的发言中也出现了国民党领导的谴责，说国民党领导再度迎合了日本人，向日本人表白要扼杀抗日群众运动，只进行正规的或单方面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发言者一再要求国民党，完全彻底地改变它的总政策，清洗政府机关，允许和促进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把政府之间的战争变成

人民战争。这些发言内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听起来却是很有说服力的。

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指示，这种谴责和要求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虽然我从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内部指示，但博古大体上向我讲述了它的内容。据他自己讲，他是这个指示的起草人之一。根据这个内部指示，全中国所有的共产党员要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积极行动起来，加入现有的组织，或者建立新的组织，并且要力求在国民党机关和军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以便把它们逐渐改造过来。指示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对国民党以及对其他政党和团体的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停止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为此应利用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同时也应加强和巩固各地的地下工作。

完全代表了毛路线的博古，还对我说，在洛川会议上，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论战。象以前一样，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的、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共产党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毛认为，最后问题在于，谁能立于不败之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张国焘则相反，他认为，虽然国民党的右翼有分裂的可能，但它的核心仍然没有受到触动。战争使国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提高了，而且很有可能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共产

党每一次任意的行动，都是对国民党的挑战，从而有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这对中国人民将是一场灾难。大敌当前，必须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准则。

洛甫最后提出了妥协的意见，他说，国民党方面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只要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抗日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是肯定的。这个意见被接受了。当然并没有消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反对意见。

关于八路军的组织和战略问题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朱德得到周恩来和其他人的支持，主张八路军形式上加入国民革命军，但同时强调，不要为人同化。其次，他还谈到，在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也就是服从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将军。鉴于我们的供应情况很差，这样做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好处，就是说，八路军可以从南京政府那里得到军饷和装备。毛泽东却相反，他坚持八路军要在组织上和战略上完全自主，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国民党正面临着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

因此，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一直没有澄清。朱德、彭德怀主张，根据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与国民党部队进行真正的合作。同时两人都拒绝让八路军进行任何阵地战，而是同意进行如彭所说的那种运动战和游击战相配合的战争。毛泽东认为，在数量上和武器技术上都不如国民党的八路军，没有希望在前线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并且认为，不可能发动起广泛的人民战争。他要求，八路军的行动不要限制在指定的第二战区，就是说，不要限制在山西，而是要到日本占领者的后方去，在那里完全自主地进行纯粹的游击战，在山区建立自己的

根据地，动员群众，通过建立新的部队不断扩大八路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以一种妥协的办法取得了一致，即八路军先在山西同国民党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并肩作战，当前线坚守不住，日本人不断推进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分散到整个华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展军事行动。

因此，正如博古向我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洛川会议上，尽管有种种妥协的办法掩护，但是毛泽东的意图还是得到了贯彻。然而几十年之后，朱德和彭德怀却受到毛的“红卫兵”的恶意诽谤，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所持的态度。而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恩来，自然没有遭到这样的诽谤。

博古在这次同我谈话以及以后的几次谈话中都认为，毛泽东在洛川所贯彻的战略和策略，同南京的指示是一致的，在下级党组织中也是这样议论的。由于缺少其他不同的消息，所以直到最近我还一直认为，南京方面指定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华北地区为八路军的作战区，以便八路军在华北扰乱敌人的后方交通线，使之难于补充军队和提供给养，从而削弱敌人在正规前线的主力。我当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揣测：蒋介石也有可能包藏着祸心，妄图在这场战争中消灭八路军（参看国际政治与经济社会主义周报《地平线》1969年第36期）。研究了有关材料之后，今天看来我上述评论的第一部分其根据是错误的。决定八路军作战区在日本占领者后方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毛以此对抗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至于说国民党领导层中的反动亲日派企图破坏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洛川会议的决议和以后的实践，却从我们这方面（虽然不

是立即)给破坏了,这种说法看来是正确的。另外文中紧接着对毛的意图的评价也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毛在三十年代末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是在抗大的讲课中,一再重复说明和补充了他的上述意图。

在上边提到的《地平线》杂志中我还写道:“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这一断言出发,发展了他把游击战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旧观点。肩负这场斗争重担的是农民阶级,斗争的阵地在农村。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在那些敌人能够控制的较大市镇和重要交通线的大后方,建立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毛认为,这就是军队的任务,因此,不应再把军队集中于重大的战争行动上,而应相反地把军队分散开来,分成若干小部队,这些小部队应独自占领一切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建立政权,进行管理,既要防御占领者的进攻,也要防御‘国民党反动派的措施’。这里已经明显地出现一种冒险的倾向,即在抗日战争中采取观望态度,并把抗日根据地变成反对国民党的根据地。毛还要求人们利用国民党在主要前线的失败,在完全独立的而不是协同作战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地区和部队。毛相信,国民党军队越是遭到惨重失败,日本人就越是进一步地侵入中国内地,日本军队的后方就会越扩大。”

我在《地平线》上写的这些话,现在无需收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保障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和自主这个原则。对这一点,也许除了张国焘之外,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里涉及的倒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这两方面的战略,这种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国民党更甚于反对

日本侵略者的倾向更为明显了。至于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抗大的领导干部公开说出来了：首先以假妥协来迷惑国民党，然后把它从华北赶出去，当共产党和军队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最后再把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夺过来，并在全国夺取政权！

毛泽东的难于识破的政策，开始对外是有意掩盖着的，它之所以易于掩盖是因为在洛川大家只是小心谨慎地对这种政策提出异议（张国焘又除外），并用妥协的方式加以掩盖了。九月底，中央委员会在延安发表的声明重申了自己过去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承认，并再度保证停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武装斗争，放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放弃苏维埃制度，使八路军隶属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政权。这项声明是应蒋介石的要求发表的，但以后的事实很快证明，它丝毫未能改变毛泽东的路线。

---

对日作战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军队未能阻挡侵略者的进攻，节节败退。九月底，太原失守；十月中旬，上海陷落；十二月中旬，南京沦陷。1937年底，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国民党军队有三十万人死亡、受伤和被俘，其中被俘人的数字相当小，可见，尽管国民党军队和将军非常软弱，但国民党士兵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接着中央政府迁到武汉。

八路军在北部渡过黄河，并且在黄河东岸，即山西省的西北端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桥头堡，这是八路军在陕甘宁地区以外建立的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其战斗行动同国民党军也是一

致的。他们依靠已经在部分撤退的山西军队的左翼，在大同和太原之间向晋东推进，竟深入到正在全线快速向南进军的日本人的侧翼和背后。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有一条通向太原的公路，这条公路要经过一个一千八百米高的山口，这就是平型关。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林彪指挥的第一一五师在这里袭击了正在行进中的日军一个旅。当这个旅正在公路所穿过的一个山谷而无法展开兵力时，八路军全歼了敌军，缴获了全部战争物资。据说，有三千日本官兵在战场上死伤。林彪自己证实说，在他向延安询问而得不到答复、事实等于拒绝时，他于是决定向日军发动进攻。

在取得平型关胜利以后，直到年底，在山西省东北部的忻州、宁武以及广灵、涞源和其他位于河北、山西交界地带的一些县城所进行的一系列小型战斗，也都获得了胜利。在一次战斗中，大概就是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受了伤。1937年底或1938年初，林彪回到了延安，之后前往苏联治伤，接着在那里学习了总参谋部教程。

八路军的这些战绩，使它在国民党部队中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从而也赢得了战区老百姓的信任，这对于创建根据地和扩充兵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延安特别为平型关大捷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还编写了各种诗歌，由歌舞队来表演，常常还由走村串巷的民间艺人来演唱。各级党组织都举行了集会，干部学校，特别是抗大还就此内容讲了课。平型关一时成了流行的口号，成了毛游击战学说正确性的例证，同时也成了蒋介石“消极防御战略”的宣判书。这样，我再重复一遍，毛泽东就把由于反对他的意见而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对他立场的证



实，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

其实，至少在华北的一些取得胜利的战役中，国民党部队也是协同作战的，但这一点却完全没有被提到。在延安，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总是在狼狈撤退，完全处于瓦解状态。这可能部分是确切的，蒋介石很晚才把他的精锐师团派到华北，而且是很有节制的。各省的军队抵御不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及省军队，但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却遥遥领先。此外，还有一些将领的无能和腐败，他们之间的嫉妒和争夺，以及长年的经济混乱，致使许多军饷不足的士兵去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所有这些都导致军队某种程度上的道德败坏，导致军事领导者的动摇不决的态度，这些人当中的个别人，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公开叛变，逃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建立了主要用来对付八路军的中国傀儡军。

此类叛变事例，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还只是个别现象，自1938年起才大大增加。毛泽东从一开始起就不断指出，因为这些事例为他的论点提供了理由，他认为八路军同驻扎在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同力合作越来越走向对立。

我以为，中国方面，特别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在人力、物力和地盘上受到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日本军队战斗力之间的明显差别，日军充分发挥了突然袭击的特点，进攻的战略，无与伦比的技术和战术，尤其是旺盛的士气等。面对这样的敌人，中国国民革命军又怎样呢？撇开我已经提到的省一级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不谈，还有国民党政治首脑的意见不一，军队组织建设和军事指导的仓促行动，只限于在阵地战中进行战略和策略的防御。这对于一支

要同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外敌进行一场大战而自己又准备不足的部队，自然是有影响的。因此，日本人甚至在蒋介石派遣了精锐师团，可以凭借有利后方为基地的江苏和浙江沿海省份，几个月之内就突破了战线，很快打开了通向中国心脏的道路。

我在观察了1937年底总的军事形势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在延安流行的说法，认为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及其在日本后方赢得的其他战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些战绩肯定提高了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烟消云散了。同样可以肯定，日本人当时被迫对已占领的城市，首先是对铁路和公路加强固守、驻防和巡逻。为此，日本人不得不投入在前线作战的部分军队。日军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投入的兵力不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影响进军的速度，有时最多拖延数周，也是由于前线的抵抗所致。直到1938—1939年，当八路军在黄河以北扩大了根据地的时候，八路军的行动才开始对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力的影响。

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在延安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后果。九月以后，日本空军开始骚扰这个城市，先是侦察机，接着是轰炸机，几乎天天如此，有时在一天之内轰炸几次，轰炸过后留下来的是倒塌的房屋和布满了弹坑的街道。一年之后，整个延安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只有城墙还残存着。

大家都逐渐搬到偏僻的地方去了，大多数人搬进了窑洞，搬进农民的旧住宅，或者新地道。开始有上百人，后来有上千人在延安城四周黄土山上挖掘这种地道。有一段地道竟有一百多米长，穿过了两个峡谷之间的一道山梁，老百姓把这条地

道扩建为一条街市，商人在那里出售商品，卖小吃的人出售食物。

毛泽东住进了延安城边的一间很宽敞的窑洞，这个窑洞同其他的不同，是长方形的，座落在山脚下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完全可以抵御飞机的轰炸。他以前住过的房子，长期保留了下来，他有时用来开会和谈话。

我和马海德分到了一个农院，离毛那里有五分钟的路程，位于城门前的半山腰上。这个农院有五个窑洞，门前有一个平坦的场院。这家农民占用了两间，第三间住着警卫员和马夫，我住第四间，马海德住第五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也习惯了。

延安被炸毁以后，日本人还继续空袭这个城市达一年之久。他们在延安远近郊区寻找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飞机在丘陵上空低空飞行或俯冲轰炸，常常是轮番数次。我在延安期间，即使在阵地上有了几部高射机枪之后，也没有见到一架敌机被击落，但轰炸的影响不大，生活在继续着，甚至一天比一天更活跃。

---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离延安几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军用机场，1937—1938年间先后有两架苏联飞机在这个机场降落。这两架飞机除了运来印刷品、药品和医疗器械之外，还有高效能发报机和一些高射机枪。更重要的是，乘坐第一架飞机回来的（我记得这架飞机是十月底到达的）有一直在莫斯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为首的是王明（陈绍禹）陈云

(廖陈云)和康生(赵容)。一百多干部在机场欢迎他们，我也在场，但为人群所淹没。我记得好象没有人发表谈话。

当晚，在小范围内举行了欢迎仪式，我没有接到邀请。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 1935 年 8 月 1 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洛甫特别提到王明在克服 1931 年李立三路线时的作用，和他多年来在共产国际中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他还称赞了陈云，因为陈在遵义会议以后模范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另外，还称赞了康生对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所作的贡献。最后一点纯粹是一种讽刺，因为中央委员会所有人都知道，由康生建立和领导的保卫部完全失去了作用，以致 1934 年无数领导干部被逮捕，电台被破获，为此中央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了很长时间。

王明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又是共产国际的发言人，据说他可能强调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但同时也指出了加强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并主张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和自主的情况下，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加强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真诚紧密的合作。

至于这次欢迎会上的讲话(如果我转述是正确的话)，只是一种在国内流行的客套，还是具有什么深远的含意，这对于我这个没有参加欢迎会的人来说，就很难判断了。面面俱到的赞美之词很象是空洞的客套，然而，王明的讲话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首先，对一个不知内幕的观察家来说，好象一切都是正常的，至于幕后的活动，那是不会传入公众耳中的。我当时以为，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会准确地真正地得到贯彻，被毛泽东成

功地战胜、分裂和多少被争取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将重新团结一致，并将起到决定的作用。

使我吃惊的是，毛在十一月中旬，即紧接着上海失守之后所举行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参加的负责干部这类会议中最后的一个会。我没有坐在前排的长凳上，马海德在我旁边，我们两人都没有翻译。前不久，我有一个译员，他在抗大为我翻译，然而在月初被日本炸弹炸死了。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抗大在延安的另一边，一天，我们从抗大向我住的窑洞走去，当我们上坡时，突然从山后咆哮着冲出一架轰炸机，我们拼命地跑，想赶快躲进窑洞去，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院子时，炸弹已经在我身后炸响了。后来我们看到，大约在五十米以外的斜坡上炸开了一个大坑。炸弹很可能正好击中我的翻译，把他炸得粉碎，事后我们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痕迹。

这样一来，我听毛的讲话就比以往更困难了。马海德当时的中文比我好些，但他的解释也不能给我多少帮助。会议之后，我让人给我讲了具体细节。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毛仍然坚持或者说仍然继续推行他在以往的会议上、特别是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主张的旧路线。他甚至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攻击，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扩大到那些所谓在国民党的影响下成了国民党“精神俘虏”的共产党员身上，因为他们认真地对待了同国民党合作。在我读了登在《选集》（《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347—360页）中的毛的文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之后，我更证实了自己的印象。

虽然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也承认，国民党所进行的“部分抵抗”或“片面抗战”是民族的战争，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战

争，然而，紧接着他又收回了自己的论点，或者把上述论点加以局限，他说，这种片面抗战，象太原和上海的失陷所证明的那样，已经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而且无疑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必须有一个愿意而且能够根据十大纲领进行一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政府和军队，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同时，毛在一切公开场合下，一再强调坚持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权。他还说，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将决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谈到这个问题时，毛还描绘了部分投降或全部投降的可怕情景，他是从双重政治意义上来讲述这种投降概念的。一方面他讲了党内的“右倾投降分子”，他说，这些人放弃阶级立场，他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使自己迎合动摇的资产阶级。这里毛提到了八路军中“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他的所谓“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指的是共产党军队领导人同国民党的军事机构和非军事当局的合作。他认为，这同党领导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他号召为反对民族投降的“严重危机”而斗争。这些投降人物，主要是反动买办和大地主，还有越来越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消极动摇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上层。毛认为，人们必须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并利用统一战线，动员工人、农民和城市小市民起来反对他们。

人们经过冷静地判断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在内部确定了两个主攻方向：反对国民党中如他所称的右派和中间力量，反对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翼。无耻的是，他诽谤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可能成为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上的同谋者，并要人们必须在

党和军队的一切工作中反对这种投降主义。鉴于这一情况，我觉得，毛泽东接着说什么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致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煽动。后来我有机会问博古，怎样调和这些矛盾。他向我提起了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8月12日的命令，以及我所不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后来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工作的决议。

博古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中、在中央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中，自抗战开始以后，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反动派和反共亲日分子没有被消除，民主改革未能实现，广大群众未被动员起来。因此，共产党不能在上层和中层参政，而必须同掌权人物明显地划清界线。否则，共产党自己在群众眼里就会窘态毕露，而且不自觉地支持了国民党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党影响的企图。而下层即地方和地区那一层，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群众的压力很大，以致出于对地方的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一定的时间内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是可以取得成果的。当然，这里涉及的只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和日本人的临近前线的后方。在自己的根据地，即在以前的苏区或日本人的大后方，在这些地方我们大权在握，也就没有人想到要分掌权力。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区，党必须通过统一战线这个桥梁，渗入各行政机关、各团体以及各级国民党组织本身，其目的是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以后夺取政权打下基础。为了保护下面的活动，共产党要在上层，就是说在中央政府以及在华中、华南的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党的正式代表团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络处，当然不能因过早的或考虑不成熟的行动，而

威胁到这些单位的合法存在。

博古认为，对毛泽东的言论应当这样来理解，只要战争进程还没有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那就要不动声色。直到力量对比有了变化，更高级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到那时，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

博古的解释对我很有启发。我从中得知，毛泽东顽固地坚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旧路线：既反对日本，又反对国民党。从毛的讲话中我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引起我深思的是，博古在阐述了毛的政治策略之后，提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这里看来预示着博古、也许还有中央委员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转而采取一条新的路线。这是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吗？毛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他的讲话中激烈地攻击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同时以老子般的口吻训斥那些由于他们的行动而破坏了统一战线的人？

没过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揭晓了，但这个答案不是博古给我的，他只是证实了一部分我从其他来源得知的、一部分由我推测的情况，即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简单地称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认为巩固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必须坚决以此为准绳，党的领导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应该是，在不反对毛的领导的情况下影响他，以避免宗派主义的错误，如不合时宜地提出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和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

在抗大有人对我说，王明激烈地批评了毛在活动分子会



议上的讲话，说他不应该因抗日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责备国民党，而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强老百姓和军人的斗志；不应该用划分左、中、右的办法来分裂统一战线，而必须把除了亲日变节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外的一切力量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现在提出领导权问题和政权问题是错误的；一切均应服从抗日斗争；必要的内部的和军事的改革不应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强迫实行，而应该力图通过在长期战争过程中的耐心教育和本身的示范来实现；在这当中人们应该以现存的，也就是说以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为出发点。

这一转述肯定是不详细、不全面的，就象俄罗斯谚语所说的“现买现卖”。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一转述是正确的，它同我听到的关于王明到达后在欢迎会上他所持的态度以及我从博古那里听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根据他们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两个与其说是不同的、不如说是对立的纲领，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和毛泽东。

1937年12月，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延安开会。关于这次会，我又是通过间接渠道得到了一些消息。几乎所有被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当中有王明、陈云、康生和项英，项英是从江西来的，可惜我没有见到他。王稼祥缺席，他年初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代表到莫斯科去了。至于1935年12月补选上来的彭德怀和张浩，据我所知，政治局开会时，他们正在八路军司令部。局外人都没参加这个开了几天的会议，整个会议是极其保密的。

在关闭着的大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隐蔽的，但是，会议

的政治结果通过党内消息、大量的文章和南京陷落后所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公开了。宣言向全国一切爱国人士发出号召，号召他们“巩固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这样就定下了基调。

宣言具体指出，尽管战争初期遭受不可避免的损失和失败，然而蒋介石领导下的英勇抵抗显示了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全民族的统一和强大，因而也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表面上还声称：国共两党的目标基本一致，共产党决心同国民党亲密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现在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严重阶段。主要危险与其说是严重的军事形势，不如说是日本日益增长的“以华制华”的企图。因此，必须彻底清除敌探、汉奸和托匪。接着，宣言列举了具体任务，如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和资源，巩固和充实“联合国民革命军”，在“统一指挥下”，根据“统一的作战计划”，布署“统一国民革命军”，充实和加强“统一的国民政府”，改造战时经济，建立巩固的后方，扩大对国际的宣传和外交活动。

军事上，宣言强调把重点放到巩固江防，保卫新首府武汉，开展日军后方的游击战争，以便争取时间，直至最终达到力量优势。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军事任务的分配。不过，同我的错误估计相反，这种分配本来是由毛泽东单方面实行的，现在好歹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了。

毛的其他一些思想，例如关于危机和与此相联系的过渡阶段等说法，在宣言中也有所表现。但除此之外，宣言同毛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是完全对立的。王明的一切均应服从

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提法，虽然当时被毛不点名地冠之以“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中也通过了。而毛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也表示了同意。

王明、洛甫、博古、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党的机关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新的路线得到了解释和补充，甚至在答记者问时，毛也公开表示赞同这条路线，虽然不是没有保留的，并阐明了他对严重的军事形势的态度。

根据党内的消息，政治局就未来党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陈云和康生被选入常务委员会，王明、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周恩来仍然是常委会委员。至于朱德和张国焘，根据西方的消息，他们也应该是常委，但我对此一无所知。

中央批准在陕甘宁地区以外成立三个局，其主要任务是：在全国恢复原有的党组织并建立新的党组织。此外，每个局还有它的特殊任务。

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其任务是在八路军活动地区，也就是在日军的后方动员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扩大现有的根据地，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如减租减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民主”政权机构。

东南局由项英领导，它的任务是依靠新四军，经常指导新四军的活动并组织动员东南各省的群众。

最后是华中局，它设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即当时的武汉市内，在国民党的领导和中央政府中代表共产党。同时，这个局不仅在华中，而且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着建党的各种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此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由于它的地

位重要，所以政治局及其常委有三个委员在这个局工作，他们是王明、博古和周恩来。当然他们之中总有一两个不在当地，他们轮流检查和指导全国的、特别是南方的工作，或者到延安参加会议和协商问题。特别是周恩来更是常常外出。

我们把华中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暗中，他加紧进行活动，以便使他旧的错误路线现在就能在事实上得到实现，并且到一定时候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或者在一次政治局计划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给予通过。在给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和八路军前线司令部的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指示中，毛俨然以公认的党的领袖和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确定了用分散占领、政治动员与实际掌权的办法来填补日本后方的军事真空地带的方针。他在八路军那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朱德作为总司令签署了指示，大批指挥员，首先是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都无疑是忠实于毛的。至于杨尚昆和彭德怀，我听说，他们开始时对毛的“宿命论的战争前景”有过怨言，但在这时并没有听说他们提出任何指责。这样，如果中央委员会中产生新的分歧，毛就有八路军和新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为他撑腰。

在中央委员会本身，他也是有所准备的。他的老朋友，如董必武（不久毛把他派往华中局）和其他人都坚定地站在他的

一边。对陈云和康生的支持，毛更是成竹在胸。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陈云担任组织部长，一度还兼任民运委员会领导，负责领导工会、妇女和青年运动；康生则占据了保卫部的要职。保卫部这个名称经常更换，有时叫“政治保卫部”，以后又称“社会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职权范围从陕甘宁扩展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和两军无数的联络站，以及国民党地区的党的办事处。至于洛甫，他原有的影响已大大减少，看来是被排除在新的领导集团之外了。不过，详细情况我就知道了。

同样，对高岗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和地方政府其他领导干部的态度，我知道的也很少。在这里，毛主要是依靠守备部队司令员、他党内的老同伙肖劲光。张国焘只是在形式上还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主席，他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冲突，显然是无法调和的。

我对“第二政治局”和新四军的情况也不清楚。看来博古和周恩来摇摆于毛、王之间，而项英则忠实地赞成王明在中央委员会所贯彻的政策。1937年年底和1938年年初，德国方面企图在中国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进行调解的消息传出以后，又出现了由毛一伙制造的对蒋介石抗战决心的怀疑，怀疑他是否能毫不妥协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胜利，然而怀疑很快就被排除了。支离破碎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又巩固了，王明的政治地位也加强了。不只博古和周恩来，而且毛泽东本人及其追随者，在1938年3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又站到了1937年12月决议的基础上。

但是，毛仍然继续准备修正这些决议。要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贯彻，就需要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开始努力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一个翻译小组陆续译成中文，译文的选择和顺序是博古按毛的愿望圈定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负责主要翻译工作，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我想他姓吴，可能是毛在陕甘宁的秘书吴亮平。虽然他在延安属于我比较熟悉的人之列，但我不能肯定说是他。

1937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我看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尤其是在多年之后，才读到这两篇著作在《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发表的最后定稿的全文。比我更内行的人都指出，毛在著作中所阐述的完全是庸俗的唯物主义。

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理论写作和普及他的革命战争战略的观点，并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广泛地运用于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他在抗大也同样讲授过这篇著作的主题。我当时不知道他举办了《论持久战》讲座，根据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07页），毛是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中举办讲座的。我猜想参加讲座的都是经过挑选的高级军事政治领导人。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战略问题》这篇著作，象其他著作一样，过了很久才出版。我自己是在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出俄文第一版时，才阅读了这两篇文章的全文。如果我的猜想是对的，那末这个我不知道的、不祥的协会，很可能就是毛所纠集的宗派集团的核心，其目的是孤立王明，从长

远来看，是破坏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

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以后不久，他在1938年11月中央六中全会作了总结讲话，这篇讲话后来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了他的《选集》。就是在这篇经过编辑加工的文章中，毛也一再提到中国的特殊性，由此推论出特有的规律性，并炮制了至今没有改变的流行警句，如：“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sup>①</sup>，“枪杆子里面出政权”<sup>②</sup>。这样的例子还可以随便举出很多。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允许我不拘礼节但确切表达的话，那就是借口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实际上是把毛的“思想”冒混于其中。

---

1938年4月初，一天上午我被叫到毛泽东的窑洞。这不仅就时间而且就邀请的紧迫性而言，都是不寻常的。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毛正坐在办公桌旁，桌子前站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同志，猜想是保卫部门的人，还有三四个抗大的领导干部，罗瑞卿站在最前面。我没注意，不知道政治局或常委委员是否在场。一个通讯员进进出出，带来消息，接受指示。我们在一边空闲无事，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毛向我们说：张国焘带着一部分追随者从延安逃到西安去了，在那里投奔了国民党，

---

① 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7页。

② 同上第511页。

并在国民党的协助下转至武汉，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毛说，有迹象表明，张还策动前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效法他的榜样。因此，必须估计到最坏的情况，估计到甚至可能出现叛乱。现在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我们的任务是，不要使抗大发生骚乱，对张国焘叛变一事，除非有人问起，否则什么都不要说。

看来我们可以走了，但毛又把我们留下，他好象还在等待别的消息，我们只好又长久地站在一边。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毛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信任的。我对他所说内容的正确性并无丝毫怀疑，他的表情清楚地流露了他的忧虑和不安。

毛终于让我们走了，我们向抗大走去，半路上我们看到警卫部队的一些单位正处于戒备状态。抗大一切都很宁静，我操着蹩脚的汉语同一些人谈话，大家毫无所知。接着，我在罗瑞卿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同样也显得比较为难。后来我回家了，以后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也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骚乱。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所在的后方司令部的基层组织，公布了开除张国焘出党的决议。洛甫的妻子是党支部书记（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她拿着一份油印材料，显然是一种报告材料，宣读了张国焘的种种罪行，列举了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本人为了同他积极合作和在他逃跑之后为使他回心转意所作的“耐心努力”。以下的内容却使人吃惊了，说张国焘企图纠集他原有的干部一同“反对王明”，因为张不同意王明所坚决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时我突然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因为我知道，这里涉及的民族统一战线近来一直是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争端的主题。



四月底，洛甫在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再也没有提到所谓反对王明的问题了。新的说法是，张国焘在西安发表声明，表示他在陕甘宁无法工作，要求脱党。为此，中央委员会把他作为不服从党的领导，与国民党保持暧昧关系的叛徒清除出去。从中可以看出（以后博古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在张国焘还根本没到达武汉时，就在毛的煽惑下作出了这个决定，并使王明、周恩来、博古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在张国焘五月初发表了《敬告国人书》之后才批准了这个决定。张在《敬告国人书》中谴责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以往的宗派态度，追求党的私利，而不顾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敬告国人书》的原文我从未见过，此事我又是从党内情报和洛甫作为答复而写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正如我在这本纪事的其他地方所说的，我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认为张国焘是一个脱党分子，并认为清除他出党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了几个月，在我知道了“逃跑”的真正过程以后，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据说，张国焘象往常一样，在随身警卫陪同下，以陕甘宁政府主席的公开身份到边区外去参加祭祀仪式。启程前他就表示不再回来了，因为与毛泽东无法相处。他准备继续去武汉，以便在那里同“第二政治局”商谈，如有必要，将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裁决。这些听起来是可信的，因为张国焘在西康已经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过去发生的一切也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把自己的老对手和老竟敌置于死地，他在延安是不会安静的。现在，张国焘发表了《敬告国人书》，投奔了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上就自

取灭亡了，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同毛泽东 1937 年底的声明，以及博古对这个声明的解释相反，1938 年共产党同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了亲密合作。其外部原因是《武装斗争和民族复兴的纲领》的发表，这个纲领是三月底四月初在国民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延安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来看，这个纲领同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比较接近，虽然人们不许公开地、直接地参加国民政府，但是允许参加该政府的“民主机构”。中央委员会也把国民党纲领中规定的国民政治委员会以及类似的省县政治委员会都看作是这种机构。当然，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中央政府及其附属的常设机构在各政治党派推荐的基础上任命的。他们只有协商权利，没有立法权利。国民参政会于七月初首次在武汉集会，有七名共产党领导人属于该委员会，为首的是毛泽东，毛当然不愿出席这次会议，而让王明去积极活动。王明在会上声明，共产党准备支持国民政府，实现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但同时也声明，共产党将坚持自己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最终目标。

王明的声明显然是同毛泽东商量过的，这可以从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中事先作的表态看出，表态着重指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委任的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接受在参政会中任命。他们积极参加参政会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在战争现阶段，特别是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的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加强抗战力量。参政会的成立是全国政治生活真正民主化的第一步，并为将来成立赋有全权的人民代

表机构奠定了基础。共产党真诚希望，在紧密的合作中，通过共同的努力，同国民党研究和决定具体步骤，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独立的、自由和幸福的中华共和国开辟道路。

还在国民党特别会议通过新纲领和国民参政会成立以前，不参加国民政府及其中央机构的原则就已经被破坏了。1938年2月初，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政治部，陈诚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他是国民党将领中最有能力的、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周恩来任副主任。周同中央磋商后，不仅接受了任命，而且还带去了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工作，这些人中有郭沫若，此人以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属政治部领导。郭沫若以这种身份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这种活动不久引起了国民党领导的严重忧虑。

从延安看，这一切好象有几分混乱，因为这里象从前一样，依然是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两条战线的口号在起作用。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在干部学校中都说国民党军事上无能，政治改革上也不可信，由共产党完全独立进行的游击战争是战胜日本和建立新中国的唯一保证；只能通过游击战才能创建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建立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整个政治工作以致党的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军队和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地区则相反，应该尽可能地开展秘密工作，不能听任阶级敌人的摆布，纵使阶级敌人暂时还是同盟者。

这些言论听起来多么革命，但是同政治局最近的决议以及武汉所执行的路线是极其矛盾的。尽管如此，还是照决议行事了。大约1937年底，中央干部部开始着手把受过训练的

同志送到“抗日根据地”，去开展合法工作，或者送到国民党地区去，从事半合法或非法工作。1938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缓和新形势同党的官方路线过分尖锐的矛盾，作为上述干部政策基础的政治路线有了改变，但是干部政策却仍然没有变化。我在上面带有一点讽刺口吻谈到的延安中央委员会同武汉“第二政治局”之间的分工，至今也原封未动，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两面派做法，在一个人身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他出席1938年10至1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我叙述这一点以前，还必须简略地提一提总的军事形势，因为这种形势在1938年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六中全会的决议，而且也影响了党领导以后的政策。

八路军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不再以军、也极少以师的规模作战，而是以旅、团以至营为单位分散活动。这些部队袭击日本小股队伍，特别是日本人的后勤部队。这样，自己遭受的损失较小，而得到的战利品则十分可观，同时又可以得到敌后居民的同情。这些部队的主要目的是在距离城市和交通线不远的山区和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使日本军队无法保持稳固的驻地。1938年初，在晋察冀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大根据地，它的面积一度有四、五万平方公里，彭德怀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交通不便的阜平县城，华北“解放区”地方政府成立时，它的首府也设在这里，以后据说该城为日军所占。

1938年至1939年，黄河以东、以北地区，建立了一连串根

据地，这片根据地象一条宽阔的带子，从绥远、陕西经过山西、河北一直延伸到山东沿海，南边与江苏、安徽直至浙江和江西的小片根据地相接，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这里作战。

关于这些根据地的消息，以及我们在那里作战部队大小和强弱的情况，来源相当贫乏，而且有一部分是极其矛盾的，特别是涉及到华中和华南的消息就更是如此，因此我自己对此很难有一个全貌。粗略地估计，华北“解放区”至1938年底面积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万，1939年底面积是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五千万。我提供的这些数字是很有保留的，因为它们出自无法核实的中国方面的材料。中国方面的材料还说，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已有一半成了“解放区”，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准确，但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最高司令部并不重视八路军及其根据地，更不用说陕甘宁了。1944年4月，毛泽东在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自己也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sup>①</sup>事实上，日本人一直是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战略的主攻方向，而从未进攻过陕甘宁，四十年代初才开始进攻八路军根据地。

所有这些根据地，完全是被日军控制的城市、铁路线和公路线彼此分开的农村地区，而且有一小部分居民离开了。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远比以往的苏区要大得多、富得多。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机构和部分离散的部队，有的被“改编”，如果他们同日本人进行勾结，有的则被消灭和驱散，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965页。

逃走的地主和商人等都被剥夺了财产。至于其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只要他们赞成抗日战争，真正拥护新政权，都没有受到触动，甚至地方各级参议会的职位也有半数到三分之二留给了这些人，但是各级常设机构决不在此列。另外，还通过减租减息和其他与抗日战争初期在陕甘宁实行的相同的经济措施，争取了广大的劳苦群众。

八路军依靠这些“解放区”，（在延安一般称为“革命根据地”，我觉得颇有启发，所以也用这个名称了），兵力得到极其迅速的增长。关于这方面的数字当然各说不一。根据后方司令部的统计，（1939年底我在莫斯科的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当时我的记忆是很清晰的），1938年八路军最少有六万人，就是说正规军的实有兵力增加了一倍，1939年增长到十二万至十五万人。后来中国公布的材料说，1938年底就有十五万至十八万人，假如《选集》里的总结讲话可以相信的话，那末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上甚至说超过了二十万人。（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04页）我认为，即使把新四军、陕甘宁的留守部队和独立游击队都计算在内，这些数字也是夸大的。

但是不管怎样，八路军的兵力飞快地增加着，这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1938年秋，当蒋介石根据相应的要求，把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三个师组成），承认它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完全隶属于中央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不过这也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意义，因为不仅蒋介石不能对日军后方的战争进程发生实际影响，毛泽东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执行蒋的指示。

附带说明一下，在政治语言的习惯上，八路军的新番号并没有通行，因此我仍继续使用八路军这个称号。

八路军及其创建的政权机关（对新四军和在中国东部和南部作战的游击队，由于消息缺乏，我没有什么可叙述的）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不断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及动员根据地居民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日本占领军，反对叛徒和内奸。这样，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组织了地方民兵，很象以前在苏区一样，民兵作为所谓的和平军队和农民自卫组织，保卫根据地的新制度，抵御日军，“惩罚”坏人，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民兵的数目，1938年底估计有一百万，1939—1940年，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告增加到二百万。

时间越长，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也就越来越避开大规模的战斗，这些部队通常只限于进行伏击、奇袭和小规模战斗，由于战斗频繁，致使敌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受到严重损失，并迫使敌人把越来越多的军队留在自己的后方，最迟从1938年底开始，敌人也日益利用由投诚的将领和政客拼凑起来的伪军。至于是否象我以后读到的那样，说四十年代初就有全部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及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用来进攻革命根据地，我是有怀疑的。但是这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八路军连同它的根据地和地方民兵，从1938年至1939年逐渐成了一个越来越影响战争形势的因素。并且在中日战争中有力地导致了力量的某种平衡。新四军和在其他根据地独立作战的游击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当然他们的活动范围要小得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1938年至1939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军队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战争第一阶段，国民党军

队在人力和物力上，受到了巨大损失，放弃了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最重要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然而由于外国特别是苏联的帮助，蒋介石及国民军事委员会成功地改组了败北的军队，建立、装备和训练了新军。在延安，人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听到的不多，因此和过去一样，对消极的方面——失败、退却、征兵、投降、叛变等这类的事谈论很多。无疑，其中有许多是对的，但是只有一半是真实的。通过和消息灵通同志的谈话，其中也有搞监听、分析无线电通讯和无线电广播的同志，我不仅知道建立了强大的后备军，而且也听说在战争方法上也正在逐渐改变，其表现是，南京陷落之后，事实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消极阵地防御战，开始转向运动战的战术。

当日本人为了全面控制战略上极为重要的从江苏到陕西（东西陇海线），从天津到南京的铁路干线而发起新的攻势时，1938年春国民党在上述两方面都收到了初步成果。日本人从济南向南，从南京向北，向两线交叉点徐州推进，就在这个城市南边的一个地方，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激战了一周，在这场战斗中，日本人的许多师虽然未被摧毁，但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半月之后，徐州才开始疏散。

日本人从徐州沿着陇海铁路，越过开封进攻郑州。郑州是北京到武汉南北铁路干线的交叉点，于六月初陷落。但是日军在这里受到阻碍，最后几乎完全停止下来。日本人一直未能越过陕西省界，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做，不愿使自己的力量分散到次要的方向去。

我想公正地说，徐州的胜利在延安很受注意，而且评价很高，当然很快就有引起批评和讨论的新事件把它掩盖了。这



年夏天，强大的日本军队继续向长江上游推进，其目的显然是占领武汉。国民党军队没有固守长江江岸，在战斗中象以往战争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国民党军队在技术和战术上，都比日本人相差甚远。他们拖延战斗，以便保存实力，“牺牲地盘，争取时间”，这是蒋介石当时的新格言。因此，在两个月之内，日本人向前逼进了按航空里程计算有四百公里之多，七月底占领了九江。九江就其本身来说，本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市，但它座落在武汉前沿，因此战略上十分重要。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不要保卫武汉，怎样保卫这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对这个问题前后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至于是不是象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和王明的意见一开始就不一致，还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意见都改变了（我认为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我实在是无法说清楚的。我只知道，只要人们计算一下日军挺进的速度，那末，毛开始把“在运动中保卫”长江流域的作法称为“逃跑式的撤退”，并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长期保卫武汉，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的一定条件是：立即在国民党地区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革，以便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战，增强部队的士气；建立外围防御，在进攻者侧面和背后开展积极的战斗行动加以配合；此外根据“任人为贤”的原则，以共产党的及其他忠实的部队领导人来替换无能的、不可靠的国民党军官。王明、博古，特别是周恩来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周甚至把胜利保卫武汉视为战略十分重要、条件十分有利的一举。他认为，保卫武汉可能成为战争的转折点，因为人们可以因此争取时间，以

新的力量继续战斗，为最后阶段的决定性战役做好准备。

从七月底至十月底，日军为了靠近武汉，用去了三个月时间。当日军开始包围这个城市时，中央委员会改变了它从前所发表的意见。这一点周恩来表达得最为清楚。他从持久战的思想出发，（这种思想毛是从蒋介石那里接受来的）写道：守住还是丢失武汉不能视为决定性的，相反，不惜任何代价、无止境地保卫这个城市，就会减少大规模作战的时机，不利于力量对比的转变。

这样，周竟同蒋介石的意见少有地一致了，蒋当时也说：胜利的关键不是保卫一城一地，必须避开敌人安排的战斗，而应该迫使敌人在山地、湖泊和沼泽地作战，这样长期下去，地点和时间都将对敌不利。因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介石方面要接受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了。

十月份，武汉城疏散一空。中央政府及其全部机构搬到内地重庆。“第二政治局”也迁到那里。十月底，日本人进兵武汉，几乎就在同时，占领了中国南方最后一个大港口广州城。

从此以后，正规前线相对地平静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达到了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封锁了整个中国海岸，掌握了几乎集中全部工业的大城市，控制了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看来日本人并不想深入中国内地，因为这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效果，而且超出他们的力量，日军分散在中国广阔的内地，兵力势必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日本人此时正努力改组在一年半的不断进攻中所削弱了的军队，巩固它占领的地盘，特别是巩固它的后方。毛泽东的下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

说，战争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开始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游击战具有更大的意义。

---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的六中全会时，我看到的军事形势。全会是秘密召开的，会上讨论的内容很少透露。从报纸简短的报导和一些偶然的交谈中，我只知道一点零碎的细节，从中我获悉，会上一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对我说，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就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那一阶段的工作做了报告，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当时中国的特殊性，完全是一种毫不隐晦的民族主义的调子。王明的讲话则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同一切反战、反法西斯主义进步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不应该把抗日战争孤立起来，而必须使抗日战争隶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斗争。王明说，这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原则的，当苏联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一原则的精神行动的。

毛在他的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谈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目的无非是表示他的政策和策略是唯一正确的。撇开这一点不谈，那末他的讲话中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及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毛的两面性。他一方面称赞国民党的“光荣历史”和“光辉未来”，明确地承认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老伙伴，并郑重其事地保证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另一方面他又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作用”，主张对盟友根据“先斩后奏”的格言（意即：首

先行动,然后报告),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象八路军在华北一开始实行的那样。这一点还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读到。在《选集》中,毛这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大大压缩,语气也大大缓和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04页)。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或者说“既统一,又独立”(同上)。

博古曾对我说,先前的政治局决议应该修改,他没有说明毛在同谁论战,但看来只能是王明。毛提出的“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同上第509页),这一要求就是针对王明的,也可能是针对刘少奇、项英和其他致力于在城市的工人中加强政治工作的同志的。毛还重复他原有的立场,认为只有在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延安和军队中党的工作才有决定意义。与此有关,他说:“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同上)。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了。至于他怎样理解“中国问题”,他在前面还说了几句话。根据反对内外武装反革命的情况,他把为民族和社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视为党的主要任务,他还批评一些人:有了1927年的教训之后,若干年中还不理解这一点,并且想把主要方面放到白区政治上。毛泽东的片面面向农民、面向军队、最后面向一场新的内战的路线,在这次讲话中重新有了突破。所有这些,同他的所谓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等言论,是极不协调的。他说,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并说这一个共和国既不是苏维埃式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式的。也许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的思想,此时已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不过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本文的任务

了。

毛在阐述他所设想的、在充分保证双方完全自主的情况下长期合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时，他的讲话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建议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同时主动向国民党机构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这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毛就是这样击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并且一遇机会，还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做为可怕的例子来吓唬别人，因为陈独秀在二十年代中期曾粗暴地驳斥了国民党提出的类似的无礼要求。

是什么东西促使毛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以此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因为共产党干部的渗透当然已无法对国民党隐瞒了。或者如六中全会决议所云，是为了改善两党合作关系，以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事实上——这一点在延安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了——中央全会以后，还继续有上百名、次年又有上千名干部学校的毕业生被送到国民党地区去，一部分直接参加党的工作，一部分则辗转到国民党及其机构和军队中，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去。人们在知己人当中都嘲笑提交名单的做法。显然，在毛泽东的《选集》里，除了其他许多内容外，这一点也被隐匿了。在《选集》中只是说：“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sup>①</sup>。

我必须承认，我对毛这些零零散散传到我耳中的互相矛盾的讲话，开始时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毛泽东在1937年不点名地、到1945年以后又点名地把以王明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诋毁为投降主义分子，而现在他似乎比他们还要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1页。

“右”。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作为他的总结报告补充部分的结束语中，他又为回到他的旧宗派主义政策打开了后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相信，他的路线得胜了。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倒不如说，人们共同制定了一个至少在表面上是统一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可以批准的纲领。

这个纲领写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决议中，该决议于1938年11月公布，接着在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说明。在这个决议中，除了对张国焘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公正的批判外，并没有对过去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攻击，但是毛在自己的讲话中，却把很多时间用在这种攻击上。决议充分肯定了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这一时期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强调了通过从内战向统一战线过渡实现历史转折的思想。决议既没有提及毛所谓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先锋作用的霸权主义的论点，也没提及他片面面向农村和军队的路线，更没有提及他所预示的以武装斗争反对“内部反革命”的前景。

决议集中对形势作了清醒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决议多次明确指出，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正奋起进行一场光辉的战斗，在这场正义的战争中，尽管有惨重的牺牲，但却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繁荣的道路。决议说，中国人民将在长期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在敌人方面为：进攻——相持——退却，在中国方面为：防御——相持——反攻。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以及与其他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的长期合作，是建立持久战的必要基础。目前的抗战，正处在从第一阶段转到第

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情况下，敌人正在加紧争取叛徒，组成傀儡政府，以便分裂中国人民。对此必须加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亲密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对叛徒、妥协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接着决议列举了中华民族的紧急任务，认为完成这些任务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的条件。

在论及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段落中，（决议说，这种合作是武装抗战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民族复兴以及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保证**）以及论及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作用的段落中，又重复了某些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曾经使用过的提法。全会又一次郑重地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诚心诚意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宣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交出上述名单。另外决议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既不允许一党专政，也不允许具有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最后，全会提醒所有共产党员，保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我参加的讨论六中全会的党的会议上，有人对向国民党提交共产党员名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党支部书记眨了眨眼睛，形象地做了回答。她说，这不能从字面上来考虑。有些人想更详细的知道，怎样理解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左和右的倾向，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左”是革命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使对党有益的民族统一战线过早崩溃。“右”则相反，这种倾向放弃党的自主权，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其实大家对决议并没有进行仔细的讨论，就一致通过了。

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还作出了一系列决议，主要是组织上和宣传上的决议，其中部分内容全部或摘要发表了。可惜，我只能回忆起一个关于准备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众所周知，这次代表大会是七年之后，于1945年才举行的，那时正值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以后，毛泽东认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清算的时机成熟了。而在1938年的全会上，毛显然在政治上受到马列主义者的某些牵制。实际上，毛当时在党内、军内已经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一地位使他能毫不顾及已作出的决议，顽固地贯彻他自己的路线。

至于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继续发展，我根据自身的阅历很难叙述什么新的情况，大多数情况是从我当时根本看不到的有关文件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一些书籍中知道的。我在延安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很不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发生的事情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然而这些情况使我获得了一个大概的印象。1939年一年中，有两种倾向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两种倾向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国民党的统一和民族统一都成了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解决，最终达到它在中国的战争目的，第二种倾向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声称：他的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使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在于通过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平等合作，在远东地区建立新的秩序。实际上在这个声明背后所隐藏的无非是在日本的统治下，以反共为幌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旧口号而



已。

蒋介石回答了近卫文麿的“和平建议”，他说，日本的真正意图是，在虚伪呼吁中日合作外衣的掩盖下，完全并吞中国并彻底奴役中华民族，因此必须把抗战进行到底。不管蒋的动机是什么，但他的态度在当时是肯定和明确的。

在国民党内乃至它的最上层，确实有人出于反共立场或个人动机，准备接受近卫文麿的建议。身为蒋介石副手、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防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汪精卫，1938年12月底秘密离开重庆，逃往印度支那，并且从河内发出电报，他在电报中要求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解除汪精卫一切职务，开除出党。

所有这些我都是间接知道的，然而上述事实在几天以后延安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文章激烈反对汪精卫，完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193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露天广场举行了群众集会，王明在这个会上讲了话。他指出汪精卫同近卫文麿的勾结，是反共老阴谋的新花样。他说，汪精卫不是孤立的，近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反共活动，有的地方竟发展为武装冲突。这样民族统一战线势必被破坏殆尽，因为谁反对共产党人，谁就在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占领者以及汪精卫一类的汉奸。如果蒋介石真的想把抗战进行到底，那末他不仅在反对公开的叛徒上，而且在反对反共投降分子及反对反革命分子上都应采取有力步骤。

这无疑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说，国民党有影响的政治家反对共产主义，是以毛泽东一贯的夺权野心为对立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觉得受到威胁，因而进行了

回击，这当然对反共分子和准备投降的反革命分子起了煽惑作用。王明当然不可能公开谈及事情的这一面。那末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六中全会的决议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了吗？看来没能这样做。总之我听说，为了把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党的办事处之间的通讯网联系起来，采取了许多组织措施。1939年春，周恩来到东南各省进行了长时间的视察，以便就地作出相应的指示。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发起了进攻，派重兵从长江下游向南推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一段时期向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我认为，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们想以军事压力配合近卫文麿的政治解决；另一方面，他们要在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把两个城市之间的主要联结线——经过长沙的铁路以及经过南昌的公路——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此切断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各省同内地的西部和西南部各省的联系。第一个目的，日本人根本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一部分。但是，在短短的三月至四月的时间里，日本人还是先后占领了守卫力量很弱的江西和湖南两省的省会南昌和长沙。

周恩来在巡视中遇到了项英，考虑到新的形势，他指示项英，用新四军的一部分武装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交界多山的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可以以老苏区作为基础。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很有利，因为在苏维埃初期，这里进行过斗争，肯定能够得到劳苦大众阶层的同情。严重的问题是，武汉、南昌、长沙之间的三角地

带还驻有国民党军队，其高级军官，说得缓和一些，对共产党不甚友好。尤其是由于双方的职权范围和作战地区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同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和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了。

项英把新四军后方司令部（也许还有江西省党委——我知道的不详细）迁到1930年内战时战斗十分激烈的县城吉安，并在离长沙东北足有一百公里的平江设立了新的通讯处。六月初，在这里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此类事件，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从未发生过，但是到1939年逐渐增多了。国民党兵在破绽百出的搜捕逃兵的借口下，强行进入通讯处，杀死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是被立即枪杀的，其余的是被捉住后活埋的。在延安，人们是这样说的（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44页注释1），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这样一种极其痛苦的、慢慢死去的方法，自古以来就为中国的封建主和军阀所使用，有一次我还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

平江惨案与以往的这类意外事件不同，它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一场极为尖锐的争论，特别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争论过程中，双方互相指责，列举罪行。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用“统一和斗争”的新口号代替了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口号“统一和独立”。王明早在他一月讲话中就着重指出，反共和投降势力的结合在这一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分歧早已开始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会上，蒋介石只是把恢复1937

年7月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目标，并要求“违抗命令”的共产党员遵守秩序。就是说，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可能王明的一月讲话已经反驳了蒋介石的类似讲话，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关于国民党的这次大会，除了延安发表的很少的消息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大会的贺电全文，贺电再一次表示加强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介石。

平江惨案之后，重庆首先竞相要求惩办肇事者，不仅要惩办事件的直接挑动者，而且要惩办事件的幕后人物和暗中操纵者，这里指的是那些国民党的最高将领，如中南二十七集团军司令，以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他们两人素以极端仇恨共产党而著称。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要求惩办直接参与屠杀的肇事者。蒋介石反过来也指责共产党，不仅在陕甘宁擅自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整个国家密谋反对国民党及其机关和军队，造成既成事实，采取单方面行动，提供错误情报。因此共产党必须最后决定是赞成还是反对国民党领导下的整个国家制度。

周恩来急速返回延安，以便同政治局进行磋商。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周乘一辆载重汽车，坐在司机身边。途中遇上土匪，可能是过去民团的袭击。幸亏车上的警卫打退了敌人的袭击，但司机受了枪伤，几天之后由于伤口溃烂不得不截去双腿。在延安有人说，周恩来在这次事件中手臂也受了伤。他的手臂确实是那时候伤的，但究竟是在这次袭击中伤的，还是如人们以后告诉我的那样，并不是敌人打伤，而是不光彩地从马上摔下来受的伤，我就不去管它了。

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战争爆发两周年来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声明他们的立场。蒋介石发表了《告全民书》，我没有看到此件的原文，从零碎的消息可以看出，他判断中日两国之间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有利的变化，同时尖锐地驳斥了由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一切“暂时解决办法”，他还号召把战争继续进行到胜利的（或痛苦的？）结束。

在延安同时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纷纷撰写大量文章作为补充。使我诧异的是，在写文章的人当中也有邓发，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延安，估计此时又在这里了。除了宣言以外，毛泽东的文章《当前阶段的主要危险》也很突出，因为它具有纲领性意义，这篇文章后来经过编辑修改以《反对投降活动》为题，收入了毛的《选集》（参看《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35—539页）。

从表面看来，两个文件的内容同上述蒋介石的《告全民书》中的三点意见是一致的。如果人们读一读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开头“极其尊重最高总司令蒋介石”，以及结尾“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那末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参看沃伦·郭《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1970年台湾英文版第三卷第551页）。可惜我不得不以这部反革命、反共产主义的著作为依据，因为没有别的来源给我提供宣言的材料。但是这部反共的著作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宣言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我是不怎么怀疑的，因为据我自己回忆就是这个内容，而且其要点同毛泽东的文章也是相

当吻合的。

然而，假象迷人。忠诚声明是表面的，背后却明显地出现了就本身来说完全是有理由的谴责，谴责一切把反共斗争凌驾于抗日战争之上的倾向。宣言开头强调说，历时两年之久的战争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进步，在持久战的广阔战线上，削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接近了抗战的胜利。因此，宣言接着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所谓和平调解的政治策略达到奴役中国的目的，近卫文麿的声明表达了这一点。近卫文麿在实行这个恶毒的阴谋时，得到了国内外的庇护和支持：从外部得到了法、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他们赞成“太平洋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来说只是“东方慕尼黑”；在内部得到象汪精卫这样的少数汉奸的支持，汪此时正公开加紧同日本人结成反共同盟；此外，还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支持，这股势力诽谤中国共产党，骚扰陕甘宁边区，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和机关，破坏抗日战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还得到那些暗中掩护叛徒、投降分子和反革命的动摇分子的支持。日本侵略者、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中国反共势力的勾结，成了中国人民争取统一和胜利的主要危险。

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同日本“媾和”，反对“东方慕尼黑”，反对一切以部分或过渡解决的形式出现的投降活动，反对一切利用反共口号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日本军队打到鸭绿江边（满洲和朝鲜之间的界河），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并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

我从毛泽东的文章中摘引了同宣言一致的内容写入了我

对宣言的简介，毛讲话中的有些提法则走得更远。他过去把人分成左、中、右，现在只简单地分成主和派和主战派。他把所有“大、小汪精卫”都算作前一种人，这种人——他从中国古典戏剧中找到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在公开投降的背后活动，这是指蒋介石，后来《毛泽东选集》注释4和5（参看第二卷第539页）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同上，第537页）还谴责“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气氛，甚至企图再次挑起一场新的国共内战，企图用这种方法破坏统一战线，准备投降，背叛民族。毛以此驳斥了所谓共产党通过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来瓦解抗日战争的谴责。文章的结尾与宣言不同，他没有要求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是要求反对投降和分裂。

几星期之后，毛泽东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他认为，肇事者是根据反动派的指使行事的。收入《选集》的这篇讲话的注释1（同上，中文版第544页）清楚地说明，他在这里就是指“蒋介石和他的党徒”。他问，为什么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他回答说，因为中国不统一，没有统一于抗战，没有统一于团结，没有统一于进步。他又重复说，“公开的和暗藏的汪精卫”破坏统一，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我不掩盖，毛的论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的悼念演说中提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用他的话来说，是针对共产党及一切其他进步力量的，这个秘密办法确实是一种警报。还有党内的通知，更引起了忧虑。通知说，国民党规定在共产党活动最多之地区，实行“联

保连坐法”，并在各地普遍建立情报人员通讯网和反革命组织来实现这一法律，平江惨案就是具体的后果。毛泽东的回答，当然也是整个政治局的回答。毛说：假如有效的法律不起作用，假如统一遭到破坏，我们就必须动员人民，制定一项法律，使挑衅者、反动派和投降派受到监督。接着又说：在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我们要进行反击；在国民党掌权的地方，我们要转入地下！总而言之，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大家知道，不久之后，即在四十年代的前几年引起了武装冲突。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推行双重政策的必然结果。

1939年还被掩盖着的内部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事形势。在延安有谣传说，由于有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斡旋，蒋介石正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签订停战协定问题进行秘密谈判。或者说，他正企图转向汉奸们的所谓和平军。我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无论如何，不祥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并没有召开。1940年1月，汪精卫成立的、并为日本官方承认的南京反蒋傀儡政府，也正说明上述传言是不可靠的。

另一方面，在前线形成了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局，一种或多或少被动的相持局面。我认为，这种战局的相对静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当时出现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作用。对这种局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这时都把“清理”自己的后方作为主要任务。国民党加强了反对新四军的行动，而日本人则把自己更多的军队，特别是中国伪军投入了反对八路军的战斗。现在，毛泽东谴责蒋介石，说蒋介石回避同日本人打仗，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毛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推行的是旧游击战



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就把军队撤退到山里。另外，他也同样满足于这种可疑的相持局面，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容许以走私形式进行的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

博古后来同我交谈了几次，有一次他讽刺地对我说，1939年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三方互相攻击：日本人，包括汉奸和傀儡，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攻击的矛头仍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坚实核心，毛泽东以前所预言的国民党内部的大分裂并没有出现）；国民党攻击日本人和共产党；共产党攻击日本人和国民党。

根据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的理论，相持是中国走向反攻的过渡阶段。但是，由于三角关系的出现，相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实际上，相持作为一种停滞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人在军事上出现了和局之后既不能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达到战争的目的，中国军队也由于越来越尖锐的国共两党的对立而不能达到必要的力量优势，以便把日本占领者从国土上赶出去。

统一战线的双方为了将来争夺中国的政权，都在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一场虚假的抗日战争，以便竭尽全力反对共产党。相反，华北共产党的部队却不得不加强对日伪军的压力的抵抗，这些日伪军使用了类似蒋介石1933—1934年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策略，当时称为“蚕食政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各个革命根据地分别圈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八路军在敌人强迫造成的积极相持状态中，也采取了曾被毛泽东在遵义斥为“把战争当儿戏”的短促突击的战术。1940年初，由于军队的压

力，毛虽然决定进行了“百团大战”，但是同以后的战役一样，这次大战同样对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日本后方的“革命根据地”甚至大大地缩小了。

众所周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来自外部，在日本堕落为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太平洋地区战争冒险家之后，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在远东苏联和蒙古军队进攻满洲，迫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投降。

但是，这一段历史已经超出了我的纪事范围。

---

这里请允许我谈一点我自己在延安的情况。这些情况同时也可以说明，最近几年多次有人问我的关于毛泽东的个人行为以及他同干部的交往中的几个问题。

我已经屡次指出，在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初从所谓的东征撤回之后，我越来越被排除在参与讨论和决定军事问题之外，政治方面的消息也很缺乏。我主要是从我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和群众集会，以及从私人谈话，特别是从同博古的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博古在保安和延安时，一直到我离开，有时间隔长些，有时间隔短些，总是按时来看我。此外，我开始作为客人，后来作为成员参加了后方司令部党支部会议。我还继续紧张地在军事学院，即以后的抗大教课。从1938年起，我再也没有固定的翻译了，困难越来越多，至少在给从国民党中国那里来的年轻大学生上课是如此。自然我主要是给以前的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的人讲授战术课，把他们培养成中、高级指挥官，并同他们一起讨论、一起搞实践演习和沙盘练习。我原来的第二个翻译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在这时已升为抗大

训练部主任。

1936年同莫斯科恢复了无线电联系以后，我几次向洛甫请求把我招回苏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毕竟是1932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顾问。洛甫是否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就知道了，反正他对我始终避而不答。

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我又向王明请求这件事，我们偶然遇到一两次，谈话很随便；和张浩以及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央委员不同，他们都回避我。就在谈话前不久，王明被任命为女子大学的校长，我觉得这对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职务，尤其是他根本不能关注这个职务，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或重庆，看来他对此也很不满意。总之，他给我的印象好象是忧虑重重，在这点上我是同情他的。一方面，他要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纵使毛所执行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这简直是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

至于我，王明再三劝我不要再坚持回去了，他的原话是，在苏联等待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枪杀。他这番话并没有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在《真理报》上我经常读到我个人认识的或是知道的名字成了“人民的敌人”，我可以保证，他们对党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我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和联系，但是我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为我自己的工作负责。

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只好准备长期地、虽然不是

永远地在中国呆下去了。1938年，有一天我去找陈云，有一段时间他是主管中央组织部的中央书记，我请他把我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参加党的生活；并请他同意我同一位名叫李丽莲的歌唱演员结婚，她是1937年底同演员江青（毛泽东现在的夫人），一起从上海到延安的。这两项请求他都同意了，我就同李丽莲到延安办事处登记结婚。

很久以前，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1938年我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交谈一切问题了，只是要用那些很准确的政治和军事术语来讲课，就不行了。我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读和写，学习时使用的主要是延安出版的成人读本，它的优点是有很多插图，每一个象形字都带有相应的拉丁字母。在罗瑞卿的默许下，我在抗大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老师，他能说点英语，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工作。渐渐地我已经可以读延安报纸上和其他出版物上的重要文章和文件了，虽然感到有点吃力而且有时还需要辅导，而听报告、讲话、讨论就顺当些了。

在正式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有一天肖劲光来看我，他告诉我，毛泽东提议让我在后方司令部（我被分在这个支部）当顾问。我把这件事视为命令，好多次到那里去遇到朱德，朱的情绪以往一直是很好的，这时看上去却有点不愉快的样子。在司令部里其实并没有我干的工作。不久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奥妙，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并不愿意我参加工作，只是象其他人一样，由于衣食住等等问题，在行政上我必须属于一个单位罢了，因为抗大离我的住处有几公里远，而离得最近的司令部再合适不过了。此外，把我的关于战术的文章译成中

文的翻译也在那里工作。在地方政府卫生部工作的马海德，还有警卫员、饲养员，总之所有住在大院里的人，同我一起组成了司令部的一个独立的供应单位。

当初，我在中央红军看到的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一种类似社会化的生活，虽然范围很有限，也开始发展起来了。不仅成千上万的中国爱国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而且作长期或短期逗留的外国来访者都对此起了作用。

例如，在我和李丽莲成了密友之后，自然各方面的艺术家就常到我家来过周末，爱好交往的马海德也常常把一些年轻人拉到我们院里来。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在来访者中间，开始几次也有江青，但很快就疏远了。

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一件丑闻正威胁着她，这种丑闻触动了毛泽东周围最亲近的人，并且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人们还试图把我牵连进去，到六十年代初，我才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暗示，因此我不得不简短地叙述一下这段历史，虽然它是令人不愉快的，而且本身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1937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1958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

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为了对付贺子珍的谴责，毛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有一天吴莉莉在我这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当我还在考虑如何摆脱她的时候，肖劲光借口要和我谈点什么上我这里来了。然后他们两人都走了，我不知道是谁先走的。这就是全部过程。肖显然是要证明吴莉莉来访，不是为了毛，而是为了我。贺子珍并没有因此受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陈云受毛的委托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毛的要求宣判离婚，这时吴莉莉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离婚之后，毛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去“就医”，把吴莉莉送回她的老家四川，而江青则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象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象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1932年或1933年由康生介绍她入了党，说她过去那几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出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好，就说这些吧。我想附带说一下，虽然埃德加·斯诺写书是为了提高毛泽东的声誉，可是他也没能完全回避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参看《西行漫记》一书的附录，1968年伦敦英文版第459—460，467—468页）。

毛的这种做法完全勾画了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我看来，也证明了毛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实际上那时就不容攻击了。关于这一点，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加以补充。毛是个蹩脚的骑手，短路程他宁愿步行，从1938年起，在城外，他总是乘坐一辆不知什么人送的救护车。假如不算偶而来往于延安和西安之间的载重汽车，那末这辆没有用于应有目的的救护车就是延安唯一的汽车了，除了他，谁也不能用这辆车子，车子在哪里出现，人们就说：“毛主席的车”。

1938—1939年，我常常遇见毛，或者是在他看望外国人时（看来此事很能吸引他），或者是在特别的机会，象张国焘逃

跑那次，而最经常遇见他还是在抗大，在那里我听了他几次课。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抗大所有领导干部集体拍照，拍照时我坐在他身边。可惜我得到的照片于1941年在莫斯科丢失了。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我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的环境同化之后，毛把我看作是一个无害的人，对我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他来说，我无非是一个无需介意的、无足轻重的人。

1939年初夏，毛泽东同洛甫、博古一起突然来到我的住处，这使我大吃一惊。他们同我毫无拘束地、泛泛地就政治和军事谈了足足两小时，范围大概就是我在纪事的后一部分讲到的那些情况，当然是毛的看法。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谈话是用中文进行的，有些字我听不懂毛的湖南口音时，博古就出来翻译，他们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突然。我不明白这次来访的目的，博古对此也沉默不语。在以后的几次访问中，凡是涉及政治问题，博古通常总是显得非常寡言。他常常同前面提到的伍（修权）一起打桥牌。过了很久我才渐渐明白，这次目的不清的拜访，很可能同莫斯科的质问以及同召回我有关。

---

随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陕甘宁的边界不仅向无数中国人开放，而且也向一些外国人开放了。他们都是作为朋友来的，至于这些朋友是真是假，那就很难洞察了。但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已很明显了。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这些人来阐述或者掩饰他的政治见解和观点，给西方留下好的印象。我并不了解这些人，特别对那些记者我更不了解，我总是有意地避开他



们。有些外国人，我在其他有关段落已经程度不同地提到了。这里，我只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对这些事的总的印象，也许这种印象并不全面。

1936年初夏，第一批客人来到延安，他们是埃德加·斯诺，格奥尔格·哈特姆博士(马海德)。最近，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他们是由美国情报机关派去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对此既无法反驳，也无法证明。有些情况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例如有一些情况表明他们此行是半合法的。

1933年，我在北京就已经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参看本书33页)。至于他是怎么来的，他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他说，一位中国朋友向他转告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这就给了他所渴望的机会，向全世界介绍他亲眼看到的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斯诺于1968年把校阅和扩展的英文版主要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最后一版作了进一步补充。据说，他是从一位他不认识的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那里接到了邀请，同时还给了他一封用隐字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并告诉他在西安碰头。在西安，还是那位曾把我送过国民党封锁线的姓王的牧师，介绍他同邓发取得了联系，邓发又把斯诺带过当时还由东北军占领的延安，抵达陕甘宁，会见了周恩来。周很热诚地为他打通了继续前进的一切道路，这完全是可以相信的，否则斯诺很难进入苏区，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更不用说得到毛的友谊了。

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斯诺对他根本不是一个人旅行，而是同马海德一起，以及他们两人进入甘肃到一方面军司令部这

些事，一直沉默到六十年代。斯诺于七月在保安出现，而马在甘肃一直呆到当年年底。斯诺几乎有半年之久在那里搜集材料，这些材料从中国红军初期的历史直到目前的情况都包括了。斯诺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人，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能相当熟练地讲中文，他得到了一切他希望得到的消息，不久就传说，他深得毛的宠信。毛也选定斯诺作为他的传记作家和他的思想的宣传者。一直到不久前斯诺逝世为止。

他也向我追问一些有关红军和共产党的问题，但是每次我都拒绝了，我对其他向我提问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原则上也是这样做的。因而我们的来往只限于社交活动，例如打网球，玩纸牌，这些活动博古总是参加的，洛甫有时也在，我以前的翻译伍修权，还有一个叫蔡树藩的独臂团长（他在军政治部工作），以及其他几个我忘了姓名的熟人。

假如斯诺是美国间谍，那他给他的主人一定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是一个精通政治的中国通，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事实、时间和数字，并附有大多数领导人物的照片和报告，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就可能对各种关系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但是，斯诺首先是个记者和作家，作为这样一种人，也必须承认，他以自己的文章为拆穿在整个西方世界散布的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大量谎言做了不少贡献。他生动地描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同人民的紧密联系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也早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后果严重的党内争论。可是，他除了作为毛泽东的喉舌片面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辩护，并把他们吹捧

为(稍有保留地)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外,又怎么可能期待他会有别的作为呢。

十一月,西安事变前不久,斯诺离去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是在我被召回之后才又回来的。当我的第一篇论中国问题的文章1964年发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时,他从日内瓦写信给我(他当时暂时住在那里),要我证实我就是李德。

1937年初,马海德在延安同我住在一起时,我们才相遇。他是一个叙利亚血统的美国公民,曾在法国和瑞士学过医,到上海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生。他自己说想为中国红军服务,不知通过什么方法他同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同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有联系,她把马海德介绍给上海党组织,并介绍他同埃德加·斯诺相识,然后马海德陪同斯诺到达陕甘宁。这些都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向我证实的。

马海德当时二十五岁,他刚到中国时还不会说中文,作为医生也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自称在思想感情上是个共产党员,其实在组织上不是,而在政治上天真得使人吃惊。后来,我逐渐给他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他有三个很有利的特点,理解快,适应性强和年轻人那种无忧无虑的性格。他很快就学会了说中文,但不能看和写,过了不长时间入了党,作为实习医生给居民看病,后来成了防治中国西北部广泛流行的传染病专家。他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不妨碍任何人,并且在哪儿都有用处。他有时在延安新闻机关协助工作,收听英语和法语广播,以及类似的工作。

1938年，准备在香港设立一个新闻代办处时，有人曾考虑到他为候选人，但后来还是派了一个中国人去了。

如果马海德是一个间谍，他似乎不可能象斯诺那样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大家都知道，他为斯诺和史沫特莱报告了不少消息，但也无损于他。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情况是在六十年代初。他住在北京，有一个中国老婆和几个孩子，还是象从前一样很得人心。他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什么影响，但同毛周围的人关系很好，他热心支持毛的政策。根据我对他的认识和估计，看来他安全地渡过了“文化革命”。

我已经提过，1937年夏或秋，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由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陪同到达延安，带了几箱子书和一个特别大的包裹，其中有一个带唱片的留声机。看起来她象是要永远住在陕甘宁似的。因为斯诺已先决定写毛的传记，于是她去找朱德。朱德只字不谈革命斗争中的关键，对党内分歧也保持沉默，因此她在自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不得不越过这些要点，有许多内容也是从其他甚至是不可靠的材料来源中汲取来的。大约一年之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又动身走了。她把书籍、唱片及其他东西都留下了，是很受欢迎的礼物。斯诺夫人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她离开延安更早一些，只呆了几个月。

毛常常来看望这两位妇女，有几次我也在场。据我所知，毛确实不曾同他们进行过认真的政治方面的谈话。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洛甫、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在延安时显然都很谨慎，更不用说王明了。在这两位妇女那里，我从来没碰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不管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还是海伦·斯诺，他们在言谈中都有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她们崇拜毛，对民族统一战线抱着怀疑态度，认为国内战争是主要动力，认为延安的军事生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至于毛实际上无视工人阶级，而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看作民族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支柱，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对毛的崇拜。所以我曾对第三者讽刺地说：“病态的托洛茨基主义”。

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作为“三大洲医生”写进文学著作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大夫，带着一个外科护士和各种医药设备到了延安。他很少关心政治，而是迫切要求尽快地到前线去，建立有效的卫生制度和必要的战地医院，采用象输血、消毒等诸如此类的现代治疗方法。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谈话，主要内容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一次毛还到他居住的窑洞来看他，恰巧我当时也在场。一两个月之后，他动身到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那里，没有带那个外科护士，因为我们这里的严酷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能使她满意，所以她宁愿背道而驰，离开了延安。白求恩大夫在前方，更正确地说，在新的革命根据地，毫无疑问工作是非常出色的。1939年11月，一次他在敌人的轰击下进行手术，自己血液中毒去世。死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崇高荣誉。

几乎与白求恩大夫同时，有十个妇女和姑娘参加的国民党医疗队也到达延安。过了几个月，这个队又不见了，我实在无法说清，她们是参加了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呢（一些情况说明有这种可能性），还是又返回国民党地区去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队在延安再也没有出现过。

此外，1938年曾有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到延安来访问，还建了一个设有除虱室的浴室，这确实是有益的设备，但是对仍然极其贫乏的陕甘宁卫生事业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欧洲人，看起来更象是旅游者。也许他们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要附带完成某些侦探任务。他们看见什么都要拍照的这种嗜好，说明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

一个印度的医疗小组却不同，它由四五名有经验的医生组成，其中有外科医生柯隶华大夫。过了一些时候，他和另一个大夫到八路军部队新的战地医院去工作，其他人在离延安不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临时诊所，既给战士看病，也给百姓医疗。他们多次请我去，在这些人当中，我虽然没有结识到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是非常进步、乐于助人的人。使我惊奇的是，毛没有或是很少注意他们，以致他们几乎完全自己照顾自己，完全依靠自己的财力。以后他们的情况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到延安来的还有其他“援助者”，不过详细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有一个红头发的新西兰人，搞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这个工作，他在国民党中国已经干了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同马海德很接近，常常到他的窑洞里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他继续留在中国。他大概叫雷维·艾黎，这是以后我从1954年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书中读到的，书名是《人民有力量》，但我也不能十分肯定。

如果把两架在延安着陆的飞机驾驶员除外，那末苏联的唯一来访者，直到我离开时为止，就是著名的纪录影片摄制者罗曼·卡尔门，他于1939年春从南方来到这里，在陕甘宁摄制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友好地

交谈。他还给我照过几张相。对那些棘手的政治问题，他总是机敏地回避过去。他甚至不知道，同他来往的是些什么人。

1938年，美国人才开始有计划地、试探性地来到延安，虽然是非官方的。起先来了一个资产阶级记者小组，其中也有汉学家，是由福特基金资助的。他们可以在特区自由旅行，当然是在管理人员和翻译的陪同下，我没有同他们接近。看来这些人在为一个驻外使馆的武官侦察地形，这个武官在半年以后带了一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他在延安呆了数周，进行了秘密谈话。至于他来谈判什么问题，我根本不知道。从交谈中我听说，他想了解八路军的军事战斗力，和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政治上彻底和解的可能性，以及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可能性。据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加强了美国在东亚对抗日本中的地位，同时削弱了苏联的影响。

不过这位武官看来好象是不满意地回去了。以后，毛泽东同他的美国谈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冻结，美国又完全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这方面只好更加倒向苏联。但是在1941年，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情况下，毛却破坏了同苏联的共同军事行动，1944年毛又重新同美国的代表进行了正式接触。

同美国人的这种最初调情，表明毛在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奉行了一种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摇摆政策，其出发点还是他的那个老调，即所谓中国是世界矛盾的中心。

最近，我看到有材料说，毛的领导同美国政府以及五角大楼代表之间的最初接触是1944年才开始的。虽然这个事实，既没有在苏联的文献中提到，也没有在西方的文献中论及，但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种接触在1938至1939年——我不

能确定准确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它涉及的是一次秘密使命，一次非官方的接触，所以无论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对此沉默至今。

---

虽然我已经详细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特区及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我认为最后再一次强调几点(尽管略嫌重复)，还是适宜的，而且我认为这几点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最近在北京，人们常常听到要求恢复所谓延安工作作风的呼声，其意图是，要把在当时生活条件下为毛泽东有意识促进的那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毛集团现今的专政、军事官僚主义的统治，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使现今的政策具有一种革命的外貌。事实上这样一种联系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使它是由中国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种种关系和条件，使毛泽东可以在党内和国内确立他的独裁统治，贯彻他的反动的和空想的政策。

从我在中国时的情况看，所谓延安工作作风，当时还刚刚形成，它的要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自给自足，军事化，群众路线和民族主义。

这种地方的和区域的自给自足是被迫形成的局面。中国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饥饿区。当地稀少的居民根本不能养活自己，红军的给养也产生了困难。幸好在“东征”和其他战役中，部队缴获了一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总算暂时渡过了困难。然而八路军离陕甘宁很远，他们自己的困难也越来越多，所以也只能拿出很少的给养。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人



从日军占领的或受之威胁的城市，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涌到延安。再加上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军加紧了对陕甘宁的封锁，日本占领者及中国傀儡军加紧了对新革命根据地的封锁。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所有的人，大人和小孩，党政机构、军队、干部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和组织都必须转到生产上来，种植粮食和蔬菜，满足自己的需要，大多数是利用开荒生产，收获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如此，用这种方法保证了生存。

六十年代以来，虽然客观形势根本改变了，但毛的领导在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回过头来采取了这种方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排除严重的困境，而是要把国民经济中的国家资金最大限度地投资到原料工业和军备工业上去，也就是说，投资到军事——工业的混合体中，并派去了许多优秀科学技术干部。

生活的军事化，是有一定的国内战争、特别是长征的传统的。假如人们把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除外（中央委员会长期以来未能对这些组织作具体的领导和监督），那末，整个党的生活在离开了老苏区之后，几乎完全是在军队中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党内的民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了。

然而在陕甘宁和新的革命根据地内，却有可能把党的生活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恢复到列宁式的标准，实行民主的领导方法，当时并没有这样做。军事化的工作作风保留了下来，军事纪律从部队扩展到党、扩展到整个大众的生活之中。未被触及的就只剩下那些不属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居民了。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的。我在中国

的最后几年，一直同党的基层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然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选举。

就连民事机构、学校和机关也是处于一种严格的军事控制之下。职员、干部、教师、大学生等等，甚至艺术家事实上都进了兵营。他们大多在自己挖的土窑洞里，按照严格规定的时间表生活、工作和学习，在那里吃，也在那里睡。已婚的周末可以放假，就是在老百姓中常说的“过礼拜六”。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集团中，尤其是中下层和附属机关中，都是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主宰一切，但在最高领导层中，在中央委员会中这种人则比较少。实际工作的责任，即执行的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这种人手中。这在战争情况下，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没有感到不民主，更不会感到反对党的原则。从决定到执行的过程缩短了，手续也简化了，并且保证了各项任务能按时严格地完成。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可以继续依靠军队干部，加强他个人的权力地位，贯彻他的政治方针。

大家知道，军队的这种主宰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在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甚至在胜利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都是如此。到五十年代，根据我的判断，军队的影响缩小了，但是六十年代以来，军队作为毛集团的工具，毫无例外地占领了从经济到文化的一切生活领域，成了这个集团进行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

当然，军事性的强迫命令既不能长期代替党内民主，也不能长期代替普遍民主。于是另一种工具，即三十年代末产生的所谓群众路线代替了它，据说毛借助于群众路线在人民之

中汲取了他的思想。事实上，群众路线是从军事的实践中，也就是说从军队政治工作中抄袭来的。上级作出的决定，不管是党的决定还是行政的决定，完全象军队的命令一样，作为指示向下传达，并且以行政和纪律措施加以保证。“群众路线”归根结底不过是党员和群众解释根据毛的决定所制定的指示，并保证这些指示的贯彻执行，就象军队中历来对士兵那样。宣传和鼓动工作基本上也只限于通过尽可能简单的、容易记忆的口号，把上级制定的措施硬塞给多数文盲的下层群众，并通过戏剧队和舞蹈队的演出，以及歌曲和传单使他们更易于理解。

六十年代以来，“群众路线”再次复兴，并且在新形式下更得到了发展。“群众路线”被誉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消除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最后痕迹，扼杀各种反对毛集团内外政策的反对派的工具。就本质来说，“群众路线”正是适合了这种需要。它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因此从上面下达的政策是否符合毛泽东自称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没有标准了。这样，毛在过去和现在更可以为所欲为，玩弄权术，挑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个人的互相争斗，而自己从中渔利，时而依靠这一部分人，时而依靠另一部分人，一切所谓的或是真正的手，包括他自己的战友在内，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

就毛依靠军队，辗转于各阶级之间这一点来说，他的统治具有拿破仑式的特点。在三十年代还不是这种情况，到了四十年代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我认为，毛的社会基础一直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产业工人，他始终只

把他们看成劳动的阶级，从来没有把他们看成历史上负有掌握政权使命的阶级。

这个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后又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为封建主和军阀所补充和壮大，他们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在人民解放军战胜国民党统治后，站到了人民共和国这一边。这个成份是民族主义的沃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毛泽东把这种民族主义视为中国阶级斗争的明显表现和特殊形式，到了六十年代，则发展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人们不应该忘记，革命根据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农民，一小部分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工人阶级只有个别的代表。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也与此相类似，这些居民中有数十万人参加了八路军。而延安却是另一种景象。几万名年轻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这里，他们中间有教师和大学生，有官员和职员，有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其他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但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充满着爱国热情，要把自己的祖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迅速增长的对干部的需要，通过三至六个月的速成班，在各种高等学校和学院里学习了一些课程，最重要的几所大学，我已在其他地方提到了。延安成了一个唯一的学习中心，抗大成了最重要的学习场所。在抗大听课的人数从1936年的几百人猛增到1939年的几千人。

这里本来有极大的可能性，把中国青年的青春引导到科学社会主义上去，教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

但是，这种可能性却没有被利用。相反，毛自己讲课，阐述他关于革命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策略思想，在这当中他实际上是不加区别地反对内部敌人和外来敌人。他阐述的内容，总的说来同他 1938 年底在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同我已经提到的包括在《选集》中的文章也是一致的。

我在写这本纪事细读这些文章时，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这些文章抹去了毛在讲课中加进去的一些新内容。我还可以相当清楚地记起这些新内容，因为当时我同一些中国朋友们谈论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毛的这些讲话同中央委员会正式发表的文件一致起来。第一，同以往一样，他极其尖锐地谴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罪行，并强调，只有同时反对“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他一再重复中国内外政治问题只能用武装的暴力来解决，因而军队是执行政策的决定因素。第三，他以中国的历史为例，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说这个国家一直在进行战争，通过战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国。与此相联系，他还特别喜欢引证古代政治家和封建主的讲话，说他们是值得仿效的。他在当时就是这样使他听众的真诚的爱国主义和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

在抗大之外，毛在演讲和讲话中，也常常喜欢同中国封建朝代的历史以及“伟大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他表示了自己对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崇敬。秦始皇在二千多年以前，经过一场长达二十四年的流血战争，统一了中国，牺牲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建筑了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他为了

抹掉在他统治之前的历史，下令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焚书运动。

同样，毛对成吉思汗也极为称赞，成吉思汗在中古时代的早期就建立了拥有从黄海到欧洲的大片领土的国家。对成吉思汗的这种崇拜后来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1938年，当国民党官府为了不致使成吉思汗的墓地受到日本人的洗劫，把它从内蒙迁到中国西北时，竟号召居住在道路两旁的陕北居民，对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兵器和甲冑表示敬意。出于好奇心，我也混到这些人当中观看了这件怪事，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对这个偶像鞠躬致敬的。

看来，刘邦也是毛崇拜的偶像。刘邦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统治者，在秦朝很快地覆灭之后建立了汉朝，至今中国人的名称就是渊源于汉朝。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如果他不愿意把一种想法说出来，那末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倒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暗示说，“中国”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达到了全盛时期，最大地扩张了自己的版图——一个古代农民的儿子可以办成的事，对一个二十世纪新时代的农民来说，就更容易了。以后我读到，毛还在年轻的时候，就为刘邦所陶醉，梦想做他那样的人。无需过高地评价这段传记插曲的意义，我也能想象出，毛一生都在做着这个梦。

至于毛泽东是怎样想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他的秘密。过了几十年，我才在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伦敦1968年第110页）一书中读到，1936年他已经回答了斯诺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直接任务，不只是保护长城以内的领土主权，而且要收复全部失地”，我从同一本书中还知道，毛把

印度支那，就是说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都算作未来的“中国联邦”之中。众所周知，1964年他终于公开提出了对苏联远东的领土要求。这就证明，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开始转为今天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的萌芽。

毛的学说在抗大和其他部门非无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学说在他们的思想形成中如杂草丛生，完全淹没了他们学到的微乎其微的、但毕竟是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尤其是借口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再以毛泽东的观点加以解释，更正确地说加以歪曲，马列主义当然更是荡然无存了。

这种军事化的领导作风，包括自给自足和“群众路线”，已经完全渗透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灵。正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不少在党、政、军及经济部门占据关键地位的干部。因此，毛能够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的斗争中得到他们大部分人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能稳定下去，能持久下去吗？四、五十年代斗争和工作的实践（在这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引起了很多人对毛泽东的理论基础以及实际政策的怀疑。这种怀疑招来了众所周知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清洗，以后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这场清洗更达到了顶峰，并且触及了延安时代的干部和许多老革命家。

## 尾 声

193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住在我窑洞里的一名中央委员会的通讯员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洛甫写的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此外，什么也没有写。六年了，与世隔绝，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突然接到这个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接着又匆匆向同院的邻居告别，跳上我那匹察哈尔矮马，向机场飞奔而去。

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在向周恩来告别，周偕同妻子和养女也是要飞往莫斯科的。蒋介石给周送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作好了起飞的准备，但起飞的时间推迟了。我那些老熟人，当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中国时，都来同我话别，甚至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别时，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去请毛同意，毛让我找洛甫，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他答应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可以随后再来。我不知道，周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李



丽莲。

我们终于起飞了。到了兰州，周恩来同他的家属驱车进了苏军基地，伍修权（我以前的翻译，当时任中共驻甘肃联络处主任）把我送到中共招待所。次日，周的养女乘坐苏联汽车到了招待所，把我接到苏军基地。基地司令对我说，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因为他把我看作是苏军成员，再说，他的基地又不是私人客栈。几天后，我们又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同样是道格拉斯型的，经过哈密飞往乌鲁木齐。到达不久，苏军基地司令和周恩来在吃饭时为了我又争论起来，然而，这一次周的意见被接受了，我们四个人都住进了中共招待所。

我们继续飞行，经过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直到莫斯科，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整个旅程用了将近三周时间，因为秋天天气变化无常，在途中各地几乎都不得不作或长或短的停留。

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我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面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十二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位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但对在场的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周恩来坐在一旁，象是“原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他坚持要把我置于“中国人的保护”之下。他特别谈到了我对1934年初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哗变的态度，以及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

“围剿”时我代表的短促突击的策略。至于福建事变，在我叙述了事实真相之后，他也不得不回旋一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我的罪过。在谈到“消极防御”时，他是极其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正是他在长期战争中主张一种消耗战，而我却是赞成运动战的，尽管不是毛认为的那种运动战。我同毛的分歧是由于他的战略计划而引起的，这个计划后来以“东征”结束了。关于这些分歧，虽然我作了汇报，但周却只字未提。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此之前好象并没有全文公布。但是，毛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失败了。

当然，我不得不放弃战士的生涯，而且多年来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有人还劝我，让我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我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但我希望，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路线，最终能在中国的政治中得到贯彻。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之前，这个希望完全是可能实现的，因为直到那时，过去的一切分歧都不得不暂时放在一旁。到了1964年，当毛领导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在全世界为路人皆知以后，我才写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公开露面，这篇文章发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

在苏联，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或者受到什么报复，相反，我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在莫斯科，在伟大的卫国

战争中我还担任了负责的政治工作。尽管如此，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反对我的活动及其后果，对我以后的生活当然起了严重的长久的影响。

俗话说：“杀一儆百”，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 1931 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还在幕后阴谋策划反对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然而未能奏效。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一切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毛泽东早就暴露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因此在这里我可以不必重复我在几年前（见《地平线》1969 年第 38 期）关于毛主义的根源和发展趋势所写的回忆了。

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也不管他处在什么形势下。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体现在苏联政府政策中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就我认识到的和力所能及的，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始终是捍卫不懈的。我想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经受了这个考验。

---

我想就此结束关于我在中国期间的《纪事》。我把我在各方面的经历和观察，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方面，还有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如实地写下来，希望对于更好地了解开始于三十年代后果严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能有所帮助。

《纪事》大大地充实了1969年我在《地平线》周刊上(第23—28期)连续发表的文章《从上海到延安》,《纪事》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一组文章的内容更精确了,有些地方也改正了文中的错误。

当时我手头没有资料,因此几乎不得不完全依仗我的记忆。读者如果考虑到我有四分之一世纪没有研究中国问题,那末可以理解,个别地方可能叙述的不够完全和不够准确。但我相信,在基本过程和倾向方面,我是提供了正确的情况。

我在写这本《纪事》时,利用了文件材料和有关文献,这样我的记忆大部分得到检验和完善。尽管为了使整个内容、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完整和正确,我尽了一切努力,但书中仍然存在着我无法消除的不清楚、不准确和顾此失彼的地方。

就拿我在94页上提到的关于短促突击策略的那篇文章来说吧,伦敦出版的季刊《中国季刊》1970年第43期上登载一篇文章,题为《华夫,第五次围剿与遵义会议》,在这篇文章中,一个名叫胡志希的作者说,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我以华夫为名一共发表了八篇文章。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我不认为我会如此健忘。也许这篇文章的脚注4作了说明。据说,这个杂志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中国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如今还保存着,1932年8月宁都会议期间出版了两期。另一种由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出版。华夫的八篇文章发表在第二种版本上。这期间我的确经常为军事委员会写一些情况分析和建议,可能有人把这些文章全文或者摘要发表在这个版本上,供少数

军事领导阅读，这是我不知道的。我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译成中文是“姓李的德国人”，有人用华夫，意思是“中国男人”来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附带说明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对周恩来归咎于我的消耗战的理论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意见，在我自己得到了华夫文章的译文和影印件以后，我对于作者援引的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不怀疑的。他在援引上述文章时指出（见《中国季刊》1970年第43期38页脚注27、28），朱德和彭德怀虽然是以后，但却坚决赞成短促突击策略的。人们可以从中再一次看到，当毛泽东在遵义把“消极防御”、“军事领导上的独断专行”等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的时候，他是如何颠倒了是非。

我想仅仅以这个例子来说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而在这方面的最终意见，那就有待于历史学家作出了。我个人的回忆只能也只想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目击者把我个人的观察介绍给读者。

我的回忆或许为那些不得不多少从官方文件和专论出发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根据吧。我想，《纪事》是武器，它将有助于揭露毛主义的历史伪造者们的面目，有助于反对毛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在此意义上，我希望《纪事》能为人所理解。

## 附 录：

在《纪事》结尾提到的华夫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4月，从内容上来看好象是为《革命与战争》第二个版本写的导言。下面是文章的全文，最早是用俄文写的，这次从中文译成德文，并参照了俄译文。

### 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

中央苏区红军，过去一段时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的赢得，是由于采取了以下巧妙配合的方针：以运动战进攻敌人侧翼，包围敌人的行进中部队，在敌人背后开展游击战。这就明显表现了革命军队的主要优点：运动灵活、行动坚决和袭击果敢。

过去敌人得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它现在发动的第五次“惩罚性的征讨”与以往几次“围剿”有根本的不同。在战略方面，敌人放弃了以往进行速决战的目的，现在它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它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战术，这种战术的特点就是实行“堡垒战”，其目的在于逐步缩小对苏区的包围圈，使我们不能开展运动战，同时切断在敌后进行战斗的游击队与红军主力的联系。结果在苏区四周以及

在红军四周，形成了一个堡垒密布的狭窄地带。敌人正投入现代化的战争技术（机关枪、榴弹炮、火炮），在战场上密集火炮，同时以空军支援力量薄弱的陆军。

很明显，面对敌人这种战术，我们过去采用的简单的游击战的方法就不足以应用了。为了挫败敌人的新战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红军必须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战术的原则，这就必须保持我军以往的根本优点，同时以新的战斗方法来使这些优点更加丰富起来。

在当前的条件下，新的战术主要是从下列三个准则出发的：

1.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应派出小股战斗部队牵制、削弱和分割敌人力量，与在敌人背后、侧翼以及正面活动的地方部队协同动作。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一定要有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一定要在各种战斗中表现出独立和主动的精神，灵活和果敢的精神。在开展游击行动时，这些部队还应负有破坏公路、破坏敌人工兵设施和堡垒，以及封锁开扩地敌人的任务。

2.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

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消极防御，必然导致失败。

3. 因此，主力应集中于一定方面，这样才能给予在阵地以外的敌人以坚决的突然的打击，并消灭其有生力量。虽然游击战和防御战在革命战争的战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战斗的辅助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主力的运动战和袭击战。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赢得第五次“惩罚性的征讨”中以及敌人今后“围剿”中的胜利，红军才有可能转向战略进攻。

当然，在其间还应变化战术战斗方法。一般说来，敌人离开堡垒不会超过10—20里（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更短）（一里等于半公里——奥注）。把敌人诱入我们的领地，现在通常已不能成功。要想抓住敌人，自己必须隐蔽起来，一旦敌人向前移动，就给予致命的一击。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侧翼向敌人后卫发动进攻，当然也可以向敌人前卫发动突然袭击，但必须切断敌人与出发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敌人的武器和器材。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和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

一切指挥员应该掌握上述三项战术原则，并熟悉我军在每一种战斗活动中所要求的安全措施。在堡垒战的条件下，如果几乎一直与敌人有火力接触，敌人使用了现代技术，那末战术的胜利就直接取决于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民间侦察员和侦察部队提供的情报，行军时注意前面、旁边和背后的掩护，堡垒四周配置战斗前哨，部署消极和积极的防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充分掌握这些措施，敌人往往利用我们在这方面的延误，对我们进行突然的夜袭和空袭。



我们在自己部队和敌人部队作政治工作，常常好象是我们处在和平的环境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工作的灵活方法，特别是在基层更应如此。

至于谈到物质的保障，我们必须节约使用我们拥有的物资，特别是弹药不应过早消耗。总之，对武器以及其他装备都应极其细心地使用，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可做。

战争的现代条件要求我们红军指挥官更坚决地行动，作出果敢的决定。他们必须能够迅速、正确地判断形势，估计敌我双方部队的人数，考虑敌我双方的地形和时间因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迅速地作出坚决的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毫不动摇、毫不踌躇地诉诸实现。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必须依靠自己的勇敢，还应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与战术能力结合起来。缺少这一前提，那末在现代战争的困难情况下，他们就不能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因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采取在战术上正确的灵活的方法。

同时，政治工作者必须能够敏捷地判断不断变化的形势，了解战斗进行中的困难条件。他们也应该熟悉军事战术的原则，而不应脱离实际的战斗行动，想入非非，而应该通过具体的政治措施帮助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革命与战争》的任务在于教育和训练红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使他们认识现代战术和政治工作的相应方法，从而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红军干部。

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多数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他们过去没有机会受到系统的教育，完全依靠自己的实际战斗经验。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